

“第三世界”：社会、政  
权和军队





# “第三世界”：社会、 政权和军队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 著

力 夫            阜 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Георгий Ильич Мирский  
**“ТРЕТИЙ МИР”: ОБЩЕСТВО, ВЛАСТЬ,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第三世界”: 社会、政权和军队**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 著

力夫 卑东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32 13.1×16厘米 177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300册

统一书号: 3017·263 定价: 3.05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的专著。作者格·伊·米尔斯基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现行对外政策的反映。

近年来，苏联为了遂其霸权扩张，口念“缓和”经，手执“天然盟友”帽，一直在第三世界或通过“军援”控制当地的武装部队，或直接间接用武装干涉来控制一些国家：从安哥拉到非洲之角，从印度支那到阿富汗，一系列的事件都证明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与日俱增。然而，事实能教育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或正在逐步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一些国家摆脱了或正在逐步摆脱他们的控制。

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是为苏联霸权主义服务的。然而，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苏联对第三世界军人政策的政策；同时，也可以了解第三世界的军人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背景。

1980年2月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提····· | 1   |
| 第二章 | 军事政变的原因和目的·····  | 65  |
| 第三章 | 军人执政·····        | 197 |
| 第四章 | 军队和革命民主·····     | 323 |
| 结 论 | ·····            | 398 |

## 第一章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提

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崩溃，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几十个新独立国家。列宁的预言实现了，他曾写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斗争的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sup>①</sup>继东方觉醒阶段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sup>②</sup>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开始了。

政治独立是从殖民统治下获得完全解放的第一步，是消灭各种形式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独立还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不铲除这种剥削，就不能克服整个世纪的落后。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内部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是改造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而且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真正的革命改造。要解决这样巨大的任务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不能不运用社会主义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特别有利的条件。改造的内容取决于领导这些国家的政权，而政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社会的阶级结构的。

---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四卷，第102—103页。——译者）

② 同上。（同上，第103页。列宁的原话与本书引语稍有出入。——译者）

殖民主义剥削是施用于不发达的条件的，因社会的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都很薄弱（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来看这些“主要阶级”）。除了个别一些国家（印度、菲律宾）外，在解放了的国家里，工业资产阶级不能代表资本家阶级，在这些国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投机商、建筑业的包工头、掮客、现代买办资本家，以及在非生产领域中拥有资本的那些人。工业无产阶级在很多国家里，力量薄弱，很不成熟，还没有组织起来。

阶级结构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中间和中等社会阶层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份量<sup>①</sup>，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这首先是国家机关的职员和知识分子（高、中等学校的教员，以及被“中等阶层”团结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包括军人知识分子，即军官。

这些握有军权的军官通常能够迫使国家向某个政治方向发展。近二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在许多国家里，军官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仅在近十五年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约有三十个国家发生了大约四十次成功的军事政变。这说明在“第三世界”军队干预国家的政治已经成为惯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政权落入军人手中已经不是例外，几乎成为一条法则，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规律的事实。

直到六十年代初，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这种规律性的事物几乎还没有研究过。分析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

---

<sup>①</sup> 我们认为，半无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群众是中间阶层，它们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地位。而职员、自由职业者、大学生和军官属于中等阶层。

主要是停留在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地主“四项式”概念的框框内。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军队通常都没有纳入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范围，只是近期以来，这些社会阶层由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已很明显，因而才成为研究的对象。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门学科中填补空白。本书的任务是要探明战后在一系列亚非国家中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规律，弄清楚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军队急剧加强干预政治生活的因和前提。

军队在各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远非相同的，要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是困难的，譬如，伊拉克军队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帝革命中是先锋力量，而在一九六八年前的这段时期内，在许多方面却又阻碍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印度尼西亚军队曾经是反帝革命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它的领导信奉反共主义，从而导致军队两次参与对左派组织的残酷迫害。因而，要给战后以来的所有军队简单地说是进步的或反动的，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军官阶层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向守旧和反民主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按照亚非国家军队的性质，可分成四类：一、非殖民地军队，即原来国家的或形式上是主权国家的军队，但掌握这些军队的国家仍以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带有殖民主义影响的烙印。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阿富汗、泰国、也门等国的军队。二、前殖民地军队，即由殖民主义者建立而由民族主义政权继承的军队，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



叙利亚、埃及、扎伊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三、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建立的军队(缅甸、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四、民族主义国家建国后成立的军队(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军队)。

在第一、二类军队中,最高指挥官通常同旧的特权阶级有联系,军事教育和思想训练主要都是在宗主国的军事院校接受的。将级军官都是保守的,大部分是亲西方的。但是在某些国家里(埃及、北也门、叙利亚)在革命政变过程中旧的高级军官基本上都已被清除,现在这些军队按其领导成员的组成来说已接近第三、四类。第三类军队按其成立时间来说,最为年轻,其中职业(科班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也最少,这些年轻革命家基本都出身于自由民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独立战争时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军事斗争。当然其中许多人在过去这段时期已经完全职业化,并且沾染了某些军阀官僚的习气。第四类军队,基本上原来都是警察部队,他们没有战斗经验和政治威信。

在建立军队时,殖民地政府总是尽量从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和最落后的居民中招募士兵和军官,这种别有用心政策,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对于殖民主义者较为可靠的殖民地武装力量(在落后地区要渗进进步的爱国思想是困难的),这种政策还可以挑动有反帝情绪的大城市居民、农民和这些山区士兵之间的仇恨。用这样的办法,即使在较发达的国家里也就可实现专制政权的领导。

亚非国家独立后,原属殖民地和没有经过反压迫革命战争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实际上继承了殖民地政府建立的军队

(或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按我们的分类,这样的军队属于第二类和第四类。所以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或是保留了原来由殖民主义者培训的军官,或是指挥岗位仍由那些受过军国主义教育的旧军官所占据。有关这一问题,下面我们还将进一步分析。现在我们先来研究军队在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

军队是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的象征,实际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主义国家虽然完全没有必要由军队来防御外敌,但是他们都愿意有自己的武装,要它们放弃军队那是不可能的。在非洲许多小国中,无用的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都认为有自己的军队是合理的,在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掌权的政治家都怕受到反对爱国主义的责难,不敢提出放弃国家军队的设想。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派也不敢提出类似的主张。

同时还要考虑到即便将领和军官的人数再少,但他们支配着国家唯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他们能够动用这支力量来坚决反对任何一个力图取消军队的文官政府,后者也很清楚这一点。

因为强调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则将给财政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但可以提出下列理由作为充分的根据,例如,存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或其他纠纷,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运动,等等。

应当看到,本国军队的存在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由于人民在几十年以至百年内失去了国家和自己的军队,他们看到

本国军队，便认为是独立的标志和主权的现实体现，认为这证明他们同耻辱的过去已彻底决裂，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主宰一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在多数国家里，就军队的职业而言，在传统上也是受到尊敬的。属于例外的情况只有中国，那里流行一句格言，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印度的种姓制中，军人（刹帝利）仅低于婆罗门。又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给予军人在社会教阶制度中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当兵不是为国家，而是为殖民主义者服务，所以军队不吸收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现在情况已根本改变了。

还有一点，对于农民的子弟来说，服兵役不仅是荣誉，而且给予进入社交界开辟了美好前景。无论何时，这对于他们总是一条最好的出路。所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人们不正确地把士兵看作是“穿军衣的农民”。不管怎么说，军队是属于有特权的、受尊敬的和常常能够左右社会的组织。要把阶级觉悟不高、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士兵和农民本身区别开来。士兵在不小的程度上已经反映本阶级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并且害怕失去这样的地位，他们顺从地跟随军官袭击总统府或者在广场上驱散人群。这些情况为本书论证军队是唯一的力量提供了根据。只有在军人政权开始公开反对农民时，军官才会失去士兵的信任。那样，士兵“社会内部”便可能发生叛乱。显然考虑到这一点，军事当局往往表白自己是“倾向农民的”。

由于军队有崇高威望，自然它比社会的其他机构优越，从而为它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可以确信，军队在这种情

况的国家里是全民族的机构，即这些国家的民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全民族的交往很少，那里的家族、氏族、种族以及地区联系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超过对整个社会的感情。从太古以来在群众心目中，国家与其说是民族主权的象征，不如说是行政强制机构。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就懂得氏族、种族、乡村、阶级、教派等类别。各阶层的群众，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种族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汇集到军队中。不识字的农民的眼光局限于狭隘的农村，但在军队中同其他地区和别的社会阶层的人相遇，在共同的民族大家庭中和各种人接触，这才开始觉悟。也就是说，军队可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觉性。所以军队又可以看作是民族统一的象征，主权的化身，成为国家的一个特殊机构，具有独特的性质，它比其他机构的地位优越。

而且军队是最现代化的社会工具。甚至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军队也不得不在军事科学和技术方面，以某种程度达到一般的现代化标准。行政机关、国民教育、文化和科学，以及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停留在原始水平，特别是当一些国家同外部世界隔绝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如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在近期发生的事变以前就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内不一定要向别的国家看齐，但在军队方面，这样是不行的。按军队的特点来讲，它是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它是被用来抵御外敌的，不能让它的训练和装备落后于敌人的水平。所以竞争和向外部世界看齐是军队固有的天性。必须把军官派到外国去学习或者是从外国聘请教官，必须使军官们了解世界上的技术成就和外国军队的组织情况。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使人进行对比。谁也难以做到象军官那样敏锐地发觉

国家的落后，因为他们在接受军事教育过程中，不仅了解其他较发达国家的军队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进步情况。觉察到本国的落后状况就可以提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激发他们起来为消灭外国统治、改造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最后重建这个社会而斗争。换言之，这样的过程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是依靠许多军官的思考、即依靠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来实现的。

按照现代军队的发展情况，参谋部的工作日益重要。参谋军官的人数也就是知识分子在军队内部的人数，因参谋人员都是知识分子。按照工作的性质，参谋军官必须懂得外国的各种新式武器和了解外国的技术进步情况，关心军队的现代化。这些军官是落后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对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和低水平之间的差距特别敏感，知道社会如果不摆脱外国的控制、不走工业化的道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停留在这样的低水平上，那么这种社会就有濒于灭亡的危险。<sup>①</sup>

如上所述，在落后社会中，军队是唯一的全社会的机构，它超越于传统停滞的带有宗教种族观念和偏见的世界之外，超越于分成为阶级、宗派和集团的世界之外。所以它具有各种政党所不具备的优点，政党除共产党以外通常是同狭隘的集团利益相联系的。军队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它在人民面前是

---

<sup>①</sup> 意大利的军事问题专家阿里多·里灰佐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军官通常都是外国军事学院毕业的，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接触面很广。这些人必须懂得非常复杂的武器和战略，通晓现代技术，成为上流社会人士，自己意识到要担任指挥官，而实际上也经常指挥。”（《前哨》周刊，1973年10月4日）

全民族的力量。

还要补充一点，军队，首先是军官阶层，经常注意内部的团结。在一切军队的军官中，都注意培养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典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特权阶层和享有团体威望而感到自豪。

管理集中、军阶制度严格、有纪律、内部联系方便，所有这些同社会的一般组织相比，武装力量是强有力的，当它们去完成政治任务时，便能够提高军事行动的效率<sup>①</sup>。

但是军队同所有的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相比，它的主要优点还在于独占军事实力。军队拥有武器，并能够使用这些武器。比之其他组织，军队能在最大程度上使用暴力。军队按其特点，是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军人是专门“使用暴力的专家”。如果军队团结一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那它百分之百能获得成功。在战后历史中，亚非国家还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军队团结一致，有人能够违背军队的意志去进行几次国家政权或社会政治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军事首脑得到军队全力支持或未因政治动荡而丧失自己的权威，有任何其他力量能解除这些军事首脑的职权。一九六四年，苏丹推翻了军事专政，代之以文官执政，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倒向革命运

---

<sup>①</sup> 意大利心理学家埃米里奥·帕尔瓦焦也确认：“过惯了兵营中的生活，兵营的纪律和军阶等级有着无可怀疑的区别，命令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讨论的，敏锐的思维能力等于是多余的，从而形成专横主义，这种专横还从军内权力向外扩展，结果不可避免地要把这种绝对服从的制度扩展到生活中。”（见《前景》周刊，1973年10月4日）

动，并带走了士兵群众。顺便指出，在“第三世界”，军官几乎经常都能依靠一般是从政治上落后和受压制的农民中招募的并听从他们命令的士兵。这种情况便有利于他们采取政治性的军事行动。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军队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的，尽管这些国家并不希望实现军事统治。一九五三年，伊朗军队顺从地跟随反动的将领在保护王国的口号下镇压了革命运动。伊朗国内的进步力量是很大的，但军事力量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一九六八年，马里军队仅仅在不多的几个小时内利用了群众的愿望就推翻了总统。加纳仅几百个士兵遵照反动军官的命令，就推翻了拥有全部政权和操纵除军队以外的一切关键部门的制度。

军队作为暴力工具，它能够粉碎抵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决定。军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的；它最有效率、有组织，是全国现代化的力量。军队特殊作用的教育在军官中间经常进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也是负有历史使命的力量。对于确信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军人来说，意识到这个使命，也就容易相信军队是实现这个变革的先锋力量了。

军队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正在发生（这里和下面所讲的军队首先是指有政治头脑的人，它的首脑就是军官），军队跳出它一般的“天赋”职能的框框，它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这里应当明确指出：实际上军队整个都是政治力量，不过有些军人自己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罢了。武装力量是为国

家服务的，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军队通常总是属于政治组织的。但另一方面，在政权制度中，如果按职能进行“标准”划分的话，直接管理国家的职能并不属于武装力量的职权范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权制度中，军队已经有点越轨了。但就性质而言，军队不能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可以“制定政策”和领导国家。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说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不过是形式，其实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已经和政治相联系，并按照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方针行事。列宁曾经指出：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伪善的奴仆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sup>①</sup>但是，军队充当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者来影响政治是一回事，而当它客观地被派去推翻这些阶级或它们的代理人的统治，则又是另一回事，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缅甸就曾是这样的情况。<sup>②</sup>

热带非洲的许多国家甚至发生军队实际掌握政权的情况，以保护上层特权阶级不被推翻，因而，归根结底，它的行动是服从于上层的利益的。尽管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在这些上层人士看来，不求助于武装力量的帮助，就会失去对政权的直接控制，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上

---

<sup>①</sup> 列宁，《军队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十卷，第36页。——译者）

<sup>②</sup> 现代资产阶级作家明确认为，军内问题是首要任务，如美国研究工作者G. C. 洛奇写道：抵御外敌是武装力量职能中“最次要的部分”，而它的“主要职能是镇压文官的捣乱，防止内部的破坏活动和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保持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威胁力量。”（G. C. 洛奇，《变革的动力》，纽约出版，1970年，第177页）



层的危机才可能发生，即这些保护上层利益的军队认为必须推翻这些上层人士的政权，或认为至少必须撤换部分领导人，否则没有别的出路。显然，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政权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些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体，从专制政体到议会制度。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第三世界”政治不稳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紧张，这种紧张通常是同非殖民化的进程效率不高和速度缓慢相联系的。从而为军队干预政治提供了口实，这种干涉能够或者有助于实现上述的政权更迭，或防止这种更迭。<sup>①</sup>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究竟有那些前提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研究工作者都想找出一个“公分母”，希望最好能够找出某种标准：在“第三世界”，什么样的国家会发生政变，什么样的国家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生活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军事政变几乎在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军队夺取政权既可能发生在尚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前的那些非常落后的国家（如也门、阿富汗），也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发展的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军队既推翻那些保守的君主制度（如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同时也推翻那些奉行革命进步方针的政府（如加纳、马里）。但不能作出下列论断，似乎政变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第三世界”最不发达的国

---

<sup>①</sup> 美国学者 T. 维科夫写道：“军人执行适合于本国政治条件的行动方针，他们自己并不认为对有无民主负有责任……，军人的政治作用不是‘政治病’，而是政治上非常幼稚的表现。”（T. 维科夫，《军队在拉丁美洲政治中的作用》，《西印政治季刊》，第13卷，1960年9月，第761页）

家或是最年轻的国家。军人推翻文官政府既发生在那些古老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同样也发生在年轻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发达的国家(按非洲的标准,如尼日利亚)以及那些落后国家(如乍得)。被推翻的制度的“年龄”有的是几十年,有的才几个月。

当然,不难证明(特别是事后来看),被推翻的制度通常是没有牢固社会基础的。英国学者J.李写道:“当军队改组那些当权的领导人时,这并不意味着它全部破坏了公认的社会制度。”<sup>①</sup>他的法国同行D.拉弗罗夫坚持下列意见:“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是非洲政治制度的衰落……军队不能消灭有效地工作的文官制度,而只能不费力地确立自己对国家的监督,而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已被剥夺政治机构。”<sup>②</sup>在这些论断中,有夸大其词的一面;譬如,加纳在恩克鲁玛时期,或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时期,都未必可以说已经是“被剥夺政治机构”的国家。但可以相信,几乎所有要被推翻的政治制度,在政变前夕都已走到了人心向背的地步,在每个这样的制度中都暴露了严重的弱点,或甚至有了很大的缺口。正如美国学者A.佐利别尔格确切地指出的,政变的重要前提之一是,“领导人的理想目标同能否执行政策来实施这些目标,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sup>③</sup>。但是,有这种可能的仅仅是那些在殖民帝国废墟上

---

① J.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158页。

② 拉弗罗夫,《黑非洲的军事体制和政治发展》,《法国政治学杂志》,双月刊,第22卷,1972年,第五期,第984页。

③ 佐利别尔格,《军事干预,政治发展的专例研究》,纽约出版,1968年,第77页。

建立起来的制度，首先是非洲的制度，而不是那些革命前的埃及、伊拉克或也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毫无“理想目标”。至于说非洲的“新”制度，以及巴基斯坦、叙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的制度，确实象下面将要讲到的，有的已濒于崩溃，或总的来说，这些制度已失去信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经济和物质因素相联系的：期望赶走殖民主义者以后能够立刻回到神话般的“黄金时代”的人们，想要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愿望没有实现。“人们寄予期望的革命”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成了“骗人的幻影”。社会各阶层逐渐陷入深深的绝望：公务员、知识分子、穷苦的小市民都意识到生活将非常艰难，物质状况即使得到改善，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年轻一代中绝大多数人得不到飞黄腾达的光辉前程。“人口统计学遭到破坏”，城市集中化导致无收入的城市人口膨胀，而且城市居民需要的供应高于农村，要满足这些要求是比较困难的。于是，示威运动就会产生强烈的作用。大城市的惊人社会对比大家都直接看在眼里，对新的特权阶层的不满日益增长，抗议就将发生。

贫穷依然如故，生活水平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没有任何提高，而且这两种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粮食生产比起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在相对下降；农业经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摆脱非常落后的状态，产量通常很低，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微乎其微。在热带非洲甚至于还没有完成从锄头到犁的过渡，十个非洲人中有八个仍生活在自然经济环境下。从经济上对殖民结构的改造进展得非常缓慢，原料的出口如果说不是唯一的话，那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

论证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贫穷原因的内容充实的著作，我们和国外都出版了几十部。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长期和残酷的殖民主义剥削，这不仅阻碍亚非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它们的经济走入歧途，从而影响它们的发展，使这些国家成为专门为宗主国提供农业原料的附属国。

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接连不断地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掠夺。他们每年从所谓第三世界榨取几十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一九七〇年公布的关于世界粮食状况报告的资料，这三大洲有三亿七千五百万人处于饿死的边缘。”<sup>①</sup>

六十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居民人口收入，每年增长六十美元，而解放了的国家才增长二美元。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留下的后果，使大多数解放了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依赖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切后果都依然存在。

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在经济上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使人民群众深感失望，而且这也是观察亚、非许多国家政治不稳的客观根据。在许多国家中，领导独立斗争的政治力量由于没有能力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使自己失去威信，当然，要很快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独立

---

<sup>①</sup> 列·伊·勃列日涅夫：《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莫斯科版，第333—334页。（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31页。——译者）

后的初期阶段，过分乐观是毫无根据的。

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热带非洲，政变的原因有时是慢性的内部政治危机。造成这样的危机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无能和堕落，这个集团包括国家的高级官员、党派成员和议会代表。

这个集团（在国外著作中常称之为阶级）的形成和巩固，对于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官僚资产阶级是这个新的上层集团的核心。

在独立之前，这个上层集团中除了宗主国的代表，即殖民者的行政官员和生意人之外，还包括为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地方官头目、高级官员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争取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又从反对殖民统治政党的积极分子中形成一支和这个殖民买办集团同时存在的“反对派”力量。那些受过教育的青年倾向于这支新的“政治”力量。政治舞台是最有前途的，而且特别宽广。政治活动的范围和公务的差别在于前者不受一定公职数量的限制。

独立之后，情况变了，行政官员代替了政论家、宣传员和记者。迫切需要管理干部就使得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到行政机关中去，这些部门很快就有人满之患。著名的英国非洲问题专家 R. 费尔斯特指出：“文官职务和军队都是获取权力的新途径，穿军衣的或穿文官制服的行政官员都是当权的‘新官僚’。”<sup>①</sup>她还写到了这些行政官员同新生资产阶级合流的过程，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原有的贵族开始在现在的大公司中

---

<sup>①</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112页。

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承包了工程项目，从事不动产的业务活动。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同北方开发同业公会的三十九个投资和贷款设计项目有关系，这事揭露出政府中的大部分人从银行中获得巨额贷款，部长的一句话，尤其是北区总理的话非常管事，可以超越法律和同业工会委员会的决议。”<sup>①</sup>

费尔斯特还指出，在尼日利亚南方省“形成了新企业家和农场主阶级，这些人是可可和橡胶园的占有者，原料收购者、商人、载重汽车所有者、高利贷者。同他们并肩工作的有书记员、手工业者以及大出口公司、政府机关、运输和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sup>②</sup>

在较落后的非洲国家里，这类现象显然是少得多，但在各地仍然存在发展的趋势，甚至在某些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况，虽然这些国家正在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庞大的国家机构对于最落后的亚、非国家来说，是一个独具的特点，非洲人甚至讽刺地称之为“主要工业部门”。这种国家机构的上层领导是官僚主义集团，比广大群众的固定工资大得多的相当一部分国库收入被他们所占有的。

英国记者迈季约兹指出：“在非洲国家，能引起暴乱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触目惊心的浪费行为，这种浪费多数都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造成的。在整个非洲大陆建造了许多豪华的总统府，为了招待成百个特权阶层的客人，用美酒佳肴来举行庆祝解放日的宴会，可是附近村镇贫民窟的居民都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议会代表除年薪外，还有各种外快，他们巨大

---

<sup>①</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146页。

<sup>②</sup> 同上。

的超额收入，当地医生都望尘莫及，更不要说农民了。”<sup>①</sup>

在尼日利亚，居民按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六十年代末是二十九镑，有大学文凭的官员的最低工资也超过七百镑，一个部的常任秘书基本工资达到二千五百镑。这些官员还要求为他们支付小汽车开支的专门费用，同时，每年休假期间还要准许他们到英国去公费旅行，他们享受的待遇如同殖民主义时代的英国官员一样。

中非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花费的费用占年度财政预算的81%，仅职员的工资开支一项即占58%。同样的开支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独立后的四年内增加88.8%，占财政预算的62%。象牙海岸有一万五千名官员，占居民的0.5%，他们占去了财政预算开支的58%。达荷美（一九七五年底改称贝宁人民共和国。——译者）的国家机构的开支占预算64.9%。马格里布各国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增加了30%，而官员却增加了五倍。

非洲马达加斯加群岛共和国的国会议员每月收入是十二万到十六万五千法郎，可是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才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加蓬由于经济原因，甚至解散国会，因为议员们的薪金造成了国家预算过重的负担；上议院议长沃尔特·杨梅的月薪就是三百万旧法郎。<sup>②</sup>

赫普古德曾经这样描绘过非洲的按欧洲方式生活的上层人物和普通人民的巨大差别：“80%—95%的非洲人，都是农民，他们的收成用价值计算每年可得四十到八十美

<sup>①</sup> 《纽约时报杂志》周刊，1966年4月10日。

<sup>②</sup>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

元……。同农民相比，一个普通的政府书记员或汽车司机每月的收入大约六十美元，这已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属于上层的是政府官员，每月可得六百美元，并且政府供给他们汽车和司机，他们有别墅和仆人……。非洲领导人先是住在欧洲人的豪华邸宅中，后来在各自的首都建造自己的豪华官邸。‘这些人多数连开小汽车的门都不愿意自己动手’。有一个司机向我发牢骚说，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就可看到象牙海岸的领导人是如何脱离了自己优秀的‘黑种人’的。”<sup>①</sup>

非洲堕落的根源是同部族传统相联系的，这种传统就是所谓人们互相搭救。几内亚比绍已故领导人阿米尔凯尔·卡勃拉尔曾经讲过，“非洲有个传统，按这个传统，如果我有个叔叔在城里，我就可以乘车到他家去，住在那儿，不用工作，而他将养我。”<sup>②</sup>这就是所谓的“恩杜库”制度（部族兄弟制度）。李仁写道，“每个部长，也就是说每个管理者。每个冒充所谓‘阁下’的人，当他刚得到一个领导职务时，他的所有部族兄弟一直到最远的远亲就都会来投靠他，要求得到能有豪华享受的职位，有自己的一份面饼。给他们领导职务之后，同样还要有办公室、司机，等等。而每一个新的领导者，照样又有自己的部族兄弟，也要再搬用族规。照这样的制度办理，直到最后，所有的职位都给那些最平庸的人占有了。因此，在阿伯特维尔，四十多个木匠占有了文官职务的岗位，于是，怎么会没有通融资金购买木料和钉子呢。而卫生服务处为了保持一条不到十

---

① 苏联杂志《在国外》，1964年，第八期，第20页。

② 《国际社会主义者》杂志，1964年，8月号，第432页。



公里的街道清洁，竟给一百八十六个清洁工支付薪金。”①

赫普古德还谈到：“当你在首都访问某个非洲活动家时，通常可以看到他有十来个或更多的亲戚，这些人没有工作，闲住在他的家里，吃用他的薪金就象花自己赚来的钱一样”。②

法国记者K. 瓦尔雷也证实：“要是在北非大草原深处得到消息说，兄弟或堂兄弟找到了工作，是在邮政部门，那么这个幸运者每月可获得七千殖民地法郎，于是，他所有的亲戚都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在非洲，谁都没有想过自己是最穷的，谁也不愿进养老院，而是不定期地到某个亲戚家里，甚至是远亲。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人的家里都是供养十五到二十个亲戚。”

在中非共和国，“由于得了二百万到三百万非洲法郎的贿赂，就出卖了开采金刚石的权利，这种坏事涉及到整个国家，从一九六三年起有大小二十个地方官员因进行非法活动而被捕，关进了监狱。但容忍受贿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这个人受贿的数目不超过二十五万法郎……，司法机关甚至可以对这个发不义之财的人听之任之，不加起诉。党证也是勒索的筹码。要给某些报酬才能得到党证。在地方上，黑非洲社会进化运动负责人以八千法郎的价格来出卖它，任意确定这种‘志愿纳费’。”③

在目前的刚果（金沙萨），④在基伍省发现总理和两个政府官员组织了一个名叫“索科热基”的股份公司，他们依仗副

① 《世界报》。

② 苏联杂志《在国外》，1964年，第八期，第2页。

③ 苏联《消息报》，1966年第三〇二期。

④ 1971年10月已改名为扎伊尔。——译者

夺比它们成立早的那些公司的办法，垄断了茶叶和咖啡的收购和生产。在总理米奥罗和他的同谋犯被逮捕前，他们还成功地将八亿刚果法郎的茶叶和咖啡运出境外；根据公司理事会的指令，这笔款项已被查封，并且转到了部长们的私人账户上，存在欧洲的几家银行里。<sup>①</sup>

刚果(金沙萨)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平齐·阿尔图尔被揭露出卖一大批属于国家的象牙，并且私吞了这笔钱。外贸部长马尔谢利·比苏基罗任职期间，无论是在卢蒙巴时期或是阿杜拉时期，他都禁止使用属于该部的一千四百万刚果法郎的基金，而把这笔钱窃为己有，并在国外买了若干家银行和工业企业的“非固定资财”。最后这个部长不但没有丢官，而且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他又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掌握了一家叫做《新美德》的报纸。比苏基罗厚颜无耻到极点，甚至企图把刚果的国家公园出卖给一家欧洲公司。<sup>②</sup>

在某些非洲国家，外贸商人都规定了“销售指数”，为的是规定商人必须花多少钱才能和部长会见。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贪污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明目张胆的伪善和所谓严格节约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不久前被推翻的上沃尔特总统亚莫戈要求工会严格节约，而他自己却在巴黎为未婚妻购买最贵重的礼品，并举行了极豪华的婚礼。

赫普古德以及其他作者一致指出，非洲人民群众的不满，

---

① 齐格勒，《新非洲的社会学》，巴黎出版，1964年，第240—241页。

② 同上，第242—244页。

正是反映了社会贫富不均正在扩大，物资匮乏日益紧张。<sup>①</sup>

正如塞内加尔的一些进步作家所描述的，“官僚资产阶级具有产生这个阶级的一切资产阶级的最坏特点：正统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无耻，追求豪华，耍弄阴谋和搞宫廷政变，蛮横无理，本能的封建主义，贪污和徇私舞弊，好逸恶劳，以及所有官僚阶级的其他特征”。<sup>②</sup>

如果说，非洲人民对这种寄生阶级不表示不满、抗议和反抗，那才是令人惊奇和不自然的。C·米斯别尔曾谈到他和伊巴丹大学经济系的一个学生的一次谈话，这位学生主张由大国提供“带条件的援助”，控制资金的分配，否则这些资金往往会落入贪污成性的领导人的腰包中。“三分之二的外援正在装进上层人的口袋，在我们尼日利亚，这些人会做出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一切”，贪污恰好就是一九六六年政变的主要原因。

在热带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官僚资产阶级真是怨声载道。但是，官僚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仍是享有特权的上层集团，处于领导地位。鉴于它的数量很少，可以预料，这个寄生阶级在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如此广泛的抗暴斗争面前是很难站住脚的。但是也不应当过高估计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根据这些青年人的心理，按他们的“欧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按他们的亲属关系和生活习惯，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步领导集团的后尘。人们经常谈到这两代人的差别仅仅在于：老的一代能够走进赡养所，而年青一代还没有他们的位置，需要等待。当他们在等待职位和别墅

<sup>①</sup> 赫普古德，《非洲从独立走向未来》，纽约出版，1965年，第77页。

<sup>②</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5年，第六期，第56页。

的时候，可能会因不满而对抗，对丑恶的领导集团表示愤恨，因此，成为为正义斗争的战士而发挥良好的作用，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望。但是，在灵魂深处，他们懂得或本能地觉得，真正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他们是不利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一代代的自然交替不可避免地将使他们得到“上升”，过去的大学生可以走上特权地位，他们作为特权的享受者，就会满怀热情地穿上盛装，这些大体上属于受同一思想教育的年青知识分子，如同现在的部长们一样，加入官僚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个阶层和所有官僚阶级一样，也是它们的再现。这便是官僚阶级生机旺盛的奥秘。

具有真正爱国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现实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如改造农村生活，教育不识字的农民，为他们治疗疾病，改进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工人中组织学习小组，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启蒙工作。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对社会有益的活动，都能够发挥有文化的青年的才干，但只有在发扬自我牺牲精神和真正关心人民幸福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然而，年青一代中多数是受“欧洲教育”的，他们缺乏这些优点。这些人的世界观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只能搞些改良主义运动，而不能参加革命。如果把热带非洲的所有年青知识分子都机械地列入革命力量的行列，那是错误的。只有最先进的青年才能积极和自觉地参加革命，而这些人中数量是不多的。

但上述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直线发展的，它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空位”有限和希望得到位置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

离。快速运转的国民教育机器培养出来的人，多于国家服务岗位所需要的人。而且受过教育的年青非洲人向往首都的国家公职，而不愿在远郊农村或建筑部门为社会服务。这样，就会拖长等待时间，最有毅力的人的默默不满也会转化为积极抗议，产生采取行动的渴望，导致使用暴力，不再“守法”。对于那种实质上“非思想性的行为”的思想根源，当然首先可以在民族人种关系上去寻找。在非洲，由于存在着很多民族和部族，历史遗留留下许多民族纠纷，往往很容易点燃潜伏的火星，把过错推到物质状况方面，借口某个人种团体剥削落后民族。所以，无论是表达真正的社会抗议，或是表达抗议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企图改变上层集团人员的结构，更选特权阶层，以及得到“光辉前程的职位”，等等，都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掩护下很好地进行。

但要得出结论说，在热带非洲国家不存在对抗特权阶层的现实的激进反对派，那是不对的。工会正在成为日益强大的力量。可以说，非洲的工会和军队一样，都是社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其影响将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而增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非洲的无产阶级现在人数还不很多。但是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的工会正在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刚果（布拉柴维尔），正是工会为推翻腐朽的反民族主义制度，富尔贝·尤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达荷美和上沃尔特的工会准确地运用了布拉柴维尔的经验取得了胜利，军队不过是“冒名邀功”罢了。由于工会和具有真诚爱国主义及主张社会正义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的反对，才能在各方面为军队夺取政权创造良好的条件。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指出。这个因素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各集团、地方和部族相结合的力量，使被保护者和保护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因素同上面所讲的“部族兄弟”制度是有联系的。很多政界领导人到同一种族的省或州的居民或自己所属部族的成员中，或自己所属的地方集团中寻求支持。如果这个领导人当上了部长或是行政机关的“大人物”，很自然，他就会使“自己人”得到工作，帮助“自己人”得到有利的买卖。新上任的非洲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被保护者”。明显的阶级差别和鲜明的社会界限竟被那些按血统、种族、部族和地方的独特的划分所取代。形成了许多“小集团”或小的共同体。这些小团体使人们互相结合，“紧密团结”，要拆散它们是很困难的。所有这些地方性的结合和盟约很早就有了，但在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大范围的国家及地方机构后，如果这种地方性的结合“政治化了”，即纳入了高级的政治范畴，那就会直接影响国家事务的进程。下列事实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某个首领没有成为领导集团的成员或离开了政府，成为反对派，那么，他的所有“被保护者”的地位都将受到影响。“保护者”的失势自然会导致他的部族的影响下降，部族成员已经不能指望仍处于“有利可图的地位”或再享有特权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自然会使他们起来反对政府，成为另一个紧张局势的根源。

劳动就业问题是造成社会政治形势经常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劳动就业，而是指到国家机关部门中去任职，那部分受过教育的青年（如上所述，遗憾的是这部分青年人数不多）希望更多地占有这个“殖民主义遗产”，这

部分青年最耽心自己的职业。在各民族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在非洲许多国家中出现一种最尖锐的政治斗争形势，这便是“争夺光辉前途”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国家看作是一种能保证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得到“美好职位”的机关（当然还包括工资）。达荷美和上沃尔特便产生了混乱，引起了政治危机，而结果便出现军队的干涉，政府只好作出决定，减少职员的工资。C.勃罗别尔热写道：“这就是一联串国家政变的主题。”<sup>①</sup>由于集团、种族、氏族之间的利害关系一步步地暴露出来，便产生特殊的社会气氛，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裁员而被免职的人或工资被减少的官员不就等于成为不幸的候补官吗，这种挫折首先看成是自己的失败，这不是个人的恶运，也不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所有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结果，而是政府执行的政策和“压制”使某个集团或部族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结果。

社会按地方、部族和集团进行划分，“正常的”（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政治生活的差异和准则就会被模糊和搞乱。按照这样划分建立的政党，有时就有非常特殊的特征。著名的刚果（指现扎伊尔。——译者）政治活动家安托·基赞加一九六〇年曾经对本书作者讲过，他创建的“非洲独立党”有二百万人。后来查明一个大部族的所有的人都自动登记为该党成员，基赞加本人就属这个部族，他们确实跟随他，因为他是“自己人”，他是“他们的”领袖；但另一个问题是，作为政党，这样的组合究竟有什么价值。

---

<sup>①</sup> 法国《费加罗报》，1966年5月14日。

波兰记者T.帕谢尔宾斯基在莫迪博·凯塔执政期间在巴马科访问过一位高级官方人士，问他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执政党有多少党员，听到的回答是：“几乎是整个民族！”果然，一九六六年在马里四百六十万居民中党员人数有一百七十万。<sup>①</sup>

把整个部族都吸收到党内而得来的巨大数量，只能模糊事物的真实状况，使自己的领导人受到蒙蔽。人为地“忠”于领袖的理想，而这个领袖又被群众组织人为地夸大宣传，并不能证明人们准备保卫这个理想。加纳的少年先锋队是用“恩克鲁玛万岁”和“恩克鲁玛是我们的救世主”等口号来进行教育的。而恩克鲁玛被推翻之后，他们又走上街头，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恩克鲁玛——不是我们的救世主！”

还应当讲几句关于建立统一的党作为一个全民族的联合大党“超级党”的问题。这样的主张在热带非洲广为流传。领导独立斗争的党，在赶走殖民主义者之后便成了执政党，其首领也就成了国家领导人。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降低了这个党本身的质量，这样的党实际已消失在国家中；党的首领当了部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领导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是党领导国家机关，而是国家在党之上。第二，既然国家机关里的重要职位都被执政党的代表所占据，那末反对党就落空了，它的积极分子干部也不再管事了。如前所述，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地方、部族及其他集团等基础上的，于是，就有很大的部分人，甚至整个集团和部族都受到排斥，成为不满现

---

<sup>①</sup> 波兰《政治周刊》，1968年2月30日。



状的人。

为了消除上述两种情况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必须建立一个由“统一的全民族的党”来代替“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主张。这个主张的主导思想是号召各民族统一起来，相应地要否定内部斗争，把这种斗争看作是分裂民族和给大家带来损害的行为。这种主张的倡导者是执政党，它企图用下列办法做到：第一，补救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自己遭受的削弱；第二，把心怀不满和一无所获的阶层、集团、部族从反对党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给他们有“光辉前途职位”的出路。这样能取得效果，尤其当执政党垄断了各种情报手段，监视着社会舆论动向。企图在政界或行政机关步步高升的人都紧跟执政党。执政党同时还操纵着工会和其他组织。

在这样的条件下，反对党要找到能为群众所理解的存在下去的理由是困难的。执政党已提出了一切蛊惑人心的口号，而反对党再也提不出既符合反帝和国家发展政策，但又同执政党的纲领有重大区别的独具一格的东西，来“吸引”群众倒向自己方面。反对党极力要代表这个或那个无特权的集团的利益，结果是宣告要分裂民族，帮助了帝国主义。这时，反对党往往都走上搞阴谋的道路，而政府就加以取缔，并且利用这一点通过官方宣传机器把多元论制从根本上搞得它威信扫地，以达到宣传一党制思想的目的。

在热带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大力谴责多党制很快就广泛“流行”。但是，现在已真相大白，一党制本身不是使非洲摆脱穷困的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个进步的杠杆。苏联的许多研究人员正确地指出，“一党制仅仅在革命民主党掌权的那些非

洲国家里才能显示它的进步性”<sup>①</sup>。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种进步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种意思：好象它不应当是专制的。因为遗憾的是，某些消极现象通常都在那些一党制的国家里产生，由于这些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私人占有制，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消极现象便成为革命民主政权天生固有的。滥用权力、部族观念、贪污、派别活动、为个人或集团争权夺利，所有这些现象都使非洲的许多国家的一党制失去威信。社会的恶意宣传、压制独立思考、限制工会运动，等等，使很多进步团体的代表失去了以前那种对一党制的热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成多元论的信徒，对他们来说，蜕变和抄袭西方制度的“民主”之损害名誉，尚记忆犹新。显然，就多数亚非国家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被它们从根本上排斥的，但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没有条件。

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国家（这种落后首先应归罪于殖民主义者）中，阶级结构还没有完全划定，没有阶级斗争的传统，“知识界”的社会意识尚处于未成熟阶段，宗教、部族观念、种姓和其他各种偏见仍居于各行其事的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种民主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历了几百年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才取得胜利）确实是“生搬硬套”、人为地从外面引进的。这种民主不适合东方社会的传统和阶级结构，这里的特点是没有主要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只有中间阶层。所以亚非国家的党政体制即使照抄原宗主国的制度，即便其整个外表、形式特点都同它相似，

---

<sup>①</sup> 《非洲的政党》，莫斯科出版，1970年，第104页。

但也有本质和原则的区别。

列宁曾经指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sup>①</sup>当然，列宁所指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都已完成了阶级形成的过程。而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以及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国家尚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那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够强的国家里，当然也可能有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如果它不甘心在群众中的微小影响，它可以：一、不仅依靠无产阶级，而且可依靠最广泛的阶层；二、在一定限度上，可以使自己的思想和纲领适合于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观。正是这样，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中，按西方方式建立的“纯资产阶级”政党和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是不会获得多大成功的。

西方党政制度在亚非国家的大失败，说明了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阶级结构的特点，首先是长期殖民主义压迫所形成的特点。企图在那些还远未完成阶级分化的国家建立“阶级的党”，是不会成功的。西方式的“阶级党”，无论是资产阶级党或社会民主党，在某种情况下包括共产党都要失败。因此，在热带非洲只能建立民族阵线形式的超阶级的“全民党”，或是按部族建立的狭隘地方党。所以在东南亚成功地建立了地方民族的、“同语言的”或宗教的党。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林立，令人产生不可靠的印象。多数的党都是知识分子小团体，影响有限，没有群众基

---

<sup>①</sup>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7页。——译者）

确，是些下层组织的分支单位；它们出现得很快，但又迅速消失，充其量不过是“讨论会式的俱乐部”，或者是专门为竞选成立的团体。

有关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些国家，首先是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些看法，简单地讲就是如此。至于军队发动政变的详细原因，我们回头再谈，现在需要研究的仍然是军队登台的背景。

构成这个背景的第二组问题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军队本身的特点。

前面已经谈过关于这些军队的一般简单分类，下面我们来进行进一步详细研究热带非洲军队的特征。

这些军队通常是在殖民地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建立的。英国殖民地(本地)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法国殖民地的不同。英国人建立屯田兵，这样的军队在东非有两支，即非洲王国的近卫军和罗得西亚及尼亚萨兰的军队；在西非有一支，即西非王国边防军。后来在非洲王国近卫军独立营的基础上，建立了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的军队。在两个营的基础上建立了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军队，同样在北罗得西亚军队的一个团的基础上建立了赞比亚和马拉维的军队。最后在西非王国边防军(尼日利亚一个团、黄金海岸一个团、塞拉利昂一个营以及冈比亚一个连)的基础上建立了尼日利亚、加纳和塞拉利昂的军队。

法国的建制不按“地方”原则，它把各殖民地招募来的人混编为军队的若干部分；在独立后，这些殖民时期建立的团都被解散了，所有当兵的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军官的分

布非常不均。尼日尔几乎没有军官，因从这个国家出来参加法国殖民军队的人都是当士兵和军士，所以新成立的尼日尔军队就没有本国的军官。在塞内加尔，原法国殖民军中较好的非洲人军官较多，因为法国人一般愿意派塞内加尔人到军事学校去学习。在非洲，原法国殖民地国家的军队都是在第一旅（旅部在圣路易）、第二旅（旅部在巴马科）和第三旅（旅部在尼亚美）的基础上建立的，即西非的两个联合兵团，司令部在拉密堡和班吉，即赤道非洲。

非洲国家给殖民主义者输送了很多兵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有十八万一千黑非洲人，即所谓的塞内加尔特种兵，虽然他们并不都来自塞内加尔。三十一个塞内加尔营参加了一九一七年的松姆战役，所有这些营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前线，进行了九十二次战斗。<sup>①</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人组成的殖民地陆军第九师于一九四四年在法国的南部登陆，同法国第一军组成联军。在印支殖民战争中，法国军队中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和军官是非洲人，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以及在苏伊士运河入侵中有三万非洲人参加。<sup>②</sup>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仅在非洲大陆的各次战役中动用的非洲军队，有作战部队和担架兵各一万人，这些士兵从东非调到西非投入同德国军队的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员了三十七万非洲人参加英国军队，其中十六万六千人被派到国外去服役，半数以上到了缅甸。战争结束后，非洲人

---

<sup>①</sup>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76页。

<sup>②</sup> 同上。

军队大量复员，在英属非洲只剩下一万九千名当地士兵。<sup>①</sup>

由于在宗主国的军队中服役，便为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的军队培养了干部，年青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有了一定基础，而不致于一点条件也没有。但同时也需指出，年轻国家的武装力量（首先是军官）配备了在殖民地的军事学校中受过训的干部，客观上意味着把国家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交给了具有西方气质的人。

这并不是说，原来在殖民地军队中当兵的人无形中都是一概成了新殖民主义的走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不少人一点也不象是在宗主国军队中服役过的人。这里指的是另一种人，由英国和法国军事学校中培训的并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的军官，他们受的是宗主国军队中盛行的军事思想的教育，接受了相应的思维方法以及其他“西方教育的精华”。

在法属非洲动员的军人被殖民主义者用来反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没有提到他们转移到爱国主义者方面来的情况，甚至连开小差的都没有。这不仅说明他们守纪律，而且反映了他们政治觉悟水平。但不能忘记，贫穷非洲国家的小职员和商人出身的子弟，当他们当上了法国或英国军队的军官后，就认为自己已进入了上层阶级、上流社会。他们的白人同事对他们的态度一般表面上是很尊重的。他们不感到受歧视，在他们中间极力培养军官团体的团结精神。非洲军官在尽力使自己被同化成新人的同时，并努

---

<sup>①</sup>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64—365页。

力增加自己对英国国教的知识，习惯观看白人军官所爱看的剧目，阅读西方的文艺作品和刊物。虽然他们当了民族主义军队的军官，但在各个方面仍象是英国或法国军队的军官，持资产阶级的保守观点，对政治和政治活动家怀着反对的偏见，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以讲自己的行话为光荣，他们已经彻底背叛原来的出身，通常都持有显著的反共主义偏见，这种偏见早在殖民主义者军队中服役时就已形成了。

这种类型的军官，自然不能发展和深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使之转变为社会革命。热带非洲多数国家的领导阶层对于发展和加深革命都是不关心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已经取得的特权。所以军官不过是原宗主国武装力量的移植者，专为适应当权集团的要求，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是同一个体系的。那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许多国家中军人推翻文官政府，决不是由于他们存在着什么原则的政治分歧。

这类军官都是在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学校里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特别有远见的是法国人，除了办普通军事学校，培训外籍军官（在这个计划中，科埃特基丹学校的成绩特别显著）外，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还创办了埃福尔托姆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接收了年轻的非洲人和马达加斯加人，这些人已经有服军役的肩章，但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普通教育。学校的课程是两年，着重学习普通教育课程，之后作为中级军事学校的学生同法国人一起在埃科利·达普利卡西昂学习一年。这个学校每年培养出二十五至三十名少尉。除此以外，还有儿童专科军事学校。军事训练在法属西非特别细致。在瓦加杜古有初级预选学校，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优秀儿童可以进入班

热维尔的技术学校或圣路易的专门学校。为了更好地深造，在这之后，在圣西尔还可继续进修。

这种培训制度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九五〇年，法国军队的非洲军官有一个上校，三个少校，三个上尉，五十九个中尉和少尉；一九六〇年，在建立非洲国家军队时，已经有四个上校，六个少校，三十一个上尉，一百五十七个中尉和少尉。这些干部形成一支原法属非洲的军官队伍，在各军事学校受过训练的有八百名中级军事学校的学生。<sup>①</sup>

原法属殖民地独立后的武装力量人数如下：<sup>②</sup>

|                      |                  |
|----------------------|------------------|
| 塞内加尔                 | 军队五千人，宪兵一千二百人。   |
| 毛里塔尼亚                | 军队五千三百人，宪兵一千五百人。 |
| 达荷美                  | 军队一千三百人，宪兵一千人。   |
| 多哥                   | 军队五百五十人，宪兵一千人。   |
| 尼日尔                  | 军队九百人，宪兵二百人。     |
| 上沃尔特                 | 军队一千二百人，宪兵五百人。   |
| 喀麦隆                  | 军队二千九百人，宪兵二千八百人。 |
| 乍得                   | 军队四百五十人，宪兵四百人。   |
| 中非共和国                | 军队四百五十人，宪兵五百人。   |
| 加蓬                   | 军队三百六十人，宪兵六百人。   |
| 刚果(布)                | 军队七百五十人，宪兵一千人。   |
| 马尔加什共和国 <sup>③</sup> | 军队二千七百人，宪兵三千六百人。 |

在英属非洲，培养当地军官干部没有象法国这样一套制度。但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〇年在西非也选拔了一百八

① 《第三世界中军队的超军事任务》，巴黎出版，1966年，第86页。

② 同上，第96—97页。

③ 现称为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译者



十人送到捷希(加纳)军官训练班接受培训。到尼日利亚宣告独立时,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院也有八十一名尼日利亚人结业。当加纳一九五七年独立时,本国军官在它的军队中已占10%以上。在尼日利亚,本国军官占25%。在英属东非,本地军官干部总的来说没有培养。到一九五九年未仅有一个本地地区的非洲人进入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院;在一九六一年内已有几个非洲人中尉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获得指挥职位,<sup>①</sup>而且有几十个年轻非洲人在卡加姆武备学校和英国的军事学校中受了训。当肯尼亚一九六四年独立时,它的军队已经有一百五十名非洲军官。<sup>②</sup>

达荷美的军队一九六三年约有一千人,中非共和国五百人,乍得四百人。仅埃塞俄比亚、加纳、南非共和国、扎伊尔、尼日利亚、苏丹和罗得西亚等国的军队超过一万人。在热带非洲有十三个国家军队的人数是二千到一万人,有十六个国家不到二千人。军队的数量比较多的,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外,还有象牙海岸(四千人)、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每个国家的士兵和军官约二千人)。<sup>③</sup>

军队的年增长速度在六十年代是3.1%(塞拉利昂)到18.9%(肯尼亚)。乌干达创最高记录,军队的年增长速度超过40%,这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民族和外交问题特别复杂和尖

---

①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69—371页。

② 同上,第373页。

③ 拉奇纳,《黑非洲的军队和政权》,布卢迪斯拉发出版,1971年,第168页。

锐。<sup>①</sup>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不仅是数量，还有训练的质量。从纯军事的观点看，这些军队作为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力量，它的价值是不大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发生了当地军队的暴动，要求干部应由非洲人当<sup>当</sup>，并增加薪水。这几个国家的总统向英国求助，没有费多大的力量就把局势平定了，只动用了两艘军舰，先由舰上的高射炮轰击叛乱部队的兵营，然后用直升飞机运载舰上的水兵登陆，这就足够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法国伞兵部队在加蓬镇压了一次当地部队的叛乱，在这次镇压中一共才死了两个人。比利时伞兵一九六〇年在刚果（金沙萨）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当地部队的暴乱。

多数非洲国家的军队是微弱的，既不能用于同外来的敌人打仗，也不能用来维持国家的内部秩序。因此，又得建立宪兵或警察，而且在很多国家里，宪兵或警察的数量超过军队，有时甚至比军队多一倍（如尼日利亚），军队是需要的，正如本书前面已经指出的，它是主权的象征（象多哥和加蓬各只有两连军队，很快就可以召集起来，那真是象征性的）。但要是没有它们那又是不行的，那些原宗主国殖民军队的老兵和由法、英军事学校培养的新军官也无处安置。此外，在一党制的情况下，军队作为非洲国家政府的一支政治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是维护领导集团统治的保证。军队通常被视为政府的政治工

---

<sup>①</sup> J. 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105页。

具。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们的人种分配名额在每个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合理，这是殖民政权执行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这样，在英属西非，尼日利亚和加纳王国边防军的军官主要都是文化较发达的南部沿海地区人，而同时又招募了落后的北部地区人当士兵。在加纳，独立时 92% 的军官是沿海地区人（主要是伊博族），62% 的士兵是从遥远的北方招募的；<sup>①</sup> 到一九六一年，80% 的中士是北方人。在肯尼亚，独立时士兵中几乎没有吉库犹族人，因为从这个民族入伍的大部分战士都反对殖民主义者，所以英国不吸收他们当兵，三分之二的肯尼亚兵是坎巴族和卡隆日族人。<sup>②</sup> 科尔缙和普莱斯写道，“选择士兵在政治方面有很重要的考虑，主要是从政治上比较安分守己和民族主义情绪较少的团体中进行选择。武装力量的一个主要职能便是镇压国内的起义和暴动。因此最妥当的办法是从那些不易受暴乱诱惑的部族中招募士兵。”<sup>③</sup> 在乌干达居民中募集的非洲王国部队，在营的基础上，建立了乌干达的军队。人数最多的布干达族人在士兵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人数最多和反对殖民主义者最积极的吉库犹族在肯尼亚的警察中还不到十分之一。<sup>④</sup> 加特捷里德日也曾谈到，“宁愿要不识字的人，因为这些人比较守纪律。”<sup>⑤</sup> 独立之后这种比例悬殊的状况就成了部族之间不满和

①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73页。

② 拉奇纳，《黑非洲的军队和政权》，布拉迪斯拉发出版，第88页。

③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73页。

④ 格特里奇，《新兴国家中的武装部队》，伦敦，1962年，第39—57页。

⑤ 同上，第36页。

矛盾尖锐化的根源。这不仅是种族团体或部族的自尊心问题，还因为服军役在非洲被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美差”，它给人以一种保障，使人从中获得社会威望，能领养老金，复员后能够得到理想工作。士兵服役期满后得到一张证书，如果是技术兵种，还可掌握一门专业，使他们进入社会后有用。此外，非洲处处都有欧洲的贸易公司在招收当地职员，特别是同金钱有关的职务通常都愿交给当过兵的人来担任。

加特捷里德日指出：“一九六一年，加纳一个士兵的基本工资每月十六英镑，比一个中等水平工资收入的还要好，中等工资收入的最小限额每天才六先令六比索。此外，还有免费的住宅、服装和其他等等。……所以新兵从来没有缺员的。加纳库马西武装力量学习中心不用登特别广告可以从一千五百个竞争者中挑选四十人。”加特捷里德日举了以下这样一个例子：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宣布重新招募复员士兵，建立一个营，以开赴刚果，当天上午还不到九点钟，招兵机构的门口已排了二百人的长队。据贝诺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阿克拉碰到了许多来自多哥的年轻人，因为加纳的生活水平比他们本国高。他们在阿克拉耐心地等待着关于自己申请参加多哥军队的答复，当获得好消息后，马上就返回多哥，并感到自己是个幸运者。<sup>①</sup>还有一个例子，法国人在西非办了六所城防部队的士兵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培养未来的中士。一九五六年，二百一十二个名额有三千个候补者。<sup>②</sup>

① 意大利《再生周刊》，1967年1月27日，第30页。

② J. 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42—33页。

类似的想法无疑在军官中也有。在第戎大学的进修班里发现：“毫无疑问，对于多数职业军人来说，进入新生国家的军队服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妥善解决就业问题的愿望，这比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强烈。”<sup>①</sup>但是本报告的作者也还指出，“第二代军官”的成员主要是在科埃特基丹学习，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时期不长（实际上仅学习期间服役），民族主义情绪较强，比法国殖民军队的老兵更关心政治。“他们对政治、新思想、一党制等等问题都较感兴趣，他们显然没有把军队的作用和政党的作用截然分开。”<sup>②</sup>

亚非国家和欧洲是不同的，军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贵族阶级的代表，虽然当兵的职业向来是受到尊敬的，可是在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国家里，殖民军队中不吸收贵族服役。这种传统在殖民军队改编成国家军队之后依然保留着，军事学校的大门向着当地的青年敞开。进军事学校的是中等和中间阶层的代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指出，在埃及，进入一九三六年创办的军事学校的，“通常都是对自己职业不满的中学教师和律师，或是那些认为军队能为他们开辟更美好的前途的人，进入军事学校可使自己在军界重新开始新的社会职业。纳吉布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开始其军界生活之前一直从事法学工作，至于那些从事教学工作时间很短就转入军界的人，是报多的。”<sup>③</sup>美国研究工作者费舍尔写道：“霍姆斯军事学院（叙利亚）的许多学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

---

① 《第三世界中军队的超军事任务》，巴黎出版，1966年，第80—81页。

② 同上。

③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53年，6月号，第517页。

庭，即小土地占有者、商人、甚至于铁匠家庭。”<sup>①</sup>其他一些作者也提到亚非国家的军官中，国家职员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从地方官以及教员家庭出身的显然多于首都的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弟。加特捷里德日还讲到，“加纳的可可农场主或邮政局官员的子弟当上作战部队的军官比自由职业者的子弟要快，所以后者大多宁愿自己的子弟当个律师或国家职员……”<sup>②</sup>

从各省来的人多于首都的人，这是经济落后国家军队的特点。实际情况是，无论过去和现在，成绩卓著的国家官员、律师、教授和首都的商人与其指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不如把他们送到军事学校中去上升得更快。首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则有自己的打算，按他们的想法，服军役的价值并不很高（尽管“原则上”、口头上承认服军役是光荣的、爱国的）。这个阶层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地信奉英国国教，传统的固执，总的来说由这个阶层的人出任军职，是罕见的现象。相反，对于小地方职员或商人、乡村教员、手工业者、医生、邮局官员、司机等这些人的子弟来说，这是求职的机会，可以摆脱穷困，开阔眼界，参加首都的生活。

美国社会学者 M. 詹诺维茨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军人职业诱人的原因有两个：它可以使人改变社会地位和满足对集体活动的爱好。在一般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看来，“当个军人是最有重大价值的，也是他们所极力追求的，同私人资本家的目标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集体目标的基础上

<sup>①</sup> 《中东的军事》，美国哥伦布出版，1963年，第55页。

<sup>②</sup> 詹特里奇，《新兴国家中的武装部队》，伦敦，第44页。

的。”<sup>①</sup>

“重大价值”、“永久的美德”、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同富有的上层人的狭隘自私观念相对抗，走向生活有一定规律，等等，所有这些理想当然是同“普通家庭出来的年轻人”的社会出身有联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小资产阶级对于首都上流社会早有固定看法。一方面，“地位低微的人”对这个上流社会怀有妒忌心理，因为上流社会所拥有的也就是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但对“地位低微的人”来讲，金钱、教育、娱乐已被自己的出身所限制。地位低的外省人向往富裕和理智的首都社会的热闹而舒适的生活，但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具有这种固有的奢望，所以他就会妒忌，因为他无法达到，所以就产生憎恨。另一方面，也是补救的方面，这种奢望可以用美德来抵消。由于首都社会汇集了一大群腐败透顶、不道德、自私和世界主义的寄生虫，所以朴实的风尚、信仰、绝对诚实和宗法式的相互帮助的农村美德等传统便得到格外的赞扬。

而所有这些对受小资产阶级家庭教育和选择了军职的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不管社会联系多么遥远，他们总会以一定方式同首都社会发生关系，未来的军官一般都认为首都社会的人圆滑、奸刁和不可靠的。但那些首都知识分子虽有缺点也有优点，他们的外表精干、学问渊博、有雄辩的口才、能说流利的法语或英语，他们可以影响人，要抵消这种影响，也可以用豪爽这一美德、廉洁、公民义务的责任

---

<sup>①</sup> 詹诺维茨：《军队在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第60页。

感来同这些“充满娇气和又爱说漂亮话的人”相对照。

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将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加强他们对在外国影响下堕落为反民族主义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态度。埃及是个最好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军官打击了君主政体周围的上层富贵集团（其成员大多数是外国垄断集团）。在叙利亚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另一方面，独立后，在文官政客领导的民族主义国家里，军队对贪污、风气败坏、行政管理缺乏效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开始表现出轻视态度。军队是遵守纪律和秩序、绝对服从命令的。议员的互相勾结、党派的互相倾轧、争论、善辩，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政治管理制度不可避免的特点，但受下级服从上级、毫不犹豫、绝对服从命令、听从管理和指挥等思想教育的军官们则绝对没有这种特点。独立后，民族主义的内容由反对外来的压迫者转变成反对“卖国求荣的政客”，因为这些政客不会管理国家的财富，而且把国家作为自己为非作歹的世袭领地。所以，发展中国家里的所有军事政变发动者都无例外地特别注意自己要同当权集团的贪污、恶意宣传和无效率的政策作斗争。一九五二年埃及政变后，军官们的告人民书中就宣布了这些主张。奈温、阿尤布·汗、易卜拉欣、杰马尔等人也是这样做的。埃及和缅甸的革命民主军官团都用同样的诺言表示自己的行动，而守旧的是属于那些有统治者的情绪的将军。当然，赞成这些主张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利益和目的。

几代军官之间的思想观点不同，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有



很明显的表现。其实，与其让它扩大，不如进行教育。“阿尤布（巴基斯坦）和纳赛尔（埃及）之间的差别部分反映出英国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院（阿尤布·汗毕业于该校）和埃及军事学院之间的不同。”<sup>①</sup> 科尔缙和普莱斯是这样描述苏丹军官的：“许多老的军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军衔和得到提拔的‘老兵’。年轻的军官是根据一九六三年的规划加速培养出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军事政变起，被揭露出几起‘阴谋’，据传说，那些民族主义情绪较强、受教育较多的‘青年土耳其派’，<sup>②</sup> 企图用这些阴谋解除老一代高级军官的职务。”<sup>③</sup>

一九六四年，“青年土耳其派”参加了人民运动，因而成功地推翻了将军们的专政。法国研究工作者加尔内认为，阿拉伯军队有三代军官：老一代是在殖民军队中服役的，这些人出身于资产阶级，一般受的是西方文化教育，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但是政治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年一代军官是小商人子弟，或是破了产的阿拉伯农民的子弟，这些人接触西方的文明较少，但在社会学方面，假如不是在政治方面，同群众比较相近。军队中和政治上掌握实权的主要是这一代军官。年轻一代是那些将要从事军官学校或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人在独立后就开始学习，先是学习“阿拉伯文化”，然后到国外实习，有的去西方国家，有的到社会主义国家。<sup>④</sup>

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时，将军们站在法鲁克一边（纳吉布

<sup>①</sup>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290页。

<sup>②</sup> 这里的“青年土耳其派”——是指年轻一代造反军官。

<sup>③</sup>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290页。

<sup>④</sup> 保罗·加尔内：《处于政权和革命中间的阿拉伯军人》，《国际社会学手册》半年刊，1972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第232—233页。

除外，上面已经讲过，他不是职业军人，他的职业是从当律师开始的)。将军们是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高级官员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都要维护英国人建立的制度。推翻他们的是以陆军中校纳赛尔为首的青年军官。一九六〇年，土耳其的青年军官们在陆军上校图克曼的领导下开始反对将军们的领导，要求合理的变革。一九五八年，伊拉克军队的上层领导站在努里·赛义德统治一边，结果被旅长卡塞姆和陆军中校阿里夫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在叙利亚、也门、缅甸，发动军事政变的主力都是陆军上校和少校(奈温是将军，但不是职业军人，他开始活动时是一个革命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成为军官)。

“陆军上校革命”不能认为是偶然的。高级军官通常扎根于国家“制度”中，并且关心制度的生存。不用说，他们大多数是在宗主国的军事院校中受过教育，具有保守观点，并完全倾向西方。即使将军们也出身于中等和中间阶层，那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他们同原来的阶级早就失去了联系，并已成为社会的上层特权阶层。相反，很多年轻军官则持激进观点，对停滞、守旧的社会制度表现不满，倾向变革。他们很容易同有激进情绪的知识分子接触(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主要是地方知识分子)。

但同时，又如上面提到的“反首都”情绪却会妨碍军官同知识分子结合，这种矛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不但如此，一部分军官还把自己特有的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搬月来一般民主中来。实际上这意味着军队反对恢复政党议会制度，那怕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革命领导下，他们都

反对。特别危险的是，在哪些由于军队的作用而建立起革命民主制度的国家里，相当一部分军官反对建立革命先锋政党，这个问题我们另行讨论。

处于关键岗位的军官多数是属于第一代的。军事政变领导人如达荷美的陆军上校索格洛、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上校和上沃尔特的拉米扎纳上校都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至今仍相互认识。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领导人安克拉将军和伊龙西将军，也都参加过联合国部队到刚果<sup>①</sup>作战。伊龙西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了二十四年。博卡萨在法国军队中服役了二十年晋升到陆军大尉衔。拉米扎纳在法国军队中服役了二十六年。多哥政变领导人陆军中校埃阿杰马在法国军队中服役十三年，参加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等的战争，同他一起参战的还有前多哥军政府首脑达德若上校，达德若早先曾多次参加过法国的抗战，尔后又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达荷美的政变领导人阿利福斯·阿来参加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等的战争。

所有这些军官的经历如此相似，引人注目。他们都在殖民军队中经历过长期服役，都有军事才干和果断精神，顺利地沿着军衔的梯阶晋升；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这些军官在国家发生内部危机关头就会坚决地夺取政权。同样合乎逻辑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纲领，他们不能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领袖。

这部分军官具有保守和亲西方的观点，并不是什么秘密。

---

<sup>①</sup> 即现在的扎伊尔。——译者

推翻恩克鲁玛的组织者之一阿弗里法上校曾这样谈到英国桑德赫尔斯特新军事学院对他的影响：“在桑德赫尔斯特新，我渡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是在令人尊敬赞美的地方，是一个从一八〇二年开始的历史悠久、具有高度荣誉的学校。这在世界上也是伟大的军事学院之一。经过这个学校可成为光荣的将军，甚至成为君主。迄今，我仍记得那些名人，如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我作为一个士兵，在英国受到了教育，并准备到各个地方去参加战斗，那里将有我的英国朋友，以及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我是一个英国生活方式、立宪制度和自由宪章的真实崇拜者……。英国就法权而言，它是属于民主的国家。”<sup>①</sup>

这些军官不隐瞒自己的感情是在西方集团一边，尽管他们尊敬中立和不结盟主张（正如安克拉将军所说的“亲西方的不结盟”）。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军事首脑都支持在军事方面同原宗主国紧密合作。他们的国家同英国或法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他们的军队都用英国或法国的武器装备。

在热带非洲没有军事工业，一切必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都依靠外来。科尔缅和普莱斯正确地指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在军事装备和培养军事专家方面能够自力更生。”<sup>②</sup>

一九六四年，法国在非洲的专家和教官有三千人，同时在法国军事学校中学习的非洲人有一千五百人。英国派往原英

<sup>①</sup> 《非洲，加纳政变，1966年》，伦敦出版，1967年，第27, 29, 49—51页。

<sup>②</sup>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385页。

属非洲的专家、教官和到英国学习的非洲人分别为六百和七百人。在加纳，约20%的军官是直接在英国的高等军事院校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其余的军官是由英国派往加纳的军事教官指导训练的。甚至到一九六五年初，加纳还有约二百名英国和加拿大的军事教官。<sup>①</sup>

苏丹军队的大部分高级军官不仅是在英国学习过，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的武装部队中服役过。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五十名苏丹军官在英国受过军事教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有六十二名尼日利亚人和四十七名加纳人在英国最好的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院毕业。在奥尔杰尔绍德陆军学校中仅一九六一年就办了几期四个月的训练班，培训了三十四名尼日利亚人，三十名索马里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军官。<sup>②</sup>

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确有特殊的情况，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因素——武装力量实质上是异己分子，仿佛是原宗主国武装力量的延续。只有在民族解放运动斗争中获得独立的国家，才是自主的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独立进行了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原宗主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但同时，它的保安系统实际上仍在原宗主国的控制下，整个军事机器仍依靠殖民主义者支撑，这些国家的军官依赖他们的培训。

既然政府必须坚信武装力量的忠诚，所以军队将帮助制订政治方针，自然这种忠诚就会得到保证，政府和军队之间在

---

<sup>①</sup> 《再生》周刊，1976年1月27日，第30页。

<sup>②</sup> 《新兴国家中的武装部队》，第16—17页。

下列情况下很快就取得和谐，即如果政府本身执行和原宗主国合作的方针，遵循完全亲西方的路线。在相反情况下，那就会发生象刚果卢蒙巴掌权时那样的事件，以及在加纳恩克鲁玛执政时所发生的情况，政府和军队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探讨。

到目前为止，所讲的一般都是军队登台的社会背景以及重新建立军队的主要特点。当然，在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因素，如对热带非洲许多国家和尼日利亚，就不能笼统地看成一样。尼日利亚同其他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它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党，这说明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同以前殖民地时期一样，不仅是各部族的联合（这是非洲常见的现象），而且是各民族的联合，这些民族之间不仅共同点很少，而且互有敌意。

根据阿迪莫耶加的材料，尼日利亚独立时，三千五百万人口中大约有六百万人讲豪萨语，这个民族主要居住在尼日利亚的北区。大约五百万人是伊博族，以及同样数量的约鲁巴族。伊博族居住在东区，约鲁巴族在西区。北区除豪萨族外，还有富拉尼族（独立时约有三百五十万人），卡诺族（约一百五十万人）。少数民族有依比比奥族、阿南族、依德若族、乌尔霍鲍族、季克族和努佩族，每个族都不到一百万人。<sup>①</sup> 还有几百万部族人（据某些资料估计，尼日利亚有四百个民族团体）。

豪萨族、伊博族和约鲁巴族是造成尼日利亚悲剧的主角。

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硬是凑合到一个国家，这是由于

---

<sup>①</sup> 阿迪莫耶加：《尼日利亚联邦》，伦敦出版，1964年，第182页。

殖民主义者任意改划非洲地图的结果。英国人建立的尼日利亚是殖民主义者人为的产物，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整体国家。因而在独立之后，加入联邦内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急剧增长，首先是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对豪萨族的盟主地位表示不满。而这种盟主权主要控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手里。

阿迪莫耶加写道：“在中央机关，各政党由于它们代表各区的利益，所以都有自己的部长。但是这样一来，这些党和部长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办公室就变成争论的场所。因此，唯一形成严密集团的英国官员的各项决定就总是能得到实现。”<sup>①</sup>

英国当权者施行的宪法，其主要目标就是使尼日利亚在不断发生捣乱的情况下便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英国人自然最信任北区的封建主，因为他们在中央机关中占有优势。人口调查登记表明北区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一九六三年的登记似乎已经查明，在尼日利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北区有三千万人。北方人民大会党在接受国家管理的同时，要受大家公认的北方主人的监督，首先是伊斯兰教封建主阿利哈德日·艾哈迈杜·贝洛的监督，这个封号称为索科特司令的封建主是赫赫有名的，他妨碍着查明国家人口的精确统计。在选举中，北区分配到较多的职位，北方人民大会党的胜利就在预期中了。这样，北区封建主领导集团在全国的优势也就保住了。

许多人已经知道，北方人的盟主权是建立在人口登记的

---

<sup>①</sup> 阿迪莫耶加，《尼日利亚联邦》，伦敦出版，1964年，第182页。

不可靠基础上的，因而引起伊博族和约鲁巴族的日益增长的不满。

同时，经济困难也开始了。尼日利亚是非洲少有的“资本主义橱窗”的几个国家之一，掌握政权的人甚至认为谈论社会主义都是不必要的，即便这种谈论不过是宣传性的鼓动。在国内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尽量吸收外国资本，是尼日利亚领导人的简单经济原理，他们指望依靠西方的援助使“美好的古老资本主义”直接在他们的国家扎根。外国垄断资本在联邦的经济领域内占据关键地位，其中特别是从英荷联合公司中分出的“非洲联合公司”。

世界原料价格(特别是可可价格)的下跌使得尼日利亚的财政状况恶化了。商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房租也上涨。失业人数增加，形成严重威胁。在南部，一九六二年失业人数已达城市人口的29%。受过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小学毕业的人80%以上是失业者。<sup>①</sup>与此同时，地方资产阶级迅速增加。“如果说一九六〇年前尼日利亚还没有百万富翁，那末到一九六五年这样的大富豪已有四十多个。有十个公司的部分资本是在头号实业家莫鲍拉吉·安托尼银行的掌握或控制下。”<sup>②</sup>官僚资产阶级上层集团同私人企业主阶层相勾结，贪污贿赂盛行。近年来实行一种旧制度，政府官员舞弊审理委员会一个接一个的审理案子，揭露出许多使人吃惊的关于欺骗、侵吞公款、贿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可耻事实。这种腐败使得社会的最上层感到困难。在东区，一个部长接受了

① 《圆泉》季刊，1967年，1月号，第43页。

②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6年，第一期，第98页。



一辆“达尔”牌汽车和七千五百旧法郎，<sup>①</sup>给阿金托拉买了一辆“麦尔谢杰斯—600”轿车。尼日利亚的部长们都喜欢长车身的轿车，这种汽车在尼日利亚称为“部长专车”。外国记者一致指出，拉各斯特权阶级上层领导在享受方面，其官邸之豪华、高级小轿车之多、生活方式之阔绰，是热带非洲所有其他城市都不能与之匹敌的。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思想进步的人士开始丧失信心，怀疑现存的制度能否解决尼日利亚的问题。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工农党的建立是最令人瞩目的事，该党分析了尼日利亚的社会阶级结构，认为人民群众的主要敌人是“上层阶级，即寄生虫”，这个阶级包括：买办资本家，大工业资本家，任经理后接受10—12%佣金的经纪人，副经纪人或外国公司代表，利用自己政治影响来保证在尼日利亚活动的外国人的合同得到实现的商人，封建贵族，即议院议长，地方委员会、法院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利用自己职权非法占有公共土地和取得贿赂和传统礼品的官员，除此之外，还包括贪官和追求名誉地位的人组成的集团，这种集团是同买办资产阶级一样的。

这个分析再次证明，在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最有影响的阶级绝不是那些一时好象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投机买办资产阶级、非生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发达的国家里，如尼日利亚，这些资产阶级按照尼日利亚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都是剥削阶级。

---

<sup>①</sup>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6年，第一期，第99页。

由于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落后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首先是团结在工会周围的现代无产阶级）和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联合，才能基本上成为反帝阵线的现实战斗力量。这个先锋队在善于领导的前提下，才能把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城市平民动员起来并吸引到自己方面。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有时间，而且这既是联盟，也是敌人。因为独立后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另一个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的增长趋势，将同时发展。被殖民主义束缚的人民创造力的解放、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提高，是同民族自觉性的迅速提高相联系的，也同民族或人种特点及传统等相联系的。一方面，民族共同性的感情可能会因某种原因而削弱，如群众看到上层领导同他们疏远，变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某个原因而增强，如由于在具有宗法式农村特点的非洲社会中，还没有明显的阶级界限，他们被许多血缘关系所掩盖，被各种同乡会的作用所模糊，在这些同乡会里既有同一个村庄的贫苦农民，也有进入城市后发财致富或处于显要地位的上层阶级的代表。同农村相联的非洲人的相互帮助的传统（例如前面所讲的“恩杜库”制度），又助长着统一的幻想，从而缓和阶级矛盾。

这些概念也得到非洲革命民主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强调非洲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从前非洲人对外国压迫者的认识是，与其说受外国企业主的压迫（外国企业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宗主国），不如说受殖民主义机构代理人的压迫。现在殖民机构已经没有了，外国公司的老板在很远的地方，剥削他们的制度正在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识中消失。

人们亲眼所见的直接剥削者是黎巴嫩商人或邻族的企业主。同乡人绝不是不残酷的剥削者，但由于有亲属关系和传统联系，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所有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外人”身上，心理上容易去责备所有的外族人，在“外来人”那里找各种困难的原因。“伊博族人善于为自己打算”或“约鲁巴族人是寄生虫”，这几乎是永远不变的成见。部族和种族的斗争自古以来始终是尖锐的，根深蒂固的相互不和经常会爆发出来。这在老早以前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非洲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是很困难的。例如，尼日利亚东区的所有居民在选举中都投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的票，认为它是自己本区和本民族利益的代表，而北区居民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投北方人民大会党的票。新党成立时，提出了统一民族的口号。人们按照习惯，马上考虑到谁是党的领导人，是伊博族人、约鲁巴族人或豪萨族人？所以没有一个政党不考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统一党。

一九六四年底，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了危及联邦能否存在的程度。一九六六年政变的直接原因在下一章还将谈到。

到此为止，论述的多半是热带非洲国家。但在亚洲和北非许多国家同样发生军事政变，那里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说到这些国家，应当这样划分，形式上得到独立，但依然属于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反动势力统治的国家（埃及直到一九五二年，伊拉克直到一九五八年），这些国家赶走殖民主义者后，政权落入民族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如缅甸

和印度尼西亚)。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掌权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军队也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埃及军队和缅甸军队各自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提。

决定埃及在一九五二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革命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种压迫使埃及的贫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人民群众陷入绝境。每个殖民地或附属国都要进行反帝革命，但象埃及那样如此尖锐地要推翻双重压迫的国家是不多的。国家要独立发展的要求和封建殖民主义的剥削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埃及 94.3% 的农户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五费丹（1 公顷 = 2.4 费丹——译者注），他们仅占有全部耕地的 35.4%，一万一千个大地主（占农户总数的 4%），每个地主拥有土地五十费丹，他们占有全部耕地的 34.2%。农民要用 70% 的收成给地主缴租。

全国农村共有八百名医生，平均每一万五千个病人中有一个医生。菲拉赫（阿拉伯佃农）的平均寿命为二十七岁。大约三分之二的居民患眼病或蛔虫病，其中多半还有其他疾病。儿童的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文盲约占 80%。<sup>①</sup>

难以想象的群众贫穷的背景下，更特别显出富有上层集团的奢侈，而这个上层集团的主要成分是大地主阶级。处在金字塔最顶端的是贵族王室集团，按他们的出身是异族人（主要是在王朝统治下从阿尔巴尼亚来的土耳其契尔克斯人），他们逐步地成为这个上层集团的成员，还有同地主结合在一起

---

<sup>①</sup> 伦吉尔，《变化中的中东》，纽约出版，1960年，第 77—78 页。

的大资产阶级，这些大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当时由于供应困难，刺激了当地工业的发展。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六〇年间，农村剥削阶级的收入从九千三百万英镑增加到一亿五千八百万英镑，城市剥削阶级的收入从四千四百万英镑增为二亿零三百万英镑。<sup>①</sup>地主享有最大的特权。革命前工业直接税的平均总额每年三千万英镑，农业直接税尚不到三百万英镑，尽管农业净收入超过工业净收入的三倍到四倍。<sup>②</sup>

剥削农民是富有上层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上层阶级中特别是一个大地主：0.01%的人拥有10%的土地。<sup>③</sup>无论是埃及或其他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对于城市商人来说，他们认为要把资本投到最稳妥的地方，就是购买土地。同样，随着工业的发展，地主们则认为最好是在城里建工厂或买工厂，他们比较喜欢从事外贸、财政、城市建筑和轻工业等。实际上在埃及革命前的几十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主资产阶级。所以有关土地改革，改变极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问题无法提出。最典型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华夫脱党在一九三五年的“改革纲领”中竟然不提土地重新分配的问题。<sup>④</sup>

然而这个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愈益尖锐。如果说一八九七年九百七十万居民尚有六百八十万费丹可耕地，那末到

---

① 利亚德，《纳赛尔的埃及》，巴黎出版，1964年，第163页。

② 沙菲，《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莫斯科出版，1961年，第172—173页。

③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巴黎出版，1962年，第64页。

④ 拉格纳，《转变中的中东》，伦敦出版，1958年，第81页。

了一九三七年一千五百九十万居民也只有八百四十万费丹的可耕地。<sup>①</sup>到一九五二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居民总共只有九百三十万费丹的可耕地。<sup>②</sup>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恐慌，但当权的上层领导根本不去考虑如何改革的问题。所以解决土地改革问题就成为革命不可避免的主要内部因素，而铲除帝国主义统治成为外部因素，因为英帝国主义使用自己的军队直接占领埃及的领土。一九二二年埃及取得独立，但在它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苏伊士运河区，仍驻有英国军队。用埃及农民的尸骨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经济上完全依靠为英国纺织工厂而生产的棉花。外贸和银行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所有头脑清醒、具有民族感情的爱国人士都怀着痛苦的民族自卑感，眼看着埃及作为一个古国、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主要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政策，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它过去所起的有价值的作用，不能尽他所能尽的责任。由于君主制不能制止英国人的奴役占领和迫使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区撤退，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第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亚洲和非洲，埃及也不例外。民族独立和帝国主义奴役下争取解放的思想在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鼓舞下，在埃及广泛传播，革命时机趋于成熟。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问题是谁来领导这场革命。

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分裂成若干派别，其影响仅限于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劳动负荷沉重

<sup>①</sup> 加尔宗齐，《埃及的旧病和新医》，开罗出版，1959年，第15页。

<sup>②</sup> 同上。

的农民处于被动状态。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满外来压迫者，但政治上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习惯地跟着华夫脱党，而这个党已完全变成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领导集团的党，并且把自己的命运同汇集在“米斯尔”银行周围的这个最强大的上层领导集团紧紧地连在一起。

“米斯尔”是埃及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这个银行由一个有进取心的商人塔拉特·哈尔鲍姆于一九二〇年创建，它是建立埃及民族工业的路标。银行的名字好似还象征埃及实业界一个派别的民族特征，这个派别的形成比贸易和工业发展委员会（也属哈尔鲍姆领导）早三年。据说在战争年代发财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一致行动。那是一九二二年华夫脱党宣布抵制美国商品和它的银行，号召埃及人把自己的储蓄都存放到“米斯尔”银行。

“米斯尔”集团和华夫脱党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了埃及资产阶级反民族主义的形象和标志。

“米斯尔”银行到一九六〇年末，它已拥有全部埃及银行资本的28%。“米斯尔”已经成为所有埃及资产阶级集团的“总管家”。①“米斯尔”财团有二十二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纺织工业、采掘、造船业等。它的业务活动伸展到航空、电影和其他许多行业，成为最大的垄断集团。“米斯尔”的领导人是塔拉特·哈尔鲍姆、哈费兹·阿菲菲、阿里·亚希亚、法尔加利、阿布德、阿巴扎、西拉克·埃德金、巴德拉维等，这些人都是埃及最大的富豪，是实业和金融界的台柱，同时这些人在政治舞台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巴黎出版，1962年，第114页。

上也处于关键地位。整个这一上层集团同大地主和外国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苏联研究工作者弗里德曼指出的，“米斯尔银行集中了埃及官僚和最大政客的全部精华……米斯尔银行的所有著名活动家和它的工业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同外国资本家有联系，当了外国垄断组织理事会的成员或董事。由于自己同封建私有制有密切关系，所以米斯尔集团中的大资本家从来就反对进行任何土地改革。”<sup>①</sup>

“米斯尔”财团对宫廷方面（哈费兹·阿菲菲五十年代初是国王办公厅主任）具有强大影响，而且受华夫脱党的领导（西拉克·埃德金是华夫脱党的总书记和最后一届华夫脱政府纳哈斯·巴什的内政部长）。

二十年代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并一度成为全国性大党的华夫脱党完蛋了，这是由于它变成了“绅士俱乐部”，这些绅士依靠自己的巨大财富而能对政治施加巨大的影响。<sup>②</sup>同大地主、企业家、金融资本家，以及外国垄断组织有联系的华夫脱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变成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集团的党，它完全“扎根”于制度。到一九五二年，华夫脱党完全失去了大多数民族激进派的信任，尽管它仍进行民族主义的蛊惑性宣传，以扎格卢尔的名义进行投机以及靠党的领导人物纳哈斯·巴什的能说会道进行欺骗，企图在一般平民中继续维护他已经失去的威望。

<sup>①</sup> 弗里德曼：《埃及的资本主义发展，1882—1930》，莫斯科出版，1963年，第272、276、279页。

<sup>②</sup> 瓦迪奇奥迪斯：《埃及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布罗明顿出版，1961年，第28页。



总之，“米斯尔”和华夫脱这两个名字，是革命前地主资产阶级埃及的标志，也是埃及政治和经济、财富和腐败、世界主义和卖身投靠的标志。这两部巨大的孔器，一部是经济的，另一部是政治的。两个组织初期都是同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愿望相结合，最后则又把自己的命运同反民族主义的上层社会及帝国主义连在一起。

埃及中小资产阶级的悲剧在于他们是华夫脱党的俘虏，同时也是“米斯尔”集团、王室周围的权贵和英帝国主义的俘虏。这样的资产阶级阶层不能建立自己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假民主的选举制度自然会使华夫脱党在选举中获胜，因为地主和村长强行用卡车把没有文化和缺乏政治觉悟的农民送到选区去投它的票。

当然，领导集团内部也是有分歧的。在国王和华夫脱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法鲁克和纳哈斯之间严重不和。但整个国家操纵在有无限权力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手里，不可能期待这个集团来进行变革。但到一九五一年底政治危机尖锐时，在人民群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压力下，华夫脱党终于单方面宣布废除一九三六年签订的英埃条约，在苏伊士运河区开始游击战争，然而这不过是蛊惑人心的手腕。当上层领导集团看到事情已“过于离谱”了，于是又发出制止信号，在开罗安排了挑拨事件（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黑色星期六”），牺牲华夫脱政府以平息事态的发展，并从背后打击运河区的游击队。

民族主义者陷入失望的深渊，他们怀疑华夫脱党是否有能力赶走英国占领者。暴乱在加剧。领导集团在巴勒斯坦战

— — — — —

争中(一九四八年)营私舞弊和给前线提供无用的武器,在埃及人面前揭穿了上层统治集团堕落的全部老底,为了自己发财致富,使埃及士兵白白地去送死。法鲁克的名字在国内外成为耻辱、腐化和贪污的标记,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一点点声望的痕迹都丧失殆尽了。

这种情绪“积累起来”的结果,引起群众普遍不满领导集团在社会方面的因循守旧和迟钝。埃及领导集团在社会政治方面表现的“自私自利在现代史中大概是空前的”。<sup>①</sup>正如意大利的一个研究工作者指出的,“整个城市中产阶级的下层都感觉到自己是受骗了,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社会事务被一小群人所垄断。他们愈益感到痛苦的是回忆起在学生年代为了实现政治和社会理想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理想曾是他们真诚相信的,而且也曾是那些政客们表示要忠于的,这些政客利用了他们年轻时代的热情。”<sup>②</sup>

革命成熟了。在那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爆发了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危机。正如一位革命主要参加者哈立德·毛希丁(当时是少校、“自由军官”组织成员)描绘的,“人民群众提出这样的战斗口号:打倒国王,同英国绝交。但是运动缺乏真正的政治领导。被这些出其不意的口号吸引的左派力量无力领导这场斗争,因为他们已被警察的追捕所削弱,也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只有军队是没有受到打击的唯一的民族力量。军队中也有革命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吸引了陆军军官界。反动派经常动用

---

① 萨弗兰,《埃及寻求政治共同体》,纽约出版,1961年,第195页。

② 明杰蒂,《现代的埃及》,佛罗伦萨出版,1959年,第159—160页。

军队直接镇压示威游行和罢工，使得军人有机会直接接触这些政治事件，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就使年轻军官们感到自己是一支实在的力量，使他们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支力量不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不去反对人民的敌人？”<sup>①</sup>

“自由军官”运动的另一位参加者，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指出：只有军队才能负起实现变革的责任，“我们拔剑，快刀斩乱麻，为人民消除痛苦……。”<sup>②</sup>

当革命成熟时，需要有发动革命的力量，予以推动。要有准备去冒险的先锋队，举起斗争的旗帜，带领群众前进。一九五二年，埃及的一些政治组织和党还不能成为这样的先锋队，因而军队登上了舞台。

一九四七年缅甸独立后，其主要政治力量是急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是缅甸民族英雄，革命民主党人昂山，但昂山和其他革命领导人被害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导人由吴努担任，吴努奉行资产阶级政纲和折衷主义思想体系的政策，这种思想体系是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幻想和佛教哲理的大杂烩。吴努的经济政策是试图同本地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结果遭到了惨败。正如瓦西里耶夫指出的，“在多年内甚至没有达到战前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不如战前……因为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从而按人口的消费量是相应下降。同高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

<sup>①</sup> 莫希·埃雷金，《埃及革命及其发展和前途》，《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38页。

<sup>②</sup>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暴风雨》，巴黎出版，1957年，第195页。

时，所有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日益官僚化，并在道德政治方面堕  
落下去。由于缅甸资产阶级对少数民族奉行官僚主义和沙文  
主义政策，国内民族问题急剧尖锐，成为重要问题。全国物  
价上涨，经济越来越混乱。前国家领导人使缅甸濒于崩溃边  
缘。”<sup>①</sup>

后来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中曾谈到：“贪污盛行，党的  
威信一落千丈。在人民心目中……由于政界和行政管理机  
关的堕落使得全部办事机构肆无忌惮地贪污。投机商和唯  
利是图者们利用他们所处的地位，掠夺人民，大发横财。”<sup>②</sup>

一九五八年十月，军队领导人负起了管理国家的责任。  
成立了以奈温将军为首的临时政府。这在各方面都是临时军  
事政体。没有提出新的纲领，没有实现任何重大的社会措施。  
军事领导人大概认为只要整顿秩序，“安抚”政客，使他们各得  
其所就够了。秩序确实是整顿好了，政权是比较牢固可靠，国  
家管理机关的效率有所提高。但要继续迈步就困难了，而且  
也不可能再继续前进。注重纯行政措施、不要政治工作、不去  
动员群众、不让他们参与社会生活，而运用军队中那套上下级  
关系制度，发号施令和绝对服从，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抑制”政  
客（对待名声败坏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自然是信任的），  
所有这些都是军事政体的特点，这样就不能鼓舞群众发挥新  
的革命积极性，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也就不能使情况有多

---

① 弗·弗·瓦西利耶夫：《在交叉路口上的缅甸》，莫斯科，1965年，第8—9  
页。

② 《1963年4月1日革命委员会关于全国大赦的声明》，奈温，《在新道路  
上的缅甸》，莫斯科出版，第154—155页。

大改变。显然军队在政治上是缺乏经验，军事机关不适应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复杂问题。正如帕伊正确地指出，就军队的统治而言，“它缺乏一个能够调整社会内部各方利益冲突的机构”。<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初，奈温又把政权重新交给文官，政府仍由吴努领导，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纯军事政体的短期试验给了奈温有益的教训，使他扫除了原来的空想：以为依靠纯军事机器和不用政治机构就可以领导国家；而是必须选定社会方向，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军事统治似乎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以后重新执政的预演。

---

① 帕伊，《政治、人物与国家的建立》，伦敦出版，1962年，第247页。

## 第二章 军事政变的原因和目的

所有从殖民主义体系中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例外地都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眼里，军队是主权的象征。此外，即便国家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愿意，但也不能解散军队；即便从保卫国家的角度来看，军队的作用很小，实际上没有用处，但也不能没有军队；甚至由于职业上无用而要让军官退伍这样的问题也不能提出来；除非这些军官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或领了养老金，才能退役。

同时，军队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通常都能干预政治，因此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是一个经常性的潜在威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讲过：“在不发达国家中，军队的存在经常是有危险的，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军队是不行的，所以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要保证军官和士兵同党政机构融成整体，使他们象我们通常说的国家职员一样没有危险。”<sup>①</sup>

怎样实现这样的“整体化”呢？政府懂得，要保证军队的忠诚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保持军官和士兵在殖民主义军队中所享受的待遇，任何企图削减这些待遇或对新成立的军队在给养方面加以拖延，正如尼雷尔所说的，哪是最“危险的”。一九六四年在东非（原文如此，似应为西非。——译者）发生的士兵

<sup>①</sup> 《观察家报》，1964年8月30日。

造反，就是因为要求增加薪水，由于多哥总统奥林匹欧拒绝军方要求，结果自己丧生，因而便把法国军队的老兵多哥人都列入国家编制。在原法属非洲的一些国家，老兵问题起初一般都给政府带来许多麻烦：例如上沃尔特约有十五万殖民军老兵，而独立后规定的军队人数才一千五百人。在几内亚，从法国军队中返回的老兵约有五万人，其中能继续为国家服役的不得超过五百人。<sup>①</sup>

原法国殖民地施行义务兵役制，原英国殖民地除坦桑尼亚外，都能行志愿招募兵役制。但实际上，真正实现全面义务兵役制的仅塞内加尔和刚果，在其余法属殖民地国家是有条件地施行的，仅仅挑选最合适的青年服役。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政府对每个地区规定限额，地方政权必须满足这个数字，并且从具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平的人中挑选最合适者。例如按出身，从当了十八个月的义务兵中挑最适合的人，这就是基于兵，有的成为中士，有的甚至可当上军官。

一九七二年在中非共和国，根据博卡萨总统的命令，制定了服役期限新条例：男十八至四十岁，女十八至三十岁的所有适龄青壮年，都要服六个月的兵役。实际上，士兵是由当局进行淘汰的基础上录取的，要是志愿招募兵役制就不可能这样做。

武装力量的军费开支，无论如何是过重的，对于穷国来说，是负担不起的，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忠诚，开支又不能削减。相对来说，这笔开支在热带非洲国家还没有在经济发达国家

<sup>①</sup> K.拉奇纳：《黑非洲的军队和政权》，布拉迪斯拉发出版，1971年，第9页。

那么大，平均为国家财政预算的4—6%，但用绝对值表示也是很惊人的。何况一九六七——六八年财政年度十五个非洲国家中八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为财政预算的15—25%。<sup>①</sup>

当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力图通过政治教育保证武装力量的忠诚，但从法国或英国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军官，以及由这些军官培训出来的新的青年军官，进行这样的工作似乎是不适合的，因为如果他们不一定是亲西方的，就会出现抵制行动，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进行职业团体精神的教育。因此，为了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原则上需要设立政治委员和执政党的政治思想指导员。但是只有在革命者领导的那些国家里，如几内亚、刚果才设有政治委员学院，在其他国家，甚至那些选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如加纳、马里，他们的领导人也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大概是由于不愿去打搅和刺激军官。实际上，军官们的反应是事先可以预料到的；下文将可以看到，在印度尼西亚，“纳沙贡”化的威胁，即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学院的建立成为一九六五年陆军领导受惊吓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监督军官的情绪比较困难，政府减少对军队依赖的另一个办法是在建立正规军的同时，再成立一支民兵，或建立一支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陆军指挥的特种部队。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就是用这个办法，他组织了一个总统近卫团，这个团从正规部队抽调了五十名军官和一千一百四十二名士兵组成；后来又建立第二近卫团。一九六五年八月，恩克鲁玛领导的近卫团不再受陆军的指挥；此后，总统近卫团的指挥权直接属总

---

<sup>①</sup> J.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90页。



统本人。参谋长安克拉将军因对此提出抗议而被解除职务。这在许多高级军官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半年后这些军官在安克拉的领导下推翻了恩克鲁玛的统治。<sup>①</sup>政变后安克拉将军发表广播演说，指责恩克鲁玛，“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部队，为维持这支军队每年花费五十多万法郎，破坏国家宪法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sup>②</sup>奥克兰少校还谴责恩克鲁玛“显然企图取缔军队，想用总统近卫团代替之”。<sup>③</sup>

恩克鲁玛本人后来也承认：“我们之所以在加纳建立民兵，原因之一是部分陆军军官对夺权计划表示支持。”<sup>④</sup>

费尔斯特对发展中国家当权派建立民兵或不归陆军指挥的特种部队分析如下，“如果要是军队不热情支持国家政权的目标，那末与其说这是防备措施，不如说反而刺激了军队。加纳军队发动政变并不是什么例外情况，而是为了自己不受总统近卫团的排斥；马里年轻的陆军中尉之所以造反，除了有别的原因外，目的也是要铲除民兵。”<sup>⑤</sup>虽然说这个因素不能过分夸大，但费尔斯特正确地指出一个趋向，其实质是军官团体不能容忍陆军之外再建立其他部队来威胁国家武装力量的垄断地位，甚至于“凌驾”于国家武装力量之上，使后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从纯军事观点看，难以想象，民兵或特种部队能够同正规部队抗衡。斯拉夫作家拉奇纳写道，“加纳和马

---

①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埃文斯顿出版，1970年，第185页。

②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197页。

③ 同上。

④ 恩克鲁玛，《加纳的黑暗时期》，伦敦出版，1968年，第47页。

⑤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429页。

里的民兵……也还没有武装和训练到那样的程度，能够保卫进步政府对付军事政变，但毕竟他们是同起义部队进行武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sup>①</sup>

总的来说，建立民兵或其他什么类似的部队在亚洲和非洲不是一条规律，而是一种例外。各国政府基本上是依靠物质和精神刺激来保证军队的忠诚。近来都力图使军队除了发挥其正常作用外再做某些“民间工作”，让它参加国家建设，关心国家的重建工作。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为民航部门培养驾驶员，参加扫盲运动，修建铁路和桥梁，参加实施市政发展规划等。象牙海岸的新兵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即派往农村工作或和地质人员一起去勘探金刚石；这个国家的军队的标志就是步枪和锄头的交叉图案。

“民间工作”得到年轻军官和士兵的一致响应。它同样使得武装力量在人民中间提高威信。非洲不久前还把军队完全看成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而现在这种观点完全改变了。军队在各方面帮助群众，使大家对武装力量产生了新的看法。

不仅是现役军人，包括退伍军人都是非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十万非洲人接受了军事训练，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学会识字，而且学会了英语或法语。他们由于到过其他国家而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多数情况是掌握了一门对国家有用的专业。在许多国家成立了老兵组织，这些组织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sup>②</sup>社会上正在形成一种舆论，认为就人口总数所占的比重而言，当过兵的人所起

<sup>①</sup> 拉奇纳，《黑非洲的军队和政权》，布拉迪斯拉发出版，1971年，第96页。

<sup>②</sup> 帕谢尔宾斯基，《非洲和将军们》，华沙出版，1966年，第152页。

的作用已大大超出他们应起的作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军人在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赶走了殖民主义者后，他们立刻成为新制度的一部分，尤其是新的上流社会的一部分。这个上流社会的军人上层领导也属于官僚；如果在独立国家中“行政官”和“政论家”在概念上有矛盾，那毫无疑问就应当把陆军领导，即军人官僚列入“行政官”这一类。如前所述，高级军官多数是在英国或法国培训的，所以他们对社会问题持保守观点。军人上层领导感到自己是有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是继承殖民主义制度特权阶层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愿意保护这个制度，并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值得特别指出的情况是，在任何一个亚非国家，军人不去发动政变，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未被授予这样的使命或自己是受压制的社会集团，而多数情况是因为他们不要求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深刻的革命改造。例如，他们为保护现有的制度，还极力把这种制度从他们认为已经受到威胁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可见他们是属于特权阶层。特别在热带非洲，许多政变的发生实际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动，目的在于防止局势失去控制而危及军人团体利益。<sup>①</sup>

至于本国军事院校培养的新一代军官，对现存的制度则

---

<sup>①</sup> 领导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政变的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谢伊尼·库恩切中校在接见《青年非洲》杂志记者时宣称：“我们没有打算享有革命者的名望……我们也还没有打算在尼日利亚创造新型的社会，我们未考虑向另外形式的社会过渡之前，要先把现有的这个社会加以完善。”（《青年非洲》周刊，1974年，5月4日）

持两面态度，一方面他们所持的观点和养成的作风，同在宗主国军事学校中培养的老同学的一样；而且在别的方面还有继承性，军官们的通用语言都是法语或英语，从殖民主义者那里继承了不问政治、职业至上、行会思想等倾向，这些倾向绝对不会促进激进思想和革命观点的形成。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军官已同有特权的文官阶层（往往是他的同族人或亲友）靠近，那末这些外地来的年青军官，则远离首都贵族，经常同代表思想激进的非军人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其中包括大学生、小职员、工会和党派的活动分子。这种两面性使得老年军官和青年军官的思想行为方面表现出差别。在军队掌权之后，研究了发生的许多军事政变和事件的经过时，这种差别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尽管军官是一个整体，特别是他们的上层领导都“扎根于制度”，但在军官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上层领导提出批评。军人习惯于守纪律、遵守时间、“坚毅面有目的地行动”，他们和文官制度的纪律涣散很难相处，引起他们重视的是搞阴谋、滥用职权和贪污贿赂。他们中的很多人天真地认为，所有这些坏事、自私观念、不良行为以及徇私等，都是掌权后个人的行为；只要改变这些行为，一切就可以纳入正轨。达荷美的政变领导人索格洛掌权后曾经说，必须“团结在纲领的周围，而不能在某些个人的周围”。上沃尔特的政变领袖陆军中校拉米扎纳也肯定认为，国家的管理只能交给下述文职人员，他们必须是“负责任的和爱国的，能克服个人偏见，并同意大家所接受的最低纲领”。<sup>①</sup>

<sup>①</sup> 《现代非洲》，1965年12月30日，1966年6月23日。

此外，军官们担心的是：内部斗争的发展、工会的政治化、罢工和其他等等，一句话，把群众引入政治，于是，这个“社会的下层”迟早也会使士兵们政治化，这样他们就怎么也不会顺从。士兵们离破坏纪律和采取独立政治行动就只差一步了。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使士兵群众远离政论家的影响，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士兵的忠诚。使军队变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团体，变成一个独立体系，使“破坏和腐蚀性的”政治潮流难于接近，这便是军官们的设想，也是保持军队完整和忠诚的唯一办法。按他们的看法，如果不是这样，军队就会成为内部斗争的受害者，并招致灭亡。但在被内部斗争所分裂的社会中，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唯一的办法只能尽快消除这种斗争，抑制政论家相互之间的争吵。这样，以下的想法自然就产生了，为了不使军队体系遭到破坏，就要消除对军人团体有危害的行为。

因此，当军人决定夺取政权时，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保证军队成为可靠和顺从工具的职能不受破坏。正如美国作家欧坎季亚指出的，“军队是按法国的原则严格组织的。将军的命令任何下级军官都不能歪曲解释，否则军队就不成其为有生命力的力量了。士兵的结合当然是根据文化程度、部族关系以及人种集团结合起来考虑的，这些人种集团对军队的影响大大超过其他组织。”<sup>①</sup>另一位作者扎尔特曼在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时指出，“这个军队并非由工人和农民组成，而是他们的子弟，这些人由于他们受到的教育、职业和地位的不同，他

---

<sup>①</sup> 《现代非洲》，1968年。

们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原来(因原来受出身的限制)。”<sup>①</sup>

当然,研究军事政变时忽视人种和部族的原因是不对的。如推翻恩克鲁玛时起主要作用的便是亚撒蒂人和埃维族的军官,这两个部族同沿海地带凡特集团的几个部族相处不和,这几个部族也就是恩克鲁玛的同一个种族。但是,尼日利亚75%的士兵是北区人,而大约有二分之一的军官是伊博族人。很有意思的是一九六〇年后获得军衔的三十六名军官有十六人站在比阿弗雷一边作战。<sup>②</sup>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军队站在那一边并不是绝对固定的。在多数政变事件中,人种和部族因素不一定都起重要作用,不用说在那些军队掌权的国家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

要想找出某个共同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军人决定推翻文官政府,那是徒劳的,因为一般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下面将有一些事例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要弄清军人对各个事件的反应,分析社会状况和弄清产生社会危机的原因,比搞清促成某个军官集团发动政变的具体起因更为重要。现在我们的分析就从埃及开始。

埃及军队究竟是怎样成为革命力量的呢?

在阿拉伯世界中,军队要发挥政治作用的传统起源于一个哈里发朝代,当时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新教——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了远征,建立了伊斯兰帝国,并使征服的人民转信伊斯兰教。埃及征服者哈里发奥马尔是统帅和国家

<sup>①</sup>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埃文斯顿出版，1970年，第185页。

<sup>②</sup> J. 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176页。

领导人。在哈里发朝代，一个胜利的统帅一般都得到哈里发授予很高的政治职位。伊斯兰教总是给予军人以极高的评价。在埃及新的历史中，军队起了杰出的作用，人们都记得马木留克士兵，他们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打通了从士兵到国家统治者的道路。一八八二年反对外国统治者的起义是由阿拉比·帕绍领导下的军官团发动的，但这次起义符合整个埃及人民的利益，是正确的。阿拉比·帕绍运动的特点如下：“它不是军阀制度的诞生，而是人民的起义”，领导这个起义的是“平民出身的军官……阿拉比的民粹主义同后来的纳赛尔主义看来有微小的相似之处”。<sup>①</sup>

在英国统治时期，埃及的军队不属埃及国家的，它是在英国控制下用来为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它不可能享有民族爱国力量的威望；只有一些富豪子弟在骑兵团中服役。但一九三六年英埃条约签订后情况改变了，军队具有国家的性质，数量也增加了，普通家庭出身的人首次获得机会能够进入阿巴西亚军事学院学习。

埃及前总理纳吉布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军官们的社会成分时这样写道：“农民和商人……都是由于自己财富的增加而过分担心，所以去服兵役。结果大多数军官都是国家职员和军人的子弟，以及农民的孩子。”<sup>②</sup>瓦迪奇奥迪斯是这样描绘新一代军官的：“这是一个年轻热情而最团结的阶层，他们能够把混乱的民族意向统一起来，并且关心全国人民的

---

① 《军队在中东的作用》，第72页。

② 纳吉布，《埃及的命运》，纽约出版，1955年，第14—15页。

社会和经济需要。”<sup>①</sup>

这是指一九三六年条约签订后进入阿巴西亚军事学院的年轻人。即第一批招收的，特别是一九三七年招收的，这些人后来组成了“自由军官团”，其中包括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纳赛尔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生于北尼美村（阿西乌特省），他的父亲是邮局小职员，识字不多，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把他四个儿子中的老大送去读书，因而加麦尔进了开罗中学。

年青的加麦尔在同学中表现出众的好学和认真，特别是对历史课程。很早他就表现出革命领导者的天赋才干，他十六岁时，就组织同学反对美国人的统治，十七岁被选为校委会代表，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帮助华夫脱党恢复政权（纳赛尔和大多数爱国军官一样，都同情华夫脱党，一直到革命发生时为止），加麦尔中学毕业时成绩优良，但他的前途仍很渺茫，因为他参加了政治活动，警察把他列入受怀疑的名册中，所以只有进入军界才能摆脱这种无出路的情况，纳赛尔便投考军事学院，在四百名选拔者中录取了四十人，其中包括纳赛尔。

军事学院的学制为一年半，在这一年多期间，纳赛尔读了很多名著，特别使他入迷的是拿破仑、阿塔图克、俾斯麦、丘吉尔等人的传记，埃及、阿拉伯各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卢梭、狄更斯、伏尔泰的著作，以及丘吉尔的回忆录。<sup>②</sup>一九

<sup>①</sup> 领导机构中十一个领导人员有八个在军事学院的同一个年级学习过。（见瓦迪奇奥迪斯，《埃及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sup>②</sup> G. 沃歇特：《阿卜杜勒·纳赛尔及其集团》，第一卷，巴黎出版，1959年，第71—73, 94—104页。



三八年七月一日，纳赛尔获得陆军中尉衔，被派到第三步兵旅步兵排当排长，这个旅驻扎在曼卡巴德，即在他自己的省城西乌特。

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未来的革命战友安瓦尔·萨达特（现埃及总统）和扎卡里亚·毛希丁。

安瓦尔·萨达特曾回忆过这一段时期：“我们在阿什·沙里弗山麓，每夜围着篝火而坐，这些佩带武器的兄弟，是年龄和军衔都差不多的青年，充满着同样的希望，有着同样的热情！我们很快就熟悉和友好，我们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相同地对现实理所当然的否定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这个外表堂堂、性格直爽的年轻人经常和我们接触……，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大家一样，但他表现出愁闷和忧郁，严肃和沉着……，他的道德纯正，他的眼光远大，使我们对他产生爱慕。由于他有着炽烈的热情、自信和力量，所以凡是同他接近的人，都会受到他强烈的影响。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的热情和对埃及前途的满怀信心感染了我们。他很快成为团结大家的中心，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热烈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虽然还没有预见到他们的领导者将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但已认识到他是前途的引路人。

“加麦尔把自己在秘密工作中锤炼出来的革命气概和组织工作者的真实才干，献给了解放事业。当我们围坐在阿什·沙里弗山麓篝火旁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将同帝国主义斗争，同君主政体和封建主义斗争，所以我们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奴隶制度。所有的爱国者都希望建立一个强盛的和完全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个目标将用武装的或别

的办法来达到。时不待人，国家正处在现实的混乱中。社会的要求……给我们指出了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革命！由于力量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情景，能够使国家不受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的苦难，曼卡巴德的军人便于一九三九年初成立了地下革命团体，为解放斗争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安瓦尔·萨达特是这样叙述了革命组织的诞生，而据一般的说法，这仅是聚集在纳赛尔周围的一个刚刚开始的小团体，其影响尚没有在曼卡巴德广泛扩展。而根据另一些作者的说法，“自由军官”组织是一九四九年才最后形成组织形式，<sup>②</sup>但迈开第一步确实是在曼卡巴德开始的。

一九三九年，纳赛尔转移到亚历山大，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阿密尔后来成了他的亲密战友。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第五步兵旅服役，之后同阿密尔一起被派往苏丹，在奥利亚山一个偏僻的驻防部队里。一九四三年，纳赛尔升为陆军步兵上尉，回到开罗，这次在军事学院当战术教官。之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读完了陆军参谋学院。在毕业后的几年内，直到巴勒斯坦战争结束，纳赛尔作为总参谋部上尉在军事学院任教。在社会上他并不有名，但军界对他都很熟悉，大多数年青军官都在这里或那里同纳赛尔相熟，有的是同他一起服役，有的是听过他讲课。

---

<sup>①</sup>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叛乱》，巴黎出版，1957年，第34—40页。

<sup>②</sup> 瓦迪奇奥迪斯：《埃及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布罗明顿出版，第56—57页。

---

纳赛尔在这些年内，都一直致力于建立秘密军官组织，耐心地、有步骤地审查和挑选最可靠的人。按照安瓦尔·萨达特的说法，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建立了第一批支部和领导机构。秘密团体不断扩大，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发展别人加入，其条件是只要发展人能够保证他发展的对象是可靠的。团体成员都有暗号。秘密组织逐步渗透到整个陆军部队，到巴勒斯坦战争开始已有七百名军官参加。纳赛尔作为“运动的建筑师和战略家”<sup>①</sup>，他一个人了解每一个人，也只有他才知道小心地进行秘密活动的全部成员。这在下面介绍《遵守秘密》这本名著时还将谈到。事实上，组织中并不是没有一个叛徒，这样的组织不可能不被王国的警察所侦破。

无论是曼卡巴德或其他地方驻防部队的年青军官，先后都来到首都，他们同各种社会政治团体接触，如果说，起初还象安瓦尔·萨达特所说的，他们的结合仅仅是由于青年的热情、民族解放的渴望，以及对社会的正义感，那末后来，就都是成熟的人了，他们沉浸在首都的政治气氛中，同各种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相遇，这些年轻的军官就有了自己对党派和政治纲领的态度。纳赛尔自己年青时就接近华夫脱党，后来有一个时期又同“穆斯林兄弟会”接触，<sup>②</sup>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活动发生兴趣。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人建议他加入这个党，但他读了他们的文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无神论和非穆斯林观点同他的思想意识是格格

---

①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叛乱》，第40页。

②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巴黎出版，1962年，第207页。

不入的。<sup>①</sup>

以下介绍“自由军官”团体的领导人及其政治关系：

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塞德，陆军少校，“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成员。

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空军中校，同“密斯尔”财团有联系，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在《埃鲁埃兹·密斯尔》航空公司服务。

卡迈勒丁·侯赛因，炮兵少校，“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成员。

哈桑·易卜拉欣，空军少校，“华夫脱·密斯尔党”党员（“青年埃及”，右翼极权论青年组织）。

哈立德·毛希丁，装甲兵少校，马克思主义组织成员。

安瓦尔·萨达特，步兵上校，最初是“华夫脱·密斯尔”成员，后来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加麦尔·萨勒姆，空军中校，社会主义党党员（战后由“华夫脱·密斯尔”改组的）。

政治上有联系而大家所不知道的还有：查卡里亚·毛希丁中校、赛拉·萨勒姆参谋总部少校、侯赛因·沙菲装甲兵中校、萨瓦特·奥卡沙中校、塔乌菲卡·阿卜杜勒·法塔哈中校、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穆罕默德·纳赛尔军医少将、阿巴斯·拉德瓦纳中校、法特欣·里斯卡军需部队少将、侯赛因·祖尔费卡拉·萨布里空军少将。<sup>②</sup>

<sup>①</sup> 印度《闪电》周刊，孟买出版，1959年9月17日，对该杂志主编的谈话。

<sup>②</sup> 瓦迪奇奥迪斯：《埃及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布罗明顿出版，第44—53页。

至于步兵中校卡迈勒·里法特后来当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书记(负责思想意识问题),作者瓦迪奇奥迪斯一点也没有讲到他的政治关系,马利克记得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sup>①</sup>而沙法依认为他是一个同“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的人。<sup>②</sup>

应当列入的还有四个人,他们在“自由军官”组织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四人是:空军中校阿里·萨布里(后来他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总书记)、少校阿卜杜勒·卡德尔·哈特姆(后来有一个时期他是文化和国家指导部长,马利克认为这个人有反美情绪)、上校拉沙达·迈哈纳(他同“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上校优素福·萨迪克(共产党员)。<sup>③</sup>

这些人的出身、政治关系和后来的职业,无疑都是令人感兴趣的。

萨布里和奥卡沙兄弟是从旧贵族家庭出身的,受过欧洲教育。其余二十三人中的二十人都出身于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阶层。虽然出身是这样,但是萨布里和奥卡沙都忠于纳赛尔的路线,这证明一个事实,成年人的社会联系以及同某种政治力量接触后,所受的影响作用之大,超过父母的社会地位。

革命组织的所有领导人,都是上校、中校和少校。纳吉布将军是在起义前的最后一刻才参加到运动中来的,其余的

---

<sup>①</sup>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巴黎出版,1962年,第208页。

<sup>②</sup> 马利克,《纳赛尔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记事〉》,伦敦出版,第38—56页。

<sup>③</sup>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巴黎出版,1962年,第208页。

两位将军，一名医生和一名军需官没有起重要作用。六名军官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上同“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了联系，还有三名是同其他右派组织有联系，而同左派组织有关系的只有两人。在“自由军官”组织中同华夫脱党有关系的军官在战后大概一个也没有。这说明秘密团体的领导人都是主张用极端强制手段改变现有制度的拥护者。

他们后来的前途是很有趣的。第一批“脱离这个圈子”的有共产党员萨迪克和反动分子迈哈纳，很快地步他们后尘的有向右摆的加麦尔·萨勒姆，而赛拉·萨勒姆不幸死亡。巴格达迪和卡迈勒丁·侯赛因在非资本主义改造阶段，即最后几年成为反对派。查卡里亚·毛希丁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政府改组后不再任职，哈立德·毛希丁几经失宠，但仍坚持左的观点。

现在我们再回到革命前的时期。一九四八年爆发了巴勒斯坦战争，纳赛尔被派往前线，并在法卢贾地区参加了最激烈的战斗，他的部队被切断了同埃及主力部队的联系，被装进了所谓“法卢贾口袋”。全体指战员都知道，战争是打输了，以色列指挥官的意图是以围逼降，但是埃及人在“口袋”中一直坚持到停战协定签订。纳赛尔的肩膀受了伤，而作战仍很勇敢，在陆军中获得“法卢贾之虎”的称号。

在法卢贾被困期间，纳赛尔组织召开了“自由军官”组织第一次会议，其中有一部分是前线同一地段的军官，而秘密组织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同谋者。大概就在这一九四八年，“自由军官”组织真正成为全国性的陆军政治组织，其目标是为推翻王国政权而准备武装起义。

巴勒斯坦战争无论对于纳赛尔思想的形成以及整个组织的命运都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历史学家J.马洛写道，“必须知道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恐怖情况是何等的可怕。”<sup>①</sup>譬如这样惊人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国王周围的人为了获得巨额利润，把无用的武器送到前线。从而打破了大家的幻想，原来对法鲁克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失了。很显然，非得用武力推翻腐败的上层领导集团，否则埃及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获得解放。

对此，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是我们的思想仍在埃及，我们的子弹在射向我们面前战壕里的敌人，而我们的心是在遥远的祖国，祖国正受到一群不可靠的人的摧残。在巴勒斯坦，‘自由军官’团集合在战壕里和指挥所里，讨论着我们的问题和寻找出路。在巴勒斯坦，赛拉·萨勒姆和查卡里亚·毛希丁同我相遇，我们冲破了法卢贾包围圈，又陷入了包围，不知道是怎样和什么时候解围的。在巴勒斯坦，有一次卡迈勒丁·候赛因坐在我的旁边，用出神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你知道吗，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死之前对我说些什么？‘他说什么’？我问，他说：‘你听着，加麦尔，我们的主要战场是埃及。’”<sup>②</sup>

主要战场是在国内，头等重要的胜利是赶走帝国主义，一定要在开罗取得这个胜利，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王国制度，这样的想法是巴勒斯坦战役后“自由军官”们的普遍情绪。纳赛尔还回忆说：“如果军队不动，我们怎么来向自己解释，还有

<sup>①</sup> J.马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伦敦出版，1960年，第212页。

<sup>②</sup> 纳赛尔，《革命哲学》，开罗出版，1954年，第12页。

谁起来行动呢？”<sup>①</sup>

最后，终于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团体的领导分成五个部分，即包括：主管经济问题、突击队、安全、恐怖活动和宣传。突击队负责发展新成员。团体的基层支部由五人组成，每二十个支部组成一个队。团体的全体成员在起义前只有纳赛尔和阿密尔知道。团体的总领导是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纳赛尔、阿密尔、卡迈勒丁·侯赛因、哈桑·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拉乌夫、赛拉·萨勒姆、加麦尔·萨勒姆、安瓦尔·萨达特、巴格达迪和哈立德·毛希丁。革命胜利后，执行委员会改称革命领导委员会。一九五〇年，纳赛尔被正式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二年再次当选。<sup>②</sup>

“自由军官”组织在他们各自的秘密活动中都力图使社会上广泛知道埃及国内有一个地下军人组织。他们散发署名为“自由军官组织”的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大量揭露王国制度的罪状。

法鲁克知道有这个组织，但他的警察侦察不出来。当国王尚在调查军官中的反对情绪时，在革命前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使纳赛尔得以加速准备起义的插曲。当时军官俱乐部正面临重新选举新主任，民族主义军官便推举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作为候选人，因为在贪污成风的军界上层把以廉洁和效忠国王而著称的纳吉布推选出来是有利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鲁克拒绝接受纳吉布为候选人，而要强迫将军俱乐部接受同提供无用的武器丑闻有牵连的侯赛因·西里·阿密

<sup>①</sup> 纳赛尔，《革命哲学》，开罗出版，1954年，第18页。

<sup>②</sup>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叛乱》，第130页，133页，170页，171页。



尔为候选人。军官们认为国王的行为是一个直接挑战。这个事件很快就传遍全军，“自由军官”们懂得，与国王的愿望相反，现在却造成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在巴勒斯坦灾难结束之后，同时又经过了军官俱乐部的事件，反对腐朽制度的任何起义都会得到所有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军官们的支持，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中、下级军官。

按照研究埃及革命的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断言，“自由军官”执行委员曾于一九五〇年制定了一个五年行动计划，以便在军内和社会上进行武装起义的细节准备。按这样的计划推算，起义日期最早也得到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sup>①</sup>参加这场革命的人对这种说法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不管怎么说，一九五一年末发生的政治危机是同废除英埃条约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黑色星期六”之后，这个危机已非常尖锐，造成了埃及国内革命成熟的气氛。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团体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选定七月二十三日为起义日期。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纳赛尔、阿密尔、安瓦尔·萨达特、哈立德·毛希丁、巴格达迪、哈桑·易卜拉欣、卡迈勒丁·侯赛因。<sup>②</sup>

机器开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政变的全部环节都运转得极好。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拂晓，七名军官——运动的领导者占领了阿巴西亚参谋部的住宅，逮捕了埃及武装力量的总指挥。第二天，起义部队又占领了亚历山大。一九

<sup>①</sup> R.约翰，《首领：纳赛尔的故事》，伦敦出版，1960年，第110页；J.拉库蒂尔和S.拉库蒂尔，《运动中的埃及》，巴黎出版，1956年，第143页。

<sup>②</sup>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叛乱》，第192页。

---

五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被推翻的国王法鲁克乘着自己的快艇从亚历山大逃往意大利。君主政体被推翻了，革命胜利了，军队掌握了政权。

现在我们来研究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的前提和过程。

早在托管时期，法国当局就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称之为特别团的当地军事警察部队。到一九四六年，当外国军队撤离叙利亚时，年轻共和国的军队共有五千人。兵员多半是从农民中招募的。如前所述，法国当局尽可能的从经济和文化最落后的边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库尔德族、德尔克斯族和亚美尼亚族等）中多招收兵员。在叙利亚军队中，城市资产阶级富裕家庭出身的军官比埃及多一倍多。属于这种情况的首先是高级军官，这些高级军官来自“五十个家族”，形成叙利亚军官团体的一个上层集团（阿塔西、马尔达姆、尼扎姆赫丁等）。至于中下级军官的社会出身已反复表明前面所说的规律性，在军事院校中，多半是地方小资产阶级、职员、手工业以及多少比较富裕的农民等家庭出身的子弟。如果是将军和上校级军官，那都是法国培养的军事干部（有些是在圣西尔学习过的），那些等级较低的军官，都是在霍姆斯军事学院中受的军事教育，这些军官都同前殖民主义者，以及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有关系。①这个情况对于了解叙利亚军队的政治作用特别重要。

美国作家戈尔顿·托里研究了叙利亚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贾马尔·法赛上校对霍姆斯军事学院一九四

---

① 《中东的军事》，第54—55页。

七——一九四八年的毕业生在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方面，影响是很大的（法赛后来是将军，在叙利亚同埃及合并期间负责指挥阿联的整个武装力量）。法赛在叙利亚军队中是“头号泛阿拉伯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叙利亚军官中的民族主义激进派团结了起来，但在这期间没有能形成一个组织上的关系。据托里说，尽管后来这个军官集团也类似埃及的那样，叫做“小型革命领导委员会”<sup>①</sup>，但事实上任何象纳赛尔式的“自由军官”团在叙利亚都是没有的。叙利亚军队倒是一股劲地反对现实制度，几乎在同埃及相同的时期内都是如此，可是差别毕竟是很大的，如果说两国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只有巴勒斯坦战争是促进两国革命的共同因素。

经过多年之后，一位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对法国记者鲁洛说，“巴勒斯坦的悲剧激起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促发了革命马达的转动。”<sup>②</sup>深感民族屈辱的群众和知识分子由于不满和失望，起而反对传统的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的领导人在政府中相互对换，用法国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古典传统玩弄政府和议会的把戏，因为这些领导人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远离群众，只关心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表现出完全不执行满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政策。巴勒斯坦悲剧是叙利亚独立之后内部矛盾深化的催化剂。

当一九四九年初哈立德·阿萨姆领导的政府企图削减国防开支，同时指控一名军官犯贪污罪而判刑时，军队的上层领导看出那些政客们试图把巴勒斯坦战争惨败的责任转嫁给

<sup>①</sup> 戈·托里：《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俄亥俄出版，1964年，第56页。

<sup>②</sup> 《世界报》，1966年10月13日。

军队。军队总司令胡斯尼·扎伊姆向总统库阿利特提交一份“抗议书”，其中以讽刺挖苦的语调反击说，军官不应当象“村长”一样递交请愿书。<sup>①</sup>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扎伊姆将军领导了政变，成为当代叙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人独裁者，开始了军队干预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时期。

扎伊姆曾在军事学院学习，之后，在特别团服役。关于扎伊姆的政治观点大家一无所知，他进行过某些改革，例如颁布新的民法法典，但又否定需要任何对社会进行重大改革的计划。这个独裁者主要是忙于处理对外政策问题。那时叙利亚舆论注意的中心是沙特阿拉伯的一条输油管问题，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家力争使这条管道穿过叙利亚的领土，英国垄断资本家则极力反对，从而出现了一场“石油战争”。阿萨姆政府已经准备欢迎美国人，扎伊姆夺取政权时有一种说法，据称是英国国家侦察局插手了这场政变，证明扎伊姆同英国人有联系，我们没有掌握别的根据，但看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的情况也应当确信，扎伊姆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掌权后不久，又同美国公司签订了输油管协定。<sup>②</sup>因此他不仅反对英国人，而且反对同英国有联系的长期欺压叙利亚的伊拉克和约旦统治者哈希姆王朝。以后的事情之发生是由一个新的因素引起的：外约旦的埃米尔（后来的约旦王国）阿卜杜拉已经有几年的时间领导了为创建“大叙利亚”的运动，目标是要使叙利亚和外约旦合并，并受哈希姆王朝的保护。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合并计划在酝酿中。在这种情况下

<sup>①</sup> 戈、托里，《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俄亥俄出版，1964年，第57页。

<sup>②</sup> 扎伊姆与《精英》杂志谈话时表示接受美国的援助。

下，事情已发展到要在阿拉伯东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哈希姆国家，消灭叙利亚的共和制，以保证英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

尽管谁也不怀疑这个计划是适应英国人的利益的，但它具有在阿拉伯世界各阶层中受到一定欢迎的特点。这个计划的制定者利用了特别受欢迎的统一阿拉伯的口号，以及面对以色列的侵略；还利用了历史和传统：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真的就是一个国家；同伊拉克统一，这在叙利亚的一部分社会舆论界中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这些情况说明英国傀儡哈希姆的阴谋企图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思想正好在叙利亚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那部分军官中特别受到欢迎。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关于同埃及统一的问题，但伊拉克是天然伴侣。是的，由于当时巴格达的统治者是腐败的哈希姆集团，所以叙利亚人对于同伊拉克合并的思想并不很感兴趣，但是为反对以色列而结成联盟和协同行动，这种主张是受人欢迎的。

正是那些亲伊拉克的（因而也是间接地亲英国的）叙利亚军官，在胡斯尼·扎伊姆掌权四个半月之后把他推翻并处死。新政权由陆军上校希纳伊领导。希纳伊和扎伊姆都曾在伊斯坦布尔学院学习过，但希纳伊在某种程度上是亲英的，政变后的第二天就废除了美叙输油管协议。但希纳伊掌权的时间还没有扎伊姆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就被推翻了，之后一个白天在电车站上被人枪杀。政权落到第三个独裁者——阿迪卜·施舍克里手里。被废除的输油管协议又重新恢复，美国垄断资本家获得经过叙利亚领土敷设油管的权利，英国支持者和叙利亚军队中的哈希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遭到

了失败。

施舍克里同他的两个前任相比，在叙利亚当政不止四个月，而是四年，<sup>①</sup>但这四年是平庸无奇的，在叙利亚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施舍克里政权内部虚弱，缺乏群众支持，没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也缺少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同卡塞姆一样，施舍克里不断地在各派力量及各集团之间进行协调和搞平衡，他不相信任何人，对所有的各派力量逐个地加以削弱。于是，他逐渐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泛阿拉伯主义者”不满意他的过分审慎，这一方面是反应在他对待阿拉伯国家的统一问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公开地表示不愿同一九五二年革命后的埃及军事领导当局接近（他把埃及军事领导当局看作同他在阿拉伯世界争夺影响的对手）。亲伊拉克的分子不能饶恕他的是一九四九年他推翻了希纳伊。他在对待社会经济改革方面表现得最畏缩不前，这使信仰社会革命的人感到失望。资产阶级不满施舍克里拒绝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为拒绝美国的经济援助使西方财界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的“不可靠的”和不可理解的制度。老的政客怀念过去的时代，渴望恢复传统的议会制和分配一些肥缺。独裁者夺去他们的这一切，之后又想解散所有的党派，企图用他自己的党“阿拉伯解放运动”取而代之，但他没有成功。势力较大的德鲁兹派公开同他对抗，一九五三年末，施舍克里组织了一次讨伐，把军队派到德鲁兹山地区，从而激起许多德鲁兹族军官的愤慨。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是，施舍克里（和扎伊姆一样）是库尔德人。

---

<sup>①</sup>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以前，施舍克里以文官政府为掩护进行统治，之后抛掉面纱，任命自己的亲信法马齐上校为“政府首脑”。

一九五四年二月，军队和人民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员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联合起来推翻了施舍克里的独裁统治。施舍克里逃往国外。可以这样认为，叙利亚从这一天起结束了军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第一阶段。这是采用“拉丁美洲式”政变取得政权的三个军事独裁者的统治时期，在这期间社会结构没有任何改变，当权的上流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最后一个独裁者变动了一下自己的人员结构），而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各派势力之间相互争权的斗争发展了，而且在这方面经常反映外部势力的利益。

从一九五四年起，一个新的军官团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已经不是土耳其或法国训练出来的老一代军官了。他们没有那些因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局限性，能够实现重大的改革。这是从霍姆斯军事学院毕业的第二代军官，他们都是有一定社会目标（或刚刚表露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某些人将在下面作较详细的介绍。

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基上校，出身于哈米的一个富裕家庭，一九四七年在霍姆斯军事学院毕业。他的才干和能力受到胡斯尼·扎伊姆和施舍克里的重视，扎伊姆政变后起用萨拉基当他的助手，后来萨拉基又被施舍克里委任为军事谍报科长。萨拉基同他的前任上司及时地划清了界线，所以在施舍克里倒台后，他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他加入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主义激进军官团，这个军官团中的大部分人参加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萨拉基本人不是复兴社会党党员），他在施舍克里垮台后仍担任领导谍报工作的要职。到一九五六年萨拉基不仅掌管军事谍报和反谍报的工作，而且包

括保安机构，所以他便成为叙利亚三、四个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萨拉基是主张叙利亚同埃及合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直至他的生涯结束，他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阿菲费·比兹里，一九一四年生于黎巴嫩，是个富翁，参加过一九四一年伊拉克的拉希达·盖依拉尼运动，后来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卓著战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比兹里从法国回国后，同叙利亚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提拔得很快：一九五五年任军事法庭庭长，审判过杀人犯马利克上校。一九五七年初任军队干部管理局局长，同年八月晋升为陆军少将，任参谋长。比兹里一方面不隐瞒自己亲共产党，同时他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保持密切联系，但他在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之后流亡国外。

阿明·纳福里，他是一个由农民和普通一兵成为军官和政治活动家的罕见的典型。由于他服役出色被送往军事学院深造，一九四九年毕业，任营长。一九五七年纳福里中校任副总参谋长，一九五八年担任阿联叙利亚地区的联络部长，一九六〇年被迫离开政界。<sup>①</sup>

阿德南·马勒基上校，是一个很快成为叙利亚政坛中心的大人物，在军队中他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负责人，一九五五年他已经是副总参谋长，由于他既握有关键性的军权，同时在威望越来越高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内又处于领导岗位，这两者的结合为他开辟了光辉的前程。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马勒基在大马士革的运动场上被刺杀，开枪打死他的是

<sup>①</sup> 戈·托里，《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俄亥俄出版，1964年，第60—61页。



一个中士，社会国民党（右派党）党员。之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开始清洗，随着清洗过程的发展，增加了该党的威望。<sup>①</sup>同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领导有联系的“第一代”将军和上校逐渐失去地位，特别在争夺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等关键性职位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军队实际掌握在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手中，因为国防部长是文官，不掌握实权）。一九五六年，舒克尔将军被迫辞去总参谋长职务，替换他的尼扎姆丁又充任了一年，这两个都是“有名的保守将军”。一九五七年总参谋长由比兹里担任，副总参谋长是纳福里，谍报总长是萨拉基，这“第二代”军官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应当列入这个名单的还有已经提到的参谋部上校“泛阿拉伯主义”精神之父贾马尔·费萨尔和步兵上尉胡奈吉。胡奈吉是一个机械化摩托营的营长，该营驻扎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喀丹地区（这个营长也是关键职位，这是叙利亚历次叛乱所一再证明了的；胡奈吉在军事学院学习时和萨拉基是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朋友）。<sup>②</sup>

左派民族主义力量不仅在军队内部，而且在文官集团中都掌握了领导权。一九五五年二月组成的萨布里·阿萨利政府日益采取反帝反哈希姆和亲埃及的立场。一九五五年七月，埃及获得苏联武器后，几乎立刻就签订了埃叙互助条约。一九五七年夏建立了人民防务部队，之后，又揭露出右派的一个大阴谋，证明这些人同外国有联系。叙利亚同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大大恶化了，不得不宣布叙利亚面临外来的进攻，群

---

<sup>①</sup> 推翻了施舍克里之后，复兴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获一百四十二个席位中的二十四席，代表数量比上次选举增加一倍。

<sup>②</sup> 戈·托里，《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俄文版出版，1964年，第63—66页。

众在大马士革挖掘战壕。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萨拉赫·比塔尔担任外交部长，出于暂时的考虑，他临时加入了左派民族主义阵营。哈立德·阿泽姆利用议会中所控制的民主联盟的三十八张选票当上了国防部长，阿泽姆访问过莫斯科，并签订一项苏联向叙利亚提供经济发展贷款的协定。<sup>①</sup>这加强了共产党和阿菲费·比兹里的地位。阿菲费的兄弟萨勒赫·比兹里担任了“人民防御”部队的总指挥，这支部队约有十万人。萨拉基、比兹里、胡拉尼、纳福里在叙利亚都是有权威的人物。

这样，给人的印象是，左派民族主义联盟的核心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而在这个党内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sup>②</sup>这个联盟牢牢控制着国家。反对派失败了。开创了一条为建立强盛的社会进步制度的道路。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阴谋，也似乎认为无论在内外政策上都必须同左派力量合作。按叙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中的一段引文来判断，一九五七年叙利亚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大概是被加以考虑的。那段引文说，“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懂得只有同人民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另一方面才能断绝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从而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实际生活却没有证实这种乐观的估计。资产阶级的应变能力远比预想的大得多。当然他们的本领最后还是用完了。九年之后出现的强有力的左派政权，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一个是

---

① 在莫斯科最后签署了给叙利亚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

② 在一九五四年的选举中，共产党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进入议会，成为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议会代表。

“强有力的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政权绝不再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似乎也“开始懂得”，必须和左派力量联合，而不是同他们斗争。

这个政权从外表上看是一九五七年诞生的，但在进行筹备创建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积极和真诚的参加者，按照他们的思想，应当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政体。考虑到这是初级阶段，在主要领导力量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处于平等地位。后来实际情况的发展超出了原来的设想，资产阶级和革命力量不可避免地要分道扬镳。但在一九五七年又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叙利亚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建立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在内的广泛联盟，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别的政策都只能是关门主义。那时共产党人可能对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力量估计过低，但即使他们估计得完全精确，那也不能改变就当时来说完全合乎规律的叙利亚同埃及合并的进程。

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气氛，任何人都已不能反对那种大家所看到的高涨热情，军队也被这种热情所感染，大家都真的相信有可能遭到外来的武装干涉，都愿意得到埃及的支持。十月十三日，第一批埃及军队作为履行联盟的义务来到拉塔基亚。不是别人，正是阿菲费·比兹里宣布：“今天两国的军队得到了统一……靠神的帮助，我们将获得胜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将成为我们阿拉伯复兴的领袖。”<sup>①</sup>众所周知，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埃

---

<sup>①</sup> 《现代东方》月刊，罗马，1957年，第十一期。

及合并之后，我们所要研究的主题似乎已经没有了，因为叙利亚军队在这期间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心理上所产生的普遍对联盟的绝望，毫无疑问又必然影响军队。一九六一年秋，几乎所有各阶层群众和各派政治力量无例外地都要求不再同埃及合并。知识分子表现为右的力量。同埃及分离的导火线是埃及领导人决定把阿联两个地区的私人企业实现国有化。纺织厂主通过自己信得过的政客“老同学”马蒙·库兹巴里同他的亲戚海达尔·库兹巴里中校（在离大马士革六十公里的德米尔卫戍部队中服役）约定准备武装起义。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拂晓，海达尔·库兹巴里带领三百人的一支部队进入大马士革。旅长达赫曼占领了参谋部和电台，同时占据了阿联第一军（即原叙利亚国民军）军长贾马利·费萨尔将军的住宅。经过二十七分钟的战斗，起义者攻进了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全权代表阿密尔元帅的住所，当他被带到参谋部时，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

对这次政变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是争取到了纳赫拉维上校指挥的喀丹机械化营参加起义。纳赫拉维的坦克开进首都后，边防军和卫戍部队的指挥官，除了哈列巴的卫戍部队之外，其他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支持政变，早晨七点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了第一号公报，但是公报中没有提到同埃及分开的问题，同阿密尔进行了谈判，他同意叙利亚在阿联的范围内自治。这个协定发表在第九号公报中，但没有得到纳赛尔的承认，纳赛尔显然对起义的规模和性质估计不足，他命令埃及陆战队在拉塔基登陆。十七个小时后发表了第十号公报，宣布叙利亚退出阿联。阿密尔和法伊萨尔飞往开罗，萨拉基

被逮捕，哈列巴的卫戍部队也宣布支持政变。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成立库兹巴里办公室，当天晚上纳赛尔宣布不再使用军队来恢复统一。<sup>①</sup>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库兹巴里和纳赫拉维的政变无疑是反动行为。而且不能忘记，那时纳赛尔制度的革命潜力还只是刚刚开始表现出来，所以进步力量由于摆脱了“法老的统治”<sup>②</sup>而充满着希望（合并期间有右翼和左翼之分）。群众中一部分支持叙利亚和埃及分开，一部分反应冷淡。

能不能说叙利亚军队一九六一年起了反动作用呢？回顾过去，可以说是，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上面所说的情况，很多军官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爱国主义的职责，是为受欺骗而失去独立的祖国的利益尽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第一，叙利亚的军官不满他们处于依附别人的地位，以及受埃及指导员和顾问责难的痛苦。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赞成“泛阿拉伯”思想并在实施政策方面站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边的“第二代军官”，到一九六一年已很少了，比兹里、萨拉基、纳福里和他们的追随者都已经不在军队里，许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军官在纳赛尔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决裂后都辞职领养老金了。取代他们的是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有联系的如库兹巴里，或象纳赫拉维式的纯粹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政变后开始清洗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居于要职的军官。这些军官没有屈服，一九六二年春阿利乌安上校在哈累布组织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有合并期

<sup>①</sup> 《东方报》，1961年10月3日。

<sup>②</sup>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尊称。——译者

间的一些高级军官，如前部长穆查赫姆·马阿里上校、贾拉将军（萨拉基的警察局长）等。<sup>①</sup>暴动遭到了镇压，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和害怕恢复纳赛尔政权的军官占了优势，纳赛尔分子军官“北爱尔兰统一党党员”都被清洗出军队。

此后，一切又恢复原状，政权重新回到几个原来的政党手里，合并期间在叙利亚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逐步停顿下来，国有化企业又发还原来的企业主。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职的资产阶级内阁总理马鲁夫·达瓦利比直截了当地宣布，凡谈论社会改革的人，他将把他们通通赶出国外。<sup>②</sup>商人、企业主、政客又重新进入议会，得意地搓着双手，当然，他们极端狡猾，胜过埃及人、共产党人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他们要重新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黄金时代”。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叙利亚已经觉醒了，群众要求变革，回避埃及的榜样已经不可能了。一九六三年初对“传统”制度的不满公开表现出来，工人骚动，农民要求土地改革，士兵和军官收听开罗揭露大马士革反动政权的广播。

在同埃及合并期间，旧制度已被大家所怀疑，为新的改革播下了种子，并长出了幼苗。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在巴格达推翻了卡塞姆将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权。此后，在叙利亚，多数人都不怀疑政府的末日（这个时期的政府仍由哈立德·阿泽姆领导，是叙利亚资产阶级最后的希望）快将来临。问题只是谁来接他的班，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或是北爱尔兰统一党党员。

<sup>①</sup> 《世界报》，1963年7月20日。

<sup>②</sup> 同上，1966年10月4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哈里里上校率领高射炮营乘坐炮兵车迅速穿过巴勒斯坦边境进入大马士革，推翻了政府，哈里里不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他能够依靠主张同埃及恢复统一的拥护者，但是他扮演了如同纳赛尔分子一样的恐怖角色，把所有在“分裂主义制度”下服役的军官全部赶出军队。

正如英国人所指出的，从一个胜利导致另一个胜利，巴格达的一举成功的政变，立刻又给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大马士革造成了获胜的机会，新政府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第二号人物”萨拉赫丁·比塔尔领导。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的政变初看起来同前面所讲的叙利亚几次事件并无差别。<sup>①</sup>但实际上有原则区别，军队从这次开始已正式和长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仲裁者。三月八日的政权由革命司令部全国委员会掌管，这是政府成立后的常设机构，全国委员会实际上是决策机关，由它决定办公室的任免事项。

哈里里的政变还有另外更重要的意义：即很快在军队中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清洗。发给八百名军官养老金，让他们退职，基本上这些军官都是“分裂主义者”。这些人皆可算作叙利亚的“第三代”军官，是同大马士革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库兹巴里一类的人，是纳赛尔和社会改革的反对派。但是同他们一起退伍的还有一批属于纳赛尔分子的北爱尔兰统一党党员。取代他们的是忠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九百名军官。这

<sup>①</sup> 在大马士革这个历史经验被成功地利用了，军官接近总参谋部时哨兵问他，“你有什么事？”军官回答：“发生了政变”，“怎么，你不顾规矩吗？该交班了。”

些人基本上都是地方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组成叙利亚的“第四代”军官，他们在近年来叙利亚的事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军队的上层领导重新开始频繁的更换。哈里里成为叙利亚“实力派人物”的时间并不长，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来说，他从来就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因此很快就被排挤掉。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三月八日政变的其他领导人，如卢埃·阿塔西。经过长期斗争之后，权力集中到了阿明·哈菲兹将军手里。阿明·哈菲兹是军人，同时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骨干分子。

当这座政治旋转木马转动时，叙利亚简直成了一幕有趣的闹剧：部长和高级官员按“绝对可靠”的原则委任，但他们往往不会处理国家事务，不懂得经济问题，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每个军官都认为自己的机会快到了，只要用一个营的兵力和十辆装甲车，就足以取得政权；新闻记者也纷纷揣测某人将发动另一次政变。各种秘密活动在进行中，一会流传阴谋肇事的谣言，一会又辟谣，军队进行着可疑的调动，大家互不信任，每个人都想骗过对方；长官们敏锐地审视着部下的面容；看该对谁进行打击？集团和同盟的形成和解散几乎在同时进行。

局势渐渐地明朗化了，虽然还动荡不定，但也有稳定的因素，那就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统治地位，有关这个党的性质，以及它在革命民主方面的发展，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讨论，因为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时期还形成了另一种制度。



下面再谈谈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同缅甸的一样，是在解放战争中诞生的，但是，它的成员比较复杂。军官阶层有三个来源：原荷属东印度的王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人建立的“卫国军”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非正规形成的青年志愿军。

荷属东印度王国军在这三个来源中是数量最少的，因为它的军官基本上是荷兰人。这支军队的部分军官和中士加入了一九四五年重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军队，而且某些人还得到了他们原来担任的重要职务。<sup>①</sup>

但是荷属东印度王国军中的大部分人，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大战结束时从日本战俘营中解放出来的，然后把他们重新改编，这些人参加过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荷兰反对共和国的侵略战争。凡出身于荷属东印度王国军的军官始终受到监视，甚至敌视，其中包括没有在荷兰军队中服役的军官。

“卫国军”营是由日本的耶麻指挥部为反对盟军而建立的，战争结束时，包括后备部队在内总计有六万多人 的士兵和军官。<sup>②</sup>

其中每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军官都是营长以上的职位，因此“卫国军”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军官的重要来源。<sup>③</sup>

---

① 纳苏蒂安将军军职生涯是从万隆荷属东印度王国军事学院当学生时开始的。

② 保克，《军队在印度尼西亚的作用》，第150页。

③ 卫国军军官中著名将军有，苏迪尔曼、亚尼、苏哈托。

第三个来源是民兵，士兵是游击队员。这些游击队是在日本人训练的青年军事化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要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来武装这支部队，政府缺乏武器，因而民兵通常是用红缨枪武装的。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学生军”和其他非正规部队，他们都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由这些复杂的部队组成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经历了政治上的复杂过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投降前夕，日本人允许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苏加诺为共和国的总统。“卫国军”和其他由日本建立的军事组织都变为印尼的国家武装力量，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这支由日本的战斗精神训练的部队，毫无疑问会殊死地抵抗盟军，但日本投降了。

盟军作为解放者赶走了日本占领者，印度尼西亚国家领导人希望盟军能够尊重共和国的独立。但是继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后，荷兰殖民主义者也重返印尼。印度尼西亚独立发展的前景重新成为泡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允许各政党活动。许多政党以及政治和宗教团体、大学生组织等开始活动，同时寄希望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每个大党都认为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当时这支军队取名为“人民保安军”。但是非正规部队的许多指挥员实际上仍独立行动。全国一片混乱，仅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实现军官选举制，通过投票苏迪尔曼将军被选为担任指挥全军职务。通过同样方式，纳苏蒂安上校担任了西瓜哇第三师师长；并选他担任几个团的指挥官。<sup>①</sup>

---

<sup>①</sup> 纳苏蒂安，《保卫革命的旗帜》，雅加达出版，1964年，第17页。

各种部队逐渐合并成统一的军队，从一九四七年第一次荷兰入侵开始，这支军队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国军，并有效地控制了共和国的国土。国家经济落后迫使军队只能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生存。师和团的指挥员自己没法解决部队的一切供给。用“节约的办法”建造兵营，自己独立解决财政、粮食和给养等问题；某些对经济工作“感兴趣”的指挥员负责搞对外贸易，成立特殊的军事经济公司，侵吞国家财产，不惜走私。军队的经济独立导致整个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倾向的发展，培养了军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本领，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养成会做兵役义务以外的工作。

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事件（第一和第二次荷兰入侵，以及茉莉芬事件）不仅使军队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而且有了行政管理本领。民政机关实际上不是被取消，就是被军队所合并，实质上是隶属于军队，这特别是在第二次荷兰入侵时，当时共和国的大部分国土被荷兰军队占领，印度尼西亚国军指挥部起了游击政府的作用。在茉莉芬事件后，爪哇置于军事管制状态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受军政部门管辖。

这时印度尼西亚国军中已形成—个骨干集团，这个集团中多数是“卫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过程中参军的年青军官的代表。“第一代军官”是荷属东印度王国军和“卫国军”的老军官，这些人已经失去影响（苏迪尔曼将军除外，他是原“卫国军”的营级指挥官，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一直到一九五〇年死亡为止）。荷属东印度王国军和“卫国军”之间的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也就停止了。

如果对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形成过程作个总结，那末可以说，它原有的特点决定了它后来的风格。

第一，就印度尼西亚国军产生的特点而论，这个军队应当看成是政治和革命力量。印度尼西亚国军的军官从一开始就不是职业团体，而是争取和保卫独立的力量。因此，在军人看来，这就是革命。所以印度尼西亚如同其他许多亚非国家一样，“民族解放斗争”的概念同“革命”是一样的，每个参加这场斗争的人，尤其是手拿武器进行战斗的人，都认为是革命者。在印度尼西亚军队中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教育他们懂得关于武装力量的革命使命和政治作用，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

第二，军队在军事管制条件下所拥有的广泛的行政管理权限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客观上使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治机构，使他们在国家政权中处于特殊地位。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都为使印度尼西亚军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追随哈达的纳席尔和苏基曼的政府主要代表资产阶级集团（爪哇集团和苏门答腊集团）的利益，对军队进行了改组。参与帮助改组的有担任武装力量参谋长职务的苏马图潘格上校和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改组（更确切地说，是整顿）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战争结束了，属于文官行使的政治权力需要从军队那里移到国家手里，以成为“正常工具”。掌权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客力图巩固后来建立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议会制中，

对于军队来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地位了。

军事首脑使改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他们需要彻底消灭军队中的游击作风残余，闹独立性，以及半自治的地方军队指挥官力图加强权力的倾向，要建立一支集中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现代化的职业武装力量，要减少人数，但要提高素质。正如一位对印度尼西亚现代史颇有研究的学者 H. 菲斯指出的，军事首脑拒绝把军队“政治化”，相反，他们要使其成为在必要时对文官政府施加压力的有效和可靠的工具。<sup>①</sup>

但是改组的最重要原因是反映了以哈达为首的资产阶级保守集团的意图，目的是为排挤左翼军官，这样的军官在军队中相当多，因为这支军队是在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所以自然会有不少民主分子参加这支军队。改组是对印度尼西亚国军中左派的第一次大清洗。

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国军的军官阶层中是不团结的，而且也不可能团结，因为这个军队建立太迟，来源太复杂。一九五二年十月，公开爆发了苏加诺（议会支持他）和以纳苏蒂安为首的最有影响的那部分军事首脑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实际上酝酿已久，早已成熟。在这场冲突中，十月十七日的悲剧达到顶点，总统受到造反群众和军人一连串的压力，他们要求解散议会，军官阶层出现了分裂。苏加诺凭着他雄辩口才的魔术，首先平息了群众的愤怒，然后拒绝“反议会的”军官集团的要求。

---

<sup>①</sup> H. 菲斯，《印度尼西亚立宪民主制的衰落》，纽约出版，1962年，第208—209页。

纳苏蒂安输掉这一局，不到两个月便辞去了军职；军官中的不团结现象就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军队已无力和总统斗争。

军队的政治影响暂时受到了削弱，被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事件分裂的军官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指的是军官们在行政管理方面所处的地位。“这样，原来在地方等级中排在第二位的团长（只有地方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才有比较新型的汽车），现在降到了第五位，而排到自己面前的，或是高级文职官员，或是有势力的地方党派领导人”。<sup>①</sup> 军人抱怨政府没有给军队足够的拨款。

军队意识到只有恢复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它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军官们决定不再分裂，免得使自己的影响遭到削弱。一九五五年二月，各集团的二百八十九名高级军官在日惹举行会议，他们来到解放斗争时期牺牲的两位军事将领苏迪尔曼和乌里帕的墓地，举行宣誓，宣誓中说：“虽然我们还不能具体实现你们所期望的建立一个自由、美好、和平的印度尼西亚，但是我们一定沿着你们的伟大意志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尽一切努力保卫你们的遗产。”<sup>②</sup> 在庄严的仪式上通过了“团结宪章”，或叫做“日惹宪章”，这是军官们团结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决心不让文官政府再干涉军人的内部事务。

这种决心是否真实，很快受到了检验，一九五五年五月，

---

① H. 菲斯，《印度尼西亚立宪民主制的衰落》，第 404 页。

② 被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 210—230 页。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领导的内阁任命翁东上校担任印度尼西亚国军参谋长，以代替辞职的苏吉约将军，而翁东是高级军官们认为不能接受的人选。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翁东正式就职，军官们根据代理参谋长鲁比斯的命令抵制就职仪式，鲁比斯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拒绝给翁东移交职务。鲁比斯在信中指出，他得到所有指挥官的支持。

这是军方对政府史无前例的挑战，令人不能容忍地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现在一切都决定于军官的团结。各地方部队的指挥官七月二日在雅加达集会，支持鲁比斯，七月三日，印度尼西亚士官协会会议要求改变对翁东的任命。七月二十四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倒台，十月二十七日，纳苏蒂安出任总参谋长。<sup>①</sup>

波克尔认为，“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可以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即从这一天起军队由主要阻止政府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进入到开始在政治舞台上起积极作用。”<sup>②</sup>军队在公开斗争中第一次迫使政府退却，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获得了决定自己领导成员的权利。但这就破坏了国家政权和军队之间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从此为他们一切不受约束打开了缺口，政府原来对军队的监督权（尽管比起其他国家还差一些）实际上是没有了。军队不仅恢复了自己自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以后被大大削弱的地位，同时变成了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有力工具。

军队“赢得了空前的政治上的胜利……是否要继续前进，

---

① 波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211页。

② 同上，第210—211页。

是否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文官政府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某些高级军官显然认为已经能够实现军事专政，但是大多数军官反对立即取得政权，而必须进行选举。”<sup>①</sup>因此，普选定于一九五五年九月进行。

军官们有什么不满，他们根据什么认为能够建立军事政权？菲斯和波克尔认为，军队首先痛恨的是贪污成风，以及由此而造成国家机器和政党上层领导的腐败、经济状况的恶化、猛烈的通货膨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等。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政府造成了贪污空前盛行的气氛。由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相对下降，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贪污的官员也日益增加。前总理阿利姆在致总统的公开信中曾经谈到，国家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支付两个星期的开支，最多只能用二十天。<sup>②</sup>政府的威信下降，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无休止的内讧破坏了政治制度的信誉。在这丑恶的舞台上，威信不断得到提高的唯一政党是共产党：如果说，一九五二年该党尚只有大约八千人，那么到一九五四年末已经达到了五十万。<sup>③</sup>

这个情况同样使得相当一部分军官感到不安，认为共产党正在成为可怕的力量，共产党人迟早会利用资产阶级政党的失败，有可能在国内处于统治地位。

一九五六年春，组成了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左派政府。困难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但政府的活动比以前加强了，提出了反帝口号，为左派力量的活动创造

---

① H. 菲斯，《印度尼西亚立宪民主制的衰落》，第 414 页。

② 同上，第 406, 407 页。

③ 同上，第 407 页。



了良好的条件，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在此情况下，右翼军官便公开反对政府，认为这个政府里的人不仅不会管理，肆意贪污，并造成各党派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而且简直是共产党的纵容者和同伙。领导右翼军官的是鲁比斯上校。美国学者、印度尼西亚问题专家范德·克里夫对鲁比斯有过这样的评价：“狂热的反共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的贵族家庭有血缘关系，鲁比斯上校是属于有权势的父道主义派”。<sup>①</sup>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鲁比斯企图政变未遂。大部分军官之所以不支持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威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军事专政的程度，同时主要因为他的政变思想、推翻文官政府、建立军事专政在当时印度尼西亚军队中不得人心。

这个问题的原因无法简单说清楚，波克尔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军官即使在客观条件有利于政变的形势下，也不愿走上这一步，其原因是，第一，由于长期的内部矛盾使他们互不信任；第二，在他们头脑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父道主义观念”（所谓“父道”即象尊重父亲一样），印度尼西亚传统尊敬长辈。军官们不愿反对苏加诺。根据波克尔解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反对作为国家标志的父亲是个耻辱”。<sup>②</sup>

正如上面我们所讲到的，早在纳苏蒂安、鲁比斯和其他领导人之间进行个人竞争时，军官们之间已不团结。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这也只能说明一部分原因，如同“父道主义观念”一样（父道主义并没有妨碍军官们一九六六——一九六七

---

<sup>①</sup> 范德·克里夫，《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国家关系》，《远东经济评论》，1958年5月29日，第635页。

<sup>②</sup> 波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210—213页。

年起来反对苏加诺)。据一般说法，印度尼西亚军官之所以“不造反”，至少还有两个原因。

军队是同共和国一起诞生的，它不能象对待别的东西一样对待国家政权（政权虽不是它创建的，但由它保卫）。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是不同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反对同帝国主义有联系的旧的上层阶级。而印尼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政治力量和现存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个制度中，它能够加强自己的影响，并获得特权，而不必去搞政变。总的来说，它是满意这个制度的。只有当它感到制度向前发展威胁到军队的利益时，才决定要推翻这个制度。

在军队中影响越来越大的纳苏蒂安也懂得，在五十年代末那种条件下，政变带来的新问题比已解决的老问题还多。印度尼西亚的军官确实具有“动摇不定”的特点，正如波克尔描绘的，之所以摇摆不定，在于他们不知道政变是否会改善他们的地位。这种摇摆不定正好从另一面说明，在现存制度中，军队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用不着实行军事专政。

缅甸的军队同样是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建立的，而且也遇到了文官政权的腐败无能，但他采取了同印度尼西亚军队不同的做法，这说明缅甸军队的领导是职业革命家，同时缅甸也没有象苏加诺那样“圆滑的领导人”，甚至在一九六五年的九月三十日事件中，苏加诺已经大出其丑，军队还等了一年半之后才清除了他，据说就是因为总统的影响大。五十年代中期要实现同样的意图，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当时已经领导一个“中等组织”的纳苏蒂安无疑是懂得这一点的。

但是追随鲁比斯的极端主义组织是另一种考虑，他同纳

苏蒂安的组织一样，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议会“自由民主制”，但也不指望制度的和平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其他各组织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在策略方面，没有什么原则分歧，毫不奇怪，在暴动受到镇压之后，斗争不会止息，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反共纲领的基础上逐步汇合到一起。

明确的反共思想经常在纳苏蒂安和其他军事首脑的言论中表露出来。但无疑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或其他亚非国家统统都一样，军官们的反共主义通常都是反对当地共产党，而不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

军人反共主义的根源之一，是同具体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的。

甚至按社会知识水平能够不受反共偏见所限制的那些军官，也是属于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军人团体的一个部分。这个团体根据纳苏蒂安的理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关键地位。军队未必要去管理国家和建立军事专政，但在任何情况下建立的制度都要使它满意，使它能处于主导地位，并保证它享有特权。对大多数军官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政治上的特权，能够领导和指挥，有社会地位，享有威信和权势。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待遇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有一部分军官首先考虑的是物质利益，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sup>①</sup>在实现

---

<sup>①</sup>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外岛查获军队参加了椰子干核、橡胶和咖啡的走私贸易。在北苏门答腊一个华裔在军队帮助下把五千吨橡胶（总值七千五百万盾）运到马来亚和香港，其中一半是替军人走私。在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名上校因从事亚运会门票的舞弊勾当而被逮捕，因为他在该项勾当中“赚得”了四万五千美元。

荷兰企业国有化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部门，实际上这就是军人的世袭领地。军官们进入所有重要部门，直至国家贸易公司。

纳苏蒂安知道，军人的地位是迟早会改变的，所以他提前发给几百名军官退休金（仅一九五九年就约有三百人），这些人首先在国有化部门得到了职位，形式上好象已不是军人，实际上他们是军事领导在国家生活中的支柱。而且，事实上很多还是现役军官，装出退休的样子，预先得到了牢靠的职业。当一九六〇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起来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时，直接遭到军人的责难（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很大一部分军官感到这是对他们前途的直接威胁。

确实象列夫指出的，“职业团体章程已经规定允许军队有一个不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以保证他们不用靠特殊地位参加政治生活。”<sup>①</sup>当然，这个职业团体章程本身只能在军队有了特权地位并巩固这种地位之后才能产生。

军队经历了一个完全成为国家政治力量的过程，军队扎根到制度中。正如列夫写道，“军队的上层领导同国家的政治机构合为一体，这是他们非常满意的。但在政治权力、经济待遇，以及社会威望等方面，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很多军官实际上进入了国家的上层集团，他们学了一些好的品质，但也学了坏的东西。”<sup>②</sup>

波克尔是这样描述军队的演变的：“年青的革命者，他们

---

① 《太平洋事务》，1963—1964年，第四期，第370页。

② 同上，第360页。

朴素、无私和渴望普遍平等，为了民族解放的理想而拿起武器和穿上军服，他们现在正在变成中年的军阀主义，拥有特殊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军官们的军衔经历了长期的限制，原来提升得很慢，现在沿着他们服役的梯阶提升得很快，给予他们享受和特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军官阶层正在变成军阀上层集团，它控制着国家或至少参与操纵国家，不是为了执行任务和实现理想，而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特权，充当一个冒牌的政党”。<sup>①</sup>

对于这样的军阀官僚上层集团来说，某些强大的、有威望的、地位巩固的政党的存在，例如，共产党的存在，便是它的直接威胁，它本能地要进行自卫，可能会进行各种猜测，如果不是怀疑共产党，那就是其他什么党，或是积极活动的群众性的党，认为这是总统的支柱，有可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领导者，军队同样把它们看成是必须消灭的力量。但是除了要消灭这个与之竞争的政治力量之外，思想上的敌对是主要的。很大一部分军官总是担心，如果共产党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军队就会失去政治和物质上的特别待遇。很多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都毫不迟疑地主张最好把共产党军官统统开除和撤换。

同时军队对共产党的仇视日益增加，还有一个原因，即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共产党和苏加诺总统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这个原因加速了军队准备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加速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从而导致一个高潮，即一九六五年九

---

<sup>①</sup> 波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 223—224 页。

月三十日的公开冲突。

“热衷于民主政体”的苏加诺制度未能使国家经济得到发展，这首先是由于这个制度的支柱和中坚力量——官僚资产阶级不关心这一问题。而且也只有当国家经济濒于崩溃、管理不善、混乱等情况下，这个阶级才能安然寄生，发国难财。整顿经济、搞好财政、稳定盾的牌价、建立合理和严格的经济制度、货币制度、限制进口<sup>①</sup>、实事求是的进行计划，等等，便会把混水澄清，使新生资产阶级失去混水摸鱼的机会。现有的混乱状况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大国的赌博政策、对外政治冒险、引开人民的注意力、削弱经济，等等，对他们来说，那再有利也不过了。

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和经济混乱，这也是这个制度存在的两个主要条件。所以尽管苏加诺在国际事务中奉行进步的反帝方针，对国内左派力量表示同情和友好，但从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是没有前途的。

非常可惜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逐渐成了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个党已经开始自己的活动，很有威望，它是民族利益的坚强和可靠捍卫者，是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热情战士。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整个党，而是“党的领导成员中的一个小集团”，正如《真理报》指出的，这个集团“背离了马列主义学说”，接受了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思想，从而“削弱了党对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实际上使它在各种反共力量的联

---

<sup>①</sup> 形式上是严格限制进口，但是对有地位、有权势和有关系的人来说，买东西是不特别费劲的，如买豪华的外国小汽车等。

合进攻面前失去自己的抵抗能力”。<sup>①</sup>

共产党的主要支柱是农民，但是能够得到农民真正坚决支持的只能是这样的党，即它不是停留在空话和口号上，而是真正致力于进行土地改革，为消灭地主和高利贷的霸道势力作有效的斗争。但是共产党不能这样做，进行土改不能脱离国家的整个情况。这里指的不是个别官员的舞弊和欺诈，而是整个制度的根本缺陷，在这个制度中没有人对坚决打击农村剥削者感兴趣，因为这些剥削者同抢劫人民财物的全国整个庞大的寄生匪帮有密切联系。

农村的有效和根本改造，只能靠那些能够改变整个制度，开展深刻社会革命的人来实现。但是其领导人已扎根于“民主政体”制度的党怎么能这样做呢？苏加诺早就不再考虑进行什么深刻的内部改革的问题，迷恋于国家的规划，一切都想依靠反对所有重大变革的官僚资产阶级。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

艾地力争使党成为政权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但不幸的是这个政权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腐败和破产。它基本上表现苏加诺的个人色彩，各方面都很“低级”，很快就失去威信，包括共产党在内。

《共产党人》杂志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当了苏加诺的尾巴……渐渐地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走上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联合的道路。”<sup>②</sup>

同时这里还应顺便提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sup>①</sup> 《真理报》，1967年8月5日。

<sup>②</sup> 《共产党人》，1966年，第十五期，第22页。

的密切关系，这个问题本来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必须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同意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路线（不过，这符合苏加诺的国策），不仅损害了自己在对外方面的立场，拒绝接受真实朋友的援助和劝告，而且降低了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地位，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人们联想到高利贷剥削者）非常不受欢迎。

正如尤里夫写道：“毛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影响，使得党的领导人看不清国家政权的反帝口号在“向着民主政体”发生阶级内容上的“蜕变”。<sup>①</sup>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苏加诺制度中的特点是：虽然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但不能批判拥有巨大财富的寄生阶层，只能用一半的力量进行这个斗争，犹如用一只手与之战斗，而另一只手还和它拉着。总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人物，更应置于批评之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一面支持苏加诺，巩固他的制度，一面又反对这个制度。

共产党人强烈指责官僚资本家，指出政府政策的反动性，改革不彻底，没有完成经济发展计划，土地改革象乌龟爬行一样，等等，但同时又大力支持和赞扬苏加诺，好象政府推行的政策不是由他负主要责任。所有那些关于变革、改组办公室、对反动派采取坚决措施等等要求，一概不给人知道。这样的批评当然也起不了真正的作用，但却引起了受批评的人的愤恨。首先触及到的是军队，相当一部分军官本身就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批评。

---

<sup>①</sup> 尤里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莫斯科出版，1973年，第18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的声明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军队之间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鉴于荷兰人的企业在军队管理下产生的不良后果，政治局声明：“劳动群众希望，把企业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这些希望一点没有实现，问题在于这些企业被一些集团所控制，这些集团对待工人比外国主人还坏。

“这些集团的头面人物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集团，操纵着国家机器，使国家为自己的物质利益服务；在这些头面人物中出现了官僚资本家，他们压迫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成为帝国主义推行剥削和掠夺政策的媒介。”<sup>①</sup>

这是对军队上层领导的直接挑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开谴责国防部长，劳动部长和外交部长，这几个部长都是进入政府的军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阐明了需要对反革命暴乱加强镇压的理由：“与其说负责安全的人（换句话说，即武装力量领导人）同暴乱者作斗争，不如说镇压进步的民主运动，把反对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已经成为官僚资本家的军人在声明中被称为买办阶级的一部分。<sup>②</sup>

军人的反应是迅速和尖锐的。一队士兵乘着吉普车包围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位中央书记萨基尔曼的住所。并且把他秘密关押了几天。七月十八日纳苏蒂安将军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策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只有少数人，包括暴

---

① 被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 227—228 页。

② 同上。

乱分子和共产党却加以否定。”<sup>①</sup>十九日，雅加达军事当局按照纳苏蒂安的命令传讯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要他们解释七月八日发表声明的原因。

这是军队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次严重的公开冲突。苏加诺制止了这个事态的发展，但从此在印度尼西亚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两支巨大力量的相互对抗，并准备决战。

一九六〇年九月，地方联合部队指挥官根据紧急状态法开始查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地方组织。苏加诺进行了干预，召开了一次所有行政官员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总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袒护，谴责反共主义。纳苏蒂安沉默不语，他知道向总统挑战没有意义，不管怎样，时间尚早。大概是苏加诺出国期间，一部分高级军官主张夺取政权。这是地方部队指挥官和军事侦察长的主张，这些人都是最反共的军官，不久前他们曾倡议同马舒米以及其他公开敌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同盟右派党联合。纳苏蒂安以他固有的谨慎没有采纳这个行动方针，苏加诺回国后解散了这个民主同盟。<sup>②</sup>

纳苏蒂安开始从另一面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斗争，根据他自己的设想，首先决定把军队变成名符其实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为此，需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军队试图控制统一战线和“能起作用的集团”，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它继续在“能起作用的集团”中进行工作，例如，在工业部

---

<sup>①</sup> 《联系》周刊，1960年8月31日，第27页；波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229页。

<sup>②</sup> 《太平洋事务》，1963—1964年，第四期，第357—358页。

门组织了一个工会团体，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竞争。<sup>①</sup>

但按印度尼西亚国军的社会计划，工作对象主要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美国记者曾经引用过一名上校的一句话，“在农村我们已进行了一场革命，战胜了荷兰人，而现在我们还要在这里击败共产党。”<sup>②</sup>

军队的任务减轻了，这是由于群众已经知道它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纳苏蒂安早就编制了“地方战争”和军队的“民政任务”条令，“地方战争”条令是在抗击荷兰侵略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心内容是把武装力量在农村分散开来，同农民一起打击敌人，军队的领导要同时承担军事指挥，行政管理 and 经济工作。纳苏蒂安当年在爪哇担任军事指挥官同荷兰人作战时就是采用这样的游击战体制，当时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就开始同农民接触。进入紧急状态后，军队的指挥官就是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免去了各村村长的职务，培训行政管理人，召集地方政坛代表参加专门会议，这也就是政治训练班的一种形式。

这样就为军队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命名为“民政任务”，这是一九六二年开始执行的，当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干涉西伊里安而建立的庞大军队干什么。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荷兰同意把这块地方交联合国暂行托管，这样的结局是早就预料到的，政府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几万名士兵的复员造成很大的困难，可能导致严重的被动，因为不能保证他们都有工作。因此决定建立一支“劳动军

<sup>①</sup> 《太平洋事务》，1963—1964年，第四期，第361页。

<sup>②</sup> 《时代》周刊，1962年10月12日。

队”。冲突还没有结束之前，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纳苏蒂安宣布：“只要这个长期的战争一结束，军队就将更多地承担劳动生产任务。部队不仅要关心保卫和保证国家的安全，而且要集中注意力于建设我们美好国家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民政任务”的政治意义是无可怀疑的，正如列夫指出的：这是“军队在争取群众方面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赛”。<sup>②</sup>

军官和中士进入专门训练班受训十至十五个星期，训练班学习的课程是：农村行政管理的组织工作、游击战原理、农业、公共卫生和“情报科学”（美国记者称这门科学为“强效力的反共宣传”<sup>③</sup>）。

“在西爪哇农村，陆军中尉用字母卡片教农民识字，而中士们指导家庭主妇如何清除水中污物。”<sup>④</sup>阿齐将军领导的“西里万吉”精锐师是第一批参加履行“社会职责”的部队之一。

一九六二年，总统第三百七十一号命令正式规定了军队的“民政任务”，命令中说：“武装力量兵团将用来实现政府在生产 and 分配方面的规划。”<sup>⑤</sup>

军队为了执行这个命令以及有次序地完成“民政任务”，制定了一套措施，这套措施称之为“卡里雅业务”（卡里雅为“劳动”的意思）。根据纳苏蒂安的说法，到一九六四年已经做

---

① 《东方世界》月刊，1963年3月，第11页。

② 《太平洋事务》，1963—1964年，第四期，第363页。

③ 《时代》周刊，1962年10月12日。

④ 同上。

⑤ 纳苏蒂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雅加达出版，1964年，第124页。

了下列工作，抢救灾民三十八万九千人，建造住房一万零七百七十三间，修建校舍五百二十四所，桥梁九百二十八座，道路二千二百零一公里，诊疗所一百零三个，河堤四百零二条，开河一百零二条，排水面积二百九十平方公里，耕种稻田二万九千公顷，在田间工作方面掘土八万立方米，分派喂养的牲口约三千头，以及其他等等。部队还在全国各地区开拓未开垦和干旱的土地，种了水稻，消灭植物虫害，给农民分配粮食和种子，帮助建设工厂，修建机场，以及其他，等等。<sup>①</sup>

军队拥有自己雄厚的经济和财政资产，不用国家给予财政拨款。军队独立进行大宗交易，驻扎在万隆地区的“西里万吉”师有自己的橡胶和香料，独立进口自己工厂用的原料和备用零件，而且这些业务都是通过苏门答腊的军事指挥部进行的。<sup>②</sup>

综上所述，到六十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家的一支巨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机构，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起着广泛作用的社会团体。列夫写道：“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发展是独一无二的”。<sup>③</sup>在文官制度不起作用，而实现军事专政的条件下，这支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和起的作用，除了缅甸和巴西之外，几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能与之比拟。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军队都直接掌权，但是它的统治性质都属上层军事专政。在很多国家里，

① 纳苏蒂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雅加达出版，1964年，第126页。

② 《费加罗报》，1966年8月5日。

③ 《太平洋事务》，1963—1964年，第四期，第364页。

当发生民族危机时，军队充当仲裁者。在印度尼西亚，一九六六年之前军队没有建立军事专政，没有推翻政府，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因为它扎根于社会，同社会结构融为一体。

享有威望和特权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的特点是，它首先关心的是保存自己，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保住已得的地位。然而他们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打破。因为它这时仍是一个有影响的党，军队的上层领导不能不感到对自己的威胁。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思想心理上的猜疑，便造成军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敌视态度的日益加深，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事实上情况不完全如此。在军队中，存在着高级军官之间的个人竞争（如近年来苏加诺利用亚尼将军的个人野心，促使他取代纳苏蒂安，当了陆军司令），有各种各样的集团，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政治分歧。在奥马尔·达尼（此人同共产党接近）指挥的空军部队中，很多军官持左倾观点，许多军官飞行员同印尼共产党有联系。甚至有反共情绪的军官的主要核心也不是铁板一块。军官的反共主义有各种各样原因，有一部分军官实际上是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贪污，把共产党看成是威胁他们特权和物质利益的人。另一部分军官主要是害怕共产党取得统治地位使他们失去个人职业，降低整个军队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军官是倾向右派穆斯林组织，因而支持这些组织的反共主张。

六十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曾提出两项要求：成立纳沙贡内阁<sup>①</sup>和进行普选。在印尼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一九六二年）<sup>②</sup>艾地宣布了党的这个主要要求。纳沙贡内阁意味着共产党在政府内享有“全权”（而不是在整个“庞大的内阁”里处于次要地位，苏加诺正是这样做的）。这些要求对于苏加诺是有利的，后来他经常用以恫吓军队。纳苏蒂安后来证实，当他警告总统要提防印尼共产党的威胁在日益增加时，他被指责为仇视共产党。纳苏蒂安还宣称，苏加诺“制止”了向贪污行贿的部长作斗争。

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的例行演说中，苏加诺明确警告军队，“不是武装力量，不是枪指导《政治宣言》，而是《政治宣言》指导武装力量和枪！不能颠倒这个原则，不能本末倒置！颠倒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法西斯化”。<sup>③</sup>

一九六五年，印尼共产党又提出两项要求：军队要“纳沙贡化”，建立“五种力量”（即在陆、海、空三军以外成立民兵和警察部队）。军队“纳沙贡化”的意思就是要在军队中派政治委员。而政治委员显然是从共产党员中委派。苏加诺赞成军队“纳沙贡化”的原则。

危急时刻来临了，双方的冲突日益逼近，不难理解，印尼共产党为什么会提出上述要求，共产党人感觉到来自军队的威胁日益增加，决定避免发生第二次茉莉芬事件，并根据一

---

① 三种力量：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

②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苏加诺发表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得到各最高国家机关的拥护）是国家政治结构的基础。

③ 波克尔，《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229页。

般自然的和逻辑的推理，军队在国内已处于重要的地位，并已同它对抗，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是把国家武装部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军队的上层领导则对于部队“纳沙贡化”极为不安，正如杜敏指出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军队来说，“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sup>①</sup>

双方都急不可待地等候苏加诺的反应，八月十七日国庆节快将来临了，按照惯例，总统要在这个节日发表长篇的纲领性讲话。纳苏蒂安坚持要苏加诺在这次讲话中否定有关建立“五种力量”的主张，但总统没有理会他。<sup>②</sup>苏加诺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九四五年制订的宪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说，“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而且必须参加保卫国家”。这实际是为建立“五种力量”的思想找理论根据。苏加诺宣布，“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作为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我就决定这样做。”

按照评论员“李纳希塔”的看法，苏加诺同样也知道，同意“采纳这些要求，左派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不用多久就会利用这个情况要他给农民和工人发枪和组织民兵。”<sup>③</sup>苏加诺未必真的要建立“五种力量”，显然他是想利用这个要求来给军方施加压力。但如果这种要求真的实现，那末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致命威胁，导致公开军事冲突，而正规部队一般都处于压倒优势。武装力量“纳沙贡化”之后，情况严重的是，实现这个主张意味着在营一级和营以上都要成立“纳沙贡委员会”，军事干部将在自己的世袭领地失去垄断权。这样，军

① 《中国季刊》，1966年，第157页。

② 相反，苏加诺明确威胁军队说，水中可以无鱼，但鱼没有水不行。

③ 《再生》周刊，1966年3月19日，第8页。



队的上层领导无论如何是决不允许的。

一九六五年夏，武装部队中的左派力量十分活跃，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在空军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sup>①</sup>高级军官的疑心大为增加。

九月，艾地在一次讲话中宣布“祖国蕴藏着革命”。军队的上层领导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共产党人在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和要求在他们影响下的那部分军人参加。

很难说军人会真的相信发生这样的起义，但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一个能够打击共产党的证据，而这种打击是他们本来早就准备已久的。围绕建立“五种力量”和军队“纳沙贡化”的喧嚣以及到处流传苏加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的消息，为军队实现强制性的政治行动制造有利的气氛，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党失去地位，根本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军队。但是军人还没有找到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借口，苏帕佐一翁东集团从九月三十日开始的冒险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又得到印尼共产党部分领导人支持，这就给军队的上层领导为屠杀共产党人、废除苏加诺制度和建立军政权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巴基斯坦一九五八年十月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前，赶走英国殖民主义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危机不断加深。

巴基斯坦建国的原则是宗教，这个国家不是在原来基础上产生的，即使成立国家，也是按照同一个宗教信仰的原则在共同愿望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文化教育方面，巴基斯坦在初期有着巨大的困难。由于被印度瓜分，使得巴基斯坦的工业

---

<sup>①</sup> 《安塔拉通讯社综合新闻》，1966年12月15日。

在次大陆是最落后的。被瓜分前，全国有一万四千五百个工业企业，但后来巴基斯坦只剩了大约五百个左右。巴基斯坦的出口物资十分之九是原料。缺乏资金和干部。农业由于地主奴役农民造成他们的穷困和没有生产积极性，也缺乏现代化的技术，因而停滞不前。

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党，无论是穆斯林同盟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别的党，都未能解决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生活的舞台上，一些政治小人物忙碌周旋，互相角逐，争斗不已，肆意贪污。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的七年内，换了六届政府。在政治生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政客们贪污成风，内讧不已，只有军队保持着自己的团结一致，超脱于争吵和内讧之外。

巴基斯坦的军队是殖民地军队的一部分，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巴基斯坦独立后，军队中除指挥官有变化外，其他一切照旧。如同在殖民地时期一样，士兵几乎全部是西巴基斯坦人。士兵中的孟加拉人只占10%，而军官中的孟加拉人那就更少。军官大多数是地主子弟和贵族阶级出身的。在进行土改后，发现有些将军拥有的土地就超过新法所规定的最高标准。

英国人尽力不让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城市知识分子进入军官阶层。

总司令阿尤布·汗同样出身于富有的地主贵族阶级。

巴基斯坦（包括印度）官僚的特点，无论是文官和军官都是亲西方和亲英国的，这也是这个官僚阶层形成的前提条件。美国作家沃里斯对巴基斯坦的官员是这样描写的：“当他们刚刚成年，尚处于非常单纯和顺从的时候，就教育他们，要成为新

—— — — — —

一代的高贵和俯首帖耳的人。选拔的过程和整个教育计划就要考虑到让这些年青人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这样做的一个主要优点是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主要学习莎士比亚、洛克等人的语录。他们的任务是打开自己成长的那个社会对自己眼界的限制，使自己毕生为中央（尽管还是殖民地）政府服务。”<sup>①</sup>

这就是地道的英国人培养的军事干部。法国有一位作家同样谈到过他们，指出：这些人“按照他们的思想是属于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是选择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议会制”。<sup>②</sup>但是，当他们看到巴基斯坦建立的议会制毫无用处，国家进入了死胡同，引起人民不满，有爆炸性的危险，有可能打乱正常的秩序，军官们便毫不犹豫地用别的政体，非代议制和独裁制代替议会制，因为这样做能够防止社会基础的崩溃，而这个社会基础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阿尤布·汗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意图所在。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是上述这类军官的典型代表，他是地主的儿子，在英国的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学习过，巴基斯坦独立时他在旁遮普服役，后来参加了克什米尔的军事行动，此后，统率东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一九五〇年九月，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有功劳的司令官还有很多。但是其他司令官已经同政治集团有

---

<sup>①</sup> 卡尔·冯·沃里斯，《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普林斯顿出版，1965年，第110页。

<sup>②</sup> 《第三世界军队的超军事任务》，第295页。

关系，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出对里加德·阿里汗的政策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阿尤布·汗不过问政治，在军界大家都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写过一篇论军队在国家建设中可能作出的贡献。<sup>①</sup>显然，里加德·阿里汗选定阿尤布·汗担任总司令是因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声望，以及由于他支持阿里汗的政策。

这样的年代来到了，文官政府的威信下降，新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他原来也是将军）无法“整顿秩序”，一些军人和文职官员都越来越认为阿尤布·汗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适合于当候选人，只有他能够拯救祖国。同时由于军队在镇压边境地区部族起义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增强了军官们的自信，提高了他们在自己队伍以及社会舆论界的威望。在政客们实力削弱的背景下，军队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巴基斯坦军队的一位军官、史料编纂员法扎尔·莫基姆·汗是这样描写改变情况的：“国家继续走向破产，人民群众处于困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感到失望，很多人甚至陷入绝望。阿尤布·汗将军不断受到压力。一些年老的军官试图说服他采取决定性步骤。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东巴基斯坦进行了七天旅行活动，第十四师师长乌姆拉翁少将协助他多次会见各方面的政界领导人，了解了国家的悲惨状况。阿尤布·汗将军耐心听了这些情况，并说：‘如果人民需要我，我决不逃避自己的责任’。”<sup>②</sup>

<sup>①</sup> 威尔科克斯，《一九五八年的巴基斯坦政变》，《非洲评论》，第38卷，第二期，第124页。

<sup>②</sup> 法扎尔·莫基姆·汗汇编的史料，第190页。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师长以上年度会议上，有几个将军宣布，国家受到完全无政府状态的威胁。<sup>①</sup>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年老的军官已经失去对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政权的信任，而把希望寄托在阿尤布·汗身上。

阿尤布·汗担任的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规定到一九五九年一月满期。<sup>②</sup>但在他期满前三个月就发动了政变，取得了政权。

政变在初期完全没有采取通常的方式，只是代表总统宣布军事管制状态，阿尤布·汗担任主要的军事总管。这个行动造成了一个让大家遵守纪律的错觉。而实际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军队已经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夺取了政权，法扎尔·莫基姆·汗曾经详细和完全公开地讲了这件事。

“按照来自卡拉奇的命令，总参谋长接受了交给他要完成的任务——准备夺取政权……总的作战方案于九月三十日就准备好了，并得到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的赞同。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总参谋长和几个军官来到卡拉奇，并在军眷里成立了临时参谋部，后来这个临时参谋部就成为军事总管的司令部。D日<sup>③</sup>由总司令选定在十月中旬，具体日期由总参谋长来审定，总参谋长将要在卡拉奇采取一定的步骤。但是十月六日穆斯林同盟的支持者为了庆祝党的主席的到来，在卡拉奇车站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警察为了驱散人群，施

---

<sup>①</sup> 法扎尔·莫基姆·汗汇编的史料，第190页。

<sup>②</sup> 威尔科克斯，《一九五八年的巴基斯坦政变》，第148页。

<sup>③</sup> D日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44年6月6日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日期，这里指采取行动的日期。——译者

放了催泪瓦斯，局势是如此严重，不得不决定于十月七日夜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计划已经准备就绪，采取行动所要的部队就在近处，这些部队早在九月间当卡拉奇开始发生政治动乱时，就已经集中到附近地区。

“阿尤布·汗于十月七日十二点半乘火车来到卡拉奇。军官们将拟定的计划向他作了报告，得到了他的赞同，由于他充分信赖这些军官，所以能够依靠他们去具体完成任务。当天晚上七点钟，卡拉奇地区部队的指挥员马立克·谢尔·巴哈杜尔少将命令他的部队于九点半开出兵营去帮助文官政府挽救危险局势……那时仍旧没有人知道要实行军事接管。晚上九点钟，总统签署了一个宣言，宣言中宣布了军事管制，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被任命为军事总管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十月八日早晨六点钟，全国都已知道改变了国政权……。一些还没有看到报纸或听到广播的部长，和平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被婉言劝回去了。”<sup>①</sup>

米尔扎总统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形式上是双重政权，政府的声明既代表总统，也代表军事总管。但是两个星期之后，阿尤布·汗就撕下了伪装，在他发表的公开言论中把“我们”改成“我”，意思就是他不再承认总统了。他的画像刊登在报纸的头版，要大家听命于他。但是米尔扎还没有屈服，他试图搞掉阿尤布·汗，起用军队中的第二号人物穆萨将军。但一切轻易地结束了。十月二十八日夜，总统府被军队包围，三名将军带着手枪走进总统办公室，

<sup>①</sup> 法扎尔·莫基姆·汗汇编的史料，第184—199页。

电话线被切断。总统只能向实力屈服，辞职并出奔英国。阿尤布·开立即宣布出任总统。

现在我们来研究热带非洲国家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依靠伞兵部队粉碎了总理马拉杜·迪亚发动政变的企图。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象牙海岸揭露了一起反对总统乌弗埃-博瓦尼总统的阴谋。被逮捕的人中有包括宪兵队长在内的军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多哥发生了政变，发动者是下级军官，这些人都是从法国军队中回来的，他们要求编入自己国家的军队，（顺便还要讲到奥林匹欧总统的轶事）。奥林匹欧出自经济的考虑，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老兵夜里包围了总统府，并打死了总统，军队（一个连）支持了老兵。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刚果（布）总统富尔贝·尤卢面对工会组织的群众起义被迫投降，尤卢把政权交给了军队，参谋长马桑卡以一个普通革命者的身份接管了政权。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都发生了当地军队起来造反，这些部队还都是在非洲王室军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士兵们把英国军官都围困在兵营里（毫无疑问，三个国家之间是预先串通商量好的），然后开往首都。在这累斯萨拉姆，道格拉斯将军穿着衬衣成功地从兵营中逃了出来，并预先通知了尼雷尔总统，使他及时离开了首都。这些造反者要求增加薪金和赶走英国军官。这三个国家的总统都请求英国帮助。其中有一个情况是很奇怪的：乔

莫·肯雅塔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关了不少年，后来争得了政权，他也被迫请求英国派兵抵御自己的士兵。英国人很快就把这些造反者镇压下去了，接着，坦噶尼喀解散了原来的军队，重新建立，乌干达和肯尼亚则对军队进行了大清洗。

一九六四年二月三十日，象牙海岸逮捕了五名军官，其罪名是阴谋反对国家。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加蓬的军队同样由于对薪金不满，收入没有在法国军队中高，因而起来造反。四名少尉带领二百名士兵（约占加蓬军队的一半）夜间包围了总统府，解除了卫兵的武装，逮捕了总统莱昂·姆巴。但是他们没有同宪兵队协商好，虽然宪兵队是被动的，但毕竟是反对这些造反者。副总统没有被造反者逮捕，他向法国求援，法国根据防御协定，给予实际上不存在的加蓬政府军事援助，法国伞兵部队很快就击败了加蓬军队，恢复了姆巴的总统职位。

达荷美、上沃尔特和塞拉利昂的政变是值得较详细地研究的。

达荷美的军队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建立的。总参谋长是索格洛中校。在这之前，索格洛曾在达荷美政府中担任法国的军事顾问。克里斯多夫·索格洛生于一九〇九年，二十一岁志愿参加法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在法国服役，后来调到“非斯条约”控制下的摩洛哥（一九一二年，法国同摩洛哥签订“非斯条约”，规定摩洛哥是法国的“保护国”。——译者）提升为军官，参加过科西嘉、厄尔巴和法国南方联军的登陆。五十年代初，索格洛到印度支那服役，一九五六年任达喀尔附近的一个法国军事基地任少尉参谋军官。回到达荷美之



---

后，便拥有不动产，包括土地和房屋，这样他便成为达荷美新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sup>①</sup>

达荷美的武装力量包括一千七百人的一支陆军部队、一千二百人的宪兵部队、一百人的空军和一千人的警察。<sup>②</sup>

在达荷美的政治舞台上，长时期内是三个主要人物（“三大派”）——阿皮蒂、马加和阿奥马德贝掌权。第一派依靠波尔多诺伏地区人、城市知识分子和天主教教会；第二派代表北部地区的种族集团；第三派主要代表芳族人的势力。达荷美首届政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由阿皮蒂担任首脑，马加是部长，第二届内阁（一九五九——一九六三）两人对换了角色。阿奥马德贝在这两届政府期间都是反对派。动乱又开始了，由于激烈争权的结果，阿皮蒂同马加决裂，同阿奥马德贝结成联盟。两人的联合从一九六四年一月保持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是故伎重演，“两个首领商量好一起对付第三方，之后便开始行动，共同打击一个人”。<sup>③</sup>天平的法码倾向阿奥马德贝方面，他当上了总理和副总统，并控制了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当然，个人的争权斗争明显地具有部族传统的特点。正如伊斯马基洛夫指出的，达荷美的权术家在争权斗争中“利用了北部的穆西格鲁西族人和南部几内亚血统的种族之间的矛盾”。<sup>④</sup>

---

①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美）埃文斯顿出版，1970年，第106页。

② 同上，第99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伊斯马基洛夫，《现代热带非洲的人种问题》，莫斯科出版，1973年，第144页。

工会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提出：第一，政治上的要求，其中包括赞成成立有工会参加的地方和民族革命委员会；第二，经济上的要求（反对政府关于削减国家职员工资“节省资金的政策”，而对这事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是那些靠出卖自己劳力过活的人）。政府和工会冲突所造成的混乱军队没有立即干预，但索格洛对阿奥马德贝进行了公开申斥。索格洛显然得到几乎是所有军官的支持，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动了政变，并且自己当上了总统。<sup>①</sup>

如果说，一九六三年索格洛在领导临时政府时曾经表示“军队支持三位领导人……不要求参加政府”，那末时隔两年之后，他则宣布，“这几个政治首领已无能领导国家”。<sup>②</sup>

在上沃尔特，独立后武装力量包括军队（一千五百人）、宪兵（一千五百人）和警察（三百人）三部分人组成。第一总司令是法国军队的老兵拉米扎纳少校。

上沃尔特一九六〇年独立时，占优势的政治力量是莫里斯·亚梅奥果领导的上沃尔特民主联盟。亚梅奥果利用操纵选举法的办法在独立前夕使他的党掌握了大约62%的选票，在议会的七十五个席位中占据了七十一个，反对党被迫解散。<sup>③</sup>在一九六五年的选举中，亚梅奥果的党通过不许对手竞选的办法，获得了69.77%的选票，但是这时国内已经广泛流传着

---

① 一九六三年底索格洛已经主持政府，这是在阿皮蒂和马加之间的关系接近僵局和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危机以后，工会领导了总罢工，当时索格洛领导的是临时政府，而且这个临时政府把权交给了阿皮蒂—阿奥马德贝集团。

②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96页。

③ 同上，第85页。

对他的不满。总统的罪名是浪费（特别是在总统生长的城市建筑豪华的官邸）、徇私（特别引起大家不满的是总统的堂兄弟内务部长杰尼斯·亚梅奥果，此人学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醉心于击拳术的人）等等。总统和工会之间的直接冲突是由“节省财政开支”的规划产生的，这个规划规定要将几类国家职员工资削减20%，增加其他几类职员的所得税，减少家族津贴。正是在亚梅奥果宣布“节省财政开支”的时候，他自己却把在巴西度蜜月的费用也列入国家开支的帐单上，从而引起许多工会会员和其他领导人的抗议。在采取合法的和议会斗争方式反对“节约措施”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工会便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决定于一月三日举行总罢工。罢工又进一步发展成示威运动，参加者有二万五千多人。站在示威运动前列的是学生，他们举着这样的标语牌：“要面包、水和民主！”，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把政权交给军队。”

政府逮捕了大约有一百名工会领导人，亚梅奥果发表广播讲话，说这是“共产党人煽动的破坏行动！”可是街上仍挤满了人流，当亚梅奥果同意同工会谈判时，工会已经不愿意再同他打交道，三十个部长中有九个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焦急不堪，亚梅奥果陷入绝望，派总司令拉米扎纳中校去到群众中宣布撤销“节约措施”。但是示威者已要求总统辞职，而且只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他们才散开。果然隔了三小时之后，拉米扎纳又重新来到示威者那里，向他们宣布亚梅奥果已经辞职，政权由军队接管。

这样，一次有趣的国家政变就算完成了。后来拉米扎纳说，他当时面临的选择是，或向人民开枪，或让总统辞职。

亚梅奥果向人民发表广播演说，他赞扬了军队，并对军队表示满意。美国作家斯库里尼克在评论这件事时谈到，“军官们善意的中立，使得工会领导人能够允许军官们按照法律原则过问政治。”<sup>①</sup>

塞拉利昂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发生军事政变之前，也经过了长期的政治斗争，造成这种斗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门迪族和泰姆奈族这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对立。国家总理艾伯特·马尔盖是门迪族人；大多数军官也都属门迪族。马尔盖领导的人民党和史蒂文斯领导的人民大会党互相对立，人民大会党主要依靠泰姆奈族。一九六七年二月，揭露出了反对马尔盖和军队总司令兰萨纳准将（门迪族）的阴谋。阴谋的领导人是兰萨纳的助手班古拉中校，属泰姆奈族。三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结果尚未揭晓，每个党都认为自己一定会获胜。这时，波士顿总督就委派史蒂文斯组织新政府。但是兰萨纳准将宣布，波士顿的行动是非法的，因为选举的最后结果还没有公布，兰萨纳在宣布国家处于特别状态的同时，夺取了政权，并禁止总督和史蒂文斯行使自己的政权，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政变。军官集团逮捕了兰萨纳和马尔盖，成立了民族复兴委员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权。委员会中门迪族和泰姆奈族的代表各半，主席由贾克森·史密斯中校担任，但史密斯这时在英国实习，所以主席的位置暂空。

---

<sup>①</sup>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71页。

---

应当指出，政变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因为财政赤字、外债增加、农业生产遇到困难、贪污等等。

经过两年半之后，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又发生新的政变，这在热带非洲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发动这次政变的不是军官，而是以中士为主的士兵。造成士兵不满的直接原因是薪金低和生活条件差，对国家越来越失望，人民群众表现出对军官统治的不满，要求恢复文官政体。塞拉利昂的全部军官都被逮捕和解职，这在军事政体的历史上是无先例的。在开展所谓反贪污的革命运动之后，涉及到的有两名军官，即班古拉和亨杰。不久西亚卡·史蒂文斯又组织新政府，军事政体让位给文官政府。

这样塞拉利昂军队的政治活动，是由三种不同等级的人发动的，最初是总司令剥夺了总理的职权，尔后是老的军官集团把总司令推翻，最后是士兵和中士推倒了军政府，恢复了文官政权。<sup>①</sup>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博卡萨上校在中非共和国夺取了政权。他推翻了自己的堂兄弟达科总统。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多哥发生第二次政变，多哥军队指挥官二十九岁的埃亚德马中校推翻了总统格鲁尼茨基（格鲁尼茨基自从杀害奥林匹欧之后担任总统职务共四年）。据埃亚德马声称，他发动政变的理由是，格鲁尼茨基奉行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全国对政府深怀不满。埃亚德马组成了国家

---

<sup>①</sup> J. 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第21页。

政权的临时机构——民族和睦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布隆迪总理、国防和内政部长米孔贝罗上尉废黜国王恩塔尔五世，取缔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组成以他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十天之后，米孔贝罗晋升为上校，担任国家总统，任期七年。这次政变是布隆迪长期内部斗争发展到了顶点的结果。其事实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先后有七个总理，其中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处死刑，一个进监狱。全国经历了一场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血腥屠杀。一九六五年十月，胡图族军官领导的一部分军队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那些阴谋发动改变的军官以及同这些军官有联系的政治活动家都被处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王子推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接任王位，称恩塔尔五世，在这次事件中坚决支持他的是二十六岁的米孔贝罗上尉，米孔贝罗出身于图西族贫穷家庭，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军事学校，担任首都军区司令官。米孔贝罗是“新的中间阶层”的代言人，这个“新的中间阶层”包括职员、大学生和军官，这些人都反对传统的宫廷贵族。党和工会反复活动，老朽的上流社会危机已经成熟，米孔贝罗帮助王子夺得了王位，尔后，他自己又把王子推翻，结束了王朝制度。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在法国前殖民地尼日尔共和国发生了政变，这是一次非常迅速而且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政变后文官政府改变为军事政权，政变是由谢尼·孔切中校领导的，政变成功后谢尼·孔切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宣布：“军队掌握政权并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不能容忍的内部事件，国家领导方面的丑事对谁都不是秘密……原

来的那些领导人对社会的利益极端不负责任，而是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sup>①</sup>

在研究了热带非洲的军事政变之后，最后还将谈到两个“特殊情况”、扎伊尔和尼日利亚，以及三个进步国家的政变（加纳、马里、乌干达）。

刚果（指扎伊尔，下同。——译者）的悲剧已多次详细阐述。其基本原因是两个：第一，比利时资本家不愿意放弃对刚果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掠夺；第二，美国统治集团力图在刚果建立供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掠夺的经济基地和为美国在非洲大陆扩大影响的政治基地。

刚果独立时，全国只有十六个刚果人受过高等教育。有关刚果的政党性质，《非洲评论》杂志是这样阐述的：“刚果的各政党实际上都是城市的，没有一个具有农民基础，它们的活动局限于召开记者招待会，属于例外的事务是组织‘青年军’，而这支‘青年军’又是由利奥波德维尔城郊的流氓无产者组成的。这些失业者保持着农民意识，那些缺乏支持者的党的总部就是依靠这些人的。只有阿巴科党一九六〇年在下刚果有群众基础，其作用主要是充当反对卢蒙巴的那些反动势力的工具。”<sup>②</sup>

刚果军队是从比利时人建立的“殖民地军队”的基础上建成的。这支军队共有二万三千名非洲人，但军官和年长的下士都是欧洲人，将近一千人。年轻的下士都是经过军事学校培养的非洲人。人数不多的中士是一九五九年军官训练班中

<sup>①</sup> 《非洲评论》半月刊，1966年9月8日，第422页。

<sup>②</sup> 《第三世界军队的超军事任务》，第106—107页。

培养出来的。然而，可以想象，比利时的指挥官还会长期控制刚果军队，比利时人决不会很快地培养当地干部。独立之后的刚果士兵突然对比利时军官造反，把他们从军队中赶出去。这时刚果军队迅速增加到三万五千人（包括青年军在内），军官一个也没有留下。不错，军队中有不少下士，因为卢蒙巴政府庆祝独立，把所有的军人都提了两级。一个连有一百九十五名士兵，九十七名中士和四十名伍长。<sup>①</sup>

令人可笑的是，这些由比利时人培训以专门镇压人民群众的残暴匪徒，竟然也能称之为军队。著名的法国记者埃·鲁洛在迪戎研究班曾经谈到：“必须看到刚果士兵在独立之前就已服役，他们对待自己的同乡极端无情。”<sup>②</sup>

这支“军队”只不过摆脱了同自己一样残暴的法国军官，随后他们的胡作非为也是人们所熟知的。先是为比利时人服务，尔后又为美帝国主义干涉和剥夺刚果的独立提供了极好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较好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解散这支“军队”，因为它对于保卫国家的独立已失去任何意义，只会给国家带来不幸。但实际上不仅根本谈不上解散军队，就连削减也不可能。全国的失业者的数量已经很大了，所以卢蒙巴不得不让这支军队存在，但又无法制止敌人利用它来反对自己。

正如《非洲评论》杂志指出的，军队自从第一次政变（一九六〇年）以后，就产生了保卫本阶级利益、反对刚果其他一切组织的心理和“特权阶级的思想，同群众完全对立，认为群众

<sup>①</sup> 《第三世界军队的超军事任务》，第115页。

<sup>②</sup> 《非洲评论》半月刊，1966年1月26日，第35—36页。



只能服从他们的指挥。”<sup>①</sup>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很低，他们常常被拿标枪和弓箭的起义者打败。众所周知，冲伯只是靠了白人雇佣军才打败了起义者的。

但军队中的团体主义精神却得到了发展，这种团体主义并不是表现在夺取战场上的胜利，而是表现在一种优越感上，即认为军队的地位高于任何别的组织。是这种优越感保证了军队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共同的语言来维持的。各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部落制度之害。在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在群众看来，政党不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只能代表地区性的利益。在军队中，部落制度感觉不出来，那些雇佣的亡命之徒早就失去了同本部族的联系，他们在军队中讲的是法语，为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服务。

《刚果国民军之声报》(半月刊)每期都向士兵宣传，说他们属于国家的上流社会，比一般不会管理国家的文人要高明得多。但是“军官们一方面宣扬自己的地位比政客们优越，而事实上双方在利害关系方面又最密切；他们都领取高薪金，享有其他各种特权(住宅、汽车等等)，军官同部长和议员不相上下。在人民眼里，他们同独立时大发其财的可恨的暴发户是一丘之貉。”<sup>②</sup>

由于经常内讧，使得国家涣散、混乱和陷入无政府状态，分裂主义情绪日益增长，从而造成连绵不断的军事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军人的作用最大，国家的管理经常操纵在他们手里。

<sup>①</sup> 《非洲评论》半月刊，1966年1月25日，第35—36页。

<sup>②</sup> 同上，1966年9月8日。

同时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腐败透顶，“侵吞公款、投机倒把、走私宝石、等等，使得上层领导越来越富，而群众的生活状况日益贫困。出现了专门从事进口荷兰酒和德国酒等商品的商业资产阶级。只要能跨进经济部，就意味着登上了发财致富的道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当经济部长。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发现投不信任票的办法能够获得好处，因而他们为从政府那里得到便宜，就充分利用投不信任票来威胁……。领导集团的可耻贪污行为终于使群众感到绝望，从而产生真正关心改善国家状况的议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力量的日益壮大使政府不得不撕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假面具。”①

政府在对反对派采取镇压措施的同时，企图谋求“从政治上解决”国内的阴谋叛乱活动。尽管总的来说，阴谋叛乱活动在冲伯上台后已经失败了，但游击队仍在国家的边缘地区活动，局势仍然很不安定。为了自己的安全，卡萨武布和金巴决定同起义者达成谅解，使他们能够不要白人雇佣兵的帮助，从而在独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中确定自己的“尊严”，除此之外，还可以削弱军队的作用，这个军队的影响正在增加，已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蒙博托决定使政府和起义者之间谈不成协议，看来这是他加快实现蓄谋已久的行动的决定性步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政变没有遇到反抗，群众

---

① 阿迦莫耶加，《尼日利亚联邦》，伦敦出版，1964年，第130—131页，格特曼奇，《新兴国家中的武装部队》，第46页。

甚至向他祝贺，认为他推翻了破产和腐败的制度。

尼日利亚独立时，主要军官都是英国人。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尼日利亚武装力量三百多名军官中只有八十一名当地人，其中有六十名是伊博族人。<sup>①</sup>

尼日利亚军队从一开始就规定一半从北区招募，百分之二十五从西区，百分之二十五从东区。这个规定符合殖民主义招募士兵的政策，即优先从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募集，也就是说从政治上最落后最边远的农村地区招收。在尼日利亚，这个原则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百分之五十的士兵是北区人，而且重点都从最偏僻的落后地区招募。独立后，被北区封建地主分子控制的政府，不仅继续奉行这个方针；而且变本加厉，改变传统做法，实际上不仅是百分之五十，而是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招募北区人。步兵通常都是北区人，技术兵和管理人员多数是伊博人。在军队里，按人口总数计算，约鲁巴人所占的比重是最少的，那是由于认为他们适合服兵役的人不多。<sup>②</sup>

到一九六六年初，尼日利亚的军队大约共有八千人。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和部族混合和融化在一起。一部分军官，包括总司令朱·阿吉伊·伊龙西将军都是在英国军队中经过长期训练，参加联合国部队在刚果打过仗的。

费尔斯特写道：“尼日利亚的军队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冲突、矛盾和危机，它的特点在于握有暴力工具。”<sup>③</sup>

<sup>①</sup> 赫特里奇，《新兴国家中的武装部队》，第27、36—37页。

<sup>②</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362页。

<sup>③</sup> 同上，第248页。

内部危机尖锐到了极点，政府明显地不能稳定各方面的正常关系，年老体弱的总统阿齐克韦遭到部分军官从政治上的攻击。由于现有的政治制度是保证北区的封建阶级和穆斯林人占有优势，因而把这个制度推翻，客观上也就满足了其他地区人的利益，首先是正在发展的伊博族和约鲁巴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来说，北区的统治越来越成为必须扫除的障碍。

阴谋策划者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伊博族年青军官——恩佐奥格武、沃卡福尔和伊费阿朱纳少校，而且他们很快又联合了约鲁巴族的阿德莫伊加少校。阴谋策划者的中心人物是恩佐奥格武少校，他是一个具有“天主教徒……清教徒的道德及书本教条”和“造反气概”的人。<sup>①</sup>这些年青军官和相似年龄的文职官员（其中包括激进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一九六五年秋，阴谋计划大体上准备就绪，其中包括决定逮捕和处决三个区的负责人。

在这次密谋策划过程中，任何一个老的少校以上军官都不知道，一月政变后，曾经很快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从一开始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伊博族高级军官参与这次密谋，其中包括总司令伊龙西将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的最高领导没有打算进行任何的军事政变，但当政变发生后，他利用了这个机会夺取了政权。几个少校进行了这场政变，而领导新制度的是将军们。伊龙西和跟随他的几个将军都是英国殖民主义学校培养的典型军人，是守旧的职业军人，毫无革命思想和

---

<sup>①</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伦敦出版，1970年，第303页。

进步表现。正如费尔斯特写道：“如果说恩佐奥格武是受了纳赛尔的鼓舞，那末伊龙西很快就同纳吉布一样，但是与埃及不同的是，尼日利亚的纳吉布搞掉了尼日利亚的纳赛尔，而不是相反，青年军官改革的热情被年老的指挥官所扼杀，老制度的政治代表消失了，但制度本身依然未变。”<sup>①</sup>

这里可以举出几个原因，来说明尼日利亚的年青军官（假如说是为了实现“纳赛尔式的”目标，准备和进行政变）未能防止保守的将军火中取栗，被抢走政权。这是由于尼日利亚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在这个国家里，伊博族出身的领导人得不到其他民族的承认。这种结果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所有的政变几乎都是伊博族人发动的。同时由于尼日利亚是联邦制国家，如同埃及一样，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夺得了首都，也不等于政变就胜利。其次是，由于缺乏长期和细致的准备而未能象埃及那样在全军建立严密、广泛和可靠的组织，未能使大量担任关键性职务的军官参加，也没有采取象埃及那样的办法逮捕年老的军官。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尼日利亚和埃及不同，军队的上层领导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心目中还没有失去威信，还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可恨的旧制度的一部分，相反，恩佐奥格武和他的朋友对伊龙西和其他伊博族的将军仍抱有幻想。此外，尼日利亚的造反军官，没有象纳赛尔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一定的纲领，没有明确和能够引导群众前进并为大家所赞成的目标。

不过，应当反对那样一种说法，一月政变具有部落性质，

---

<sup>①</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第300页。

是伊博族人想夺取联邦统治权，因而政变首领基本上都是伊博族人。但这只能说明这个民族政治上比较开展，所以多数军官是他们的代表。政变是由“政治上日益尖锐的不满造成的……，而其决定因素又是年青军官对政治的不满情绪激化，因为他们这一辈人对政客们的胡作非为极其厌恶。”<sup>①</sup>

年青军官推翻了濒于崩溃的文官制度之后，未能把政变引向革命，没有依靠群众，未能制止部族间的流血冲突发展成内战，因而命运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短促而悲惨的结局。<sup>②</sup>

一九六六年一月政变的详细经过究竟怎样呢？

部队的行动，经过细致的策划，在五个主要城市同时进行：即联邦首都拉各斯和四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卡杜纳（北区）、伊巴丹（西区）、贝宁（中西区）和埃努古（东区）。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夜一点，全国各军事单位都发出警报，并按事先组织好的计划，各部队同时采取行动。

卡杜纳的行动由恩佐奥格武少校为首的军官小组指挥，恩佐奥格武早在起义前几天就从拉各斯飞到这里。在卡杜纳，参与谋划这次事件的共五名军官。当部队在恩佐奥格武的率领下于一月十五日夜向艾哈迈德·贝洛的官邸进发时，军官和士兵依然还认为是进行夜间操练，只是在到达官邸附近的时候，恩佐奥格武才向他们宣布行动目的。大部分军官和士兵都是北区人，恩佐奥格武后来说，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打死

---

① 《政治周刊》，1966年2月5日。

② 恩佐奥格武为保卫比夫拉而牺牲，沃卡沃尔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起义的北方士兵打死。伊费阿朱纳在比夫拉战争中为组织反对分裂主义者的头子奥朱古事件被枪决。

和拒绝参加这次政变，但还是听了他的话。是“尼日利亚爱国主义”的共同感占了上风。确实这种精神在卡杜纳的那个夜间充分表现了出来，当时所有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人为了推翻暴政，团结起来，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激烈斗争中没有保持下去。

艾哈迈德·贝洛（萨尔达乌纳·沙科蒂）是尼日利亚的“实力派人物”，他在尼日利亚北区当了十二年总理，谁都知道联邦政府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这个目空一切的大封建主认为在尼日利亚无人不能收买或俯伏听命于他。他在被处决前三天，正好赴麦加例行朝圣归来。

在草地上架好两门迫击炮，午夜一点整，开始轰击他的官邸，攻击就此开始，顽抗很快就被打垮，恩佐奥格武少校被炮弹的碎片打伤，但他拒绝到医院治疗，继续指挥战斗。艾哈迈德·贝洛从火光冲天的官邸中被拖出来就地枪决。<sup>①</sup>

这时在伊巴丹，叛逆者攻打阿金托拉的官邸，同警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枪战，双方都死伤了许多士兵和军官，阿金托拉从卧室中被拖出来，枪手朝他打了十三枪。

在拉各斯同时爆发了事件，但是那里没有经过战斗，总理巴勒瓦和最可恨的贪污犯财政部长欧科提-埃博赫的官邸都被包围，一群军官走进总理府，把他叫起来，强迫他在辞职的文件上签字。巴勒瓦还问：“签字之后你们还打死我吗？”但他和欧科提-埃博赫一起被押上汽车带走，两人在路上被处决。几天之后，在公路附近的一棵树下找到了巴勒瓦的尸体，给予

---

<sup>①</sup> 《政治周刊》，1966年9月10日。

荣誉的葬礼，巴勒瓦和财政部长所不同的是他得到了人民的尊敬。

在贝宁和埃努古，政变没有流血。总理奥萨德贝和沃克帕拉都被逮捕，军队占领了关键地点。当逮捕沃克帕拉的消息传到他的故乡贝德时，那里传开了一种说法，说事情是北区人干的。于是整个这一地区响起了铜锣，战士们拿着长矛、宝剑和弓箭乘上占领者向他们迅速提供的卡车准备前往埃努古，战士们唱着战歌决心向北方人宣战，但在向他们说明了政变的真正目的之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到深夜三点，一切已经完全结束，军队掌握了尼日利亚所有各主要城市的权力，被推翻的那些领导人都被处决了，英国人精心炮制的政治制度从此不复存在。

上午十点召开了国会，但是三百一十二名代表只有三十三人和一位部长出席。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没有发表关于这次事件的任何公报。士兵们很快把国会大厦打扫干净。接着又召开了内阁会议，让阁员相信他们的职位将得到保留，因为这时大多数部长已躲起来，不知去向。会后发表的公报说，某些部队举行了暴动，塔法瓦·巴勒瓦被他们劫持走了，大多数军人和总司令本人仍效忠政府。

总统阿齐克韦在英国治病，由奥里查代理他的职务。一月十六日，奥里查在广播中宣布，遵照联邦政府的建议，他把全部政权交给军队，随后是伊龙西将军发表讲话，他宣布，军队同意执掌政权，以后国家将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管理。合法手续就算完成了，军事政权有了正当根据。

伊龙西首先关心的是防止北区反叛。在卡杜纳，恩佐奥



格武少校执掌政权。恩佐奥格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问题并不是在于各部队暴动，而是伊龙西将军策划的有准备的行动。他说：“新制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要消灭贪污、任人唯亲、部落观念和内部斗争等弊病。”他猛烈攻击已打倒的政客。这位少校强调说：“全世界的选举都是虚假的。”①

恩佐奥格武这番讲话的意思是，伊龙西参与谋杀了在北部宗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艾哈迈德·贝洛，以便使伊龙西将军处于不利地位。伊龙西采取了一个力图平息北区对自己不满的步骤：他发布一项命令，召恩佐奥格武到拉各斯，并把他监禁起来。这样他好象觉得自己就安全了。但是同激进的年青军官决裂后，伊龙西的处境更困难了，他失去那些在即将到来的困难岁月中可能支持他的人。

迫使伊龙西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北区人起来反对军事统治制度就意味着联邦的瓦解。新的领导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北区出现诸如政变那样的事件，这是伊博族人为了铲除豪萨族—富拉尼族特权的当务之急。一月政变在客观上加强了南部资产阶级，相对地削弱了北部的封建主，也就是说起了进步作用。此外，它的正面意义在于新制度不断地克服尼日利亚所存在的各民族集团之间的斗争，以维护联邦的存在。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因为政变后的几个月，封建上层集团的拿手好戏是充分利用了北区人盲目的宗教信仰，而军事当局又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社会纲领和依靠群众

① 《圆桌》季刊，1967年1月，第43—44页。

的办法，因而得不到主张使国家朝着独立和进步方向发展的各个组织的支持。

伊龙西将军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他已四十二岁，十八岁就在军队中服役，他的经历同安克拉将军有许多相似之处。伊龙西曾担任过两年英国控制下的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顾问，指挥过联合国驻刚果的尼日利亚部队，也许是因为这种情况，他周围有不少高级军官。他除了抱有民族主义思想，主张消灭可耻的贪污行为和内部纷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纲领。

新政府逮捕和审判了那些被怀疑有违法行为的部长，并根据一定法律程序追究那些贪污罪犯的银行账目。新政府还宣布打算削减行政机关费用，增加居民住宅建筑及医疗设备费用等等。在经济政策方面，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资本。解散政党，命令工会停止罢工。

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伊龙西政权的命运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命运的是民族主义因素。

北方的酋长们对于杀害他们领袖的新政权所抱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伊龙西对此也不会不清楚的。为了使北方大领主不反对自己，伊龙西不去触动他们，不搞那些反对贪污之类的措施。但这种让步的做法反而对他造成危害，酋长们不但不改变对伊龙西政权的敌视，相反，认为他软弱可欺而感到振奋。当政府打算不采纳联邦制，而改用集中管理时，一百零五名酋长便在卡杜纳集会，并声明反对新政权。民族问题是军政府政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各种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北区上层人物的反对将使伊龙西的计划必然失败。

---

另一方面，那些进步的具有民族感的伊博族人则甚为失望，他们认为军事首领在对待北方封建主的态度过于软弱，因而积极性大受影响。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军政府颁布了第二十四号通令，宣布由联邦制转为中央集权制，引起了酋长们的不满，也引起了北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艾哈迈德·贝洛大学的毕业班学生的不安。因为过去北区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垄断着填补他们本州政府机关的空缺职位的权利，他们在联邦机构中一直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北区人在其中只占百分之一，但是在他们的北区家乡，不会受伊博族人的排挤。现在面临的前景是一切地方性的特权都要被剥夺，因而北方的青年担心他们的州里将要派来许多受过较好的教育的南方人。军事政权的敌人立刻利用这种情绪。<sup>①</sup> 费特写道：伊龙西促使那些部族的传统统治者反对自己的原因是，他取消了普通法院的法律权利，免去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委员和各种机构的候补负责人的职务和资格等等。<sup>②</sup> 看来，要使国家职员保证支持政府是十分必要的。但职员们，特别北方来的人，首先对中央集权制政策不满。结果伊龙西失去了部族首领的信任，也没有得到国家机关人员的支持。伊龙西将军想要消灭封建部族制度，但是他彻底失败了。

主要危险还由于在豪萨族士兵中激起了不满。酋长们的奸细在他们中间不断地进行宣传，说伊龙西及其最亲近的助手都是伊博族人，在一月十五日的政变中，没有一个伊博族人

---

① 《世界政治》，1968年，第二期，第190页。

② 同上。

---

被打死。政变后所有得到提拔的人都是伊博族军官，豪萨族的士兵在政变中被用作盲从的工具，为了确立伊博族的统治，杀害了豪萨族的领导人，等等。

五月二十九日，即宣布废除联邦制的通令发布后的第五天，在北区各城市便开始了预先准备好的屠杀，伊博族人是屠杀的对象。封建主的好绅杀害了很多小市民，特别是从南方来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失业者。上百个伊博族人被打死在街头和家里。如此野蛮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尼日利亚是前所未有的。

伊龙西知道局势恶化了，他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军队能够保持团结。七月间，他改变了原定不离开他用坦克和反坦克炮保卫的官邸的主意，跑到尼日利亚西区，这一出走就注定了他的完结。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伊龙西在阿贝奥库塔（尼日利亚西区），那里豪萨族士兵爆发了叛乱，把所有伊博族的军官统统打死，其中也包括伊龙西将军。北方士兵解除了警卫队的武装，把他和法德瑞伊中校送到离阿伯达几英里的地方，用机枪把他们两人打死。<sup>①</sup>

军政权的新领导由三十二岁的雅库布·戈翁中校继任。戈翁是基弗族人，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中部。政府竭尽一切努力来稳定局势。但是部族的自发行动继续蔓延。九月二十六日，乔斯（尼日利亚北区）开始了残杀伊博族人的暴行，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这次大屠杀到十月二日在卡诺发生的流血

---

<sup>①</sup> 《世界政治》，1966年，第二期，第190页。

事件达到顶点，豪萨族的士兵残酷地杀害了几百名伊博族的和平居民，北区在几天之内打死了成千上万的伊博族人，还有许多人被打成残废，多数被挖去了眼睛。

到十月底，有一百八十万伊博族人抛弃了自己的财产，狼狈地从北区逃回东区，逃亡者对北区人的暴行控诉激起了尼日利亚东区人的报复行动，在哈尔科尔特港和奥尼沙，开始屠杀北区人。尼日利亚东区军事首领奥朱古中校命令其他地区的所有人（中西部除外）都离开东部地区。伊博族人也从北区、西区、中西部和拉各斯返回自己的家园。

在这样的气氛下，军队的团结自然被彻底破坏了。波兰的一位作家作为事件的一个目击者，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军队分裂了，有一部分被歼灭了，而且无法确定那些部队是忠于新政权的，那些部队是反对新政权的。军人互相残杀，死亡最多。军官至少被杀死一半，而且都是视死如归的最年青的军官，手枪才发到他们手里。在第一次政变中，伊博族人打死了约鲁巴族和豪萨族的军官，而在第二次政变中，约鲁巴族和豪萨族的军官杀害了伊博族的军官，幸存下来的很少。”<sup>①</sup>

一九六六年的流血事件中，最受迫害的是伊博族人，终于这个民族掀起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导致了一场分裂运动。一九六六年末，以奥朱古中校为首的尼日利亚东区军政府开始采取力图脱离联邦的步骤。一九六七年四月，尼日利亚东区脱离联邦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五月三十日，奥朱古正式领导比夫拉共和国，给尼日利亚带来无限痛苦的战争就

<sup>①</sup> 《欧怡周刊》，1966年9月10日。

此开始。

尼日利亚军人掌权曾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其中的热烈程度是难以形容的。数百人在新政权领导人的住地集会，通过决议，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例如，尼日利亚公民全国大会党领导下的各党联盟（曾获得伟大进步联盟称号）决议中就是这样说的：“在我们伟大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第一次获得真正的独立，这一天应当成为我们全国的节日。”在齐克运动（阿齐克韦的支持者）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说：“群众中普遍出现混乱和失望，进行这一场政变是必要的。独立以来，政府粗暴地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老百姓无权在自由和互相尊重的条件下生活。他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上有组织的横行霸道和玩弄欺骗手段使得所有的选举都成为滑稽丑剧。政治家不为国家服务，而是巧取豪夺和积聚金钱。失业和剥削日益严重，不少掌权的封建法西斯集团无限制地愚弄群众。”①

对于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推翻按英国殖民主义者旨意建立起来的可恶制度，就好象是赶走了梦魇，开创了新时代。军人象国家的救世主一样受到欢迎。时隔不久，这种热情就开始消失，变成了失望和冷漠。大家都看得清楚，这些掌权的人都是些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职业军官，很少有自己的见解，毫无政治经验，同前政府那些领导人比较，所不同的仅仅是诚实和爱国。但是，果然不出所料，只有这样一些品质是很不够的。很难判断，伊龙西政权的社和经济措施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政权只有半年的历史。民族问题压倒了一切，

① 《政治周刊》，1966年2月5日。

社会和经济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第二位的，虽然说，归根到底民族问题同这两个问题也是有联系的。

尼日利亚——它是一个由部落制造成互相搏斗和民族主义无法调和最突出可怕的典型。非洲的各部族和各种族集团之间的传统纷争，同世界其他落后的地区一样（这些地区的社会过去和现在都处于经济落后状态，社会文化也不发达），经常出现流血和暴行。但是过去这种纷争不能采取象现在的形式。现在的纷争已经达到全国范围的政权一级的规模进行，而且敌对双方都掌握着比从前有力得多的经济和军事压迫手段。

各民族和部族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水平虽然至今仍然很低，但是他们已经具备当代的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掌握了新式武器，这就更增加了内乱的危险性。传统的敌对状况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群众陷入了失望。他们目睹独立后的政府不能在经济上取得任何较快的发展，未能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赖。日益扩大的社会差别和新生的特权阶层使他们的痛苦和不满有增无已；从银幕上看到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舒适和富裕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诱人，恰好同现实中的贫穷、匮乏和没有前途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现实世界难以想象地复杂。这个世界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念、社会标准和时代概念，使他们失去了依靠，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并产生了怨恨情绪，引起混乱，甚至濒于绝望。

在落后的社会中，还没有能够引导这种不满情绪到政治阶级斗争轨道上去的组织，而且群众的思想意识中也严重存在着宗教偏见和落后观念，习惯于宗法式的农村社会，所以社

会抗议一般容易导致形成敌视所有异民族，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等表现形式。

尼日利亚的悲剧说明，军队并不是都能有效地促进建立民族团结的社会和消灭种族隔阂。狂暴的部族仇恨一经暴发，顷刻之间就给全国群众带来灾难。“全民族教育”的时代随即消逝，穿同样服饰的人民互相残杀。

因此，热带非洲的军队并不具备抗部族制病毒的免疫力，它掌权后并不能使国家摆脱积聚已久的仇恨。

在加纳的政治生活中，军队起了复杂和多方面的作用。一九六六年二月，它作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发动了政变，军人推翻了恩克鲁玛的进步制度。

在这里没有必要来评价这位杰出的非洲爱国者和他在加纳建立的制度，他是个一贯坚决反帝的战士，社会主义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恩克鲁玛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克服国家的落后。恩克鲁玛创建的党——人民大会党是国家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除了军队以外，一切都由它管理。建立了一党制。恩克鲁玛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党的终身主席和总书记，是总统兼总理，有权取消特别法庭的判决，有权任命和罢免高等法院的法官。

一九六一年制订了七年发展计划，规定国营部分的增长速度必须超过私有部分，虽然后者还有不小的作用。

对于私人资本，无论是本国的或是外国的，都一概吸收到工业建设中来，而且对于外国资本给予比本国资本更为优惠的待遇。在偏重国营部分的同时，建立了许多联合企业。到一九六五年已有三十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其中一半是工业。



恩克鲁玛的制度对于国家的发展取得不小的成绩，医生和小学生增加了一倍。国家预算中的最大开支项目就是国民教育。一九六三年以前，每年的生产增长速度是5.5%—6%；可可豆（加纳的农业基础）的出口到六十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12%。但是经济上无可置疑的成就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有些原因同他的制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如国际市场上可可豆价格下跌，造成一九六五年末可可豆的收购价格降低，从而引起农场主的不满，这部分农场主（包括他们的家属）占人口比例的20%。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耗尽，外贸逆差造成的债务和赤字很大，通货膨胀难以制止，失业人数增加，很多国营企业亏本，这些企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私人企业低一半。

鉴于这种情况，政府不愿给私有部分以行动自由，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上，但是在落后国家活动的外国资本，在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便促进了私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腐蚀国家和党的干部，社会上层贪污成风。早在一九六一年，恩克鲁玛就撤换了六名部长，在审讯过程中发现，那个大名鼎鼎的格贝德马有一座带有花园的豪华住宅，两辆美国汽车，五座别墅、商店、餐厅、汽油库等等。<sup>①</sup>内务部长埃杜西在外国的六个城市有存款，他的妻子去伦敦休假，向一个古董商买了一张纯金的床，这件事在加纳广为传播。显然，恩克鲁玛的制度没有能制止贪污，未能使这个非洲年青国家避免这样的灾难。

尽管恩克鲁玛选定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很好的理

---

<sup>①</sup> 齐格勒，《新非洲的社会学》，巴黎出版，1964年，第139—140页。

想目标和年青热情的干部，但是为巩固进步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多数是不足以依赖的。党很不坚强，领导干部中有部分人贪污，社会生活的民主气氛不够，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弊病，等等，这一切都给右派抓住了把柄。

帝国主义间谍早就在进行反对革命制度的活动，在国家内部寻找支持者，物色对象，等待时机。到一九六六年初，新加纳的敌人认为动手的机会到了。

同时在加纳军队中产生了敌视政府的情绪，这种情绪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发展成为反革命阴谋，导致政变和恩克鲁玛的倒台。

在西非王国边防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纳军队到独立时有四千人。按传统，大约60%的士兵是从落后部族中募集的，而军官几乎全是南方人。<sup>①</sup>恩克鲁玛很关心军人物质上的特殊待遇：最年青的军官要在他的军事学院毕业后才能开始正式担任军职。士兵的薪水超过国家平均工资的一倍，恩克鲁玛当政期间，他个人掌管的部队曾经达到一万四千六百人，海军九百七十人、空军六百五十人。非洲人军官由一九五七年的二十五人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六百人。军费开支由4%增加到8%。警察由六千人增加到一万二千五百人。<sup>②</sup>

老军官一般都是黄金海岸殖民地军队原来的中士，他们都被派往英国学习过，有的在桑德赫尔斯特新军事学院，有的在蒙斯和伊顿·霍尔中等军官学校。

亲英思想必然会渗入到加纳的军官阶层中。军官们的上

<sup>①</sup> 《民族》月刊，1966年3月21日，第320页。

<sup>②</sup>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280，181页。

述服役经历就可以部分说明这一点。大部分军官或是直接在英国培养，或是在加纳由英国教官培训……。加纳军官按英国社会的标准和根据英国军官的尺度来判断自己国家的事务。

当然，把加纳的军官都列为信奉英国政治生活标准应当非常慎重。一九六六年的政变首领之一阿弗里法上校在一次谈话中说，恩克鲁玛制度抛弃了他和他的同学……没有出版自由和人权。<sup>①</sup>

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如果这些军官不属于西方民主的保卫者，那末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对他们格格不入。军官干部都是阿克拉附近的英国特斯基军事学校中培养的。一九六〇年后，这个军事学校改成为国家军事学院，但实际上这个学校没有多大变化。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加拿大军官。加捷里吉写道，加纳的军官团体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组织，党对它没有多大影响。<sup>②</sup> 詹诺维茨同样指出，“虽然加纳是一党制，但是在军队里没有建立鉴定政治忠诚的制度，也没有检查政治上是否可靠的考核制度。”<sup>③</sup> 英国《论坛》周刊写道：在加纳军队中，“非洲化主要是换人……，军队和警察都是‘由欧洲人来指挥黑人的西方机构’。”<sup>④</sup> 《非洲报道》杂志写道：“加纳的武装力量是殖民地机构，是经过扩充并加以非洲化的，但又不完全是非殖民地化的军队。”<sup>⑤</sup>

① 《观察家报》，1966年3月21日。

② 《非洲论坛》，1966年，第2卷，第一期，第31—41页。

③ 詹诺维茨，《军队在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第54页。

④ 《论坛》周刊，1967年3月3日。

⑤ 《非洲报道》，1966年4月，第17页。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通过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形式的、没有效力的)而掌握一切的恩克鲁玛会突然“失去”军队的支持呢?如此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对武装力量的作用估计不足,他始终是关心军队的。也不可能想象恩克鲁玛会把军队置于党的监督之外,对它漠不关心,或接受所谓“军队不介入政治”那种英国人的传统原则。当必要时,恩克鲁玛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些传统原则和西方政治生活的标准。

恩克鲁玛讲过这么一段话,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加纳的黑暗时期》一书中写道:“为了一定要有军队,我必须忍受我自己会遭受的灾难,虽然我知道这是危险的。英国人培养的加纳军队的未来军官是属于正统的,同时也是受新殖民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我不得不把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党,反对我个人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军官全部接受下来。更坏的是,步兵基本上都是在北方招收的,那里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教育问题无人过问,很多士兵不知不觉地就被引入歧途。”<sup>①</sup>

恩克鲁玛还说:“警察局长哈尔立和其他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这个情况对许多军官都可以用‘桑德赫尔斯特的心理学’来解释。这些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认为英国人比加纳人高贵……他们逐渐地成为比英国人自己还要高贵的‘英国人’,盲目追随传统的英国军官……。阿弗里法认为自己是超越于自己国家农民和工人之上的‘绅士’。他承认,他正是在英国首次听到对加纳政府的批评。”<sup>②</sup>

据恩克鲁玛说,加纳大约有六批军官毕业于桑德赫尔斯

<sup>①</sup> 恩克鲁玛,《加纳的黑暗时期》,伦敦出版,1968年,第38页。

<sup>②</sup> 同上,第45页。

特军事学院，只是后来几年才有逐渐增多的军人派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恩克鲁玛还写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凡是在苏联学习过的军官，没有一个去参加二月暴乱。”<sup>①</sup>

恩克鲁玛还进一步发挥了上述的主旨，他说，在独立的非洲国家要防止来自军队的突然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解散职业性的军队，用民兵代替。恩克鲁玛承认，他曾经想走这一步，但是没有成功；军官们打破他的计划，发动了政变。政变首领之一科托卡上校后来宣布：“恩克鲁玛组织民兵，谁能容忍他这样做？”<sup>②</sup>

这里有这样一些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恩克鲁玛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那些受英国人的思想训练出来的军官是不可靠的，他甚至憎恨这些人。那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同这些“职业军人”作斗争？而且还有些反常，为什么他还增加了军官的数量，而且到了最后才想到要建立民兵？

根据事实的可靠程度，只有一种解释是能令人相信的：恩克鲁玛希望保持军队的忠诚、军官的忠心，正因为这样，所以就不去触动他们，不去对他们进行带刺激性的“可靠性审查”，不去根据这些军官的政治态度进行调动或免职。实际情况是，恩克鲁玛也只有依靠英国军事学校给他输送合格的军事指挥干部，别无他途。要更换军官，这比起任何其他行政管理机关或政治机构要复杂得多。可以撤掉任何一个部长，把一个并不具备任何专长的人安放到这个岗位，当然这个人必须是政

<sup>①</sup> 恩克鲁玛：《加纳的黑暗时期》，伦敦出版，1968年，第46页。

<sup>②</sup> 同上，第47页。

治上忠诚的，这个人可以依靠前任领导的专家助理来进行工作。但是却不能把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派去当团长，指望某个“专家”去帮他处理军务，当然在革命军队中或在游击队中这样做是可以的，但在正规军、基干部队中，在和平条件下是不行的。指挥员必须是军事专家并且对部下有威信。

所以恩克鲁玛不得不保留原来那些按英国方式培养的军官或西方军官，和在军事学校中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学生。他对此毫无办法，他决定不采用“政治干涉”的办法突然引起军人的不满，他知道军人是最不喜欢这样做的。应当承认，从形式上看，这是使年青国家的军队能够和政府站在一边的合理方针（再结合物质上的优待）。

但是这种逻辑推论是不确切的，推行“政治教育”制度只是可能引起军队不满的原因之一。要预先发现和防止军队中刚出现反对情绪的苗头是困难的。不消说，还有种族、集团和其他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某个高级军官由于个人野心而成为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不问政治的军官就会不再效忠国家领导人及其思想和政治方针，而跟着自己的长官行事。

一九六一年，加纳派一支武装部队到刚果参加联合国部队作战。指挥加纳这支部队的是英国的一名将军亚历山大，助手是安克拉，他们两人都不支持恩克鲁玛对刚果危机所表示的立场，特别不赞成恩克鲁玛对卢蒙巴的那种隐讳支持。当恩克鲁玛决定派军事学校的学生到苏联去学习时，分歧就尖锐化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恩克鲁玛解除了亚历山大和其他几个英国军官在加纳军队中担任的职务。但是代替亚历山大的是他的亲信安克拉将军。一九六五年，恩克鲁玛削减了

军队所需要的拨款。这就引起了老军官不满。当恩克鲁玛一九六五年七月察觉到安克拉也不可靠，又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改变了原来对军队的态度，打算建立民兵，这就更使军官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恩克鲁玛提高了对军队有可能反对他的警惕性；政变组织者之一阿弗里法上校后来承认，正是由于“人民大会党加强了政治监督，乃引起军官们的愤恨”。<sup>①</sup>看来，恩克鲁玛已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引导”军队，但已经为时过晚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当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国内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的制度。政变的直接组织者是第二步兵旅的旅长科托卡上校，科托卡带领自己的部队从兵营开往首都，于早上五点到达。整个战斗参加的人数最多大约一千五百人，二十辆坦克。参与策划这次政变的还有阿弗里法上校、警察局长哈里立。到上午十点，守卫恩克鲁玛官邸的私人近卫军基本上已被击败。下午六点，科托卡上校通过阿克拉电台宣布克瓦米·恩克鲁玛政权和人民大会党已被推翻。政权由军人机构——民族解放委员会接管，领导人是离开军队后担任非重要文官职务的安克拉。

信任哈里立的恩克鲁玛在北京得知政变的消息后还说，“啊，哈里立一定会把一切镇压下去的。”<sup>②</sup>他估计错了，哈里立和科托卡、阿弗里法一样，早就是参与策划这次事件的领导人之一。在新的领导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安克拉，他是最后

<sup>①</sup> 《非洲论坛》，1968年，第二卷，第一期，第31—41页。

<sup>②</sup> 费尔斯特，《枪杆子》，第370页。

才参与这个事件的。安克拉是加族人，生于一九一五年，中学毕业后当教员。安克拉参加西非王国边防军后，经历了从入伍列兵晋升到将军的历程，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谈到，安克拉是加纳最能打仗和最顽强的士兵，在需要强攻的时候，他是非凡地坚决和果断的。<sup>①</sup>

除了恩克鲁玛的私人近卫军之外，谁也没有反抗。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党顷刻瓦解，国家和党的机关大部分负责人都立刻承认新政权。

殖民主义者训练出来的官员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刻也是同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不能保卫恩克鲁玛的政权。埃及进步杂志《先锋》周刊的编辑这样写道，在加纳，“国家机器依然操纵在反革命分子和殖民主义者的傀儡手里，殖民主义者培养这些人就是为了在加纳独立之后充当他的代理人。”<sup>②</sup>

恩克鲁玛也曾说过：“只要新政府取得政权，不论是和平的还是武装的革命，都应当撤换所有旧政权的主要官员。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教育了我，忽视这个问题就会给政府造成致命的结果……。”<sup>③</sup>恩克鲁玛已撤换了旧机构的高级官员，但问题是自己提拔的那些官员同过去的旧官僚相差无几，他们不是用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而是沾染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思想。

恩克鲁玛在回忆录中指出，高级官员很容易改变自己的

---

① 《民族》月刊，1966年3月21日，第320页。

②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7年，第一期，第18页。

③ 同上，第58页。



信念，能为任何制度服务，从殖民地制度一直到革命后的政权，后来他们又很快支持暴乱政权。“官员们经常怀念殖民地时代，那时候他们是高级阶层，被称为‘政治军官’，实际上操纵国家。他们之所以拥护军事政变，是因为他们相信，随着军事政权的建立，他们将成为真正的主人。”<sup>①</sup>

《游击队》杂志曾对加纳事件的评论如下：“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原因，是加纳的资产阶级没有消灭。在唯一的一个党内，他们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代表加纳的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经济权力，而且利用这一点保住了受到恩克鲁玛限制的政治权力，但暂时没有反击……。恩克鲁玛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必进行强制的改革，不要先锋队的党……不用发挥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巨大作用，不必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而且还给资产阶级过多的自由，恩克鲁玛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因为恩克鲁玛不赞成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力图摆脱他的统治。”<sup>②</sup>

《游击队》杂志是以极左观点而著称的，自然谈论恩克鲁玛的思想时未免过于夸张，情况未必是那么绝对。但是文章中指出的问题有重要意义，是否真的由于过分地放纵资产阶级而造成恩克鲁玛垮台的原因？

其他一些左翼作家也作过粗略的评论，同非洲进步知识分子接近的英国工党党员勃朗库埃在《论坛》周刊上写道，“恩克鲁玛的垮台是因为最后两年他脱离了人民，甚至脱离了他

<sup>①</sup> 恩克鲁玛，《加纳的黑暗时期》，第40页。

<sup>②</sup> 《游击队》杂志，1966年，5—6月，第29—30页。

的党。他的政策上的错误在于他未能把人民群众引导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要减少加纳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就要做必要的牺牲，增加税收，紧缩开支和限制进口。所有这一切，如果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抱有热情，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人民没有出现这样的热情，所以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愿望，人民不理解要作这样的牺牲。”<sup>①</sup>

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季贾尼·巴比克尔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开罗的讨论会上发言说：“处于慌乱中的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是抗拒不了国家政变发动者的。对于他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先锋党，恩克鲁玛企图把人民大会党变成先锋党的设想没有成功。在党的建设方面和工作中存在着很多缺点。当考验来临的时候，甚至于党员本身都不团结，没有起来保卫革命。”<sup>②</sup>

柳特费·霍利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这次政变必然发生的道理。他说：“党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党的领导人只是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以党和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影响为立足点，事实上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力量的源泉。党的影响主要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它未能深入到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去教育和发动群众，使他们投身到为真正的革命利益服务。”这里所说的党就是指加纳人民大会党。霍利还谈到，“表面上有一个庞大的革命机构，但内部空虚和缺乏效率，它没有实际效能，脱离群众，经不起真

---

① 《论坛》周刊，1967年2月24日。

②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7年，第一期，第59页。

正的考验。”<sup>①</sup>

左派人士是这样看的，至于反对派的看法（他们早就预言恩克鲁玛的制度要垮台，这个制度正在走向孤立），则认为政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恩克鲁玛的“暴政”和经济困难使他威信扫地。

如果要说到党的内在弱点和缺乏效率，作者在上面已经讲过，无需再作补充，但有一个问题还没有阐述清楚，即究竟哪些原因造成它的弱点，以及这些原因同《游击队》杂志所谈到的现象（维护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勃朗库埃、巴比克尔、霍利等人的一致看法都认为，恩克鲁玛未能建立一个依靠群众的具有革命思想的真正先锋党。显然，这都是互相联系的。但是作者们的这些解释还是不够充分。勃朗库埃认为，恩克鲁玛“缺乏明确的理想去说服人民认识到需要发挥热情和作出牺牲”。其实理想是有的，恩克鲁玛在他的讲话中多次讲到这一点。他真诚地希望鼓动起群众的热情，并依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许多上层领导作出了不好的榜样，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革命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民族的人民比加纳人遭受的苦难深沉得多，但是他们以真诚的热忱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跟随领导人，因为信任他，思想上忠于自己的领袖。在加纳就缺乏这样一点，因为没有使人民得以产生这种信任的必要条件，即使人民相信，所有的领导人自己首先要信守自己的

---

<sup>①</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9年，第一期，第17—18页。

诺言和提出的口号，和人民同甘共苦，准备分担艰难和困苦，特别是关心老百姓的需要和痛苦。资产阶级自然可以独立地尽力“做生意”，这是在过去他们受外国资本欺凌时所不能办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在非洲社会的条件下力量并不是很强大的，影响也不大，经济上并不发达，仍然依赖原宗主国，实际上照旧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企业家在政治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然而那部分在国家和党的机构里享有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却拥有巨大的能量。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很大，在落后的国家里便可以形成一个一小撮人的独立王国，从而打开缺口，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

但这时，那些被建设新的正义社会的口号所引诱的群众就会感到绝望和受骗。于是，群众和领导阶层之间就产生了“信任危机”。社会不平等的情景使得所有的口号和纲领都失去国内人民的信任。热情消失了，信誉破坏了，群众处于被动状态，根本谈不上为未来而自愿牺牲和勤奋劳动，因为人们看到各种负担太不公平了，所有的重担和苦难都落在普通人身上。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斥责领导干部只顾追求个人幸福，几内亚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说还不是比加纳更坏，那至少也是一样。在坦桑尼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的一位记者写道：尼雷尔一九六七年初巡视了全国，了解到“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从外国公司的经理那里得到很多的钱，这些外国人花钱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高职位的非洲人的庇护，他还看到其他一部分领导人建造房子，然后以高价出租。接着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大部分领导人拥有豪华的汽车，在

人民中间流传着一个关于‘瓦宾采’阶级(麦尔谢杰斯·宾茨之流)的悲剧。”<sup>①</sup>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尼雷尔为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举起“阿鲁沙”纲领的旗帜,开展了反对物质特权的运动,成立了“绿卫军”。塞古·杜尔有力地打击了已出现的这个上层阶级。但是恩克鲁玛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把贪污最多的官员撤了职,但是这些人又安排了别的岗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全国的气氛实际上已被资本主义思想所浸透,外国资本家的活动得到充分的鼓励,实际上产生了新的买办阶级,本国的大企业主便活跃起来,发财致富。激进纲领和进步口号的薄雾遮盖不住私有观念勃发的社会。这样的气氛感染和腐蚀了新一代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

恩克鲁玛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同样也是容易理解和解释的,他本人无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他鼓励外国和本国资本,仅仅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对于发展加纳的生产力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他知道没有私人资本,对于落后和贫穷的国家来说,就不能建立发达的经济和实现工业化,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克鲁玛认为,领导机关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党手里,并且有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有害影响是能够战胜的。

这样一些想法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里,要立即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国家力量,首

---

<sup>①</sup> 《经济学家》周刊,1967年2月13日。

先改造经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利用和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那是一定要失败的。无论是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私有部分，尽管他们经济水平的起点远比今天的一些年青亚非国家要高得多。从人的因素角度看，必需有一个有觉悟的并能够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真正革命党。这样的党在俄国革命前已经建立，而且实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也不能把它解散。这样的党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依然存在；私有经济部分即使在某些国家里其能量还比较大，也不会脱离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问题的核心在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党是要由克服了私有观念及剥削思想和不追求发财致富的新型的人来组成，这些人还应当 在革命教育和斗争的过程中经受思想锻炼，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为了顺利地进行革命，在解放了的国家中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新型的人，对于这一点，许多革命的领导人都是懂得的。例如，塞古·杜尔讲过：“把旧人改造成新人是一种思想和政治方法上的变化，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精神境界，并要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每一个人。”<sup>①</sup>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从何下手，谁是教育的对象，以及由谁来教育？

在大多数热带非洲国家里，执政党的骨干都是受过欧洲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习惯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多数情况下，钻到领导岗位的人都是受过殖民主义者的思想训练，被作为“第五纵队”使用的新殖民主义的传播者。即使党的领导思想上都是对社会主义有深厚感情的非常忠实

---

<sup>①</sup> 塞古·杜尔，《几内亚的革命和反帝斗争》，《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7年，第四期，第54页。

的人，那也很难把那些“西方化”的骨干分子教育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些骨干分子去接近群众，作为群众的榜样，并且由他们担负直接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任  
务。

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采纳的无疑是关于必须鼓励私有者的积极性才有利于国家发展等一类意见，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范围。还没有真正用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而且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火车头的国家机器，就会又快又容易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在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就会形成特殊形式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也就是塞古·杜尔所说的那个阶级，这个阶级考虑的是别墅和汽车，这也就是所谓“麦尔谢杰斯·宾茨之流”。如果对这些不及时制裁，不加以清洗，如果不采取真正强有力的措施在全国造成新的气氛，不从人民中间去发现和发动新人，那么这个制度就将是非常脆弱，那只要很少一点士兵就足以把它推翻。在加纳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政变就一定不可避免？看来也不是的。没有一个原因能够证明政变不可避免，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

就生活水平而言，如果同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加纳是相当好的，国民收入高于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供应的困难，必需品价格的上涨确实引起群众的不满，但还远远不致于造成群众性的反政府的示威。

所有这一切还只能是为政变准备条件，只能鼓励政变策划者的勇气，为他们企图推翻国家的制度消除阻力，创造一个

使群众对政变采取漠不关心和处于被动状态的社会背景。但是如果军官集团不想推翻恩克鲁玛，那毫无疑问，恩克鲁玛仍会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上面已经提到，进行这次政变的力量是很小的，这是否意味着科托卡上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成功？看来不是的。这里有一个未遂政变的例子，即加纳政变一年多之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一些年青军官又想夺取政权，他们想杀害科托卡，并在几小时内控制电台，但他们的打算遭到了失败。这次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整个军队并不支持他们。发动这次政变的仅仅是一个团，其他部队的指挥官仍忠于安克拉将军，力量的优势立即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但是这些指挥官如果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也保持对恩克鲁玛的忠诚，那么毫无疑问，科托卡指挥的一个旅也会遭到失败。加纳、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证明，要取得军事政变的胜利，单由某个个别部队出动，甚至即使控制了首都，并在广播中宣布夺得了政权，也还是不行的。而必须是各军种的指挥官或者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站到政变者方面，无论何时必须得到最关键的卫戍部队和指挥主要武装力量的联合兵团的支持，这些指挥官必须洞悉政变策划的经过，表示赞成或支持，这样才能使政变顺利进行。

推翻政府的想法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担任关键职位的大多数军官中酝酿成熟，但是政变的起因并不是首先萌芽于军队，而是开始于社会舆论界。

对于科托卡、安克拉和其他准备发动政变的人来说，所谓社会舆论，首先是在精神和思想方法上同自己属于同一类型



那些人的意见，也就是中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这些人是黄金海岸联合大会党的核心，他们因为受到恩克鲁玛本人和恩克鲁玛的追随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激进派）的排挤。主张政变的第二种人是从殖民主义学校中培养出来的“旧官吏”，这些人虽然也在恩克鲁玛的领导下任职，但是对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纲领深怀惧怕。支持政变的第三种人便是大资产阶级，这些人尽管生活得不坏，但是不满政权集中在党的领导手里。正是这个阶层对推翻恩克鲁玛最感兴趣，政变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

《青年非洲》杂志对于加纳的政变结果有过这样一段述评：“胜利者是旧的上流社会，因为这些人的理想曾经被恩克鲁玛的地位上升所扑灭”。《青年非洲》还指出，新政权的特征是，“确定全国解放委员会方向的特别政治委员会是由旧上层阶级组成的，法院的权力同样掌握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就占据这些职位的那些官员手里。他们的同事在行政管理机关里拥有从恩克鲁玛那里夺得的权势。”<sup>①</sup>

但是如果不是普遍的失望、冷淡和不满，光是这批人的舆论是否就足以激起军官们反对恩克鲁玛呢？这也是令人怀疑的。亲西方的那些旧的上层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恩克鲁玛，政变为什么不发生在一九六一年，而在一九六六年，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的。所有处于关键岗位的军官和警官都团结一致，反对恩克鲁玛，或在政变发生后表态支持政变，这种事实就可以肯定制度本身已经得不到群众必要的信任和支持。之所以

---

<sup>①</sup> 《青年非洲》周刊，1967年3月15日。

失去这种信任和支持，那是由于恩克鲁玛政府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各种缺点及错误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因此，我可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问题并不在于军队怎么样（尽管可以一再重复说，如果不是那些最反对政府的军官发难，恩克鲁玛会终身掌权），而是在于总的经济和政治气候，使国内存在着有利于政变的客观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政府的行动往往是由几个军官就可以发动，而且他们的个人意志还得以实现。

在解释加纳事件时，有一种说法犯了原则错误，似乎没有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以免除不发生政变，好象随时都有可能由某个对制度不满的军官集团来发动。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这样的集团到处都会有，但是他们的行动要获得成功，必须得到处于关键岗位的主要军官的积极协助或至少勉强支持，而且这首先是整个制度威信下降的结果。

这里可以顺便插一句，即使恩克鲁玛能够及时把安克拉以及所有危险的军官安然从军队中清除出去，但也很难保证他就得以避免军事政变的危险。起来反对他的，还可能有“新一代”的军官，这些人在观点上同旧的上层阶级虽没有共同点，但对恩克鲁玛的统治也怀有某种不满。

恩克鲁玛早在政变前政治上就已失败了，政变只是把这种失败公开暴露出来。

恩克鲁玛的倒台表明，特别是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刺激的关系是多么重要。恩克鲁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方面。对于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困难都不可避免地会在重建落后的殖民地

国家过程中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经济落后，同时也是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要很快摆脱这种依赖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人民如何对待这些困难，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人民去克服困难，这就涉及到要进行思想教育和发展经济。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马里的莫迪博·凯塔总统领导的进步政权也被推翻。马里的很多情况同上述加纳恩克鲁玛统治时期是类似的。下面可以看一看波兰的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帕谢尔宾斯基是怎样分析马里的政变的先决条件的。

“每次激进的改革都赢得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保守分子强烈的反对……，莫迪博·凯塔的政策还遭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上层分子的抵制，他们的活动日益集中于对付国家。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和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考虑欠周，助长了右翼反对派的气焰，他们攻击的借口是国家不断地进行导致亏损的投资，以及对待小商人的政策不够灵活（一九六五年的情况最为严厉，严格规定商人的活动，以便取缔妨碍经济生活的分子）。①

凯塔一面同贪污作斗争，一面清党，没收了由国家配给官员们的一百六十八辆汽车，由于舞弊被控而撤职和关进监狱的人达一百七十五名。一九六八年二月，凯塔解散了国民议会，实行法治，但是人们的不满情绪起来了，包括军官们在内，都反对过火行为，他们感到军队也受到总统的监督。由于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最后在穆萨·特拉奥雷的领导下，军人

---

① 《政治周刊》，1968年11月30日。

集团便推翻了凯塔的制度。下面帕谢尔宾斯基是这样描写这次政变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A. 苏马雷将军’号军舰靠岸，人群热烈欢迎总统。莫迪博·凯塔带着倦意同妻子一起坐进汽车，向首都进发。但总统的车队行驶十公里之后，就被身穿带斑点短上衣的年青士兵拦住，三十岁的中尉特基耶科拉·巴加约戈走到黑色轿车旁边，敬了个礼，然后说：‘总统先生，你是否愿意听从部队的发落？’受惊的莫迪博·凯塔没有表示反抗，默默地坐在装甲车上，一路纵队又继续开向巴马科，在这里政权已被穿亮光淡咖啡色军服的军官夺取了。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掌握了全国的政权，由三十二岁的穆萨·特拉奥雷中尉领导，特拉奥雷以举止优雅而著称，他是一个博学多才和稳重的军官。”<sup>①</sup>

政变之后五年，穆萨·特拉奥雷在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解释过他决定发动政变的原因，“不但是国家经济濒于彻底破产，财政状况极端恶化，而且还加上蛮横和残酷的‘民警’天天在那里敲诈勒索，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实验失败（如施行集体经济），以及营私舞弊和分裂群众等等引起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制止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一句话，就是要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这样的任务自然就只有落到军队肩上……。”<sup>②</sup>

在热带非洲，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被军人推翻的三个国家的政权，便是乌干达的密尔顿·奥博特政府。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伊迪·阿明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掌握

<sup>①</sup> 《政治周刊》，1974年1月19日。

<sup>②</sup> 《青年非洲》周刊，1973年3月17日。

了乌干达的政权。

乌干达和加纳、马里不同的是，它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没有真正地表现出来，但是奥博特的总的反帝方针和他左的倾向是无可怀疑的。奥博特统治的十五个月内，曾经发表了一个名为“普通人宪章”的文件，规定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向左的方向转变。之所以会有这次政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上，就是因为国家开始了向左的转变。

政变前，乌干达的军队在各方面都是社会的特权阶层，经济上受到优待。一九六四年暴乱后，三个东非国家的军队实际上进行了重建。肯尼亚政府决定建立高度职业化的美国式军队，由英国培养的和不过问政治的军官指挥。政府就不会再受到这样的军队的威胁，因为肯尼亚同加纳或坦桑尼亚不同的是它没有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国家制度维持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军官们用不着担心政府会采纳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用民兵来代替军队。换句话说，肯尼亚政权的性质和军队的性质正相符合，同我们在加纳看到的情况正相反。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和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奉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对待军队的政策正好相反。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监督，武装力量“政治化”的原则真正地付诸实施，军队的干部由坦噶尼喀非洲联盟领导的青年联盟选派。因此，坦桑尼亚的军队同几内亚和刚果的军队属同一类型。

乌干达既不象这个，也不象那个，奥博特领导下的政权在某种程度趋向左的方向，但军队则属于资产阶级保守派的职业团体。乌干达的情况类似加纳。政权和军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一九六四年暴乱之后，奥博特采取安抚军队的方针，为了消除军官的不满，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所有的军官都完全是非洲人。大大增加军人的薪金，特别是中士的薪金。乌干达中士的收入比马拉维多一倍，一年比肯尼亚多二百法郎。赞比亚士兵的薪金一年是一百八十法郎，马拉维一百零八法郎，肯尼亚一百二十九法郎，乌干达是二百八十五法郎（一九六七年的资料）。<sup>①</sup>普通士兵的薪金相当于普通居民的十五至三十倍。一个普通居民的收入一年尚不到二十法郎。而且军人还有住宅、供应、医疗和其他各方面的优待。同农民相比，士兵和中士已属于富裕和享有特权的人，更不用说是军官了。农民是奥博特政权的支柱，为了他们的利益，奥博特制定了“普通人宪章”。但社会对抗依然存在。

奥博特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想把军队逐步引向“善良”的道路，所以给他们以物质上的优待，企图以此来打消军人对他的政策的干预，这实质上是想赎买军人。

一九六八年，坦桑尼亚的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8%，肯尼亚6.9%，乌干达10.2%。乌干达一九六八年的军费总额达到一千七百万美元，这几乎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总和。<sup>②</sup>

“普通人宪章”的公布，无疑是表明奥博特总统想结束社会内部不合理的分配。奥博特本来就是尼雷尔的朋友和信徒，不断受到尼雷尔思想的影响，向左的方面发展，学“坦桑尼亚的模式”，不可避免地迟早要按坦桑尼亚的样子来改变军队，建立“政治化”的人民武装力量。在这种新型的军队中，不

<sup>①</sup> 《现代非洲研究》季刊，1972年，第十卷，第一期，第22页。

<sup>②</sup> 同上，第七期，第24页。

可能再保留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让他们享受超高工资，武装力量的某些个别成员还会遭到激进的清洗。看来乌干达的许多军官都十分担心自己的前途，这不是简单的思想倾向问题，而是涉及到他们的特权、职业，必不可少的面包。

军官们的担心之所以越来越大，还由于奥博特已经开始建立忠于他个人的“特权阶层内部的特权阶层”，即某种程度上类似加纳的总统近卫团，其正式名称为“特种部队”（约一百人，不包括在军队总数的约七千五百人中）。“特种部队”在薪金和武器方面都享有特别待遇，从而引起正规军的憎恨。最后奥博特建立了一个半军事组织“公共服务支队”，即一种他个人的秘密警察，其成员不穿军服，如预想的那样，有自己完整的情报网。这同样是为了监视军官的。

有反对情绪的军官意识到总司令阿明将军可以当自己的首领。阿明是个职业军人，受过英国军队的传统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缅甸作过战，后来又参加英国军队同肯尼亚的茅茅起义者作战。一九六四年，阿明在以色列学习跳伞；一九六七年，任总司令。奥博特最初显然是信任他的，后来开始限制他的权力。奥博特在军队中设立了陆军和空军参谋长的新职。阿明根据这些情况，认为总统下一步将撤掉他总司令的职务。于是，他乘总统不在，便发动了政变。这完全和加纳一样，奥博特当时在新加坡参加英联邦国家会议。当他得到消息时，乌干达的政权已经掌握在军人手里。

实际上没有反抗，奥博特的党——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是软弱而不起作用的；有人曾经这样描写过这个党，说它是“各地方组织或地方政治团体的联盟，而这个联盟中的每个组织

或团体都代表一个政治集团……。”<sup>①</sup>在总统家乡朗果州共三十多万人口，其中有两千党员。正当奥博特准备对党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革时，军人们便下决心加紧策划政变。严重的经济困难，贫富不均和贪污成风引起各阶层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推翻奥博特政权创造了条件。

据美国研究工作者洛弗奇的看法，政变的结果，乌干达政权的性质是属于军人上层集团、高级官僚及布露迪地区的大咖啡业主的联合执政。<sup>②</sup>南非共产党的一家杂志《非洲共产主义者》指出，“所有受奥博特政策威胁的企业主都欢迎阿明的政变。”<sup>③</sup>

苏丹军队干预政治生活的特点，也是值得我们简略介绍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独立之后，这个十分落后的多民族农业大国的政权掌握在官僚阶级手里。这个官僚阶级同封建部族财阀、商业资产阶级、银行家、英国资本家都有联系。在苏丹，影响最大的是安萨尔和哈特米亚两个大教派，安萨尔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它代表的首先是封建部族上层集团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哈特米亚教派，同样有它的支柱，即第二大党民族联合党。这两个“传统保守”的党在伊斯梅尔·阿扎里的领导下组成第一个联盟。但是由于民族联合党的分裂，又分出人民民主党，出现了第一次政治危机，阿扎里的联盟垮台。国民党和人民民主党组成新联盟。一九五六

① 《现代非洲研究》，1972年，第十卷，第一期，第31页。

② 同上，第19页。

③ 《非洲共产主义者》季刊，1973年，第三期。



六号  
亥  
月

年七月，国民党总书记、退休的陆军准将阿卜杜勒·哈利勒组成新政府。随后的两年，国家经济状况越来越坏，生活水平下降，由于棉花出口减少，发生了灾难性的收入紧缩，失业人数增加，社会贫富差别的矛盾尖锐化，贪污丑闻增多。工会和大学生都激烈反对软弱无力但又凶残可恶的政府。

苏联的研究工作者格里亚杜诺夫曾经断定，“对阿卜杜勒·哈利勒政府的不满将于一九五八年秋达到顶点……，在国民党和安萨尔教派的领导下，构划出政变的设想，并要通过这次政变消灭他们的政敌，为国民党早就设想好的建立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总统（当然是国民党的代表）领导下的共和国扫清道路。”<sup>①</sup>

实际情况是哈利勒自己亲手把政权交给了以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为首的高级军官集团。这些高级军官认为，需要对脱离保守势力的反对派进行抑制的时候到来了。但是在这个集团中居领导地位的并不是阿布德，而是同哈利勒关系密切的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卜将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政变形式上是阿布德领导的，把阿布德称为领头人和总司令，实际上在国民党的官方出版物中都承认政变不过是形式，“主要是接收政权”。<sup>②</sup>哈利勒相信，暂时由同他的思想相近以及关系密切的军官掌握政权，以“维持秩序”，不会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安萨尔教派的领导人西迪克·阿卜达拉赫曼·马哈吉在政变两年后写道：“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军政府是过渡性的政府，这个政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

① 格里亚杜诺夫：《苏丹的新形势》，莫斯科出版，1969年，第58页。

② 同上，第59页。

---

就会交出政权，以便我们在健康的基础上管理国家。”<sup>①</sup>但是，军政权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军人通常是不愿为别人去火中取栗的。苏丹的将军们镇压左派力量，取缔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他们对政权感到“兴趣”。他们决定即使没有传统的“保守”党也行。将军们总是指望军政权应永久存在下去。

但实际结果完全是另一回事，军人不能解决摆在苏丹面前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下降，迫害和镇压反对派政治组织、军阀违法乱纪和横行霸道，所有这一切逐步形成苏丹人民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反对阿布德政权。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日益广泛和高涨，大学生骚动，工会日益强烈地要求改变军事专政。而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则企图利用军人来紧紧地扼杀左派力量，但没有得逞。麻木不仁和残暴成性的军事专政终于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所以在一九五九年，那些放肆的“保守”党领导人、首先是国民党人开始说服军人改变统治方法，让那些文职官员参与执掌政权。但是他们的打算没有成功。于是，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反对阵线终于成立，其中包括了从右到左，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各派力量。这标志着军政权的彻底孤立，开始了它的危机。

这个将军集团继续掌权三年多。到一九六四年秋，他们才彻底垮台，这证明同各方断绝了关系后就无能为力了。这个集团不仅表现出他们缺乏目标和主张，而且对付不了北方的民主运动和南方的起义者。将军们在自己的部队中也失去了

---

<sup>①</sup> 格里亚杜诺夫，《苏丹的新形势》，莫斯科出版，1969年，第65页。

威信。一九六四年十月，当警察镇压喀土穆大学的学生后，首都的知识分子便开始罢课，参加者还有广大的劳动群众，军队也出现分裂。十月二十六日，恩图曼的一部分军队在年青军官的指挥下，包围了政府大厦，要求阿布德同意解散被人民所痛恨的、统治国家达六年之久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军政权落得了可耻下场。阿布德本人仍担任国家领导人，但时间不长。十一月十五日，他企图在军队中“清洗”年青革命军官，但未能得逞，于是被迫辞职。

又过了将近五年，苏丹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从此国家的政治生活又回到以前的阿布德时期，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国民党又重新掌握领导权，似乎一切又回到旧的轨道。但是军队已经不是原来的情况了，英国“学校”中培养的旧保守领导在阿布德专政时期已失去信用，已不能恢复他们原来在军队中的地位，让位给了年青军官。这些年青军官也看到新的文官政府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便自己出来掌握政权。当时因为政府没有效率、贪污，一九六四年后主张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掌权者都失去了威信，特别是对南方问题束手无策，因而又发生另一次总危机。结果又是年青军官，其中特别是共产党人以及观点上同共产党接近的民主党人，代表了坚决主张社会变革的广泛社会阶层的愿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摧垮了濒于垮台的政权。

这是第二次苏丹军队反对文官政府，但同第一次有着原则区别。这次宣告了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参加政府的有共产党人。左派军官、政变的发动者在革命委员会中居重要地位，但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年青将领加法尔·尼迈里，由于他

在一九六四年推翻阿布德专制政权时革命立场坚定，所以在进步军人中赢得了威望。

尼迈里并不是以某种政治观点而出名的，但是左派力量考虑到革命后的进步改革需要他的全力支持。而结果如何，当然又是另一回事。经过不长的时间，共产党表现出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该党领导人是经过考验和有威信的古卜·杜勒·哈利克·马哈古卜，他同尼迈里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冷淡下来。实际上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很明显，如果真正建立政治组织，共产党便会成为核心，这不仅威胁那些表面上衰落实际上靠教派支持仍有不小影响的“保守”党，而且对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也很不利。尼迈里也逐步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同共产党领导之间的冲突不断加深，这种冲突在尼迈里主张苏丹加入阿拉伯共和国联盟时达到顶点。左派担心阿拉伯联盟具有反民主的民族主义性质。最后尼迈里把三名左派军官逐出革命委员会，这三名军官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便开始策划反对尼迈里的密谋。密谋策划者于一九七一年试图推翻尼迈里未遂，从而招来了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并在军队中清洗左派分子。军政权在这之后具有特别浓厚的保守色彩。

苏丹在十三年内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一九五八年，同地主资产阶级有血肉关系的、由英国人培养的保守将军取得文官政客自愿交出的政权，经过六年之后，把国家引入政治危机，面临破产，不能解决现实的各种问题。一九六四年，进步力量在年青的有激进思想的军人参加下，推翻了阿布德政权，并把权力转交给国务活动家，这些领导人未能使国家免于混

回到从前那种丧失威信的制度，控制一切的仍是教派和贪污行贿的政客，这些人中包括官僚、农村及部落的贵族和实业界。一九六九年，年青一代军官重新掌握政权，而且不再把权力让给“政治家”，但是被葬送于内部分裂。最后是一九七一年，左翼军人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在苏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客观上使军政权向右转。

军队继续统治着苏丹，在国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还远远不会结束。

近二十多年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发生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和找到一定的规律。

这些政变的社会政治内容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暂且不谈它们的差异，而先来研究其共同特点。整个军队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都有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同军队的性质和他们的实际行动没有关系。不论为谁服务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一样有官阶、军纪、宣誓、条令等等。军事政变可以说是一种带职业性的行为，是军队固有的特点。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为了谁的利益。

首先，我们来研究“典型”的军事政变，即部分军官在某个部队带动下发生的事变，目的在于推翻政府（这同整个军队在总司令的命令下发动的事变是不同的）。为使政变成功，军人的团结应达到怎样的程度呢？

政变策划者的处境通常总是困难的，一方面在策划过程中知道的人愈少愈安全，但另一方面只有在事件发生前答应支持的军人愈多，才愈容易实现和愈有成功的把握。

叙利亚、伊拉克、加纳和其他许多国家发生的多次反叛的

失败证明，要使军事政变获得成功，单是某一部分军人采取行动是不够的，甚至即使占领了首都，在广播中宣布夺得政权也还不行，而只有当各兵种的指挥官或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人数量最多的卫戍部队和掌握武装部队骨干力量的联合兵团的指挥官）都站在政变发动者一边，政变才能成功。要使这些人或是参与政变的策划，或是表示赞成，或是政变发动者有把握在政变发生后，能够使们给予支持。

为此，必须把推翻政府的设想，预先在大多数担任关键职务的军官中酝酿成熟。这是否普遍不满现政权的结果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些历史事例，埃及一九五二年、伊拉克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三年、也门一九六二年、巴基斯坦一九五八年、缅甸一九六二年、土耳其一九六〇年、苏丹一九五八年、尼日利亚一九六六年、叙利亚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都存在着对统治制度极端的不满，这种不满从对政府的失望发展到大规模的暴动，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能够通过政变去推翻，社会舆论不再支持它们，政变可望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赞成。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权仍掌握在拥有多数群众支持的政府手里，军队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政变（甚至即使有大部分军官的支持）。

这意味着政变条件的成熟并非取决于军队，而是取决于社会。也有另一种情况，条件即使已经成熟，但政府仍继续统治国家。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军队对舆论变化的反应非常敏锐。由于军事政变的成功

需要有大家的同情或得到担任关键职务的指挥官的默认，实际上就不可能发生某个贪功的将军不考虑形势的发展和社会舆论，一意孤行地夺取政权，从而导致其他军事长官不予支持而失败。可能有偶然发生的政变和冒险行动，但这不是寻常所见的。一定要让那些担任关键职务的军官对政权的更迭取得某种秘密的一致意见。密谋策划的水平越高，为进行政变提出的论据也越能使人信服，也更能使人相信政变会取得成功，从而得到人们的支持。尤其老的军事长官比年青人更加小心。年青军官失败后损失更大，地位也更无保障。但是年青军官通常不会不顾地位和生命去冒险，如果没有真正十分严重的原因，他们不会反对政府。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这些军官们认为，文官政府已经准备改组军队，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已经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那他们就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因为这时他们已经不再考虑会失去职位和搞坏他们同特权阶层的关系。

但是否可以认为，军人只从注意社会舆论方面来估量形势和决定“支持”或“反对”政变呢？首先应该说，是这样；但也不完全是这样。社会舆论对某种制度的不满通常是很混乱和模糊的，因为其中有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不满。例如，叙利亚的资产阶级和左派在一九六六年初都不满哈菲兹政权，但是这两者的愿望正好是相反的。卡塞姆在一九六三年初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但不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

如果政变策划者是革命的军人组织，那自然它听取的是左翼激进派方面的意见，如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几个国家就是那样。但如果政变不是由军队内部的政治组织发起的，而是

由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官发动的，由于这些高级军官一般都是受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保守思想所影响的，那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中等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意见，例如苏丹、巴基斯坦和加纳都是这样。

在多数情况下，政变发动者一般都是那些已经得到一定地位的人。譬如，拉丁美洲的政变发动者（特别近年来）通常都是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官，各军种和军区的司令员。各司令员采取的行动很快引起共鸣或是改变整个军队的力量对比，或是影响政府的人员成分和政策，从而带有“总体”军事政变的性质。武装力量采取的政治行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不管军队用那种形式干预政治，都是为了要夺取政权。

缅甸一九六二年、巴基斯坦一九五八年、印度尼西亚一九六五年、苏丹一九五八年、尼日利亚一九六六年、土耳其一九六〇年，军队夺取政权都是按照高级指挥官的命令进行的。伊拉克一九五八年的政变是直接由两个精锐旅的指挥官领导进行的。热带非洲许多国家的政变通常也都是由武装力量的指挥官领导的。但一九五二年埃及的政变是由中级军官发动的，然而这时纳赛尔和他的支持者也都已经出名，并在军队中享有威信。纳赛尔是军事学院的战术教官、巴勒斯坦战争中的英雄，埃及大多数军官都知道他。

美国学者尼德列尔用过一个名词叫做“巨人”，即能使天平向一边倾斜的人。为使政变获得成功，在最后关头必须有声望卓著的人参加。但往往有这样的反常现象，这种人同参与策划政变的其他人相比，他是很少了解军官们的真实动机的，所以他只能当虚有其名的首领，候补的国家首脑才是正式



首领。这样的巨人有：纳吉布、昂加尼阿、斯皮诺拉、阿杜马。

关于政变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国内对上层领导集团的亲帝国主义政策普遍不满；但在没有强大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情况下，这些领导集团不希望和不可能进行成熟的社会改革。这样的例子主要有埃及和伊拉克。

二、文官政府不能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造成经常的政治危机，国家无法从绝望中找到出路。

三、对上层集团的守旧和古老的专制制度不满（也门）。

四、文官统治全面没有效率，如行政机关贪污，群众对它冷淡和绝望，享有特权的上层集团在左派力量日益壮大面前感到恐惧（如巴基斯坦、土耳其、苏丹）。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将军夺权，成立“强权”政府，以维护原有制度的社会特征。

但光是这些还不足以使军队起来造反，多数情况是（特别在热带非洲），军官们感到了军队的自由受到威胁，有可能失去独立地位和享有的特权，才决定发动政变的。因此，政变的“客观背景”（上述四个原因之一或四个原因的总和）是可以找到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正是由于它的落后和为克服落后要经受的难以容忍的困难），往往会逐步产生各阶层群众的不满。

促成军事政变的因素又可归纳为：

一、失败的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的悲剧之后产生了精神上的严重危机，军队感到自己被文官政府出卖了，政权失去了威信。

二、无休止的国内战争，原来的政府对付不了这样的战

争(如缅甸)。

三、由于上述国家的政府对少数民族和其他起义者进行军事镇压,结果加强了军队的作用(伊拉克的军队曾对阿西里族、库尔德族和起义的农民进行军事镇压)。

四、“连锁反应”——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变影响到其他国家。

五、施行的“经济制度”造成财政困难,沉重打击了国家职员,引起工会的不满。

六、种族矛盾。

按照政变的性质分类,可归纳为下列两种:

一、整个军队遵照指挥官的命令夺取政权,政变带有武装力量采取行动的性質,虽然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性的。通常是军人服从命令,因为违抗就意味着破坏军纪。

二、部分军队在造反的军官集团的领导下发动政变,目的是推翻政府,撤换军事指挥官,因为原来的军事统帅忠于政府。从政府和军事指挥官的立场来看,这就是叛乱。军人支持这种政变(同第一种情况不同),便是破坏军纪,因而参加叛乱是冒生命危险的。可以想象纳赛尔、卡塞姆、萨利勒姆等的政变如果失败,将会如何。一九六七年加纳的政变失败后,肇事的军官遭到处决;一九六四年土耳其同样发生一次失败的政变,阿依捷米拉和古尔达纳上校被处死刑;还有其他例子都雄辩地说明,无论是反对政府或是反对高级指挥官都不会得到宽恕的。加纳的阿尔杜尔中尉由于发动政变,企图推翻民族解放委员会未遂,后来在处决前他在法庭上说:“要是政变成功,那么这个政变就是合法的,如果失败了,那么就是不合

法的。”事实上，早就有人说过：“叛乱不可能是成功的，否则它就不称为叛乱了。”但是参与攻打总统府的军官和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否会取得成功，同样也不知道是谁派他们去，为谁的利益服务。判决阿尔杜尔中尉因为叛变而处以死刑的法庭，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工具，而这个政府也是通过政变推翻了合法总统——恩克鲁玛建立的。如果阿尔杜尔胜利了，他也同样会领导新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毫无疑问会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包括判决他死刑的人在内。

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政变也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至于政治内容，那它同政变的方式没有关系。奈温、阿尤布·汗、阿布德、蒙博托、昂加尼阿，他们采取的行动几乎都是一样的形式，都是代表整个武装力量推翻文官统治的。

但即使都是建立军事首领的领导形式，那政变也会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不是抽象的。

发动政变的军事首领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殖民地学校培养的军官（阿布德、安克拉、伊龙西、索格洛、拉米扎纳等）。这类军官不会因某种原因去依靠某个左派的运动，他们代表保守势力，而且这类军官发动政变的所在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运动。政变是因为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政府机关没有效率而引起人民的极端不满，以及为了那些“被得罪”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同时也是为自己分一杯羹。他们发动政变还因为出现了爆发强大左翼运动的趋势（有时是很严重的），甚至可能造成革命的形势，危及军队的特权。这些保守军事官僚的代表没有社会纲领，也不依靠政治运动，他们的行动首先是为了本阶层，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国家向资本主义发

展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夺权（往往是先发制人）意味着是对那些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人的打击。

季贾尼·巴比克尔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开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的报告中说：“职位比较高的老一代军官都是直接由殖民主义教官培养出来的，或是在西方的军事院校中培训的。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标准和思想，而且由于自己的地位已经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都主张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那些在法国和英国军事学校中培养的军官，他们发动的军事政变多数是在热带非洲，有时还同帝国主义合作。

这种政变通常同社会革命毫不相干，相反，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那些真正要求变革的力量。所以埃及评论家艾哈迈德·比哈·阿丁把这样的政变称为反革命政变，其特点是：“它进行某些表面的人民赞成的改革（其真实目的是阻止真正的革命），收买人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sup>②</sup> 这些话虽写于一九五八年，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件同样证实了这种情况。

二、为了个人野心或某个军官派别（军事委员会）起来政变的造反军官，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改变现有制度，不如说是为了武装力量本身取得统治地位，向敌对的派别进行报复。在拉丁美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亚非地区，这类政变发生次数最多的是叙利亚。

---

<sup>①</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7年，第一期，第59页。

<sup>②</sup> 艾哈迈德·比哈·阿丁，《军事政变时代》，《鲁兹·优素福》周刊，1958年2月24日，第10页。

这些冒险的军官有时被某个政治派利用，借他们的野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叙利亚的军官库兹巴里（一九六一年分裂主义政变首领）、哈里里（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政变首领，政权交给了右翼复兴社会党）、哈托姆（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政权交给了左翼复兴社会党），不久哈托姆又同新的叙利亚首领决裂，并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后逃奔约旦，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略期间返国，被逮捕处决。

三、企图获得独裁地位的造反军官。这些人原则上是属于上述军官的同一类型，但是野心更大，是当地的“拿破仑”，这些人缺乏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信念，不能领导社会运动和政党。属于这种类型的有伊拉克的卡塞姆、玻利维亚的巴里恩托斯等。这些人在革命运动的浪潮中总是追求地位，具有非凡的蛊惑人心的能力。

四、过渡型的或混合型的骨干军官，这些人具有上述各类的特点，同时还有下述第六类型的某些特点。这些军官都是旧学校里培养的，发动政变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军官团体的利益，也不但按军阶的“授权”行动，而且极力为自己争权，特别重要的是，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尽管这样的纲领仍没有超出保守的资产阶级一系列决议的框框，但已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成分。重视资产阶级的传统，一定限度内保留了传统的民主形式。阿尤布·汗便是这种类型的军事首领。

五、新产生的“政治军官”，这类军官多数是在消灭了殖民主义统治后建立的新型军队中出现的。他们与上述几种类

型的军官相比，在观点上比较符合时代，认识到不能让过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保持不变，要求取缔这种经济结构，尽管他们还没有打算要同左派力量合作。他们也懂得群众的作用，力图依靠群众运动，领导政党，提高那些内心不满和“空虚”的人的地位。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临时的“新制度”——具有一定社会目标和意识形态的制度（民族主义是它的基石）。这个制度的特点在于它不同于帝王的专制制度或一般的普通制度，也就是说它要让群众绕过“政治组织”直接上诉。

六、带肩章的革命民主派。包括纳赛尔（已故）、奈温、现在的叙利亚军事首领和布迈丁。

当然，这一类是最标准的，但各类之间的界线也不是很固定的。

要是说到军事首领和他们所发动的政变，需要再次着重指出，他们的成败都取决于国内的整个社会气氛。

军队不是非阶级或超阶级的力量，埃及、伊拉克或缅甸的军队在革命前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军队是同社会有联系的，所谓国家军队主要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在国家危机深化、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它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军人的意识中深藏着变化的过程，认识向两方面分化。军人的头脑里首先产生对革命的认识，即掌握革命的思想，从而开始准备政变。表面上仍是原来的特权阶级上层集团的工具，然而其内部已经有了反对派，并为了民族的利益准备抛弃誓言。无论是埃及或伊拉克的政变，严格地说都不是由将军们领导的军队发动的，而是军队内部的革命组织发动的，这种革命组织取代了原来

的军事指挥官。只有缅甸是另一回事，夺取政权是军队根据总司令的命令进行的。但是前面已经讲过，奈温最初的职业不是军人，而是革命干部，同时缅甸军队本身是在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革命军队。

但是在埃及和伊拉克，军队内部的革命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轻易地获得胜利，夺取政权，那是因为它在整个军队中有政治觉悟的先锋队。是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得那些没有参加政变密谋和不知道要进行政变的军官很快就同起义者联合？是什么东西迫使军区和地方军的指挥官不再支持他们曾经宣誓要保卫的王国，而支持革命者？而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指挥官的支持，政变是一定要失败的，即使占领了首都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很多次这样的例子，甚至已经夺取了首都，结果还是失败，其原因就是其他军区和地方军的指挥官拒绝支持起义者。因此回答只有一个，革命的思想在军人的头脑中成熟了，除了极少数高级将领之外，在整个军队中也都成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敢于冒险、并能把其他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先锋队通常是会产生的。这里指的是由革命的军人组织发动和得到全军支持的政变，这样的政变必然违背一小撮将军的意志，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同王国的存在联系在一起。

在结束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再简要地研究一下军事政变的技术。

政变一般都是以同一方式进行的。政变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是(纯技术上的安排)政变组织者掌握了主力部队、成

---

功地选择时机、策略上采取突然袭击、行动速决和果断、准备造反的组织都要吸收地方军区关键部队的指挥官参加。

主力部队通常都是由武装部队上层集团掌握的。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多数情况是数量不多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点，也就是人数不多，但素质精锐，具有很高的战斗力，是训练有素的“上层集团的”师团。通常是伞兵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印度尼西亚，就是“西里万吉”师和特种伞兵师，以及战略后备部队）。如果这些部队都参加政变，那就有百分之九十成功的把握。在老挝，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只用了一个主力营就夺得了政权，另一方面，反对西贡吴庭艳的第一次政变就遭到了失败，因为坦克部队站在当权者一边。

政变时间一般都选在拂晓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希望出其不意地占领政权机关外，主要考虑的一点是，这个时候街上比较空闲，有利于部队行动。要是冲击总统府的坦克阻塞在街上就会引为笑柄，损害政变的声誉。

政变的日子通常都选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以便于采取突然袭击和取得政权，因为这两个日子多数官员都离开首都去休假。

有时候还故意耍手腕，把政府的注意力引开，麻痹它或弄得它摸不着头脑。譬如阿尔及利亚，一九六五年政变前，军队集结到首都也是借口看一部专门的军事影片和筹备亚非会议。南越准备推翻吴庭艳的肇事者散布流言欺骗他，说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游行就将发生，以此为借口被得到允许把军队集结到首都。在伊拉克，卡塞姆和阿里夫利用了部队将要调往约旦的机会，领到了枪枝和弹药，由于政府害怕军队，这些武器



平常是不发给军队的，后来他们改变去约旦的路线，而把部队开往巴格达。

政变者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占领首都的关键部门，如国家首脑的官邸、国防部或参谋部、电台和机场。

总统卫队的抵抗通常都得用火力加以歼灭（多数政变只有在这时才流血）。在这之后，总统才感到他是失败了；联系被切断了（这是政变所必须的），等待援助的希望也破灭了。为保证政变完全成功，政变发动者（特别在那些同原宗主国有条约关系的非洲国家）要逮捕各部部长。在加蓬，当正要把总统姆巴推翻时，错放了一名部长，结果造成了政变的失败。这名部长利用自己的权力，求助于法国，法国伞兵解救了被捕的总统，很快镇压了起义者。

政变后都要宣布进入军事管制状态，或甚至实行戒严，有时还暂时停止同国外的空中联系，在某种情况下包括电报联系。政变后一定要做的事情是，政变领导人发表广播演说或发布夺权公告，广播演说的内容是对已推翻的制度进行指控，号召人民团结在军队的周围，说明军队夺权完全是为了对国家的利益负责。

如果在政变过程中，军区和地方部队各军种的指挥官都纷纷宣布支持新政权，那就意味着政变获得成功。也就是说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远不是最困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

### 第三章 军人执政

军人掌权后做些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从埃及谈起。埃及的民族主义军官在全国总形势的影响下树立了革命观点，经常同各种政治组织接触，倾听爱国社会人士的意见。

这些爱国社会人士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安瓦尔·萨达特对这一点也确认无疑，他写道：“青年大学生完成了思想革命，这个革命走在我们政治革命的前面。”<sup>①</sup>

但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纲领。这些爱国者考虑的只是推翻独裁的君主制度，赶走英国人，伸张社会正义（这是非常模糊和不具体的）。这种模糊的不满情绪，同样反映在“自由军官”的行动中。没有任何纲领，没有任何主张，革命之后究竟做什么，没有一定的主见。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是谁也没有获得可供借鉴的纲领。哈立德·毛希丁对此作过这样的阐述：“当革命发生后，人民群众不再相信以前的领导、原来的立宪组织和政治组织。但是革命的领导既没有一定的纲领，也没有明确的要求，亦缺乏能够表达人民群众真正意志的有组织的运动，而只是提出了各派和各界人士都能接受的、没有任何社会内容的、非常一般的口号：团结、遵守秩序和劳动。”<sup>②</sup>

<sup>①</sup> 安瓦尔·萨达特，《尼罗河畔的叛乱》，第122页。

<sup>②</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38页。

纳赛尔曾回忆说，他在革命前“想象的是全民族都在准备行动，他们只等待有个起义先锋，猛攻外部的堡垒，以冲开牢固的方阵，使大家有充分信心去实现伟大的目标。我想，我们是一个突击小队和开路先锋，我们只要在前面领导几小时，团结一致的群众将很快跟上我们。先锋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攻克了暴政的堡垒，它迫使法鲁克退位，它继续坚守既得的阵地，以等待群众组织起来完成最后任务。它等了又等，在它面前出现过一群群的人，但实际同理想的差距是如此的遥远！在这些人群中都是些互不一致的支持者，还有过去留下的人。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被堵住了，先锋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实际上只是刚刚开始。”<sup>①</sup>

革命胜利时，这“无数的人群”中究竟包括哪些人呢？当然首先是华夫脱党。纳哈斯·巴什及其追随者都认为这些政治上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军官一定会把政权交给民族运动的体现者“伟大的党”。他们觉得原来已被动摇的威信现在又重新提高了，正是由于革命胜利前半年国王停止了华夫脱政府的活动，纳哈斯现在可以把自己描绘成君主专制的牺牲品。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中也有人主张把政权转给华夫脱党，自然是要在军人监督的前提下。另一部人则主张解散一切政党，甚至拟好了有关这个动议的决议，但纳赛尔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朋友们，我担心的是这样的决议会被人抓住辫子，说我们要搞独裁……。我们的革命是民主的革命，我们不能建立专制制度。我们要让各政党和组织清理其内部，制定

---

<sup>①</sup> 纳赛尔：《革命哲学》，第19页。

其纲领和目标来适应新的情况……”<sup>①</sup>

纳赛尔的主张没有得到革命指导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支持，于是他宣布决定辞职，并退出这个委员会。这样，纳赛尔才迫使委员会接受其观点。

这是纳赛尔“沉迷于立宪幻想”的时期，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毫不隐讳，并自我批评说：“我过去竟是如此的信奉民主和党派制度，以致要为其退出革命指导委员会。但是现在我懂得了在今天阿拉伯民族同外国作斗争的时期，各种政党是可被人收买的……”

革命指导委员会决定清理各政党，并规定最迟不得超过一九五三年二月，以进行选举。各政党的清理必须由它们的领导自己来进行。当然这种清理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各党的领导人很少愿意“清除”自己的人，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在这些党的首领身上存在着旧制度各种毛病的恶习。为了答复“清理”的要求，纳哈斯组织了华夫脱的青年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并高呼口号：“没有纳哈斯就没有华夫脱党！”。很快就清楚了，要地主资产阶级的党“自己清理”，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主要问题还在于这些党如何对待土地改革，在埃及的所有国内问题中，这是最迫切和最紧急的事情。当民族主义军官还在服役的时候，他们每天同农民出身的士兵接触，得到了对农村情况的深刻印象，认识到埃及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它要做的是必须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军官们懂得虽然政变几乎没有遇到

---

<sup>①</sup> 沙菲：《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178页。

反抗，但被他们打击的不仅是国王和国王身边的奸党，而且包括同王室有联系的整个上层阶级和世界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这个拥有巨大财富和政治经验，并有国际联系的上层阶级不会容许侵害他们在埃及的独霸统治。他们从第一次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一定会开始反对革命。因而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保证新政权的安全，削弱正在扩展中的反革命势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破坏它的经济实力根基，即剥夺它占有的土地。所以土地改革理所当然地是消灭大地主阶级势力、保卫七月二十三日革命成果必不可少的措施。

旧制度的党究竟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由于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坚决要求，华夫脱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党的机关报《埃尔·米斯尔》上公布了自己的土地纲要，用的标题是：“大土地占有者的进步税额”。纲要中只谈关于土地税问题，而根本不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样的党还能够等待它做什么呢，该党总书记西拉克·埃德金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声称“我们对国家土地的公平分配感到满意”，避而不谈任何别的形式土地所有制。<sup>①</sup>

“库特里亚·华夫脱”党（当时从华夫脱分裂出去的一个集团）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建议它发布的纲领中同样不谈土地问题。自由宪宪党的纲领只谈到把国家的土地交给农民，该党主席侯赛因·海卡尔竟直截了当地宣称，“限制私有制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这样做显然会引起阶级之间的战争。”萨丁党也采取一模一样的立场。<sup>②</sup>

<sup>①</sup> 拉格尔，《变化中的中东》，第 89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86—87 页。

最后，阿里·马赫尔总理本人实际上也反对土地改革（马赫尔是老练的反动政客，由革命首领委派他当了政府首脑。之所以让他当总理，看来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能够有效运转，使得官僚机构得以稳定，同样也是为了使英国人放心，并且也便于革命指导委员会在革命后的初期当发现情况严重时，能够进行武装干涉）。他宣称不希望国家遭到经济混乱的危险。阿里·马赫尔的态度使革命指导委员会不得不一九五二年九月撤掉他的总理职务，由纳吉布继任。<sup>①</sup>

纳赛尔力图使这些党同意进行土地改革，他会见了华夫脱党的总书记西拉克·埃德金，同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四小时。为了革命指导委员会能同华夫脱党合作，纳赛尔提出一个条件，要华夫脱党庄严声明它同意限制土地私有制。但这一切都白费，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象要说服罗马教皇去信仰伊斯兰教一样困难。安瓦尔·萨达特曾写道：“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最后相信，使这些政客同革命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sup>②</sup>

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公布了第一百七十八号土地改革法。规定一个私有者的土地最多不得超过二百费丹（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父亲允许再增加一百费丹），并答应给地主以补偿费（没有支付这笔补偿费）。没收的土地划分成地段分配给农民，每一段不超过五费丹，支付赎金的期限为三十年。

总之，革命指导委员会坚决反对那些不同意改革的人提

<sup>①</sup> 拉格尔，《变化中的中东》，第88页。

<sup>②</sup> 沙菲，《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179页。

出的关于只纳进步税而不重新分配私有土地的一切建议。这是因为“这种方法不能消除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的弊病”。<sup>①</sup>这是个政治问题，因为保留大量的土地私有，意味着保护封建地主贵族阶级的雄厚政治基础。这是军队所不能允许的。

土地改革无可挽回地削弱了旧埃及势力最大的阶级的地位，而把埃及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农民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方面。而且这场革命立即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莫希·埃德金写道：“土地改革法对于人民的生活以及革命的命运可能起了最大的作用。它解放了农民，使他们成为站在革命方面的一支政治力量。”<sup>②</sup>

接着又公布另一项法律，规定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最多不得超过六个公司，凡是掌权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再兼任另一个公司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个银行的经理不得在另一银行中兼职。年龄超过六十岁的人未得部长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再担任公司经理职务。沙菲写道：“由于这些法令，埃及免去了四百多个老头子的总管职务，这些人在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中已经任职几十年。”<sup>③</sup>实际上是把埃及的大资产阶级官僚和资产阶级大老板逐出了政治舞台。

一九五二年八月，颁布职称和封号的法律，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对背叛者进行审判。旧制度的许多著名人物受到革命的审判。如西拉克·埃德金被判服苦役。要评价这事件的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74页。

②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39页。

③ 沙菲，《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186页。

正义性，应当想到此人是华夫脱党的总书记，最后一届华夫脱政府的内政部长，是埃及最大的地主之一，也是开罗银行的创始人。

华夫脱集团也懂得，事情要按他们的愿望来扭转局面已不可能。那么他们在狂妄地拒绝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建议之前几个月里想些什么？这些坏透了的政客打错了主意，但从心理学上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算盘，他们不懂得七月二十三日事件的性质，他们的打算是只要军事政变完成以后，军官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兵营，国王也已不存在，政治舞台那就将重新成为华夫脱党的自由天地。所以也不排除他们为法鲁克的垮台而高兴，因为这同他们的利害有关。这些人统治埃及几十年，只学会了一套老经验，认为社会只会是一种表面的改变，而所有上层集团终将互相勾结。大地主所有制是他们权力的基础，它如同埃及本身一样是永存的，不可动摇的。

封建主阿勒连比当时曾说过：“英国人可以泰然自若地撤出埃及，他们实际上已经培植了一个大私有阶级，英国可以通过这些人来推行自己在埃及的政策。”<sup>①</sup> 革命要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阶级。莫希·埃德金写道，革命后立即制定法律，“目的就是从政治、社会和思想上打击大地主阶级的影响，因为这些大地主都是保守的政治活动分子。革命剥夺了这个阶级的武器——土地、党和威信。这个阶级的代表受到了审判，通过审判证明他们是卖国分子、贪婪和挥霍人民的财富。整个阶级受到公开谴责。”<sup>②</sup>

<sup>①</sup>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72页。

<sup>②</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39页。



也可以这样理解：革命指导委员会决定进行土地改革也就是要罢免旧官僚、撤掉阿里·马赫尔和清洗政党，这是军政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军人决定执掌政权。先锋队懂得，它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因而需要打击潜在的敌人和团结同盟者。

莫希·埃德金写道：“革命先锋队代表青年军人集团，这些青年军人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对民族独立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于帝国主义、王室及其走狗倍加仇恨。第二是他们同一切其他政治力量和组织没有关系，并尽力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sup>①</sup>

这些话是值得注意的。青年军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使命和天职，他们不希望同被旧制度败坏了名声的政党混在一起。革命后的第二天他们面临一大堆问题，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问题。但他们没有打算回答这些问题。毫不奇怪，他们力图赢得某些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的支持，首先想得到那些“内行”的帮助，任命阿里·马赫尔为总理，尽力同华夫脱党建立联系。绝不能认为那时他们就准备“回兵营”，不应当死板地理解纳赛尔的话：革命军官只愿意“领头几小时”。

他们很可能没有打算直接领导政府，而准备监督政治家的活动，并保持自己的团结和独立。但当他们看到同旧制度的政客谈判不顺利时，他们只好自己来管理国家，由实现最高监督的想法转而采取把政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为了行使政权，需要有一个纲领，哪怕是一个最一般的纲领。军人们宣布了革命的六个目的：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推

---

<sup>①</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38页。

推翻封建政权，结束垄断组织对政府的控制，树立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健全和民主的社会，建设一支强大的民族军队。

这意味着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资产阶级最善于提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口号。

这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事情（客观上符合几个阶级的利益），也不能依靠一个阶级，革命消灭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双重统治。但是民族主义军官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得政权，完成了革命之后，没有再把这个权力交给别的阶级。进行这场革命的人们所遵循的思想是：民族独立，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实现社会主义，消灭旧制度的各种罪恶，保证国家进步，建设现代化的发达社会。这些主张是对革命敌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集团的宣判。

起初许多军官似乎想得很简单，只要推翻国王和赶走英国人就满足了。但很快他们又认识到需要同整个旧制度的种种依存关系作斗争，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具体体现为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几万军队，不如说是埃及在经济上同外国垄断集团的依存关系。不改变经济结构，就不能摆脱这种关系，这首先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打击的对象除了英国走狗或法鲁克安插的亲信之外，还应更广泛地包括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使某些人改变立场，并在这些人中间找到同盟者，简单地说，斗争要转移到国内的社会计划上。民族革命同社会革命是不可分开的。

纳赛尔掌权两年后于一九五四年写道，“我们国家的每个民族都经历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政治革命，通过这场斗争取

得对专制君主或外国占领军的胜利，赢得了独立自主权；第二次是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社会各阶级互相斗争，直斗到人们的正义有了保障和社会得以安宁时为止”。<sup>①</sup>在历史的急剧转折中，斗争实际上迅速排除了认为社会所有各阶级和阶层能够进行合作的设想。到一九五四年，纳赛尔懂得了他必须同各种敌人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首要的敌人是英帝国主义，它占领着埃及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埃及就这一问题同英国人时断时续谈判了将近两年。埃及领导人通过这两年的谈判终于认识到在运河区除了进行武力斗争外，别无其他出路。而英帝国主义也今非昔比，不那么强盛了，它同伊朗摩萨台之间的一场“神经战”失败后，在近东地区弄得威信扫地；整个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如果它同埃及发生战争，前景也很不利。英国国内舆论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出埃及，认为英国军队驻扎在那里需要花费很大的开支。由于核子武器和火箭技术的发展，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军事价值也已缩小。此外，英国政府仍可能同埃及建立同盟关系，甚至把埃及拉入它当时在近东建立的军事集团。最后英国人从埃及得到允许它在一定情况下仍可以把军队重新开往运河区的条件。考虑到这一切，终于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生效，英国军队必须从苏伊士运河区撤退。这是纳赛尔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胜利，在纳赛尔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敌人是国内反动派的多头蛇，这个祸患在一九五

---

<sup>①</sup> 纳赛尔：《革命哲学》，第23页。

二年革命以后一时是难以消灭的。当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华夫脱党和其他党都懂得了军人不会把政权交还给他们后，便转而采取另外的斗争方式。首先，把过去的那些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华夫脱分子同“穆斯林兄弟会”不记旧恨，联合起来要求恢复议会制。这是旧制度政治家的一张主要王牌。他们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民主的口号进行投机，要求取消军事专政，呼吁召开各政党代表大会和恢复他们的活动。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华夫脱党及其同盟者一边。反动派的另一张王牌是试图利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内部分裂，因为当时革命指导委员会正面临新的问题，不少军官改变观点，其中一部分人因为不能割断同“穆斯林兄弟会”的旧关系，政治上便受人利用；另一部分人由于受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力而摇摆不定，他们同这些越来越倾向于恢复议会民主的知识分子老早就有联系。军政权名义上的领导人纳吉布将军是第一批转向“旧政党”方面去的人之一。

气氛紧张了。革命指导委员会越是不向旧政党敞开权力的大门，那些没有被感化过来的人越是怀恨在心。自由派知识分子欢迎专制君主的垮台，但绝不愿看到他们心爱的议会游戏被否定；教授、律师和新闻记者对军人都没有任何好感，认为这些军人都是“地方上的暴发户”、“没有知识的大兵”，对自己则自我“标榜”为国务活动家；大学生也极端不满这种“黑暗而无生气”并只要求他们劳动和守纪律的制度；商人和商业资本家都提心吊胆地观望着国家的新领导，这个领导严厉地、几乎是残忍地要求商人作出牺牲，并加以限制，而且还极力对

他们的全部实业活动实行严格的监督；穆斯林信徒因不能实现建立神权制国家的理想，便挥动拳头要求民主。人们提出一大堆责难。事实上难道不正是为了民主才进行革命吗？这些在菅房而不是在政府里的一小群军官难道不正是为了推翻暴君才夺取政权吗？谁还需要新的君主专制？为什么不允许各政党活动？议会何在？

纳赛尔的朋友动摇不定，怀疑自己是否有反对人民意志的权利，因为正是为了人民才去进行革命的。总之，法鲁克时期有议会制是一回事，而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君主制度已经消灭，大地主的土地也已经剥夺了，革命做了它能做的事情。现在不正是该恢复正常生活了吗？革命指导委员会还采用军事专政的办法来维护政权难道是可以理解的吗？

纳赛尔的地位非常危险。他懂得并察觉这些议论的虚伪性，他深信“政治上的民主必须先于社会民主”，因此，必须改变整个旧社会的结构。他相信恢复政党的活动将意味着革命的结束，一切又将象从前一样，只是没有国王，华夫脱党蛊惑人心的骗子和“穆斯林兄弟会”凶残的宗教狂分子将重新开始愚弄人们，教唆他们去互相残杀。他继续观察其他人，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些人呢？在纳赛尔背后已经有这样的议论，说他想当独裁者。他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他面临要维护自己名誉、地位和威信的问题。关于撤走英国军队的协议，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勇敢决定，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这些都是使阿拉伯国家走向团结的旗帜。迄今他还是一个不知名的中校，在军队中甚至还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自由军官”的精神和智慧，而不是纳吉布。把一切功绩都归于纳吉布，称他是人

---

民的父亲，到处挂他的肖像，他勉强装得象一个抽烟斗的调皮农民形象。而这时纳赛尔还不会很好地登台讲话，他的口才不好，没有号召力，情况对他不利。

要求允许各政党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革命指导委员会也动摇了，并且人们可以逐渐感觉出来。“自由派”加倍努力，已经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和他们站在一起，但这些共产党人同样错误地认为，只有恢复政党制度，他们才会有美好的前景。于是，危机达到了顶点。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纳赛尔威信受到了威胁。已经无法拖延了，委员会必须在他同纳吉布之间进行选择。纳吉布这个被夸大了的人物，已经被郑重地称为“扎伊姆·萨乌拉”——革命领袖。纳吉布早就讨厌纳赛尔，因为他经常在幕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位五十岁的将军一直盼望着摆脱青年军官的监护，成为立宪共和国的总统。

但早在一九五二年，委员们已经开始倾向纳赛尔。纳赛尔领导他们走向胜利，他们相信他的智慧和能力。纳吉布被撤去了委员会主席和总理的职务，纳赛尔当上了政府首脑，其他成员都保持不动。

但胜负还未见分晓，纳吉布被撤职的消息象闪电一般激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人民大为震惊，他们对这一事件缺乏思想准备，他们习惯于纳吉布当领袖。人们竟象失去了父母一样，很多人在街头哭泣，这种情绪为“自由派”所利用。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使革命指导委员会面临孤立的危险。军队内部同样也不平静，有些部队在准备用暴动来恢复纳吉布的权力。纳赛尔号召坚决顶住，但产生不了效果。

委员会束手无策。军队分裂了。为避免内战，委员会决定恢复纳吉布的权力。这个决定可说是最后一分钟才作出的，那时装甲部队已经准备出动了，在这个部队中许多人都喜欢民主的口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有一位最左的成员“红色少校”哈立德·毛希丁在坦克部队中服役）。坦克部队的军官准备用武力恢复纳吉布的职务，他们认为这是为革命而尽职，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三月二十五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了下列决定：各政党必须立即改组；革命指导委员会将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散，并不再组织自己的政党；任何人都有政治权利；立宪会议的首要任务是选举共和国总统。<sup>①</sup>

这是一次投降。几十个“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包括他们的首领哈桑·侯达比获得了释放。八名部长提出辞职，等候成立新内阁，内阁的人选将全部是文职官员。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要求革命指导委员会“返回兵营”。纳赛尔早在两天前已宣布：“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政治家。”现在他看到，革命者要让位给“政治家”，说得更确切一点，现在是资产阶级政客胜利了。

纳赛尔遭到了失败。但悲剧的高潮不是在第二幕，而是在第三幕。最后胜利并没有属于将军，而是中校。为此，纳赛尔动员了所有后备力量。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力量的呢？军官们起初拒绝支持他，知识分子跟着纳吉布走；革命指导委员会已经宣布，六月份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那时，纳赛

---

<sup>①</sup> 葛洛克，《纳赛尔的新埃及》，伦敦出版，1960年，第32页。

尔将向群众讲话。

但是群众是否愿意接近他呢？工人阶级对待革命政权的态度尚不明朗，工人以及全体人民都欢迎革命，但是他们对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在达瓦尔村发生的事件都非常清楚，那天在工会的号召下进行的罢工遭到了当地驻军的镇压，两个工会领导人在第二天被处死。确实正是纳赛尔公开反对把这两个领导人处死刑，但他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军政权的首批受害者是工人。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当事件即将发生时，工人陷入了慌乱。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机关报《千百万人报》上曾指出军政权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同华夫脱党人合作。“穆斯林兄弟会”同样反对军政权，尽管正式的“兄弟会”自从他们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组织了一次街头骚乱之后已被解散。<sup>①</sup>纳吉布日益同他们接近，这对谁都不是秘密。要把情况弄清楚是困难的。

纳赛尔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在于他的组织工作。他早就对工会和解放联盟有巨大而巩固的影响。解放联盟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性组织，是军政权为从政治上动员人民而建立的。解放联盟是一个根本没有定型的组织，而且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是这一次它却说出了自己的话，这大概是从它

---

<sup>①</sup> “穆斯林兄弟会”在一九五三年建立了安全机构，成立了三个秘密组织，为了便于工作，吸收了军官。中士和警察参加。在“第案”的军官中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密探，他们经常报告关于“兄弟”的破坏活动。革命指导委员会先提出警告，之后便解散了这个组织。《哈里斯，《埃及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美耐斯坦福出版，1964年，第219页）



成立以来第一次表现出是一支政治力量。它的基层组织都是忠于纳赛尔的人，它的领导人都是纳赛尔亲自挑选和审定的。解放联盟号召人们走上街头，支持军政权，支持革命指导委员会。纳赛尔提出的口号是：继续革命，委员会继续执政，反对恢复政党。

工会宣布总罢工，开罗的整个交通陷于瘫痪。解放联盟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街上高喊口号：“我们不要政党，我们需要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领导。”纳赛尔的拥护者不知疲倦地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说如进行选举，华夫脱党将会获胜，华夫脱党就要重新上台执政，谁都不用怀疑，华夫脱分子一般都是采纳农民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日三天内决定了埃及革命的命运。情况比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变后还要严重。整个形势是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如果纳赛尔失败了，三个月后，纳哈斯·巴什就会登上总理的宝座，一切又会回到旧轨道上去，军队开辟的革命基地将会丢失。

但是纳赛尔胜利了。投向他这边的力量有工会和各群众组织，从而使他巩固了在军队中的地位。忠于纳赛尔的部队包围了装甲部队。游行的规模更大了，无产者和平民都走上街头；同时在街上游行的还有大学生的队伍，他们高喊口号，要求恢复政党和实行普选；但他们的游行队伍和前者比较，相形见绌，只不过是零乱的支流而已。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经过三天群众性的游行之后，革命指导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宣布，预定在六月进行的选举将停止举行，再次撤销纳吉布所有的职务。这一次他是彻底完蛋

1954年3月

了。<sup>①</sup>四月十五日，委员会剥夺了华夫脱党、自由宪政党和萨基斯党所有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这些领导人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二年一直担任部长级职务。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纳赛尔把旧政权的所有知名政治家统统都清除了。这三个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首领在后来的十年期间从来没有一个能再次当上部长。从此以后他们都完蛋了，包括“伟大的”纳哈斯在内。如果他的信徒再叫喊“没有纳哈斯就没有华夫脱党”，那末确实是没有华夫脱党了。实际上一九五四年春的这几天是给这个四十年代就建立的光荣党画了一条线，埃及资产阶级不再是政治代表，庞大的机器被彻底打碎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六日，纳赛尔重新当上总理，他再次担任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从此以后，整个政权是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在军队的领导层中开始了清洗。革命指导委员会中以左派观点著称的三名成员（哈立德·毛希丁、尤素福·萨迪克、阿卜杜勒·穆尼姆·阿明）被清除。逮捕了十六名军官，罪名是他们要同共产党联合行动，准备在五一节举行“骚动”，并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已经退休的上尉穆斯塔法·卡马尔·西德基，他过去还是“自由军官”组织的知名活动家。

以哈桑·米斯里上尉为首的十四名军官（同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侯赛因·沙菲很接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之后，革

<sup>①</sup> 三月二十八日，纳吉布在革命指导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勉强冲出了内阁会议大厦，拿着手枪穿过纳赛尔支持者的人群，为自己冲开了一条路。在开会期间，纳赛尔和萨拉赫·萨勒姆经常走到楼台上平息群情。三月二十九日早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护送萨乌德国王离开开罗，在机场上发现纳吉布，他企图与萨乌德一起飞走，但被制止了。

---

命法庭在巴格达迪主席的主持下判决艾哈迈德·沙乌基上校十年监禁，那时是沙乌基随纳吉布到麦加朝圣回来后不久。之后法庭便解散，清除了军队中的反对派。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在他讲话时有个暗杀者接连向他打了八枪，但没有打中，这个暗杀者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建立，纳赛尔提名查卡里亚·毛希丁担任领导。大约逮捕了七千多名“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其中八百六十七人由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安全机构的六名领导人得到了提拔，而在这之前一个月逮捕了纳吉布将军。

就这样，粉碎了各种阴谋，消灭了军政权的一切敌人。过了一年半以后，到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通过直接普选，纳赛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在埃及的历史上实现了统一领导。至于说到内乱和不稳定的过渡时期，那是后来的事。正如阿卜杜勒·马利克写道，“从军事专政的巩固到一九五四年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宪法的制订，以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一切意味着大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束。”<sup>①</sup>地主资产阶级在埃及统治了三十年，英国人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控制终于从政治上被完全摧毁了。

但是这个阶级根本代表不了埃及的资本主义，更代表不了整个封建主义。地主依然存在，他们利用土改法所留的缺口，每个地主可以有三百费丹土地，而且还可以对土改法的规

---

<sup>①</sup>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83页。

定有所超越，尤其是长工和农村的警察还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工业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触及，被消灭的只是那些同地主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顽固派，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原来受保守贵族排挤的“新资产阶级”的发展。消灭了西拉克·埃德金之后，又铲除了旧的高级官僚和王国制度的政客，但是“米斯尔”依然存在，并且它的二十九家公司也很兴旺，如阿布德“糖业大王”以及法尔加里·雅赫雅和其他公司等。打倒的只是拥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权力的剥削阶级上层集团。整个资产阶级获得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这特别是对于工业资产阶级。正如毛希丁写道：“工业化是争取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革命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保护已有的工业和建设新的企业，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如提高消费品进口的关税；降低工业设备和机器的进口关税；为了鼓励投资，新公司在八年之内免税（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第四十三号法律），工业投资在五年之内免税……，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要发展经济和吸引私人资本。”①

政府工业银行为发展工业提供大量贷款，政府本身也给大企业拨款，革命后建立的国营企业迅速增加。

到一九五六年，国营企业的资本已占新建工业股份公司的百分之五十六。不仅国家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私人投资也增加了。例如，一九五四年的投资是六百八十万埃镑，而一九五六年已达到二千五百六十万埃镑。根据加强和发展某些

---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0页。

工业部门的设想，在私人中间推销国家股票。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已经开工的那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股票。从而为资产阶级创造了比革命前更为有利的条件。

其实土改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要把资本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创造条件，推动私人资本向工业部门投资。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根据地可以断定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军政府在全力发展国营工业部门的同时，也大力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希望私人资本能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军政府同样也鼓励外国资本。革命后一个星期，即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就公布一项法令，修改了一九四七年关于匿名股份公司的第一百三十八号法令，这个法令原来规定埃及资本在这个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一。新法令把本国资本的比重减少至百分之四十九，而且还附带声明，在一定情况下这百分之四十九中还可包括部分外国人的股份。<sup>①</sup>

“在军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特别注意妥善处理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并尽可能改变那些不利于外国在埃及活动的法律规定……。凡是石油公司不满的采矿工业法律条款，也都加以修订，以适应它们的要求。”<sup>②</sup>

实际上在这期间，埃及为外国资本开了方便之门。如前所述，“自由军官”在即将掌权之前并没有任何社会经济措施的计划。所以他们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后急忙请来了最有经验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94页。

② 利特尔，《埃及》，伦敦出版，1968年，第219—220页。

的著名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军官制定过土改规划和参与修改股份公司法律的法令。他们的经济顾问是这样一些专家：如赛义德·马雷、艾哈迈德·富德·埃马里、艾哈迈德·侯赛因博士(驻华盛顿大使)等。这些人都拥护工业化，自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会超出资产阶级观点的范畴。专家们正是利用自己的权威，加以军官们不懂经济，提不出任何不同意见，于是便把革命指导委员会引向接受外国资本的道路。这些资本事实上是需要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势条件下，外援的唯一来源就只有西方国家能提供。因此，在对外政策中最好是奉行“不要吓跑”西方的方针。有一个西方作家甚至认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西方如果能够使阿拉伯人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建议，那就是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一个最大的胜利。<sup>①</sup>

但是埃及在这个时候能否实现“马歇尔计划”呢？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是可以的。但是除非西方国家能够正确估计埃及的发展趋势，估计它在世界政治战略中的作用，但西方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大家都知道，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从经济上监督埃及的发展，西方政府必须创造同埃及军政府实现合作的政治前提条件。而西方国家只创造了一部分条件，美国人同意从埃及撤走自己的军队。于是，纳赛尔宣布了两国之间的建设性合作不再存在任何障碍。<sup>②</sup>至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新政权的态度是友好的，显然可以认为这是前进了一步，

<sup>①</sup> 比尔博士：《中东——东西方之间动荡的国家》，慕尼黑出版，1959年，第82页。

<sup>②</sup> 利特尔：《埃及》，伦敦出版，1958年，第242—246页。

也就是说，在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方面前进了一步，艾森豪威尔赠送纳吉布一支银制手枪。

但是光是“关系正常化”是不够的。西方同埃及的政治合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承认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殊作用（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埃及在发挥这一作用时所奉行的政策），二是要谅解埃及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

在五十年代初期，英国在近东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建立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以确保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自英国失去印度后，加以近东石油开采急剧增加，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西方拟议中是要把埃及包括进这个集团。但是，对于赶走外国占领者后不久的埃及革命政府来说，加入世仇英国人所控制下的军事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埃及拒绝了参加任何拟议中的这类组织。这时华盛顿和伦敦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伊拉克便成为这个新集团的基石。当纳赛尔巩固了国内的权力后，便能够积极考虑对外政策了。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角是埃及的老对手——伊拉克。这个国家的政权这时还掌握在反动的封建王国集团手里，他们毫不隐瞒对埃及革命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视。

纳赛尔认为，英国和美国故意以此来打击埃及，同时也企图以此来侮辱和削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美国和英国一方面在伊拉克身上下工夫，武装伊拉克，同时继续保护自己在约旦的统治地位（这个国家的政权由统治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的人在掌握），鼓动约旦对叙利亚提出领土要求。西方国家一齐用开埃及。纳赛尔不得不应战，他宣布巴格达条约是

“人民的监狱”，并坚决反对这个条约，从此对西方的态度就变坏了；而西方在阿拉伯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使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三十年代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巴勒斯坦。对于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的解放和团结而迭遭失败之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巴勒斯坦成了新战役的战场，这场战役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之战，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阿拉伯人眼中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夺走了阿拉伯人的土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仅把巴勒斯坦问题看成是灾难，而且把它看作能够动员所有阿拉伯国家人民投入争取解放和团结斗争的手段，以激励他们民族的共同感情和血缘兄弟情谊。阿拉伯的民族运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整个阿拉伯地区，从摩苏尔到喀土穆，普遍感到巴勒斯坦的冲突是全民族的悲剧。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它的领导集团一直奉行侵略的挑衅政策，不断地点燃冲突的战火。一九五四年，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开始发动反对叙利亚的一系列新挑衅，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在内都感到这是对自己的威胁。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战争失败的教训都是记忆犹新的。显然，只有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才能避免“第二个回合”的失败。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拥有现代化的装备，而埃及军队的装备都是些无用的落后武器，它缺乏战胜以色列的能力。

埃及军政府企图获得美国的武器，使自己军队的技术装备也能达到象以色列一样的水平。为此，阿里·萨布里少校于一九五二年秋开始同五角大楼谈判；到一九五五年九月，纳



赛尔亲自召见美国大使。可是华盛顿故意利用这个机会对埃及进行勒索，因为那时经济落后的国家没有别的武器来源。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自己的政策一定会取得成功。美国人知道，如果埃及购买英国武器，那么英国军队就会进入埃及，这是开罗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当时追随华盛顿的法国也不会去破坏美国的策略的。但华盛顿万万没有想到，埃及会转向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提供武器。

连开罗也很少人会想到这样做。纳赛尔是很多人中唯一想到了这个主意的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时他懂得，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而且还会要求埃及加入“集体防御”组织作为提供武器的条件。时间已不允许等待了，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因而便转向苏联。一九六五年，纳赛尔在莫斯科访问时曾经谈过这一点，他说：“当时的殖民主义者认为，它一定能吓住我们，它可以利用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区建立基地来反对我们，用武力进攻来威胁我们。我们拒绝了这种威胁，并请求你们帮助我们打破这种武器供应的垄断。”<sup>①</sup>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纳赛尔宣布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提供武器的条约。看来他是做了一件简单而最有意义的事情；他需要武器，他赢得了国际舞台上互相对立的两方中一方的支持。一方拒绝，他就转向同情他的另一方。但是要采取这样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步骤，必须有勇气和远见，要坚决打破那些清规戒律和习惯的框框，即所谓哪些“能做”，哪些“不

---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65年8月31日。

能做”。如果在其他方面都相同时，只有这种勇气才能显示出伟大政治活动家和普通“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前者是能够坚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开辟一条新途径，后者即使已经看到这条途径，但也不见得敢于选择这一不寻常的步骤。

对于西方政界来讲，埃及购买苏联的武器就象晴天霹雳一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竟是如此勇敢。资产阶级报刊发出了非同凡响的叫嚣，从此纳赛尔成了西方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纳赛尔的威望在埃及大为增加。他的行动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这以前他并不是很知名的，一九五二年的革命是和纳吉布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些阿拉伯国家本来对纳赛尔的态度是很冷淡的，例如，在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最大，它不能饶恕纳赛尔镇压它的埃及“兄弟”；苏丹人对纳赛尔推翻和逮捕纳吉布极为不满，因为纳吉布的母亲是苏丹人。但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后，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纳赛尔给了帝国主义一个耳光，他向强大的美国发出挑战，他成了阿拉伯民族英雄和“新的萨拉基”。

纳赛尔在对外政策方面决定购买苏联武器和反对巴格达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他以后行动的方向。首先是他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关系之后，就必须经常考虑到同帝国主义阵营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对抗。购买苏联武器是制定他的政治路线，奠定他的外交政策基础，即不结盟和积极中立路线的第一步。

其实这一步，如同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一样，是西方

国家逼出来的。纳赛尔事先没有自己的既定政策，它是根据已经出现的形势，临时采取的政策。当帝国主义企图威吓他或对他进行勒索时，就发生了需要武器这样的情况，因而被迫在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应战。他的功劳在于，他是“第三世界”政治活动家中第一个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面前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帝国主义无论在武器供应、经济技术和财政援助方面，都已经不再处于独霸地位。

再重复一句，纳赛尔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得出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由于政治上的近视把他推上了这条道路，而后来又为此而感到懊丧。但有什么办法呢？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五年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务院能够放弃在近东建立帝国主义反苏军事集团的立场吗？当然不能。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执行美帝国主义对外战略、为当时美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机构了。艾森豪威尔能够不过问阿以冲突吗？不能。因为他不能不考虑下一步的国内大选，不能不服从于他自己那个党的政策。由此可见，美国不能满足埃及的愿望。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埃及的民族利益是无法调和的。这便是问题的实质。这个规律促使纳赛尔购买苏联的武器和反对巴格达条约。同样，由于这个事件，埃及领导人的对外政策观念也开始转变，在阿拉伯中东出现了一个新形势。由于西方在埃及已经“失去机会”，比尔上校也枉然悲痛，“马歇尔计划”的近东方案再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如果说，一九五五年埃及对外政策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对内政策的变化还不明显。主要敌人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集团

被消灭了，但可靠的同盟者还没有得到，牢固的社会支柱也没有形成。前面已经讲过，解放联盟不能充当得力的政治工具。毛希丁写道：“解放组织不是革命党，它是现有各种力量（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问题）的简单联合……。不能把这个组织变成真正的革命党，这本身就说明政治工作缺乏明确的思想路线……。解放组织事实上没有得到群众的公认。”<sup>①</sup>

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方向还表现在军政府在消灭右派反动政党的同时，又迫害左派分子。正如一家美国杂志所指出的：“既打击了右派，也打击了左派；既打击了地主，也打击了工人。可以说，确切的结果是，大资本家受到了新政府近乎中等程度的打击，而工人和右派活动家则受到更大的打击。但是大资本家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轻易地贿赂和欺诈，而是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能把这些穿军装的‘狼’赶回兵营去。”<sup>②</sup>

英国工党著名女活动家卡斯特尔一九五四年访问埃及后得到的印象是，革命“停滞了”，未能向前发展，原地不动。她的同事比万得出的结论是，埃及的革命仅仅是画了一个正面图。<sup>③</sup>

大体上说，当时是可以这么看的，但是如何确切地表达卡斯特尔所谈的埃及人，比万犯了一个错误，他理解的革命就只是一个正面图。<sup>④</sup>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0页。

② 《美国社会主义者》月刊，1959年1月。

③ 《新政治家》周刊，1963年2月3日。

④ 同上。

苏伊士危机的后果之一是把外国企业埃及化，即强迫外国人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埃及人。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颁布了第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法令，规定完全剥夺外国人拥有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外贸公司的所有权。这意味着英国银行和法国银行在埃及的剥削活动从此结束了。这些银行拥有资本五百六十万英镑，存户的存款总数达到一亿八千万英镑。与此同时，将六十四家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人办的保险公司收归国有，这些公司的资本总计一千七百一十万英镑，此外还有许多外国的贸易公司也都收回埃及所有。

所有这些都是继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采取的措施，目的是要把埃及的经济从外国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样做对于民族资本的利益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但是从政治观点来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进行的国有化和埃及化，则是导致军政权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开端。

私人资本活动的基础是他们信赖国家政权。单是经济和财政上的优惠还不能保证私有资本的积极性，而必须使他们对未来抱有信心。私有资本的活动经常带有冒险性的。任意投资，就是冒险。如果资本家本能地意识到冒险超过“最高利润”标准的话，那末任何经济优惠，尤其是爱国主义的号召都不能打动他们去投资。当埃及资本家看到纳赛尔政府是如此的轻易、迅速和毫不犹豫地把外国人的财产国有化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心里充满着疑惧。一方面，他们为赶走了竞争者而高兴，而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开始考虑，如果一旦政府认为需要，对他们会不会采取同样做法？这又该怎么办？

如果政府中有“自己人”，那就不会有这些担心了。但问题是军政府垄断着政权，只给资本家提供经济上的优惠，不允许他们参与管理国家。这便是私人资本家同政府之间产生“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英国研究工作者奥勃拉恩写道：“由于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不再向商人和企业家征求意见，因而这些规划也就得不到他们善意的赞同，这在社会和政治规划方面也是一样。但是，要消除他们疑虑以便将来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征得他们对规划的支持本来是必要的。所以尽管经济形势比较有利，但是政府的政策在实业界却产生了不可信任的印象。特别到一九五九年之后，一些官方人士和报界公开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敌视，这种怀疑就更大了。”<sup>②</sup>

资产阶级的疑虑还由于以下原因而增加了。埃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主张埃及经济实行计划发展的倡导者之一，还有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已故的奥斯卡·兰格。一九五四年，他在开罗担任埃及领导人的经济顾问。负责经济规划工作的第一批组织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已经成立，它们的作用日益扩大。重视经济规划的原因在官方文件中这样写道：“之所以必须设立规划机关，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机构来提出建议，尤其是实施建议……，这是为增加产品和投资所必不可少的手段。”<sup>③</sup> 换句

① 埃德蒙·阿斯富尔曾谈到过：“实业界与军官之间互不信任，那些希望掌权的人自然会利用这个权力。”

② 奥勃拉恩：《埃及经济体系的革命》，伦敦出版，1966年，第314页。

③ 《阿联，1960—1965年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概要》，开罗出版，第3—4页，第7页。

话说，要使国家不被窒息而死，就必须加速发展经济，但私人自发势力不能产生一个机构来保证这样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成立了经济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有部分。这时国家公司和混合公司拥有的资本总计一千七百万埃镑，但是埃及化之后，到一九五八年末，资本就增加到五千八百六十万埃镑。<sup>①</sup>如果一九五〇年私有资本尚占总投资的81%，那末到一九五六年已经缩小到了40%，而国家投资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0%。<sup>②</sup>

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不鼓励私人资本。相反，政府仍然希望同私人资本进行很好的合作，特别是现在埃及化之后，当地的投机商从希腊人、黎巴嫩人、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手里买了不动产，因此政府就会对这些商人感兴趣。

而事实上，私人资本家经营的事业进行得很不错，根据埃及及国家银行的统计，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度一百四十四家股份公司的利润比上年增长7%<sup>③</sup>。一九五九年成立了十九个股份公司，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三十六家，它们的票面资本达到三千零七十万埃镑，比上年度增加了二千五百二十万埃镑，即增加460%。<sup>④</sup>法国的埃及问题专家罗洛后来回忆起这个时期时认为，这是“埃及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sup>⑤</sup>

波兰《经济》杂志描绘过这个“国家军事资本主义”，这种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12页。

② 《埃及、以色列和土耳其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纽约出版，1958年，第21页。

③ 《埃及国家银行经济公报》，1960年，第3—4期，第264页。

④ 同上，1961年第一期，第56—57页。

⑤ 《世界报》，1963年9月20日。

资本主义是当时埃及军政权采用的类似“日本模式”。<sup>①</sup>为私人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鼓励他们向工业投资，以发展经济，同时保持对它的一般监督。以上便是纳赛尔经济顾问的主张。

毛希丁写道：“这个政策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为了促进国家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不是对它没有任何政治监督。”<sup>②</sup>

事实很快证明，把资本家从政治舞台上拉下来的同时，在经济上却对他们加以鼓励，这样的做法是很成功的。

资产阶级对在国民议会中有广泛的代表表示满意。这个国民议会是根据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全民投票通过的宪法成立的新的最高立法机构。推选国民议会候选人的权利是民族联盟。这个联盟是从解放联盟改组成的新的群众性组织。其中起实际决定作用的是民族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有巴格达迪、阿密尔和扎卡里亚·毛希丁等人）。被推选出的二千五百零八名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中，执行委员会批准一千一百八十八人。这样有半数以上被淘汰。<sup>③</sup>选举结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宣布。介绍一下国民议会议员的组成是很有意思的：其中包括十六名部长、三名副部长、四十六名律师、四十六名地主、四十名长工、三十四名军官、二十名医生、二十一名国家职员、十五名房产主、十四名警官、十二名工程师、十名教员、十名大商人、八名市政府官员、八名新闻记者、五名自治市

① 《经济》，华沙，1965年，第三期，第582页。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0页。

③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17页。



负责人、四名会计员、九名企业主、四名小商人、二名药剂师、一名阿拉伯族长、七名私人公司职员、二名广播员、四名工人。<sup>①</sup>

从上述成分中可以看出，国民议会中有产阶级占压倒多数。不过这个机构无权决定真正重要的事务。而民族联盟和解放联盟还有所不同，英国作家写道：“一九六〇年我到埃及时，给我以一种复杂的印象，什么人都参加民族联盟，未必有谁能弄清它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复杂结构……”<sup>②</sup>

谁都知道，只有军队才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力量，而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纳赛尔总统。他个人拥有真正的绝对权威。所有功劳都归于他一个人（在那样的条件下把他评价过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埃及摆脱外国统治，夺回一小撮外国贵族掌握的权力，赶走土耳其、切尔克斯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贵族和黎巴嫩、希腊、意大利、犹太等的商人，从而为“纯洁”埃及人创造条件等。<sup>③</sup>人们把纳赛尔看作是恢复埃及民族尊严的人，首先使开罗成为埃及决策的地点。纳赛尔命令把这样的标语贴到大街上，上面写道：“抬起头来，我的兄弟，受耻辱的时代过去了！”他消灭了埃及人身上的整个民族的污点，这些

---

① 《金字塔报》，1957年7月16日。

② 帕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际事务》季刊，1962年，第三十八期，第22—23页。

③ 早在一九〇五年克罗麦尔勋爵写道：“靴子的生产和整理几乎完全被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所垄断，呢绒毛织品的生产和销售被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欧洲人所控制，缝纫业被犹太人包办。”一九五一年《股份公司年报》中谈到，埃及伊斯兰教徒占31%，科普特人占4%，犹太人17%，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12%，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占9%，欧洲人占31%。《《中东是武装力量的社会》，纽约出版，1955年，第124、130页）

污点是长时期奴役造成的。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们聚集在亚历山大广场听纳赛尔的讲话，当大家听到他痛斥帝国主义时，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这是毫不奇怪的。

此外，在埃及人民的眼里，纳赛尔的光荣在于他出身平民，他是农村邮递员的儿子，一个普通的军官。过去受惯了国王、君主，总督统治的埃及人第一次在开罗看到由普通人和平民阶层的人组成的政府。

尽管纳赛尔个人以及他在“外交战线”上的成就很受人们的欢迎，但是广大群众对他的许多变革却很冷淡，因为他的这些变革在政治机构方面事实上没有多少变化。纳赛尔用个人威信掩盖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革命后过了好几年，富者仍富，而老百姓依然生活在贫困中。资本家则极力利用国家提供的方便，扩大自己在国家经济部门的活动和影响。新的国家机构同私人资本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部分军官担任了行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工资比他们原来在军队中高一到二倍，他们发财致富，而且接受贿赂，成为特权阶层，加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行列。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一九五二年，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仅为三十五埃镑，一九五七年为三十七埃镑。埃及财政部长在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财政计划报告中也承认，由于物价上涨和税收增加，革命后的六年内生活费用的开支增加了30%，实际上如果把棉布、糖、煤油、烟卷和其他商品猛涨的价格都计算进去的话，那末所增加的数字还要大。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工人的最低工资规定为每天十八比阿斯特（一埃镑等于一百比阿斯特）。但是产业工

人和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多数只有八至十个比阿斯特尔。由于税收和保险费的增加，国家职员的实际工资也减少了。

土地改革继续进行，根据一九六二年公布的资料，农民分配到的土地为六十四万五千六百费丹（可耕地的总面积约为六百万费丹），有二十二万六千个农户分得土地，也就是说，在大约一千九百万农民中有二百万农民得到了土地。<sup>①</sup> 赎金和税收是压在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根据《共和国报》调查的资料，拥有三费丹土地的农民每年要付出一百二十五埃镑，而他的收入也不超过一百一十五埃镑。<sup>②</sup>

英国《泰晤士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除农民以外的所有人的新生活》的文章，文中写道：“对于埃及的农民来说，生活总是一成不变，他们用的是比较昂贵的蜡烛、喝的是淡茶，家里供养着许多闲人。革命对他们来说还只是前面的亮光，用他们的话说，‘明天，杏花才能开放’。”<sup>③</sup>

到处都令人感到革命尚未成功，从而造成人们不满的气氛，政府之所以能够应付这种局面，完全是靠纳赛尔个人的威信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团结的口号。但单凭这些毕竟是很不够的。纳赛尔也清楚地知道社会舆论，为了缓和群众对缺乏普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他也认为必须反对特权阶层，但这只是口头上这么讲。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六次合作社代表大会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工人社会》，第75页。

② 《共和国报》，1958年11月17日。

③ 《泰晤士报》，1959年5月15日。

上，纳赛尔谈到了国内产生“新贵族”。他说：“如果谁认为这些人成了国家的主人，那就错了。”反对资本主义口号在他的这次讲话中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说：“民主的社会不必是一个多党制的社会，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它没有剥削、贪污和资本主义的危险。”所谓“资本主义的危险”这句话，据判断，纳赛尔指的不是一般的私人资本，而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组织，他尖锐地指责了这些集团或团体。<sup>①</sup>

大约在纳赛尔这次讲话的同时，《鲁兹·优素福》周刊发表阿卜杜勒·库杜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埃及产生了“特权阶级”，其中“除了资本家之外，还包括大公司的经理和高级官员”。这个阶级“总是想操纵国家，使之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务”。在这家周刊的同一期上还登载了法特赫·哈利亚写的题为《新资产阶级》的文章，文中谈到“那些企图占垄断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危险性。<sup>②</sup>

因此到一九五八年末，埃及领导人便开展了一个反对大资本家的运动，但同时指出，这里要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私人资本。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九五九年建立的伊拉克军政权。首先讲几句关于伊拉克一九五八年的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以努里·赛义德为代表的亲帝国主义封建君主集团的统治。

革命的先决条件酝酿了好多年，各政党进行地下活动，在这些政党中，活动能力最强，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是共产

<sup>①</sup> 《东方》（贝鲁特），1959年1月6日。

<sup>②</sup> 《鲁兹·优素福》周刊，1958年12月1日。

党，军队也投入了这场斗争。根据哈杜里提供的资料，早在一九五四年初，军队中就有了“自由军官”小组（可能受埃及影响，尽管同埃及军方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sup>①</sup>政变准备了很长时间，组织这场政变特别困难。努里·赛义德本人原来也是将军，在他所处的年代，经历了不少次政变和叛乱，他时常戒备着，深怕军方发动袭击。如果不派军队去打仗，他就不准分发枪支弹药。一九五八年七月，暴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当时努里·赛义德决定把部队派到约旦去进行一场武装干涉，以镇压黎巴嫩发生的反帝起义。

赛义德受到了命运的嘲弄。派往约旦的部队由伊拉克的“自由军官”小组领导人担任指挥官，一个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一个是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中校。这两个人是好友，他们在巴勒斯坦战争中都是营级指挥官。阿里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负责指挥第二师的第二十旅，这个旅的驻地在靠近约旦的边境地区，卡塞姆负责指挥第十九旅，这个旅部署在巴格达的北面。<sup>②</sup>

卡塞姆被委任为赴约旦部队的总指挥，他领到了弹药。非常凑巧的是这时政府的所有领导人都在巴格达，他们准备七月十四日飞往伊斯坦布尔参加巴格达条约委员会会议。在同一天，卡塞姆的部队已经领到了弹药，准备出发。卡塞姆改变了去约旦的方向，带部队返回首都。七月十四日拂晓，阿里夫指挥的第二十旅开始进攻王宫。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战斗，

---

<sup>①</sup> 哈杜里，《军队在伊拉克社会中的作用》；另见《军队在中东的作用》，哥伦布出版，1963年，第44页。

<sup>②</sup> 贝尔博士：《中东——东西方之间动荡的国家》，第227—228页。

“黑暗的制度”终于推翻了。整个上层领导统统都被消灭：费萨尔国王和他的叔父、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还有王室的其他全部成员都被打死在王宫的台阶上。努里·赛义德逃走了，但是两天之后又被群众格杀街头。

共和国成立后，以卡塞姆为首的革命政府也随即组成。阿里夫担任他的副手，并兼任内政部长（同样在军内卡塞姆担任总司令，阿里夫担任副司令）。同埃及革命不同的是没有建立任何军事领导机构。群众只知道两位领袖——卡塞姆和阿里夫，这两个人的肖像到处都并排挂着。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巴格达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群众代表，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对政府的支持，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最大。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大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的拥护者广泛开展活动。被旧制度窒息的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了。反动派躲藏起来了，富人为自己的生活担心。成立了人民法庭，开始对“黑暗制度”时代的活动分子进行审讯并判刑。在议会大厦原来写着“为上帝”几个大字，现在已改成“为人民”了。

土地改革法公布了。这个土改法基本上是照抄一九五二年埃及土改法的条文。人们在等待宣布以某种形式实现伊拉克和埃及的合并。阿里夫飞到开罗，受到纳赛尔的接待。阿里夫表示钦佩和忠于“阿拉伯革命的领袖”。全国都期待着经过一个短期过渡阶段之后举行议会选举。在形式上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继续存在，这些党早在革命前就同“自由军官”建立了联系（这些党包括共产党、复兴社会党、国家民主

党、独立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sup>①</sup>

国家民主党和独立党都是首都知识分子的团体，实际没有真正的组织，特别是在各省。只有共产党和复兴社会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竞争，而共产党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有关选举和未来的国家机构问题，卡塞姆坚持自己的主张，从一开始就争夺个人权力，了解卡塞姆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正直并有自制力的人，但同时又虚荣心太大，贪图权势。卡塞姆不想举行选举，因为这种选举很可能导致一党或几党执政，从而结束他为实现自己专权而宣布的特别状态。卡塞姆作出了无休止的口头承诺，但拖延建立正常的政党的生活，这实际上是要把过渡时期变为正常状况。他也不愿意组织自己的党，可能他自知没有作为政党的领袖的才干，而且还可能因为担心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政党无法同已经建立的那些政党竞争。为了打好这样的基础，他必须招聘理论家和组织活动家，并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们。当然，卡塞姆能够禁止所有的政党，建立自己的一党制，但是这样会造成党的上层领导的出现，从而分散权力，而且还要制订纲领，使得自己耍手腕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卡塞姆认为，他只需要无党派的专家，因为这些人随时可以撤换，而且这样可以使自己不被一定的组织形式、方针和纲领所束缚。他懂得，纳赛尔的榜样对他来说是不能仿效的，他觉得他同纳赛尔不同的是，他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威信，也不是有经验的活动家；如果某个政治组织成立之后，他不一定能够有把握地保持自己对它的领导。

<sup>①</sup> 但无论共产党人或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人在卡塞姆政府中都没有代表。

显然，卡塞姆本能地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领导能力有限，也不能适应（虽然他一直有这样的愿望）。他正是因为感到各方面都不具备条件，因此尽量同那些在能力上超过自己的人和组织疏远。他决定抑制这类人和这类政治力量，并在各派力量之间随机应变。他情愿不去建立群众基础，不去制定一定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战略方针，因此正是卡塞姆本人为自己政权的垮台埋下了祸根。

一九五九年秋，卡塞姆击败了复兴社会党的支持者之后，又迫使共产党转入地下。共产党在人民中是最有影响的，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的党。也就是说，从一九五九年夏天开始对共产党进行镇压，卡塞姆的这个决定性步骤一直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在评价上述事件时，不能抹杀军队的作用，军队虽然是被动的，但同时是决定性的。如果要是一九五九年春军队站在共产党方面，或者同情共产党，那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共产党的影响只是在空军内表现得比较明显。整个军官阶层的情绪是不利于共产党的。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党使用暴力，那就会被军队所镇压；因此在得不到军队支持或只有一部分部队支持的情况下，任何武装起义都是冒险的。

黎巴嫩记者马吉达兰尼非常了解伊拉克事件，他写道：“卡塞姆尽可能地留用努里·赛义德时期的军官，他只是撤换了实在不可信的人。这样军队就保留了原来的指挥系统，他们对任何要进行深刻变革的进步政策都抱敌视态度。”<sup>①</sup>

<sup>①</sup> 马吉达兰尼，《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的经验》，《中东论坛》，1965年，第四十一卷，第二期，第46页。



这是对卡塞姆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描绘。他不顾民主派人士的要求，拒不清理国家机关，在这些机关里有许多努里·赛义德政府的反动官僚。所以象土地改革这样的事情便进行得很慢很不顺利，土地分配工作象乌龟爬行一样，地主和管家纵容或鼓动地方政权暗中破坏土改的进行。

要扫除反动派的阻力和实施土地改革，必须依靠群众，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但要这样做必须有一个纲领，必须有一个有觉悟有热情的政治组织，一个革命先锋队的党，但如上所述，这样做卡塞姆是害怕的。这样的党本来已经有了，谁也比不过共产党能够号召和发动人民群众，这个党遭到了卡塞姆的打击，这个能够制订革命纲领的组织被他取缔了。他解散了农民协会。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归根到底，卡塞姆的土地改革等于零。农民这支最大的革命队伍对卡塞姆的信赖消失了。

中央和地方机关都填满了反人民的官僚走狗，他们推动卡塞姆去接受旧制度的遗产，他们抱定一种“思想主张”，那就是反共主义。保守和自私，充满着宗教和沙文主义的偏见，他们都仇恨共产党，因共产党人象征着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

所有这一切都同军人官僚制度有关，这些老军官是卡塞姆原封不动地留用下来的，向这些老军官看齐的还有中年军官，而青年军官还没有足以自立的力量。这就可以令人理解，就整个来说，军队的作用是被动的，而持积极反共立场的主要是卡塞姆周围的上层军人集团，这些人不断地把他拖向右转。

这些军人官僚的反动性和反共主义怎么能同他们七月十

四日推翻君主制度的行动相协调呢？首先，不应只根据他们推翻努里·赛义德政权这一点而对他们的革命性估计过高。历史证明，往往是推翻反动专制君主的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仇恨这种专制君主和力图推倒这种寡头政治从来就不意味着一定是进步力量。伊拉克军队的多数高、中级军官在社会意识方面并不比努里·赛义德政府的官员们进步。差别仅仅在于这些军官是属于另外一代，属于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一代，他们在英国人面前不再奴颜婢膝，丧失伊拉克的民族尊严，不再执行努里·赛义德所奉行的狂热的反纳赛尔主义和组织阿拉伯各君主的“神圣同盟”等政策。此外在“黑暗制度”时期，军官在政治上不能发挥作用，政权从来都是被那些老大臣所独占，军队中已经担任要职的青年军官，如卡塞姆和阿里夫虽已心怀政治目标，但是也只能在消灭了被人厌恶三十年的旧统治集团之后才显露出来。

起来推翻阿卜杜勒·伊拉赫—努里·赛义德亲英集团的同时，伊拉克军官在一九五八年感觉到自己（公开这么讲）是“金方框”事业的直接继承者（这里指的是四个民族主义上校，这四个人在一九四一年领导过反英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一定的社会目标）。

一九五八年，这一代军官不仅继承了前辈的事业和口号，而且还继承了他们的民族主义世界观——正是民族主义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外国的压迫和本国的暴政；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从阿拉伯军官（不仅是伊拉克军官）身上可以很好地看到，他们之所以局限于民族主义和反帝，是因为他的眼界非常

狭隘，社会意识贫乏，有反民主的思想，盲目地反共，而且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反理性主义。叙利亚的左翼青年军官属于例外，第一是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劳动阶层以及极其贫困和受歧视的那部分群众。第二是因为在思想观点方面他们受到先进知识分子和复兴社会党党纲的巨大影响（这个党纲甚至在右翼领导人领导复兴社会党时，在客观上仍是进步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叙利亚的文化水平比埃及高，比伊拉克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在埃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军官带着怀疑和敌意对待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先锋党。

从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九五八年曾经支持过革命的许多伊拉克民族主义军官在对待革命的进步发展、社会改革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等问题上，持反对态度。正是这些人（尽管个别人有变化）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三年间围绕在卡塞姆的周围，尔后围绕在阿里夫两兄弟周围。在伊拉克军事官僚阶级直到最近还是一个雄厚的力量，成为这个国家向进步方面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个阶级是卡塞姆政权的支柱，在不小的程度上正是受这个阶级的影响，人们所期待已久的革命蜕变成了这样一种人的专政——这种人没有纲领，没有思想主张，没有能力，对人们的各项要求一一给予承诺。卡塞姆作出的诺言不多不少，正好象“每个月一次新的革命”。但是人们不需要“每个月来一次革命”。他们总共只需要一次革命，但必须是真正的革命，通过这个革命消灭不平等和剥削、贫穷和失业。这样的革命在卡塞姆时期伊拉克人民没有能够等待到。“为了人民”只不过是呆板地刻在不再召开会议的议会大楼墙上的一句空

话，成为革命未能进行到底的标志。这场革命好象沙漠中的小溪，慢慢地干涸了。

卡塞姆政权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是谁来推翻它，由于卡塞姆大大地“得罪”了复兴社会党和共产党，<sup>①</sup>很自然卡塞姆终究会遭到他们的致命打击。一九五九年三月，穆斯林的暴动失败之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负责人得出结论：此后要取得政权的唯一途径是杀掉卡塞姆。从此就开始专心的准备，由于各种原因，这计划拖延到一九五九年十月才执行。卡塞姆坐着汽车，当行驶到巴格达的中心街道时，遭到了枪击，卡塞姆受了伤，复兴社会党的负责人逃往国外。

谋杀卡塞姆的一系列步骤都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因而决定通过军事政变把他推翻。为此，串联了对卡塞姆不满的军官。自然，首先联合的是原卡塞姆的助手阿里夫，因为一九五八年末，卡塞姆同阿里夫已经发生尖锐的冲突，阿里夫被判死刑，但后来又获得释放。阿里夫同军界保持着联系。复兴社会党的首领赛基是塔巴克恰里将军的女婿，塔巴克恰里在一九五九年因同穆斯林事件有牵连而被卡塞姆下令判刑。塔巴克恰里在军队里颇有声望，后来遭到枪决。于是，卡塞姆自己在军官中树立了敌。由于各种原因而“怀恨”卡塞姆的军官包括：塔赫尔·叶海亚、纳吉·塔列布、马赫迪·萨勒·奥马什以及其他在军队中有名望的军官。

复兴社会党的计划不仅要打击卡塞姆，而且包括共产党，后者并且是复兴社会党要集中报复的目标。“国家近卫军”早

---

<sup>①</sup> 民族主义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者，他们还被称为尤尼昂分子和纳赛尔分子。

就决定要成立。准备好了数以千计的绿色臂章、棍棒和冲锋枪，按照门牌和街道编成共产党人的名册，以便于实施大逮捕。

这股阴谋力量的领导核心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终于形成。参加这个核心的有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和军队的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拂晓，巴格达的市民被炮弹的轰隆声震醒。起义部队的坦克和飞机猛攻国防部大楼，因为卡塞姆住在那里，而且他早已被迫害狂所跟踪，经常处于被谋害的危险中（白天他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用两个他的肖像和几十个半身像作掩护，夜间他在加强保卫的情况下进行工作）。防守被突破之后，警卫部队投降了，卡塞姆在地下室里坚持了很长时间的还击。他同阿里夫通了电话，要他顾全老朋友的友谊，请求允许他出国，但是遭到了拒绝。二月九日早晨六点，一切都解决了。从半破坏的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走出一个人，他摇晃着走到伞兵营士兵们的面前，他掷下带空弹匣的自动步枪，这个人的衣服已破碎，身上已经烧伤，穿着将军服。他是“唯一的领袖”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他被带到广播电台大楼，在那里他受到革命指挥全国委员会法庭的审判。阿里夫以指控的方式痛斥了自己原来的朋友，卡塞姆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他被判处死刑。二月九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卡塞姆被绑在椅子上枪毙在阿拉伯音乐厅里，同他一起枪毙的有他的亲属、原人民法庭庭长迈赫达威和其他被推翻的首领。

对于巴格达的市民来说，没有什么怀疑，他们的“唯一领袖”死了，第二天在电视中播映了倒在椅子下面的卡塞姆的尸

体，身上还有被自动步枪子弹打穿的孔。

阿里夫当了总统，但实际上整个权力都集中在以赛基为首的复兴社会党的右派手里，赛基是个贪图权势和非常残忍的人。横行的暴政代替了原来的专政。

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迭之后，都不象伊拉克那样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而且即使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象一九六三年这样残忍地使用暴力和疯狂地进行的迫害，也是空前的。

企图在二、三月间消灭共产党，把几万名有民主情绪的人投进监狱，盖世太保式的拷问和凌辱，五月镇压共产党，夏季和秋季对库尔德民族进行了一场歼灭战——这些可以说是赛基集团统治的主要标记。

军队上层领导推迟了第二项计划。赛基和沙皮勃及其集团把持了政权。军人首领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理想的目标。伊拉克的军事官僚上层领导同复兴社会党的关系如同叙利亚资产阶级同复兴社会党的关系一样，同共产党相比，资产阶级所遭受的灾难较小，但由于当局要防止任何周折，他们同样被看作是不可信的人，未能分享权力，软弱的伊拉克资产阶级同复兴社会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奥斯特洛维佳诺夫十分正确地写道：“对于二月事件，一部分资产阶级理解到了这是一次反资本主义的政变。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右派复兴社会党极力树立自己无限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同别的阶级和阶层发生更加尖锐的冲突。政变打击的不是集中在一个目标，而是象扇形一样，它击败了各式各样的对手……。极端分子领导集团表面上好像是奉行激进主义，这一假象使人联想

对象某些资产阶级标榜信奉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对于自以为是超阶级和超民族的复兴社会党右派来说，反对所有主要阶级是合乎规律的。”<sup>①</sup>

正当复兴社会党致力于迫害共产党和纳赛尔的拥护者，进行同库尔德人的战争和日益尖锐的内讧时，却没有注意到来自军队的威胁。赛基后来侨居国外之后说：“革命是由第四营的青年军官发动的，因为我们只让年老的军官参加了全国委员会，我们没有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让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当了总统，尽管在革命后三天我们就同他之间发生了冲突。”<sup>②</sup>实际上伊拉克的高级军官是复兴社会党的不可靠的同路人。

复兴社会党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即没有注意清洗军队的上层领导，没有从传统机构中把那些反对一切激进改革和所有持极端主义（无论是左的或是右的）的人清洗出去。将军们首先发现复兴社会党内的政治冒险主义者要把军官排除出政权之外，而这个政权正是将军们想要得到的。当复兴社会党的头子自己互相争吵时，阿里夫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动了新的政变，推翻了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的统治。政权终于第一次由军人上层领导直接掌管。这个军人领导集团本来已经因卡塞姆为实现其个人独裁而削弱和涣散了，并且又被复兴社会党排挤到了末位，但从此开始，好几年内军人官僚集团都是伊拉克最有影响的力量，当然把这个集团看作是

<sup>①</sup> 奥斯特洛维佳诺夫：《复兴社会党民族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6年，第一期，第45页。

<sup>②</sup> 《阿拉伯政治文献》，第33页。

一个统一的力量也是不对的，事实上军队中的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上文已经一般地介绍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拉克军官集团。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间，他们基本上是保守的和守旧的，没有什么变化。马吉达兰尼指出，卡塞姆被打倒之后，“少数同卡塞姆关系密切的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大多数年老的军官原封未动。虽然政治上接受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但在军队中仍保留了守旧的传统。”<sup>①</sup>在推翻了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之后，这个传统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因为这时已经不用再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博得复兴社会党头头们的欢心。

是的，一九六四年伊拉克颁布了所谓社会主义法令，根据这些法令实现了许多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并以埃及为榜样，成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打算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党。但这是个极大错误，没有考虑伊拉克当时同埃及和叙利亚的情况不同而去生搬硬套。

伊拉克当时的工业很薄弱，工业资产阶级的人数很少，资产也不多，远未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同叙利亚和埃及不同的是把工业企业国有化，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反对政府，用不着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资本主义。至于说工业资产阶级，它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获取政权，巴格达、巴斯拉、摩苏尔的大商人资产阶级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一九六四年的国有化给国家带来了好处，但是这个好处并不大，因为由于整个工业很薄弱，很落后，它在伊拉克所起的作用远没有象在埃及

---

<sup>①</sup> 马吉达兰尼的文章，载《中东论坛》，1965年，第二期，第46页。



和叙利亚那样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提成要比加工工业的收入多得多。<sup>①</sup>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还不存在要打击资本家和货币流失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经济战线上还没有出现象埃及和叙利亚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伊拉克一九六四年的国有化要控制的不是经济局势，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希望得到纳赛尔的支持，阿里夫总是以纳赛尔的崇拜者标榜自己）。

但是，当那些指挥官体会到国有化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立就是伊拉克同埃及合并的开始时，他们很快就为之失望。军人上层领导根本不愿意合并。原因是：第一，由于上述的一九五八年革命时的因素；第二，他们不希望因为合并而带来的变化（他们最害怕的是纳赛尔撤掉他们，换成自己的人）。当然纳赛尔的忠实崇拜者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也未必就乐意让出他作为伊拉克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所有纳赛尔分子的部长都被迫离开政府，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实际上也成了空架子，它的领导人被赶出政府，凡是纳赛尔分子都被解除了职务。之后，甚至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办公地址也上了锁。

在宣布土改后的八年内，总共只有三十多万家农户获得了土地，这个数字相当于缺地和少地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二。但农民得到的是坏地（几乎有一半是不能灌溉的），而好地仍在地主手里。贫穷、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横行霸道仍是农村的灾难。

<sup>①</sup> 六十年代伊拉克每年从石油获得的收益约一亿三千万英镑，国家总预算约二亿第纳尔（2第纳尔=1英镑）。

共产党无论在阿里夫的前期和后期都处于地下，任何外交政治步骤都不能缓和军方和文职官僚的有组织的反共。

军事官僚资产阶级反对建立任何有思想纲领的政治组织，因为思想纲领会吸引群众，所以共产党和复兴社会党都在被禁止之列，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也不能积极开展活动。统治集团也不希望资本主义倾向过分发展，他们正确地意识到如果强有力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得到西方资本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它就会在政治上处于控制国家的地位。

毫无疑问，同库尔德民族的战争大大地影响了现代伊拉克的发展。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分散了发展国民经济的财力，阻碍了国家的正常发展；也给库尔德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难以想象的负担，同时使伊拉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这场战争只有军队上层领导才需要，因为战争在进行，军队就成了注意的中心，谁都不会再否定它的主导地位，军人享有的各种特权就被认为是正当的，任何人胆敢反对，都可以在“民族利益”的旗号下加以严厉申斥。在军事状态的条件下，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要压制民主。如果不是因为耗费过多、损失太大，这个战争还会继续下去的。正因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人民群众表示严重不满，政府才不得不停止战争。

伊拉克的人民群众对军队的统治是不满的。从英国记者的报道中可以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很多证明，“军官们作为一个阶级，在伊拉克越来越不受欢迎，这是由于他们从卡塞姆时期就开始过的奢侈生活，不断搞阴谋，对国家政权的干预等等

引起的。”<sup>①</sup>

一九六七年的一期《国际工人运动》杂志写道：“军官不仅在中央机关占据关键性的岗位，而且在地方、国家经济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宣传等机构中都是这样。军队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文化体育。与之相配合的，还有英国殖民统治者留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军队是国家生活的主要调节者……。经过一定阶段后，客观上加强了保守力量……。原来的封建地主迁往城里，把地租收入投入到经济现代化部门，特别是投到城市建设、商业等部门。但这些都是非生产性领域。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条件并按照习惯，他们同其他保守势力联合起来。行政机关和军队的独立性的增加和扩大使得保守力量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些保守力量通常可以作为军队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不能把他们视为一体。”<sup>②</sup>

军队成为享有特权的团体。同邻近国家的军队相比，伊拉克军人的薪金最高，在库尔德地区服役的军官，由于他们多年不断地同库尔德少数民族打仗，因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和额外休假。退伍军官购置了华丽的别墅。塔赫尔·叶海亚中将几次领导政府，伊拉克人给他一个绰号叫“巴格达的贼”，大家都公开讲，说他从石油公司得到了五百万第纳尔。

伊拉克的军人官僚体制是卡塞姆建立的，同时也保留了阿里夫时期的主要特点，有时也挥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社会主义同反共主义是不相容的。有数百名共产党

<sup>①</sup> 《卫报》，1966年8月8日。

<sup>②</sup> 布拉尼斯拉夫·乌科维奇：《在十字路口的伊拉克》，《国际工人运动》，1967年，第一期，第91页、96页。

员和进步活动家、爱国者。伊拉克人民的优秀儿子被关进了监狱，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任何改革、任何积极的对外政治活动都不能改变这个政权的反动和恐怖的实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伊拉克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伊拉克的现政权早就应该铲除。”

这个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问题是在这些互相竞争的军人集团中究竟由哪一个集团来推翻它。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由于他弟弟飞机失事而身亡，使他偶然担任了总统，但他没有能力，很难担任国务活动家的角色。按性格，他不是一个人独裁者，但是他也不会（或不愿意）成为一个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倡导者。泛阿拉伯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军官对他不满的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促进阿拉伯的统一。复兴社会党的军官对一九六三年他弟弟取缔复兴社会党统治的仇恨转移到他身上，英国学校培养的“努里·赛义德”派老一代军官对阿里夫的对外方针和他对“伊拉克石油公司”打击不力表示极其不满。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益的军官在阿里夫把该派的首领巴扎兹的总理职务撤去后，就同阿里夫决裂了。主张恢复库尔德战争的那些人对阿里夫不能宽恕的是因为他反对重新发动这场战争。而库尔德人则对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和给他们以自治而失望。左派痛恨阿里夫政权继续野蛮地镇压共产党，右派则不满他拒绝恢复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不给西方资本打开大门。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又因阿里夫政府在“六天战争”期间持反帝立场而把它当作敌人，并对阿里夫进行一系列指责，说他不重视军队方面的要求以致在约旦—以色列战线上受到严重挫折。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十三名退休的高级军官上书阿里夫，信中要求恢复立宪制度，筹备议会选举，反对他的“个人专政、脱离人民、以及他未能认识巴勒斯坦战争的巨大失败”。六月间，贝鲁特的报纸报道了王朝时期的政客由于从国外得到金钱和武器，又重新活跃起来。伊斯兰教界人士也对阿里夫政府不满。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就有六名政府官员辞职，六月又有两名库尔德人部长辞职，七月初土改部长和劳动部长也相继辞职，七月二十日，总理塔赫尔·叶海亚宣布改组政府。最后于七月十七日夜，阿里夫的私人近卫军的军官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告诉他军人已经准备起来造反，然后把他送往机场，在那里已经有一架飞机等着他……

据埃及报纸报道，七月十七日的政变是由两支部队发动的，即共和国近卫军和侦察部队。共和国近卫军于一九六六年六月镇压了前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发动的叛乱之后，就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近卫军开始干预政治，它的军官被称为“宫廷军官”。近卫军的首领是达乌德中校，近卫军的坦克营长加伊丹少校曾同阿里夫讨论过政治问题，有一次曾要求他对政府实行改组。<sup>①</sup>

另一个密谋中心是侦察部队：该部队的第二把手纳伊夫中校是青年军官集团“阿拉伯革命运动”的成员。政变后纳伊夫任总理，达乌德任国防部长。四月二十日写信给阿里夫的作者担任了主要领导人。贝克尔任总统，阿马什任内政部长，提克里蒂任总参谋长。但是这种“双人政权”只维持几天。七

---

<sup>①</sup> 《金字塔报》，1968年7月18日。

月三十日总统解除了总理的职务。纳伊夫和达乌德被排挤出伊拉克的权力之外。贝克尔将军任国家首脑兼总理和总参谋长。复兴社会党又重新执政。但这已经不是一九六三年的那个复兴社会党了，它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左的反资本主义倾向。

伊拉克的军队同埃及、叙利亚的军队是一样的。但它在卡塞姆和阿里夫时期为什么都不能起革命民主力量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这样回答，即一九五八年革命之后，军队采取了反共立场。反共主义同社会进步及民主趋向是不能相容的，这不仅是因为同这支最积极、最真心致力于社会进步深入改革的力量割断了联系，同时还因为反共情绪会促进反动思潮的发展，对进步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人们接受先进思想，使得沙文主义和宗教观念的根基更加牢固。当然，反共主义本来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观念产生的，牵扯不到阶级不和问题。纳赛尔、奈温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左翼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方针不是偶然的。在埃及，当然不是说纳赛尔非得同人数不多，影响还不大的共产党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在他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明确地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并非敌人，亦非竞争者，而是同盟者。

然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伊拉克共产党是强大的，它有可能取得政权。这就吓坏了军人集团。他们首先不是从思想上，而是从政治观点上着眼来看待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是要同自己竞争的政治机器。

此外，他们害怕的还在于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人，有它自己固有的阶级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族主义和宗教偏见，文化水平较高，视界比较开阔，有才能，等等，并能把共同利益置于集团利益之上。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是由历史、传统和整个政治斗争过程形成的。这是因为有非常悲惨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斯兰教影响到所有人对生活 and 事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品行。

民族主义和宗教都会影响人们的态度，使之对共产党及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无神论团体等更坏。处于统治地位的小私有者的特征（包括军官在内）不承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反对它的英国国教，是异己者。

只有那些最进步最清醒的少数人才能挣脱这种精神枷锁。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中都有共产党员，但人数很少。基本群众都得顺应传统和从孩提时起就过惯的环境。所以，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革命民主军官中反共偏见仍很强烈。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还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的恐共病，他们把共产党视为私有制的敌人。总而言之，可以想象，伊拉克革命后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有多大（所以他们吓坏了军队上层领导），这也可以理解伊拉克的军人官僚制度为什么要反共，进而反民主。

还应当谈一下伊拉克的特殊性。这个国家的罪魁是多民族、分裂主义、教会主义、集团主义利益，等等。伊拉克的居民首先把自己看成是阿拉伯人或库尔德人，然后才是伊拉克人。阿拉伯人首先又把自己看成逊尼教派或十叶教派。复兴社会

党右派把共产党看作主要敌人，从来不认为一九六三年的屠杀是不应该的。共产党则反对这一切人，同样也反对政府。

最后还有一点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文化水平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在伊拉克，民族天性是富有朝气和多情，但缺乏宽容、人道主义和眼界狭隘。血缘复仇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提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带有集团复仇传统的特征，而且规模很大，非常残忍。伊拉克进步力量的团结一直到近年来依然非常困难。

由于有这个背景，问题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高级军官能掌握政权，并形成一个统治阶层——军人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没有一定的目标和纲领，有时能够急转弯，要弄不少手腕，它能统治伊拉克是暂时的。

由军队掌权的热带非洲许多国家，军政权的前途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有些国家在向进步的方向变化中。

多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军人夺取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在埃亚德马的第一任内阁中，除了他本人，还有三名军人和七名文官，一九六九年埃亚德马宣布，军队已经稳住了国内的和平和经济。所以打算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成立一个“多哥人民统一党”（多哥人民联盟），党的领导人不少是文官政治活动家。一九七一年八月，在拉马卡拉召开的多哥人民联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根据这些政治活动家的愿望，要求军队返回兵营，提出了“立宪制”的口号，准备恢复文官统治，但是政治家打错了算盘，他们不懂得军官们都不准备放弃政权，埃亚德马本人也绝不愿当一个普通人，甚至不愿只当一名高级军官。



斗争持续不久，军人就轻而易举地获得全胜。埃亚德马领导这场斗争很有技巧：全会后，紧接着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就打算恢复文官体制，并通告不要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因此掀起了一场反对这项决定的浪潮。大量的信件寄给埃亚德马，要求他撤销这个决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军队给了政府工作人员以沉重的压力，迫使他们起来反对党的领导，这个党的领导成员多数是文官政治家。五天以后，埃亚德马宣布，他“与军队一起依从人民的意志”。<sup>①</sup>

同年十一月，在帕利梅召开多哥人民联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开幕时情况就变了，“拉马卡拉精神”不再存在了，唯一的报纸《多哥新闻》写道：“当年那种老式的立宪制已经不再必要了，按照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意见，这种无力的代议制在多哥已经不应该有它的位置。”<sup>②</sup>埃亚德马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撤销了他原先答应恢复议会制的决定，说“这个决定没有得到人民的批准……多哥人对恢复政治家执政的思想感到愤慨。”<sup>③</sup>代表大会推荐埃亚德马由旅级军衔晋升为师级，并选举他为党的主席，成立了全国委员会，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构。委员会中高级军官占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从而使他们对党拥有不可改变的影响。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举行全民投票。人民赞成埃亚德马提出的一党军人体制，埃亚德马将军获得99.87%选票。这样，新体制就算最后批准了。它的代表形式就是多哥人民联

---

①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1973年，第五十一期，第49页、52页。

② 同上，第52页。

③ 同上，第49页。

盟党，这是个群众性的组织。根据一九七二年初的资料，参加这个党的成员占多哥成年居民的 86.55%。

多哥军队上层领导的特点是落后的北方人占多数，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都是从法国军队低级军官提拔起来的，八个人有五个是这样。其他的上层领导是在法国军事学校学习过的南方人。

外国观察家认为政治稳定，经济有成就和埃亚德马将军有无可争辩的威信，标志着多哥是非洲最稳固的军人政权之一。

在上沃尔特，拉米扎纳将军同样牢牢地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这个国家的军政权具有另一种特点。一九七〇年进行了普选，韦德拉奥果担任政府总理。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执政党，而是多党制。一九七〇年六月，举行全民投票，通过宪法，规定总统应该由军衔最高的军官担任，三分之一的内阁部长由军人担任。这与多哥一样，军队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合法化，但也有不同之处：上沃尔特宪法规定，现在是过渡时期，到一九七五年将恢复文官政权。根据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军政权在国内很有威信，因为它倾注全力为解决经济问题而斗争。上沃尔特的国民生产按人口平均占世界的第一百三十五位（即倒数第二），仅次于马拉维，美国杂志《非洲报道》上的一篇文章曾用过这样的标题，“上沃尔特：忍受吧，什么也没有”。<sup>①</sup>

在达荷美，索格洛将军的军政权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被

---

<sup>①</sup> 《非洲报道》，1973年，5—6月。

推翻，军事政变的结果（短期内成立第四共和国），阿里方斯·阿莱夺取了政权并兼任总参谋长（这个职务是在索格洛政权建立后才有的）。索格洛政府的危机是从一九六六年秋开始日益严重的。当时索格洛征收“民族团结税”，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减少工资25%。政府工作人员举行罢工，接着是教员罢教。换句话说，严重局势继续存在：资金缺乏和社会阶层不满等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阶层（基本上是职员）在政治上“多少起了点作用”，为了节省资金，他们忍受着物质上的匮乏。

危机虽然勉强被控制住，但是索格洛没有能力解决曾使马加遭受失败的那些问题。在这种状况下，青年军官中反对派的力量便得到加强。青年军官在一九六七年初组织了军事警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取代索格洛掌权后建立的民族复兴委员会。但看来青年军官未能控制新的委员会，因为后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六十人组成的两个分队发动了政变，推翻了索格洛，解散了军事警惕委员会。

夺得政权的青年军官在他们的告示中宣布：“我们这些达荷美军队的青年军官意识到要对全军负责，并理解到我们的领导人在欺骗人民……，”等等。他们批评了原来的首领“软弱无能”，断言说，“所有新的受害者都是人民，人民的购买力已经大大缩小，造成了实业界的萧条，商店和市场的冷落……经常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生活的农民群众耗尽了自己的劳力，他们的状况一点没有得到改善……。”告示还尖锐地批评了军政府的某些成员，“这些人权迷心窍，忘记了军人的尊严”。之后，新总统阿莱又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宣布，军队是“全国唯一有组织的力量，而政党只是用来进行选举的组织，我们

又重新被迫进行干预，不许最近发生的罢工再继续下去，这些罢工是由政府的不负责任引起的，但也造成混乱，极大地败坏以至破坏了达荷美军队的威信……。”<sup>①</sup>

因此，索格洛的军政权不解决任何一个一九六五年军官们反对的灾难性问题，显然从新的军政权首领声明中可以看到，贪污依然存在，虽然索格洛同它进行了斗争，并努力“创造新的社会气氛”，提出了“归还土地”和“部长下田”等口号。

第二个军政权没有能杜绝贪污。新政权把安全委员会解散后又成立了以阿舍马大尉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阿舍马与库昂德特指挥官联合于十二月十七日发动政变，但是刚过几个月阿舍马大尉因盗窃六千八百万法郎被控告，由特别法庭进行审判。<sup>②</sup>一九六八年三月，政府通过决议成立一个与贪污作斗争的“军事惩办委员会”，规定凡贪污资财达到十万非洲法郎给予警告处分，超过一百万的撤职，等等。

当时立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宪法草案，一九六八年三月，公民投票获得通过。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选举中，五个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获得多数选票，因而军政府对选举结果宣布无效，并推出前任外交部长埃米尔·津苏任总统，军政权形式上把处理国家事务的权能交给了文官政府，但军队仍是最高仲裁者。

津苏总统和监督他的军人未能得到安定，两年之后达荷美的政治指针旋转一周又回到原位。“最高三人领导”重新回到舞台上，传统的首领——阿皮蒂、马加、阿奥马德贝两次执

<sup>①</sup> 《西非》，1968年1月6日。

<sup>②</sup> 《消息报》，1972年7月26日。

政。这一次他们不再是轮流掌权，也不再搞“两个反对一个”的联盟，而是和最早那个时候一样三个一起当权。一九七〇年四月建立的独一无二的三头政治体制，并规定全国二百五十万居民将由三个平等的总统来领导，每个总统担任两年政府首脑。

第一任是马加，执政两年。但是第二任阿奥马德贝没有当上，军人又重新夺权。这一次看来是要永远抛弃达荷美政治棋盘上的“三个将”。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马季耶·克列库少校发动政变，并由青年军官组成军事革命政府，克列库声明，三个被推翻的总统“从军人管理部取得政权，军人管理部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解决摆在国家面前的问题，显然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军队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因而解散总统委员会”。<sup>①</sup>

克列库同埃伊阿杰姆一样，但与拉米赞不同，他声明，不再考虑把政权让给任何人，<sup>②</sup> 他不再恢复在索格洛时期已解散的政党。他还说，“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人民政党，而现在除了军事革命政府以外（这个政府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行机构），我们又成立了由军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sup>③</sup>

新政府宣布改革行政机关的结构，以消灭地方主义，清除军队中与新殖民主义集团有联系的老军官集团，成立负责拟定国家发展远景计划的全国委员会，并吸收工会代表和青年

---

① 《真理报》，1972年2月24日。

② 《亚非》双周刊，1973年6月25日。

③ 同上。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sup>①</sup>

《真理报》记者在评论达荷美独立后第五次军事政变建立的政权时写道：“现在掌权的政府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sup>②</sup>

克列岸政权表现出左倾，与几内亚接近，克列岸访问几内亚后说：“那末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教益的，如果今天进行象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那样的全民投票，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象几内亚人民一样去投票……那里进行着真正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我是钦佩的……我会以几内亚为榜样的。”<sup>③</sup>

马里一九六八年政变后，军人牢牢掌握了政权。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后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动：副主席兼总理、前军官学校校长约罗·迪亚基特在一九七一年被清除出委员会，因搞阴谋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三年宣布他因心脏病死去。现在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有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和十名大尉，所有六名军区领导人都是大尉。

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仍保持着莫迪博·凯塔的基本政治方向，但是特别强调秩序和纪律。军队宣布新制度依靠劳动、纪律和正义，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秩序，同时还宣布只要条件成熟，政权将移交给文人。当权集团中的第三号人物在同波兰新闻记者帕谢尔宾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说，尤苏弗·特拉奥雷大尉曾经这样解释过军事委员会的纲领：“独立发展

---

① 《真理报》，1972年2月24日。

② 同上，1973年8月8日。

③ 《亚洲》双周刊，1973年6月25日。

---

经济和不结盟。”大尉在回答关于这个政权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时说：“一部分人说我们是左的，另一些人说我们是右的，我们干自己的事，我们愿意同所有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既定目标的人合作。”<sup>①</sup>

在加纳，代替恩克鲁玛的新的军警政权，没有一定的纲领，对军官来说，当他们登台后，首先一定是破除旧制度，而不是建立新制度，因为这个集团指望资产阶级，安克拉政府认为私人资本应占首要地位，认为它是发展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

减少国营部分的比重。废除国有化的做法如下：把国营企业卖给地方资本家，只有外国资本可以按股份原则参加投资；出售给资本家的国营企业大部分都是能赚钱、能为国家谋利的，而且价格也特别便宜。

有时还采取了大量紧缩通货的政策，冻结工资。但是物价继续上涨，灾难性的失业成了新政权最严重的问题，收支逆差不能好转。

军政府指望国际资本的援助。国际资本重新对加纳感到兴趣。一九六六年，向加纳提供的贷款总额为五千三百万美元。<sup>②</sup> 寄希望于大量引进外国私人资本，但又无力抵偿。外国资本只限于向某些国营企业投资。地方资本没有大企业所拥有的资金。亏本的企业都是国家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关闭。

对外政策方面奉行“亲西方的不结盟”路线。军政权公开执行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方针。

内政方面，集中力量残酷镇压任何可能的反对派，颁布了

---

① 《政治周刊》，1974年1月26日。

② 《现代史料》，1967年，马奇出版，第151页。

关于“与破坏活动”作斗争的法令，这项法令特别规定了军事法庭有权审判文官和甚至可以判处死刑（对“破坏活动”最轻的刑罚为二十五年苦役）。<sup>①</sup>

政府宣布一九六九年打算恢复文官体制。但是在民主方面没有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所有进步分子均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理由而遭到迫害。几百名恩克鲁玛时期的部族领袖被开除公职，但是最大的领袖，如阿桑特亨仍保留原位。

缺乏思想、生气、胆量和坚定性。显然，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这个国家拒绝一切尝试，向新殖民主义投章；没有能力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制止失业的增长；军政权的声誉显著下降。许多原来对军政权有热情的人都起了变化。《加纳时报》写道：“那些在一九六六年初对军事政治轴心表示拥护、赞美和歌颂的人……，现在似乎也对这个政权感到失望，希望它马上消失。”<sup>②</sup>

军队领导人的目光短浅狭隘，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显然没有能力平息由于加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许多人仍认为需要用非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克服落后和建设新社会，他们忧伤地怀念克瓦米·恩克鲁玛时期，希望他能回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在宣告普选前五个月内，安克拉将军离开加纳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实力派人物”军事集团的首脑耸人听闻的辞职原因是，他犯有最腐朽的贪污行为，一九六六年，以“与贪污作斗争”为主要理由之一而发动政

<sup>①</sup> 《论坛报》，1967年3月10日。

<sup>②</sup> 《加纳时报》，1968年2月26日。



变的活动家被揭露出接受了外国公司贿赂。于是，加纳的第一个军政权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以严重败坏声誉而告终。

科菲·布西亚博士组织了文官政府，他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也是恩克鲁玛的政敌，这个政权执政两年内在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和政治都遭到了破产。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和食品缺乏已经达到危险的境地，指望外国援助不能实现。一九七一年全部外援等于加纳偿还外债的数量。国际市场上的可可价格继续下跌，一九七一年收购时期，收购者不肯给农户预付收购品定金，原因是中央收购机关根据新规定，要等可可豆真正入库后才能付给收购者货款，然后再付给农户，而农户习惯于在十月至来年三月的收获季节开始时就收到预付款，其结果是造成可可豆私卖增加和引起农户的强烈不满。

布西亚政府造成塞迪（加纳货币）严重贬值和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一到两倍。货币贬值是布西亚最不受人欢迎的措施，加速了他的垮台。

政府长期与工会作对，干涉工会事务，归根结底想要解散加纳工会大会。激怒了工人阶级，引起码头工人大批辞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一九七一年四月，大学生联合会举行代表大会，对政府采取完全反对的立场。

英国杂志《观察家》周刊写道：布西亚政府“是胆怯并怕痛地对待批评，对批评他的人采取高傲和粗暴态度，而这种批评呼声最高的是关于加纳经济状况的恶化。政府同独立存在的司法机关发生冲突。政府严格控制报纸，粗暴地禁止工会大会的活动（这对政府来说是最致命的），这就制造了军队上层领导反对政府的机会。当时还没有一个不满的集团能够同政

府对抗，只有军队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民不支持布西亚政府，所以军队不用特别费劲就推翻了政府。”<sup>①</sup>军队同样由于经济原因而对布西亚政权不满，一九七一年政府削减国防费用10%，塞迪贬值也打击了军官。

政府害怕发生政变，开始调换军官，特别是委派阿昌庞中校指挥第一步兵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搞政变策划者的头头（这里我们可以想起一九五八年的伊拉克卡塞姆和阿里夫）。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第一步兵旅按照阿昌庞的命令占领首都的战略要地，而且好象闹笑话一样，原来属于阿昌庞指挥的第五营已经守卫着那些要地。这次政变没有流血。

阿昌庞一九三一年生于库马西，阿散蒂人，他是个教员，二十七岁参军，被派往英国学习，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在联合国驻刚果（即扎伊尔。——译者）部队中服役。在全国解放委员会统治时期，他担任过一个省的省长，在布西亚时期当营指挥员。他的晋升是缓慢的，因为他与被推翻的克瓦米·恩克鲁玛集团没有关系。一九七二年政变时，他的同谋者都是原先在他指挥下的少校，这些人是作战军官，不是参谋军官，从来没有搞过政治。<sup>②</sup>

全国拯救委员会是领导机关，委员会的主席阿昌庞同时也是代行国家权力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总统和总理职位被废除了，政党被解散了。全国拯救委员会除了有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参加外，还有一些老军官，进入委员会的十二名军

<sup>①</sup> 《观察家》周刊，1972年1月16日。

<sup>②</sup> 《星期日电讯报》，1968年2月26日。

---

官中有七名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执行委员会也是由十二人组成的。<sup>①</sup>后来全国拯救委员会的委员减少到九人。

推翻恩克鲁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陆军中校阿弗里法试图同阿昌庞联合，宣布自己是他的朋友和同谋者，但是阿昌庞夺取政权两天后，阿弗里法便被指控为反对现政权而遭逮捕。<sup>②</sup>

法国《世界报》写道：“军队直接监督国家……全国拯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除司法部长穆尔外都是军官，全国十个行政区的十名领导人都是上校和少校。”<sup>③</sup>

阿昌庞自己怎样阐明他发动政变的理由呢？

“经过冷静观察，加纳是如此地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使得人民老是处在动荡中。一月十三日加纳武装力量采取行动，目的就是要永远结束在我们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虚伪和伪善，使人民能够有一个新的开端，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有理性的生活，在经济和社会民主方面能够有真正平等，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参加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

阿昌庞一月十三日指出：“我们进行的不是简单的政变，不是简单地由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而是要在我们国家进行一次真正进步的民族革命……使加纳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我们社会的原有基础……”

阿昌庞回避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他

---

① 《非洲报道》，1972年4月。

② 同上。

③ 《世界报》，1973年2月28日。

宣布，“那种所谓自由企业家活动的制度应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要用有效的计划来取代。”<sup>①</sup>

阿昌庞咒骂“新阶级是发横财的政治骗子，在他们手里集中了极其令人吃惊的巨大国家财富。他们简直在不可思议的财富中游泳，而那些疲于奔命的普通人、工人和农民则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全国拯救委员会决心结束这一切。”

加纳新的军政权建立一年半之后，《世界报》的一个记者曾报道加纳资本家对这个政权的不满。该记者写道：“没有许多分行和拥有外国资本的大公司都处于停顿状态。行政机关对它们多方阻难，使得它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不再增加储备，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监督。所有这一切都阻碍着经济发展。”<sup>②</sup>

全国拯救委员会通知全国所有挂外国招牌的采矿垄断联合企业，把55%的财产移交给国家，外国公司一律改为国营企业，可以保留私人财产，但不要外国贷款。正如阿昌庞指出的，“在通常情况下外国贷款是不能进入我国的。”<sup>③</sup>他还指出，今后政府开支将完全靠国内的经济来源支付。

国家货币价格的核定，<sup>④</sup>得到居民的普遍赞成，在一年之内黄金储备由三千一百万增至一亿一千六百万塞迪，贸易由赤字变成盈余。<sup>⑤</sup>恢复住房修理补贴，降低国家房屋的房租。取消“国家发展需要”的苛捐杂税（在布西亚时期这种税占工

---

① 《真理报》，1973年1月17日。

② 《世界报》，1973年7月28日。

③ 《真理报》，1973年1月17日。

④ 指纸币升值。——译者

⑤ 《世界报》，1973年7月28日。

资收入的5%)。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新政权确实认真地考虑了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真理报》记者写道:“扩大粮食基地是新政策的一部分。规定了可可、大米、棉花、甘蔗和其他农产品的最基本的收购价格,并且交货之后立刻付给农民现金。这个新政策收到了效果。国家本来被前政府搞得濒于破产的边缘,而现在有了相当大的数字的货币储备。可可、黄金、木材生产大大增加。这些是加纳的主要出口商品,与外国垄断资本家进行剧烈斗争的结果,政府才得以在黄金、钻石开采公司以及木材工业部门占有55%的股份。外国资本家的横行霸道受到严重打击。”<sup>①</sup>

在扎伊尔共和国(以前的刚果(金沙萨)),蒙博托将军的军政权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它的主要成绩是:民族团结,经济稳定,结束了过去的依靠外国的状态,恢复了民族尊严,整顿了行政机关的制度。

蒙博托政府把议员和省政府人员的薪金缩减一半,禁止收购和借贷外国货币,想在刚果筹建企业的外国人必须有不少于五千万刚果镑的资本(即三十三万三千美元)。

刚果军政权把城镇恢复非洲名称,宣布卢蒙巴为民族英雄,恢复基赞加的议会代表权,缺席判处冲伯死刑。恢复在冲伯时期断交的那些友好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蒙博托在国际斗争中的反帝立场使他的国家在外部世界重新提高了威望。蒙博托在与“联合矿业公司”争执中,他的勇敢和有原则的立场(最后折衷解决)显然在人民中赢得了声望。

---

<sup>①</sup> 《真理报》,1974年3月6日。

由于改组内阁和建立新党人民革命运动，十八个部长中十个是大学毕业生，还有三个也是高等院校的毕业生。

实现中央集权制。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撤销了城区的自治权及其独立的法律地位。以后城区的市长不再选举，而是根据执政党的推荐由内政部长任命，原来选举城市市长的选举机构由指定的委员会代替。在某种程度上，蒙博托是既实行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创造性地利用了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这样做，他就不能使没有前途的军政权过渡到进步的民主政权，从而维护住国家的独立性。蒙博托看到了未来。

蒙博托宣布了民族主义和“真正扎伊尔发展道路”，提出“扎伊尔独创性”的学说。这里指的首先是“神圣的非殖民化”，“扎伊尔的特性”。不仅改变城市的名称，恢复本国的老名称，还除去欧洲的姓名，用本民族的姓氏，总统本人已不用约瑟夫·蒙博托，而用蒙博托·塞塞·塞科。

统治集团的含意已经不完全是军人当政，军队依然是蒙博托的主要支柱，在政治局势恶化时，军队是他的后备力量，但是在金沙萨，将军们无权做出决定。总统在不断扩大人民革命运动（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影响，人民革命运动这一组织不是个政党，而是各民族力量的联合，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动力。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是最高权力机构，总统、政府、议会都要向它报告工作。当然，政治局的人都是蒙博托的可靠支持者。

蒙博托在他自己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目前非洲十三个国家的首脑都是军人，其中只有我基本上脱离了军队，而成了国家的第一个负责人……今天在国家的各政治机关中已没有一

---

个军人，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国家和地方专员中也都没有军人了。<sup>①</sup>

一九七二年五月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布，要使扎伊尔不再充当外国垄断集团的“原料仓库”，要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鼓励外国资本向扎伊尔投资，但是在所有新的公司中都必须有本国资本参加，鼓励地方私营企业，但这些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直接监督。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但是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他们。不久蒙博托便尖锐地批评企业家，说他们是“比昨天的殖民主义者还殖民主义者”（这指的是他们的工资和价格政策）。

显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在英加成立了水电公司，在马卢卡将建一个大型冶金工厂，重建造船厂，发展轻工业。同贪污和多妻制作斗争。由于政府取得无可怀疑的成就，所以大家都公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

总结热带非洲各军政权的活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凡受殖民主义教育的军官发动政变，都不是着眼于要进行革命改革，而是要维护现有的制度。总的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世界观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军官们都不相信议会民主，他们尽力使国家有更大的独立性，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很少有贪污行为。

在某些国家（如达荷美、加纳），“第一代”军官的军政权下台后，经过文官统治的过渡，让位于“第二代”军政权，这是属

---

<sup>①</sup> 《论坛》，1973年，第十一—十二期。

于新一代的军官掌权。这些军官都是青年人，他们受宗主国军队教育的影响较少，同殖民主义上层的关系也较浅。他们同“第一代”军官的区别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怀疑资本主义有能力消除国家的落后。阿昌庞同克列库的观点明显不同，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尼日利亚、扎伊尔和多哥的军事首脑看来都信任“自由企业家的活动”，但是必须在国家的严格监督下，使之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

在一般情况下军人是不会让出政权和“返回兵营”的，而且只要他们保持内部团结和相信自己能够对国家实现牢固和有效的统治，谁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做。显然，加纳推翻恩克鲁玛的军事首脑就是因为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而在塞拉利昂和达荷美则是因为内部斗争和不断地分裂。无论在非洲，或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军事仲裁者的主张都未加认真研究和阐明，但是在所有这些军人掌权的国家中，军队都自称为民族团结的保护人。如在多哥政党——多哥统一联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通过的纲领中指出，“今天要把军队排除出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军人已不再只关在兵营里了。

“军队当一个‘大哑巴’就会失去作用，军队同国家合成一体就能使政权稳定和巩固。”<sup>①</sup>

仅有上沃尔特的军政权曾公开声明效法塞拉利昂和加纳的例子，逐步把政权交给文官政治家。在多哥、达荷美、尼日

---

<sup>①</sup>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 49 页。



利亚、加纳、中非共和国，军队暂时不打算在近期为就交出政权。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掌握政权，就是因为具备上述条件，即自己的队伍团结和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地统治国家。

但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功统治呢？到目前为止在非洲存在的军政权是否都是实现了成功的统治？

首先应当指出，军政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根本缺点：它是不合法的，违背宪法的；它是政变的产物，即使它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就从法律观点看，军政权也缺乏合法的基础。如果只讲事情的实质，不讲什么法律，那么军政权必须比它的上届政府好。也就是说，它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社会公正、民族团结和经济上升。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社会舆论的心目中不仅是形式上而且是实际上“合法”的。最后还有一点是，军政权应当与军事独裁划清界线，不应该继续保持暴力形式。

根据这些标准，那末非洲军政权究竟有些什么优点？

看来最有成效的就是实现了民族团结的纲领。这就便于军队原则上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和部落团结的工具。非洲军队尽管人种非常复杂，但都使用一种语言——英语或法语，士兵用同一民族的思想进行教育。这样便有利于另一种情况：军人是纪律和集体化的支持者，使它本能地反对种族自治和地方性自治，因为这样的自治会削弱中央集权和促进离心倾向的发展。蒙博托和伊龙西坚决改组旧的行政系统不是偶然的：前者是立即把二十二个省缩减为十二个，并限制地方权

限；后者是实际上废除了尼日利亚的联邦制而试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已有的许多材料都说明军人原则上反对部落制，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本身根本就没有克服部落制对自己的影响。

军人比他的前辈更广泛地利用民族主义，把它作为思想纲领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途径。前面已经阐明“扎伊尔独特”的主张。引用马季寥·克列库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革命首先应该是真正达荷美式的，我们不应该同人家的思想发生什么关系，我们有自己的、达荷美的社会文化体系。”<sup>①</sup>

几乎所有的军政权都宣布要为社会的公正而斗争，反对各种社会集团的特权，而有些军事首领还尽力作出朴素和节约的榜样。如上沃尔特的拉米扎纳将军强调指出，他的薪金比他的前任亚梅奥果低五倍，而农业部长说，他的薪金比他当教师时还低，高级官员的薪金和补助费也都被削减。关闭了几个上沃尔特的驻外使馆，为了节约资金，电视台也关闭了，这样每年可节省七万美元。<sup>②</sup>达荷美的索格洛将军断然禁止为首都公馆安空气调节器。<sup>③</sup>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将军拿出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建造医院，禁止国务活动家上酒吧间、舞厅和集市，同时严厉批评“经常靠公费酗酒的政府工作人员”，并宣布“资产阶级统统都得消灭”。其他国家的军事首领也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奉行这个方针，其中某些首领还继续保持兵营生活。

---

① 《亚非》双周刊，1973年6月25日。

②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85页。

③ 《军事干涉》，纽约出版，1968年，第93页。

关于经济措施，前面已经讲过，看来效果最好的是多哥和上沃尔特，因为这些国家的军政权从一开始就稳定地发挥作用，而且已经有相当的“年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政权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在热带非洲的条件下，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如上所述，工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文官政府的政策是不满的军人。执政后首先就遇到财政经济困难的问题。在达荷美，军政权立即预先通知工会，他们不允许在工资问题上作任何交易；其中一个军事首脑指出，如果职员想要提高工资，那么让他自己来管理国家吧。在上沃尔特和中非共和国，满足了工会的某些要求，但同时预先通知工会，他们可不能再提出新的要求。拉米扎纳总统毫不含糊地声明，工会不应该“暗中拆政府的台”，<sup>①</sup>从而使双方的关系逐渐趋于正常。在索格洛统治达荷美时期，这一关系曾经是最坏的，索格洛拒绝满足工会提出的撤销降低工资 25% 的要求。有一个工会咒骂说，“短命的索格洛将军的军政权”是“极端厚颜无耻”的。<sup>②</sup>此后，一些工会首领便被投进监狱。一九六七年，新的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向工会作出让步，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索格洛政权的垮台。

整个来说，到目前为止，军政权和工会之间的关系看来已经稳定。

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殖民主义者走后，官僚制度成了新的上流社会的核心，它没有敌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很弱，人数不多，不能成为

<sup>①</sup>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 94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95 页。

社会的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很分散，政治上没有组织起来；农民，在政治上也不活跃；而青年激进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地位和（推翻殖民统治后）能够动员群众的主张。官僚机构便自命为主人，而军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只是它的工具。可是，政权的工具突然又变成了政权。自然，军政权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昨天还是万能的官僚机构与新主人（即军人）的关系。

第一必须指出，军官没有代替（也不可能代替）行政机构。J.李正确指出，与拉丁美洲和近东不同，热带非洲的军人没有建立“反官僚政体”，在行政机构中军官没有代替文职官员。<sup>①</sup>总之，非洲军队的军官数量太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除了那些声名狼藉、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外，旧机构一般都不动。无论在哪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都未发现任何严重的冲突。官僚机构非常忠实地为新政权服务。原因很简单，这些官僚们凭借其阶级嗅觉感到，旧体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们在这个体制中依然是特权阶层。几乎所有的上述军政权都没有任何要触犯官僚的比较激进的，尤其是革命的意图。在较多情况下，官僚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没有感到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但是在文官制度下，上流社会首先是官僚阶层，有其直接的政治代表——执政党。而军人掌权后，原有的政党活动即被禁止。被推翻的国家首脑原来也就是政党的首领，他们在新政权内没有地位，政党被解散了。热带非洲所有军政权的

---

<sup>①</sup> J.李，《非洲军队与民政》，纽约出版，1969年，第173页。

国家内，党的首领不可能得到重要的位置，军人不信任他们。一方面因为这些人过去的名声很坏，同他们合作有损于新政权的威望，另一方面因为掌权的军官集团有一种害怕心理，怕文官政治家凭其经验和关系，可能在不满的人民群众中找到支持者和制造阴谋。但这也并不是说，对旧政权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激进决议的拥护者和现代化的鼓吹者能自动得到新政权的赏识。在军政权中也没有他们的地位，显然，军人们本能地感到自己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弱点，感到自己的社会基础狭隘。他们害怕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行动自由，会导致形成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心，使得掌权的军官集团不知不觉地失去对政权和思想影响的独霸地位。

自然，推翻进步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军政权对这种疑虑最重。加纳在推翻恩克鲁玛之后，代表官方观点的《每日写真报》就宣传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了“所有的大财主、积极分子和思想家”。<sup>①</sup>全国解放委员会企图在知识界依靠“职员阶级”——高薪律师、医生等。他们是敌视恩克鲁玛和他的主张的，他们是欢迎安克拉政府的。这些人在加纳第一个军政权时期召开的立宪会议上占多数，他们通过决议说，国会议员不应领工资。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国会，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于富有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纯粹出于物质考虑，否则就不会选择国会官职。

还应当指出一个事实：由“西方”训练并持保守观点的老一代军官与青年军官相比，更容易同那些被解散了的旧政党

---

<sup>①</sup> 《非洲的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第200页。

的活动家合作，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倾听他们的意见。而象阿昌庞和克列库这样一些军事首领，他们对“旧制度”的政客一般都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殖民主义者留下来的整个上流社会，特别是其政治代表统统都得垮台，这些人只能带来害处。

“没有政治生活的政治，没有政治家的政治”——这是热带非洲军政权大多数领导人的秘密口号。而军人自己又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传动带”系统，找不出动员群众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作一定的准备、没有经验、没有干部，而最主要的是没有一种有名堂的思想体系，缺乏改革纲领，没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但这些人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倒是奇怪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基本局限于在英国军事院校学习的那一套，然后在按照英国形式建立起来的军队里安分守己地服役，或者在法国军队里服役，参加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战争。在经济问题上这些军事首领可以依靠技术专家，但社会政治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的眼界很狭隘，在政治问题上简直无人可以依靠，因为旧制度的政客都是殖民主义者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些人除了一些陈规俗套之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而激进知识界的新一代又使他们害怕。

因此这样的军人首领宁愿（或者说被迫）不要真正的政党和组织，代之以无组织形式的、装点门面的、无明确社会政治倾向的“群众运动”。但不能说这样的政权仅仅是靠刺刀支撑的，不能把热带非洲所有的政权都看成恐怖的军事警察专政。幸好，非洲暂时还未出现斯特罗斯纳和巴蒂斯塔。其原因部分地由于在落后的非洲国家左派反对力量太弱。但是大多数

---

上述政权的性质很明显是反民主的、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很多军事首脑的政治思想的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保持原状和在原制度范围内比较有效地和有序地进行工作，不触动原制度的基础。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仍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财产，新殖民主义剥削结构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所有这一切使进步力量感到失望。但是进步力量太弱，而且分散，民主运动处于萌芽状态，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刚刚开始发展。军队保卫政权，而这个政权不惜一切手段加强军队的特权。加纳全国解放委员会掌权后给军职人员加薪5%。上沃尔特行政机构中的军人保留了原工资，为节约而削减官员工资没有推广到他们中间。乌干达的阿明将军发动政变后军队的开支增加到三倍。

军人清教徒式的反贪污观点还在继续广泛宣扬。但是，如前所述的塞拉利昂民族改革委员会丑事那类事实可资证明，军人当政后远不是始终廉洁奉公的。同样也未能证明军人团结的神话。上面已经谈过，加纳、尼日利亚、达荷美、塞拉利昂等的军事政变后发生的事件证明，军人当政后，内部分裂和斗争不亚于文官当政时期。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东南亚军人在掌权后的活动情况。

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权立刻进行了严格的“清洗”，逮捕了一批前政府的政治活动家，包括几个政党的全部领导人。被揭露走私和施展财政诡计的许多官员被送交法庭，他们的罪行被公布于众。

很快就发布了特别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特别法

庭，调查玩忽职守或行为不端的官员的案件。命令公布后的一年内，有三千名官员被撤职或受到其他惩罚。

政治体制进一步演变的过程如下：宣布军事状态的临时措施，军队的任务在于准备条件回到文官统治。起初采用“基本民主”制度（这一点下面再讲），然后制订和施行宪法，从而改变军事状态，准许各政党活动。

在“基本民主”制度范围内选出八万名复选代表，应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公布的新宪法选举总统，选举一百五十六名国民会议员和三百名两个省的国民会议员。一九六五年按这种制度举行了初次选举。阿尤布·汗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总统。一九六二年准许各政党活动，但只是“原则规定”。政府有权不许某一个具体的党活动。<sup>①</sup>

军队仍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形式上确未固定，在宪法中仅仅指出（第二三八款），在二十年内只有武装力量的高级军官才能担任国防部长职务，这样，军队的活动范围由于受文官的控制被彻底地取消了。在某些行政领导岗位上，有军人，但整个来说，行政机关中的军官很少，在国民生活中军队的直接作用比印度尼西亚、缅甸或埃及小得多。

军队和官僚阶层组成了政权的支柱。大部分军官和很大一部分高级官员出身于地主阶级，保护着地主的利益，未脱离地主阶层，未分离成独立的社会集团（不象“第三世界”某些国家，那里军官主要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

---

<sup>①</sup> 《经济情报公司经济评论季刊增刊》，巴基斯坦，1966年第1页。



经脱离了他们出身的阶层)。其原因显然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人受地主阶级的影响，比出身于中层小资产阶级的人所受本阶级的影响要强烈和稳固；土地所有制及其有关传统和土地所有制产生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军官的政治思想立场。巴基斯坦的军政权首先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中小地主在地主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军队，军队成了专横独裁政权的基础。这仿佛是一种“农业波拿巴主义”（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波拿巴主义客观上反映了小农经济的利益；巴基斯坦的“农业波拿巴主义”也反映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土地所有者而已）。

巴基斯坦军队通过它的军官与地主阶级保持紧密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军队向独立自主的集团发展的趋势比较缓慢。军队没有彻底组成军政权，它起着仲裁者的作用。军官的社会关系、其“英国式”的组织形式、亲西方的观点和保守主义促使巴基斯坦军队阻碍进步潮流的发展。

阿尤布·汗懂得，被他从国家生活舞台上撵走的旧政权的政治家们对他的政府始终将持反对态度，他不失时机地削弱他们的威望，把他们与“平民”相比。阿尤布·汗有个典型的声明说：“我国人民的心是健康的，政治家的心病同人民的心灵毫不相干，人民的心灵始终是高尚、忠诚和纯洁的。”<sup>①</sup>

中小地主——大多数军官出身的社会阶层——仍然是政权的主要支柱，一九五九年的土地改革考虑到了他们的利益，

<sup>①</sup>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的讲演和声明集》，卡拉奇出版，第二卷，1959年7月—1960年6月，第25页。

土改只涉及到西巴，它规定的土地拥有范围是五百英亩水浇地和一千英亩旱地。赛义德指出，这正好是大部分军官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sup>①</sup>

土改中受到损失的是最富的地主（虽然他们得到了大量的赔偿费），阿尤布·汗政府由此得到了巩固，过分独立的大封建主的经济实力，实际也是政治实力大受削弱。<sup>②</sup>

参加国民议会的中小地主伙同与他们有关系的政治家，支持能维护他们利益的现政权。此外政府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在地方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派去的省长和主管财政和税务的委员们等等。对于“不听话”的地主，则经常使他们感到，如果他们的行动不理智，他们在议会中所代表的地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更复杂的是资产阶级的问題。巴基斯坦资本家阶级的少数上层集团控制了工业。根据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资料，在六十年代，近二百五十个资本家控制了75%的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是四大集团（米门，希尼奥季，布哈拉和霍尔扎），他们几乎占有工业收入的一半。<sup>③</sup>这些人对军政权满意的是它给国家带来了稳定，并在组织同外国资本家的合作方面做得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军人掌权前工商界那种担心来自“左”的方面的威胁，现在已经逐步消除了，地位得到巩固的资产阶级也要争夺政治特权，而政权的日益专横却越来越排挤

<sup>①</sup> 利特·赛义德：《巴基斯坦宪法规定的独裁制度》，《太平洋事务》季刊，第三十六卷，第四期，第365页。

<sup>②</sup> 显然，在阿尤布·汗政权的最后几年，两个最富的封建主失掉了自己的职位，即巴基斯坦前任省长纳瓦勃·卡拉巴格和外交部长布托现任总理。

<sup>③</sup> 《美国经济周刊——评论》，1962年，第五十二卷，第54页。

他们。

一位英国观察家说：“阿尤布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不受欢迎，这是因为商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政治特权被剥夺。卡拉奇、达卡和拉合尔的商人和律师愤怒地批评政府。在城市会讲英语的巴基斯坦人中支持政府的很少。”<sup>①</sup>

假如资产阶级不面临紧张的社会革命的威胁，他们就会厌恶独霸政治权力的专横制度，并且会要求分享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份权利，而且要占优势。阿尤布·汗政府一般说来保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资产阶级也想取得政治权力。这就是巴基斯坦资本家阶级反对军政权的实质。

很多宗教界人士对政府持相当公开的反对态度。“伊斯兰教徒一般都反对现政府进行的改革，害怕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他们实际是在等待有利时机。”<sup>②</sup>

在东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的政府不受欢迎，因为其基础是军队。实际上孟加拉人把这个军队几乎看作是外来人。而且在一九五八年政变前，东巴基斯坦就已经掀起自治运动，这是同争取社会生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改革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阿尤布·汗进行的改革根本没有满足孟加拉民主人士的要求。

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逐渐遍及各阶层人民。过低的生活水平、艰苦的物质条件以及缺乏民主自由，乃导致对阿尤布·汗政府的强烈反对。一九六八年，首先起来的是大学生，但是

---

① 布赖恩·贾宾：《在阿尤布的控制下》，《前卫报》，1967年1月21日。

② 《第三世界军队的超军事任务》，第293页。

反抗运动是在工人和职员参加之后才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九年一月，民主行动委员会成立，要求释放政治犯和撤销紧急状态，要求罢工的权利和进行直接普选。三月，政府妥协了，同意实行议会制。但是要平息公开起来反对阿尤布·汗的群众运动已不可能了。罢工和群众集会没有停止，极端主义集团大肆活动，虽未发生武装冲突，但一天之间群众的纵火活动普遍发生，特别在东巴。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尤布·汗把政权交给了军队的最高统帅叶海亚·汗将军。一星期后，叶海亚·汗宣布为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对派的某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全国局势趋于稳定，但潜伏着的紧张气氛仍然存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叶海亚·汗被迫实现诺言——进行普选。国民大会三百一十三个席位中，代表东巴人民——孟加拉人民利益的人民联盟获得一百六十七个席位。它的首领穆·拉赫曼获得组织巴基斯坦政府的合法权利。但是军政权暗中决定不承认选举结果。军人到底是害怕国家分裂和孟加拉地区独立呢，还是不想让位给文官政府，尤其是以反对党领袖、一个孟加拉人为首的文官政府呢，这很难说。其实，他们二者都怕。将军们的种姓制度的傲慢态度——旁遮普族和普什图族的权贵们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鄙视孟加拉人，践踏和蔑视民主，不愿承认选举中表现出来的人民意志。这一切使巴基斯坦军人上层必须采取决定性的一步。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穆·拉赫曼和人民联盟的其他领袖被捕，在达卡的军人突然开始屠杀孟加拉人。到第二天清晨，东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硝烟弥漫，一夜之间枪杀近五万人。巴基斯坦的军

---

阔为保护政权而采取种族屠杀。这次的流血罪行是第一个惨案。悲惨事件一个接着一个，造成了一百多万和平居民的死亡，最终导致印巴战争和巴基斯坦的失败和分裂。在原亲国家的废墟上巴基斯坦军政权看到了自己不光彩的结局。

上一章叙述了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印度尼西亚政变的先决条件。军队执政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军队继续控制印尼。在苏联报刊上曾评论过印尼军队是“统治的政治集团”。<sup>①</sup>苏联学者尤里叶夫对印尼的军政权作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他写道，在这个国家内“军队已变成了最强大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执行机构的基本部分和它的主要支柱”。<sup>②</sup>

《世界报》记者引用了印尼主要政治组织专业集团联合秘书处的书记苏米斯彦姆的话，“印尼的政治上层集团是军人和国家官员。”<sup>③</sup>军队在其中居首位并非偶然。雅加达人说：“管我们的从前是上百个部长，现在是上百个将军。”三十九万军队，加上十万警察是印尼最有组织和最有威望的力量。一九六五年，军队取缔了共产党、推翻了苏加诺政府和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他们进驻各个部门和操纵一切，紧紧地控制着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条命脉。这个过程是从苏加诺时期开始，尔后是在“新制度”建立后完成。其实质内容也就是尤里叶夫所说的：“陆军的高级军官与被收买的文官结合成为官僚资产

---

① 《真理报》，1971年6月23日。

② 尤里叶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莫斯科出版，1973年，第245页。

③ 《世界报》，1972年9月11日。

阶级。”<sup>①</sup>这位作者正确地论述了将军们与文职官僚资本家利益的一致，这些官僚资本家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作者同时把军队称为“这个阶级的主宰和工具”。<sup>②</sup>

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军政权不掩盖自己的社会政治方向。军队确定印度尼西亚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私有经济，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外国的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私有制；早在一九七一年中，苏哈托总统就原则同意五十四个国营公司改变为私有。政府主要是促进发展工业的私有部分，取消原来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活动的限制。更多地注意引进外国资本。一九七二年，《真理报》报道，近五、六年来，印尼通过官方渠道就得到外国贷款二十四亿美元。<sup>③</sup>《世界报》记者写道：很多外国企业家“争夺这个一亿两千万人口的市场，在这里只要三、四年就可收回投资。苏加诺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统治时代过去了，金融资本家的信用恢复了，钱又重新大量涌现。”<sup>④</sup>这位记者又说：“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政策可能导致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长期掠夺印尼。”<sup>⑤</sup>

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无疑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在财政稳定方面），都是一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专家、西方培养的科技人员和经济学教授。这些人大部分是原社会党和美国

---

① 尤里叶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第73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真理报》，1972年2月23日。

④ 《世界报》，1972年2月12日。

⑤ 同上。

柏克利大学毕业的，他们得到了军队首领的庇护。财政、经济和商业各部门的领导岗位全部由留学美国的专家担任。

军队本身也直接参与加速发展私有企业。一九七一年初，有六十三个企业正式属于军人。属于军队上层的“西里万吉”师拥有自己的工商企业和银行等。“军队的政治独裁依靠这个师，使经济和财政上的自立得到巩固。”<sup>①</sup>

军队插手经济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营私舞弊，虽然在苏加诺时期就已开始了这种恶行。贪污贿赂遍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军人比文官更甚。“士兵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sup>②</sup>敲诈掠夺日益普遍。曾经成立过反贿赂委员会，但要采取有效措施极为困难，因为在军队控制国家的情况下，军人实际上认为自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政府机构被军人把持。到六十年代末，二十五个省长中有二十二名军人。七十年代初，在北苏门答腊二类区的十七个行政长官中有十五名军人，在中爪哇地区，三十五个行政长官有十八名是军人；派到国外的五十个大使有二十一名军人，政府各部总局八十六个秘书长和局长中有三十四名军人。<sup>③</sup>《费加罗报》记者写道：“群岛上没有一个村子不是由中士或军士领导。全国没有一个国家企业的经理不是由上校或将军担任的。私人商行不属于他们的也很少。”<sup>④</sup>将军领导着稳定大米市场的国家机构，将军主持雅加达的商业厅，由他分配

① 尤里叶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第144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第75页；另见《国际事务》双周刊，1968年，第一期，第59页。

④ 《费加罗报》，1973年3月7日。

大众牌小汽车等。<sup>①</sup>正如苏联作者鲁谢夫指出的，对高级军官来说，将军军衔“不仅是军衔称号，而且在转为文官职务时，还从军队得到了政治‘嫁妆’”。<sup>②</sup>

议会四百六十名代表中有七十五人是政府委派的军人，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协商会议九百二十名代表中约三百名军人。

军政权和政治生活的关系，正象一位波兰记者所描绘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政治根本没有，经济发展——那还不错。”<sup>③</sup>如何理解经济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讲过。政党生活在军人看来只会分裂民族，搞阴谋诡计和给“经济健全”造成困难。军队报纸写道：“政治——这是读书人的癖好……。不容置疑，无论是政治，或是民主都是城里人的奢侈品。”<sup>④</sup>内政部长阿米尔·马哈茂德将军公开宣称：“世界上破坏活动的中心是大学……。”<sup>⑤</sup>在国家安全组织的一项特殊命令中指出，“所有的社会团体，无论是官方组织，还是非官方组织，今后都无权组织会晤、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来讨论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然而，没有政治是不能管理国家的。统治印尼的将军们意识到，他们不能给“政治活动家”广泛的活动余地，以免削弱

① 《亚洲概览》，1973年2月，第137页；另见《费加罗报》，1973年7月7日。

② 鲁谢夫，《印度尼西亚：将军们和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8年，第十二期，第59页。

③ 《政治周刊》，1971年7月24日。

④ 尤里叶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第132页、182页。

⑤ 《亚洲概览》，1973年2月，第129页。



甚至破坏军政权，但又不能缺少有组织的政治支持。尤里叶夫写道，军政府的全部活动“是要达到两个互相难以结合的目的：保持和加强武装力量的控制作用和扩大新政权的政治地盘”。<sup>①</sup>

前政权留下来的政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中这些政党与军队结成了临时联盟，但是它们决不愿意把领导权让给军队。伊斯兰教的首领们利用共产党暂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和从前与苏加诺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被削弱的机会，宣称要当国家的政治领导，并代表地主的利益。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军队采用了极为复杂的手段，逐步排挤和限制各个政党，改变他们的领导，“说服”他们，“规劝”他们，以至最后彻底改组整个政党制度。一九七〇年，苏加诺总统建议将所有政党分成两个团体——“精神的”和“物质的”。然而这一人为的主张未能实现，原因之一是各政党的领导暗中反对。于是军人决定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排挤和击退其他政党。这样就产生了专业集团联合秘书处。<sup>②</sup> 军人深感自己的社会根基薄弱，而且认识到一些“传统”政党很不可靠，所以决定建立完全顺从自己的政党机器，以便依靠这样的政党能在各代表机构中占据优势。

军人毫不隐讳要担当专业集团的领导。这一组织的主席

---

<sup>①</sup> 尤里叶夫，《一九六五年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第79页。

<sup>②</sup> 早在苏加诺时期就产生了专业集团的概念，印度尼西亚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根据各社会团体所处的地位把社会分成各种不同的生活范围。如在从事“物质发展”的集团中既包括工人和农民，也包括官吏和企业家，从事“精神发展”的集团中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妇女等，个别集团包括军人和教会执事。

是穆尔托诺将军，总书记是苏巴尔佐将军。

专业集团提出的口号是“现代化和发展”，按照规定，国家机关的职员必须选举专业集团，因而专业集团在一九七一年三月的选举中获得62.8%的选票。其他政党中只有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它依靠信教的农民获得近19%的选票。曾经很强大的民族党获得的选票还不到7%，因为它的群众基础——政府职员被专业集团夺去了。

军人用这种办法削弱了各政党，“统一”了政党的生活，把所有政党统归为两类，发展的统一党和发展的民主党，第一类包括伊斯兰教党，第二类包括民族主义党（非宗教的）和基督教党。只有这两类党，加上专业集团才有权参加以后的普选，但是只有专业集团才有权“在村一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其他两类政党只有在大区以上才能进行这项活动。谁都知道，印度尼西亚主要是农业国，所以不难理解这一决定的意义，也不难预测选举的结果。

这样，军队掌握政权就成为合法和得到巩固了。它不愿公开把自己的政权称为军政权，但又不隐瞒自己要掌握领导权。一九七〇年，苏哈托公开宣称：“武装力量认为，除了他们，谁也不能解决民族面临的任务。武装力量不想仅仅当个消防队，他们必须负责铲除火灾的根源……。”

一九六六年，印尼政治训练班的文件中说：“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武装力量。”另一个军队文件又指出，武装力量“必须对社会生活起稳定剂和催化剂的作用”。专业集团主席穆尔托诺将军说：“即使专业集团解散了，我们还有国家职员和军队。如果职员中发生混乱，我们还有军队，而军队恐怕是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sup>①</sup>另一位高级军官对一位法国记者说：“武装力量是国家的动力和安全的唯一保证。”<sup>②</sup>

所有这一切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是印尼军队的思想家、共和国武装力量原来的领导人纳苏蒂安将军的一贯思想的发展。纳苏蒂安将军认为，军队不是技术工具，而是一个职业集团，其主管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军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它应该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思想力量，军队对保护国家威望起主要作用，它带领人民达到革命的目的，等等。<sup>③</sup>在“新制度”下“革命”一词因不需要而被抛弃，正象纳苏蒂安自己遭冷遇、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一样，因为他与印尼其他军事首领不同，他是一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在印度尼西亚，军队可以公开声明自己处于领导地位，而且这是合法的；今天任何人都不会威胁它。军人官僚政权是巩固的，它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但它能否有效地建立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能否有效地解决丑恶多变的印尼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矛盾，还要拭目以待。

印尼军队的上述特点也是泰国军队所具有的，而且泰国军队更甚。泰国军队虽然没有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它更突出地表现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团体。

泰国不是亚非国家中的典型国家，因为它从未沦为殖民

---

① 《亚洲概观》，1973年2月，第134页。

② 《费加罗报》，1973年7月7日。

③ 纳苏蒂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雅加达出版，1964年，第22页，109页、112页。

地，没有经历过民族解放革命。同时这个国家从一九三二年起几乎一直是在军队控制之下。分析泰国军队的政治作用可以弄清军人官僚集团的结合过程，以及它是怎样演变为国家统治力量的。

一九三二年以前的几个世纪内，泰国犹如一个僵化的、停滞的，更确切地说是个没有发展的国家，也是个世袭的贵族上层统治的国家。为首的是君主——正统的封建塔尖。现代化军队只是在曼谷王朝第四代以后建立的，即一八五一年以后，当时出现了职业军官。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军官被派往国外学习。军官接触了外国的生活后，自然就产生要使社会现代化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与以中世纪专制制度和严格的教阶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是矛盾的。这种制度的重要官职除少数王亲国戚外，谁也得不到的。在军人集团和文职官员的策划下，一九三二年推翻了少数贵族寡头政权。新建立的政权包括六十四名文官（主要是以国际法教授比里·拍浓荣为首的国家职员）三十三名军官和十八名海军军官。<sup>①</sup>军官的级别从大尉到上校。

君主专制被立宪制所代替。宫廷集团失去了对政权的垄断。但是推翻了前政权的大尉们和上校们很快就认识到，象起义和政变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是为别人火中取栗。在代表议院的七十个席位中，军官只有十六席。<sup>②</sup>但是具有一定

---

<sup>①</sup> 米尔斯，《东南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幻想和现实》，明尼阿波利斯出版，1964年，第95页。

<sup>②</sup> 威尔逊，《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283页。

进步和民主倾向的比里集团也未占优势。占优势的是一些旧班底的保守官吏，他们确实不属宫廷佞臣，但敌视一切新鲜事物，倾向君主专制的一套办法。这两派的斗争造成了军人集团决定夺权，因而于一九三三年举行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没有同思想进步的文官配合，实际上军人当权。

新政权的“实力人物”是奎披汶·颂堪。从一九三四年起他担任国防部长，一九三八年开始任总理。文官一个接一个逐步从关键岗位上被排挤走，由军人代替。奎披汶·颂堪当了元帅，在他统治时期，军人成为跃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一九三八年，国务委员会二十一个成员中十一名是军人，而七十八名委派的代表中五十三名是军人。<sup>①</sup>

颂堪政权的垮台与其说是由于国内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外部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把国家的命运与日本连在一起。日本失败后，显然他也就落得相应的报应。一九四四年的政变是一个罕见的事例。这次由于文官的主动行动，使军政权垮台。军人作用骤然下降，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政府内八个办公机构中只有五个军官获得部一级职位。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比里和他的支持者对宪法作了这样的修改：今后国家公务人员和军官无权占居政治岗位。但为时不久，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又发生了政变，由六十五名军官组成的（其中有八名将军）军人集团夺取了政权。根据米尔斯的材料，“其中只有三人是一九三二年政变的参加者……大部

---

<sup>①</sup> 因塞：《泰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分析》，伦敦出版，1963年，第76页。

分只受过中等教育。基本上是下级军官，他们不满低薪，不满控制政府的老近卫军的专横。”<sup>①</sup>

政变的发起人把自己的行动解释为必须恢复“被践踏的军队荣誉”，消灭统治者中的贪污现象和各种恶习。奎披汶·颂堪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但是不久陆军与海军之间又发生矛盾。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海军上层领导曾企图从陆军集团手中夺取政权。事情的经过犹如一幕滑稽剧：美国赠送给泰国一艘战舰，赠送仪式在甲板上举行，主角是美国大使和奎披汶·颂堪，在仪式正处于高潮时，有一队水兵乘快艇靠近舰旁，登上甲板；当着大使和全体曼谷贵族的面抓走了元帅，扬长而去。奎披汶被押在一艘军舰上。陆军和海军之间开始了“战争”，军舰停在河面的锚地，陆军从两岸攻击。决定三天战斗结局的是空军，它联合陆军，炸毁了军舰，包括监禁元帅的那艘军舰。救出了奎披汶，叛乱被平息。

国民议会解散，恢复了政府有权委派一半议会议员的制度。

这次军人集团再不会放弃政权了，所有关键岗位重新由军官担任。但是很快就清楚，矛盾不仅在两个军种之间，而包括陆军内部。各集团之间开始了尖锐的竞争。最强的是陆军最高统帅屏·春哈旺将军。威尔逊曾对他作如下的描述：“他的政治活动已经超出军人的范围，扩展到实业界和其他生活领域。屏·春哈旺的女婿炮把他的集团变成一个机构庞大的组织，控制了警察、政府、议会和其他政权机关。”<sup>②</sup>但是当屏的

<sup>①</sup> 米尔斯，《东南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幻想和现实》，第99页。

<sup>②</sup> 威尔逊，《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第264页。

最高统帅职位被沙立将军取代后，沙立立刻就获得优势。直到一九五七年，斗争以沙立集团取胜而告终。

沙立为了给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先是依靠议会。他出国治病后，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文官政府。但这个政府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和行政问题，陷入财政困难，不能对付日益强大的反对党。于是沙立元帅突然从国外回来，于一九五八年十月进行了不流血的政变，修改宪法，建立了他自己的军人独裁。一九五九年一月，他宣布新的临时宪法生效。根据这个宪法，国民议会议员由政府委派。<sup>①</sup>民主的把戏从此结束。

由于沙立病死，结束了他六年的统治。文官统治再度恢复，但为时不长。一九七一年他依·吉滴卡宗元帅又发动新的军事政变，军队再次掌握政权。新的军政权与沙立政权不同的是它不只一个“实权人物”，而是有两个，他们是他依本人和巴博·乍鲁沙天将军。他们下面还有两个有实力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军队副统帅、国民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克立·西瓦拉将军和他依的儿子、巴博的女婿纳隆格·吉滴卡宗上校，他是制止社会危险分子活动委员会主席。<sup>②</sup>

政变后十三个月，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通过新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国民议会二百九十九名议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指派。二百九十九人中，二百名军人（一百三十四名陆军代表，三十名海军代表，二十三名空军代表，十三名警察代表）。一九六九年前选出的原国民议会议员只有一人进入新国民议

<sup>①</sup> 威尔逊，《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第265页。

<sup>②</sup> 《亚洲概览》，1973年2月，第162页、165页。

会，此人也是将军（西里蓬京）。<sup>①</sup>

《亚洲概览》杂志写道，政变后开始逐步解除那些“钻进”前文官政府的军官的职务，使得“纯洁的”军人占优势。该杂志在评论军政权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指出：“……贫富日益悬殊，上流社会和群众日益隔阂。在政治发展方面，军政权至少使泰国后退二十年，同时对经济发展、国内秩序和国防方面未作实质性的改进。”<sup>②</sup>

泰国终能轻而易举地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发展特点——国家极为落后，没有现代化工业。泰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数量和政治影响都很小。商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华人，他们是商界的骨干，是整个经济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极无声望的，没有任何公开政治影响的社会集团。“统治集团”包括首都文职官员和军官。在君主专制时期，统治泰国的是可以称作封建官僚的少数阶层——闭塞的贵族宫廷阶层、廷臣和大臣。一九三二年后，上流社会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簇拥在王宫周围的闭塞的阶层了，贵族出身已不是厕身上流社会的必要条件。但社会制度的本质变化很小，因为保守、自私自利、比以前较为“民主的”官僚阶层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出身揽权。

在泰国从未有过民主传统。严格的教阶制度决定社会的全部生活。传统的教规限制了农村村社人们的行动，也给城市社会的性质打上了烙印。在教阶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也完全“加入”了这种体制。在这个国家里，既无政党，也无工

<sup>①</sup> 《亚洲概览》，1973年2月，第177页。

<sup>②</sup> 同上，第174页。



会，军队是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在它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不存在任何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上的障碍。命运使泰国避免了殖民主义的奴役，这也给军政权的建立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泰国从未发生过能唤醒和发动群众，激发政治能量和推动社会各阶层的民族解放运动。宫廷政变是泰国社会唯一能表现政治活动的形式。国家的独立和与外部世界隔绝使它脱离国际上的主要思潮，固守中世纪的社会关系。

泰国未遭到在邻国发生的风暴的袭击。军队从未执行过国防任务。因此武装力量有可能把精力集中在别的问题上，积极登上政治舞台。军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文官政权的控制。从一九三二年起，历届国防部长和他的常任助理，以及国防部的全部官员都是现役军官。<sup>①</sup>武装力量所需的费用开支也不受文官机关的监督。

军官从事经济活动，并且在国家经济中有牢固的地位。国防部掌管一系列工业企业，包括分配石油的机构、皮革厂、玻璃厂、纺织厂、罐头厂。国内大部分商业无线电台属于军队。有军人银行（私人商业企业），其最大的股票额属于国防部。

这样军队的上层变成了集体的资本企业家。军队的财力、物力和权力大大超过私人企业家。

根据米尔斯的估计，统治泰国的上流社会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并且基本集中在曼谷。处于最高层的有十一—十五人，他们是万能军人集团的成员。上流社会

---

<sup>①</sup> 在泰国广泛宣传下列内容的招贴画：“国王是一座房屋，而军队是这座房屋的围墙。”

的第二梯队约一千人，他们是将军和上校、高级国务大臣、议会头头、几个亲王、可能还有几个主要商人，后者的数量无论如何不可能多，因为全国的大部分资本家是华人。最后是上流社会中的第三等人的代表，大部分是政府官吏，以及自由职业者、记者等等，一般说，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有稳固的地位，他们感兴趣的是保持现有的制度，他们的观点是保守的。<sup>①</sup>

威尔逊还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军队领导有什么愿望要使国家的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革命化。一般来说，他们的观点是保守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动的……”<sup>②</sup>这位作者还指出，军人同实业界已经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而这个实业界目前已无所顾忌。

宪法的装饰当然是骗不了任何人的。部分议员逐渐表示不满。威尔逊写道，为了平息这些议员的不满，他们采用“许以职位、特权和其他贿赂手段”。<sup>③</sup>

泰国的贿赂现象达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方面最有趣的是去世的独裁者沙立元帅的升迁。他最初的“政治”生涯是在泰国的北方当一名团长，当时他就从事贩卖鸦片的走私活动，由此获得的金钱用来发给士兵“额外”薪金。后来，这种收买军心的手段又被沙立用于全国，取得政权后沙立宣称：“我憎恶贿赂，我要消灭贿赂。”这时他的资本已近五十万美元，在以后的六年中沙立的资本约增加到三百倍；他每月可得薪金五

---

① 米尔斯，《东南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幻想和现实》，第103—104页。

② 威尔逊，《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第275页。

③ 同上。

百美元，积攒财产达一亿四千万美元。独裁者从建筑公司的老板、疗养所、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和工业企业公司那里得到收入和贿赂，他利用国家彩票、体育比赛等大发其财。沙立有一大群非正式的妻妾。在他死后这一切都成了公开的财产。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军队的忠诚保证了他的统治的稳定，收买了军队。正如军队杂志《展望》所说的，沙立“用养老金、住房、子弟学校来笼络士兵。沙立拨款为士兵建造晶体管收音机厂，以及成立了向士兵赊销电视机的公司。特别重要的是他买到了将军的忠诚。而将军们也未忘记自己的上校、少校和大尉。”<sup>①</sup>但他的后继人中真正比较忠诚的未必很多。据说，内务部长，同时又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巴博·乍鲁沙天将军控制着银行、船舶公司和经营猪肉销售。

还应补充的是，这个政权的对外政策是百分之百反民族主义的和亲帝国主义的。泰国的军阀甘心情愿地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与美帝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军队派往朝鲜，帮助美国侵略者，后来又积极帮助美国进行反对越南人民的强盗战争。泰国变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基石和美国在东南亚推行侵略政策的堡垒。

泰国军队的演变是带有象征意义并值得注意的。这是军队上层彻底蜕变为反民族主义的军阀官僚阶层的典型例子。类似的演变趋势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能见到。但恐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泰国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形式这样完整，其过程也不会象泰国那样能够达到自己合乎

<sup>①</sup> 原文漏掉这段引文的出处，看来是引自上述《展望》杂志，但该杂志的出版地点及时间均不详。——译者

逻辑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泰国军队的例子对我们的研究如此重要和有意义。泰国军队的演变对“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想夺取国家政权的军队上层是个效法范例。这种演变就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为一种理想。这是那些名利观念重和自私自利的军阀官僚的理想，他们把军人职务作为手段，来保持自己不受监督的权力，维护其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欲望。

泰国军队变成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国内它不属于任何人；相反，它却统治着一切。泰国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化身。军队同国家机器和封建主阶级的上层领导、以及人数不多的资本家阶层联合起来组成万能的剥削集团，形成掌权的上流社会。它不为社会的某一个阶级服务，也不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自成一个特殊的冒牌阶级。这个自我形式和自我产生的阶层不是什么别的，就是军人官僚资产阶级。

保卫国家对这个军队来说甚至不仅是次要任务，而是第三位的事。它手里的武器是用来保护和捍卫自己的统治。权力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任何别人，权力为了实现统治，为了发财——这就是这种军队的秘密口号。在这个国家里，军队在民族危机时已不是“超阶级”的仲裁人，而是一个组织，它力图使自己的垄断地位合法化和永存下去。这是个寄生的资产阶级化的官僚集团，这些官僚身穿军装，在保卫国家的旗号下利用士兵的步枪，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实质上这已经不是真正原来意义的军队了，而是以军队名义掩盖下的官僚资产阶级剥削阶层。事实上，泰国有特权的人都戴有军官肩章，不应掩盖他们的社会本质和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

位。非洲学者(包括共产党人)所说的非洲“议会和行政资产阶级”是同泰国以军阀面目出现的“新资产阶级”没有原则差别的。它们起着相同的社会作用,抱有同样的目的:即利用国家政权来维护其经济政治特权。

泰国的例子未必能作为“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典型,因为军政权暂时稳定的原因是经济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各种优越条件,这是别的国家所不具备的。泰国是大米和橡胶的最大产地和出口国,铅矿和柚木的出口量不断增长。大米之丰富和玉米产量猛增,缓和了粮食问题,而橡胶和铅的出口换得的外汇能够保证进口必要数量的设备和原料,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人民闭塞落后和缺乏革命传统有助于稳定的保守制度的存在,又吸引着外国资本(特别是日本),使得军政权的物质有了保证。军政权靠变泰国为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附庸而巩固起来。

一九七三年十月,在空前强大的学潮之后,泰国的军政权崩溃了。六月间因大学开除九名学生而激怒了学生领袖,他们要求在六个月内制订出宪法草案。宪法运动席卷全国,运动的中心是反对军政权。十月初逮捕了运动的积极分子,引起了泰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十月十三日的游行示威,参加者约四十万人。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成了泰国的“流血星期日”,军人和警察驱散了新的游行队伍,打死了近三百五十人。但是军政权的末日没有几天了,确切地说只是若干小时了。在危急时刻,军事首领之间发生了分歧:他依·吉滴卡宗和巴博·乍鲁沙天企图继续进行“残酷的屠杀”,直至将反政府浪潮完全镇压下去,但克立·西瓦拉将军反对这样做。为了对

抗他依一巴博集团派往首都的特种部队，他动用了第一军的部队。象一九六四年苏丹一样，军队的分裂意味着军人政权的末日。几小时后，十月十五日，他依、巴博和纳隆格逃往国外。文官政府掌权。

这样，泰国这个腐败不堪和引起公愤的军人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就垮台了，垮台的直接因素有两个，最强有力的学生浪潮触发了社会的不满，军人上层领导内部在决定时刻分裂了。无论哪个因素都是这个既不能代表群众利益，又不能代表中间阶层利益的军政权必然垮台的原因。

这样通过对军人掌权后的活动进行分析证明，老一辈的将军，即受殖民主义教育的职业军人能够（那也远非永远）“建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政治经济得到稳定，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克服国家的落后，建立起新的发达的社会，而且他们也没有这种愿望，因为他们已完全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上层。于是，又产生一问题：年轻的革命军官如果只依靠军人机构，能否管理国家？

就军人的性格和特征而言，他们就不具备能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所必需的品德。

骨干军官通常最多只能当个能干的行政长官，而且一般也是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仅仅具有爱国主义、忠于职责、有意志、有决心、有纪律、有组织性，等等，是不够的，因为要求的不是单纯地为建立制度，而是要能够进行最复杂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关系。

詹诺维茨写道：“如果首要的目标是说服而不是强迫，那末评价军人寡头在国内战线上的成效，主要是根据军人能否

建立群众性的政治基础或促成这种基础的产生。

“取得政权后，军人政府面临的任务是保证国家的领导。为完成这一任务，军人必须在其组织机构外，但要在他们的绝对控制下建立起有生命力的群众性的政治机构。”<sup>①</sup>

希尔斯认为，制度建立之后，军人很少再能做些什么，他们缺乏信心，不能对社会施加影响。“他们的危险是空闲，他们毫无成就，落得个清闲的政府和清闲的街道。”希尔斯还说：“他们（指军人）不是生意人，也不是有经济发展头脑的政府职员。如果他们鼓励上面两类人物中的任何一类，或者同时鼓励上面两类人，他们就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可能形成能左右方向的独立的权力中心，如果不鼓励或不容忍独立派的活动，国家又将出现停滞。”<sup>②</sup>

希尔斯还写道：难处在于殖民主义者建立的旧机构不适应革命新阶段的要求——它最多能保证处理日常事务，保证行政机器较正常地工作。执行革命的新机构应是政治思想机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样的机构就其对社会舆论影响而言，比军人机构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军政权纯粹没有什么政治主张。没有政治组织，徒有其表，军政权便不能长久存在——它需要有群众的支持。军政权是政变的产儿，它没有合法性，它并不能引起社会结构上的变化，它的功绩不过是打击了无声望的旧政权——这点本钱长不了。军政权没有政治轴心、缺乏建设性的纲领、缺少能动员群众的思想，它是没有

---

① 詹诺维茨，《军队在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芝加哥出版，1964年，第84页。

② 《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出版，1962年，第56页。

成效的。但如果给各种政治力量以发展的自由，准许成立具有意识形态纲领的群众组织，军政权就会走上缓慢的、但不可避免的自我灭亡的道路。

苏联作者约尔丹斯基写道：“用军事办法解决非洲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比垮台的旧政府的办法更高明，一遇到实际矛盾，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遇到困难，军人独裁者就会很快变得‘虚弱’，而失去自己的力量，失去开始时的那股劲头。”<sup>①</sup>

荷兰的研究工作者达德勒指出：“大量属于文官承办的任务使军人不能完全代替文官行政机构。他们能做的最多是把军队干部派进文官机关，监督它的活动，从而在管理机关中形成新的核心。这就使得各联系渠道的行动复杂化，使得除最高级机关外的各级机关不能及时作出决定。结果是一片混乱。”<sup>②</sup>

美国学者列文写道，“实质上军人最终寻求的方式仍是文官领导者采用的、但已被革出教门的那些方式。”<sup>③</sup>

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纯军政权的寿命都是不会太长的；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的任务极为庞杂和紧迫。军政权或是进行改变，即变为具有群众基础的、有政治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政体，或是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缅甸的革命军事领导竭力运用群众的积极性，并以此为自己的政权建立广泛的基础，努力建立先锋政党。实际上这样的政体已不再是军政权了。

---

① 《在国外》，1968年，第二期，第23页。

② 达德勒，《军队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海牙出版，1962年，第22—23页。

③ 《非洲报道》，1967年，第十二期，第23页。



但是军政权转变为社会政体，要做很艰难的组织工作，“在他们下面建筑”群众支柱和建立政治基础。军政权感到自己的虚弱性，经常寻找支柱，这对于理解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形势是极重要的因素。政体寻找基础，也是为自己寻找社会支柱。促使它这样去做有一系列内外因素，首先是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必须有人能够依靠，能够保住自己的政权，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最近的例子是蒙博托政权的演变。尽管军政权活动的独立性相当大，具有宽广的机动余地，但在选择方向时仍没有完全的自由。它所找到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政权本身属于什么性质，决定于它的社会关系和它活动初期对其他社会势力的态度。

阿根廷作者 T.S.特亚注意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军人与前政权的分歧达到怎样的程度，使他们决心登上政治舞台。他正确指出，这种分歧越深刻，军人越是决心彻底改变现存的制度，这种分歧越小，越是可能进行一般性的军事政变。<sup>①</sup>把这个思想再引伸一步，可以说，军人在政变前即在他们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政变后的政治方针。然而这种影响取决于在革命形势成熟时国内总的政治气候。军人决心的大小，是进行一般的政变，还是对制度作激进的变革，这是和国内整个政治斗争的灼热程度、和社会对前政权的不满程度、以及和给军人出谋献策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水平成正比例的。

如一九五二年革命前夕的埃及，濒于崩溃、威信扫地的国

---

<sup>①</sup> T.S.特亚，G.捷尔曼尼，J.格位希奥雷纳，《阿根廷，群众的社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1965年，第282页。

王上层集团同政治上已很成熟，非常左倾但缺乏组织的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知识界思想宝库中的高超主张立刻被“自由军官”信手拈来，武装自己。一些根本问题（农业问题和英国撤军问题）在旧政权时期没有解决。军队首领必须立刻解决这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外反动派对他们的态度，促使他们的观点进一步朝着激进方向发展。

缅甸从三十年代起，社会气氛就充满着反帝的、民主的、尔后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思想，存在着一种很强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革命的军官在准备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这一总气氛的影响下制订了自己的纲领。叙利亚一九六六年掌权的年轻军官根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受共产党的影响，制订了自己的纲领。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因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无力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解决迫切的任务，于是军人革命者便从这些知识分子手中“抓过”意识形态的旗帜。历史上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代表群众利益的受进步知识分子影响的先锋队是穿军装的人，但这仍然是一种政治运动的先锋队，而不是什么自行其是、孤芳自赏的势力。这一运动与日暮途穷的政权之间的分歧相当深刻，以致先锋队选择激进的社会方向，进行深刻的改造。

但是在很多别的国家，特别在热带非洲和印度尼西亚，军人和被他们推翻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分歧不明显。

现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给一系列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在热带非洲，包括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何况这些国家的军人本身具有会变成这种阶层的趋势。他们与“文职的”官僚资产阶级仍有很大区别；

他们往往不是那样明目张胆、不知羞耻地弄权纳贿、大发横财。此外他们掌权后，一般要取缔政党和议会，因而也就使自己和别人都失去机会，不能再利用这些重要的渠道来革新社会和个人发财致富。然而，泰国和印尼的例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当军人感到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制裁时，当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了巩固的地位时，他们营私受贿的程度就不亚于文职人员。

发展中国家的军人集团在具有滋长资产阶级营养基（私人经济成分）的条件下，不可能不向资产阶级阶层变化。

军人官僚资产阶级不能单独统治国家。它既要依靠国营经济及其官僚机构（当然这里不可能仅配备军人），又要依靠私人经济（这里军人的地位更有限了）。私人经济的作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议会制条件下，官僚资产阶级把国家职能和政党议会活动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而在军人当权的条件下，他们便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国家职务还是存在，但政党和议会内的升官机会已等于零。但这是刺激从事私营生意的附加因素，何况军人政府显然不鼓励“社会主义倾向”。因而不必担忧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保守军政权会实行企业国有化。根据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规定的各种限制都不妨碍发挥私人主动性，无疑它可充分发展，但要有两个条件，即国内的政局稳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

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保证，如泰国的例子，那末资本主义将会发展得很快。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促使独立资产阶级的形成，使资产阶级成为不仅觊觎经济特权的

阶级，而且企图参加政治领导。其前景可能是使官僚资产阶级包括军人资产阶级不再能独霸政坛。

但是对很多国家来说，最可能的是另一种前景。它们未必能在不久的将来达到稳定，因为政治上的这种稳定只有在比较顺利的经济基础上才有保证。但是顺利的经济，必须克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持久危机，这首先碰到的阻力便是帝国主义的继续剥削和在国际市场上对经济落后国家不利的价格比例，还有上面讲过的其他因素。到处问题成堆，而且都难以解决。干部问题也极为尖锐；而且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所谓“智囊流失”趋势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所谓的“智囊流失”就是知识分子中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为寻求优越条件侨居资本主义国家。

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急需克服落后的关键时期。选择了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而有效的支持，但同时也有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主要依靠资本主义强国，这些资本主义强国的政策是，既鼓励又限制发展当地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希望永保“第三世界”的落后性，以保证它能继续进行剥削。同时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在资本的有机构成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一差距促使帝国主义资本把落后国家的经济“往上拉”到现代化的水平，以扩大投资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推动资本主义这样做的原因，是它被迫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帝国主义既想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旧的殖民结构，同时又想打破这种结构。

其结果是“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形成畸形、不正常和半殖民地的性质。

经验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已解放国家的迫切民族问题，不论其动力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这一点意味着政治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这在“第三世界”多数国家常常表现出来。因此很难指望象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平静”和“安宁”。政治上得不到稳定的军政权（可能是大多数）便将面临一个不妙的前景：如发展私人经济，无论在投资数量或在投资方向上，都不会去考虑使经济高速增长（资产阶级不会去搞那无所作为的冒险，也无力与外资竞争，它宁可选择那些非生产性领域）；如果发展国营经济，它会变为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的垫脚石，没有效率、无利可图。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更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实现军人统治者的愿望。

这样，军政权所面临的上述两种前景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结论：它们的时间不会长，寿命短促。但是军人既然处于政局不稳的状况，所以他们未必愿放弃争夺领导权，结果军队内部就会产生一种希望从绝境中找出路、主张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

但是，在对军人不仅在反帝方面，而且在国内和社会方面也可能采取进步方针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前，最好先简单研究一下第三“发展中大陆”——拉丁美洲的武装力量在政治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某些趋势。

“第三世界”的无论那一个地区，都没有象拉丁美洲那样，武装力量有如此强烈的参预政治生活的传统。据说，在那里

“如果军队不亲自管理，那末也要由它决定谁来管理”。军国主义早已牢固地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烙印。现在军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着拉丁美洲的十二个国家。近一百五十年内，这个地区发生了五百五十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但是政变的性质在起变化。如认为拉丁美洲仍旧象一百年前那样，夺取政权的往往是一些贪图权势的军人集团，那就大错了。

拉丁美洲的军队往往被称为“超党派”的。这个术语表达了军队在政治上的作用。这观念在军阀头头中很流行。军人把军队看作是国家制度稳定的保证，看作是能防止内讧的、不使国家分裂或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同时正是由于秩序保证者这第一个职能，军队又获得第二个职能——仲裁者。因为预先就断定立宪政权不能保住秩序和稳定（因为它总是产生于互相斗争的政党和派别，因此它首先不是反映全民族的利益，而是集团的利益）。自然的结论便是：只有摆脱了派别情绪和作为全民机构的军队才有权并且有责任在“内乱”时干预政治和“保卫全民族”。结果是军队就怕于干预政治生活和参加斗争，而仅仅保证正常的政治生活，保证政治家遵守“游戏规则”。形式上这种观点是完全符合武装力量“不干预政治”的理论的，军队似乎在政治之“上”、党派之“上”，变成了“超党派”；民族在危机时刻求助于它；它好象是最后的保护人。因而军队成了仲裁者，它是民族主义思想最高代表。“政治属于政党，祖国属于军队”。

军队作为民族利益理想的体现者和共同利益的代表，以及作为最高仲裁者，这类观念当然是与拉丁美洲的军国主义

传统和领袖制分不开的。但在近几十年来它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领袖”就其直接意思来讲，仅仅在一些小的落后国家保存下来，而这样的古典式的“领袖”如戈麦斯、索莫斯、特鲁希利洛、巴蒂斯塔基本都是过去的（虽然现在也有例外，如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在比较发达的拉美国家，“领袖”已经过时，甚至从军官集团的观点也是如此，他们已认识到“领袖”终究对他们来说是弊多于利。“领袖”的统治在民众的眼里破坏了军队的威信，整个军官阶层作为一个团体，在一个极坏的暴君统治下，也不会不感到自己的安全和特权地位受到的威胁，如这个暴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尽阴谋诡计，唆使一部分军人反对另一部分军人。个人独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加强秘密警察和近卫军的作用，而削弱正规军的影响。军官们已经充满着职业性小团体主义的感情。他们关心的是维护和固守自己作为一个特殊团体的特权地位，不愿屈从于独裁者魅力，即使这个独裁者出身于军人也罢。军官阶层随着自己变成了军阀官僚集团之后，也同样开始追求稳定，这如同任何一个稳住了阵脚、进入“政体”、以及取得特权的阶层一样。军队的政治阵地越巩固，建立军人个人独裁的可能性越少。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取得政权的不是“领袖”，而是一些军人集团，但这不再是原来不问政治的集团，实际上是些军人小集团，他们互相争权夺利，唯一的目的是为自己取得政权和特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些“有纲领的集团”。至于说是什么样的纲领，那要取决于各种因素，如革命运动的水平和力量对比等等。

一九三〇年后的四十五起军事政变表明，仅十起有左的

倾向，三十一一起属于右的或极右的性质。这并不是说，反动政变的发起人一定会保卫传统的大富豪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农业寡头独霸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富豪的经济阵地虽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他们的政治势力大大下降了，甚至军官自己已不是象从前那样出身在农业贵族家庭。例如，一九六四年的调查证明，阿根廷高级军官有73%出身于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有资产的官员，25%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仅2%。<sup>①</sup>多数军官出身于中小城市的富人、官员、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家庭。<sup>②</sup>

不应夸大军官社会出身的作用。在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尽力消除他们的阶级根源，培养他们的职业团结心，小团体趣味、“军人爱国主义”，等等，这就削弱了从下层人民出身的人的反抗情绪。帮会式的关门主义在发展。穷乡僻壤的小私有者家庭出身的青年，一旦经过考试和竞争而进入军事学校后，便为自己能属优等的狭小上流社会而自豪，对自己有幸进入的“军人之家”忠心耿耿。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一无所知，在军事学校里传授给他们的是一些极简单和千篇一律的东西，其思想是极端的反共主义。用这种思想熏陶他们的职业团结心，培养对军人传统的崇拜，机械地服从命令，以及武装力量就是“民族的精华”等观点。军校毕业后，青年军官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军官集团内，等级界线又把他們与文化水平低的士兵分隔开。职业威望很起作用。阿根廷社

<sup>①</sup> 《拉丁美洲》，1964年，第四期，第47页。

<sup>②</sup> 约翰·约翰斯顿，《拉丁美洲的军队和社会》，斯坦福出版，1964年，第106—106页。



会学者路伊斯·德·伊玛斯就这个问题写道：“……为了具备这一威望的各种特征，要求忠于一定的美德。军官要得到特别好的职务，必须具备这种威望，如不具备，其官阶升迁就将受到阻碍，只能得到一些次要的职位。”<sup>①</sup>这里指的是必须信奉军人集团的千篇一律的“信仰”，墨守军阀式的死规矩，培养一成不变的世界观，而反共派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军官的物质特权作用颇大。阿根廷服役三十年的军官领取全新退休金，而委内瑞拉领取高一级军官薪金的退休金。哥伦比亚军官服役二十五年，即可退休，领取的退休金为薪金的85%。智利军官有权比大学教授早十五年退休，而领取的退休金多25%。智利军官可以获得无息贷款建筑住房。在委内瑞拉，政府的信贷利息以4.5%计算，而对国民最低是12%。智利的军官几乎能以半价购买食品。据不完全统计，在阿根廷各种间接优惠的总和至少相当于军官基本薪金的60%，在智利和墨西哥为40%。<sup>②</sup>

军官得到了社会特权和物质优惠，使它体会到“上流社会化”的好处，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属于特殊社会集团的。就其心理讲，军官接近于城市资产阶级追求特权和舒适。他们不希望社会大变化，当形势危急、出现“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威胁时，社会激怒他们起来反对激进的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牢固地结成一个团体，甚至即使出身于下层的军官，因他们常年在军校和军营内受到职业教育，足以抵消了他们

<sup>①</sup> 路伊斯·德·伊玛斯，《指挥阿根廷部队的人》，《拉丁美洲》，1984年，第四期，第43页。

<sup>②</sup> 约翰·约翰斯顿，《拉丁美洲的军队和社会》，第103页、166页、167页。

在家庭和幼年时代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洗脑进行得很彻底，深刻的社会根源彻底被消除了。团体主义把各种不同的出身溶化成一体。军阀官僚集团的地位稳固，颇具军阀特征。例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军队就是这样。他们培养和提升的都是思想僵化的职业军人，充满着资产阶级官吏思想、名利主义和官阶等级观念的骨干军官。这种军官能够服从上级去完成政治任务，如发动政变，他会象执行战斗一样去完成。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首席军官”，他是“军队仲裁者”。政变并非在上校或少校的领导下发动，而是在一些高级军事长官的统率下进行的。

研究厄瓜多尔军官产生反共情绪的原因后，从中可以发现，这首先是害怕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其原因是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队就要被取缔而代之以民主。<sup>①</sup>军官们还害怕，人民革命会消灭他们赖以取得特权地位的制度。古巴革命后，这种恐惧心理更加强烈。在这方面，军官跟着资产阶级走。正如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写道：“由于惧怕革命的威胁和革命的前景，大部分资产阶级向右转，与帝国主义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在某些情况下，还与寡头结成联盟……。这里指的已不是维护原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而是逐步改变这一结构，通过大量和‘无条件’地吸收外资，执行全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方针，改变资本主义前的某些成分（首先在农业中）。所有这一切是在独裁的、一般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各阶层的‘集体利益’的军政权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不损害政治寡

---

<sup>①</sup> 《拉丁美洲研究评论》季刊，1966年，第二卷，第一期，第20页。

---

头的利益，并与美帝国主义结成紧密联盟。”<sup>①</sup>

上述作者把这种政策称之为“有点象是拉丁美洲式的普鲁士道路”，它是巴西、玻利维亚、智利“法制化”军政权的政治方针的客观内容。

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组织要求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以扩大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活动。为了工业化，资产阶级需要积累资金，需要利用国家资源，而所有这一切都要进一步压榨劳动人民，缩减对他们的开支，冻结工资，关闭无利可图的企业等等。广大劳动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反对这种“残酷”的资本主义发展方针，而要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手段来镇压也是困难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将政权集中于军人手中，这些军人尽管把自己小集团利益置于资产阶级利益之上，使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受到严重损失，但总的来说，他们力争避免社会革命，他们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

不妨把一九六四年巴西发生的军事政变和一九七三年的智利政变作个比较。当然，这两个国家在政变前的当政力量是很不一样的。古拉特的观点及其社会支柱与阿连德的差别很大。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第一，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包括小资产阶级，都是惧怕左派政权进行的革命；第二，多数害怕这些改革的反动的反共军官都站到右派方面。

巴西资产阶级出于自卫的本能起来反对古拉特总统，支持军事政变。美国作者霍洛威兹写道：“中间阶层的主张有利

---

<sup>①</sup> 米耶列斯，麦季娜合著，《结构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出路》，《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7年，第五期，第68页、66页。

于右派，因为所有其他政治路线都好象不能保护他们特权的激进社会发展的路线。”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中旬，当古拉特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六个私营石油加工厂收归国有和没收沿铁路和公路十公里的未耕土地的决定后，持续很久的反对他的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在圣保罗，反动派组织了反对总统的妇女群众游行，即所谓“家属进军——求上帝保佑自由”。圣保罗州的州长把武器分发给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极右头目雇用的队伍。

一九七三年九月，政变前几个月内在智利发生的事几乎完全一样，一直发展到在圣地亚哥举行臭名远扬的“带锅进军”，参加者有数以千计的资产阶级家庭妇女。直到组织极右派武装队伍（《见祖国与自由报》）。

巴西的部分武装力量，特别是下级军官和军士们，越来越支持左派力量。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就有六百名陆军军士举行暴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里约热内卢有四百二十五名水兵举行静坐罢工，要求社会改革和普通人的政治权利。有一位陆军下级军官当时声明：“我们的鼓声将是对东北地区饥饿孩子哭声的回答，我们这些人民的士兵，象其他劳动人民一样，但是我们的工具是步枪。因此一旦与压迫者算账的时刻来到时，我们将是锻造胜利的优秀工匠。”②

智利也象巴西一样，反动军队的上层领导也因军队“下层”中的同情左派的情绪增加而感到不安。政变前一个月，在瓦尔帕来索和塔尔卡瓦诺基地有一百多名水兵被军警逮捕并

① 霍格威兹，《巴西的革命》，《新政治》季刊，1964年，第二卷，第79页。

② 《世界报》，1966年10月6日。

---

遭到拷问，强迫他们承认左派政党在武装力量内的“破坏活动。”<sup>①</sup>

巴西政变是由武装力量最高军事长官，即军队总司令卡斯特洛·布兰科将军领导发动的。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领导政变的是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巴西政变后从军队里解除了二百二十二名高级军官的职务，包括十六名将军和五名海军上将。<sup>②</sup>智利政变前后进行过大量的逮捕或开除思想进步的军官；在推翻阿连德后的几个月内，很多军官包括巴契列特将军，被处死或交法庭审判。

最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这两次政变都插手了，这一点我们的报刊有很多报道。发动军事政变的将军们都是五角大楼豢养的，他们与自己在美国的同伙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反对阿连德那些人的行动是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配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了代号叫“肯塔夫尔”的行动计划。一千八百八十多名智利军官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军事训练中心古利克堡学习过。其中六名为皮诺切特制定叛乱计划。皮诺切特本人和他的助手，该集团的另一位头领李将军在近十年内曾驻在华盛顿，相当于武官和空军随员，集团的第三名成员是麦里诺海军上将，曾是驻伦敦的海军随员。皮诺切特、李和麦里诺都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联系的军官。

巴西和智利武装力量的很多军官相信广泛流传的谣言，说“共产党人准备收拾军队”（我们还记得，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事件以后印尼军官就是用这种奇谈怪论为自己的反共行

---

① 《新時代》，1973年，第三十期。

② 《新政治》季刊，1964年，第二期，第74页。

为辩护的)。《幸福》月刊引用一位巴西军官的话说：“当他们（指共产党人）要在午餐时吃掉我们以前，我们决定在早餐时先吃掉他们。”<sup>①</sup>而在智利的政变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智利军官的言论：“阿连德一当上总统，我们就明白，他的目的是破坏国家的一切机构。在头两年他摧毁了各中间阶层的经济实力，这个经济实力是我国各种机构的基础。”<sup>②</sup>据证实，九月十七日，人民统一组织准备进行非法政变，但军队“赶先了”。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政变的前提条件、动因、方式、甚至在宣传口径都是一样的。

《拉丁美洲》杂志写道：“鉴于智利发生的事，同样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军人（穿军服的人民）会如此灭绝人性地镇压自己同胞。这里不妨回忆一下智利军队的特点，它具有普鲁士式的粗暴生硬的纪律和特殊的服从制度。这是其一，尽管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站在中间阶层人民的立场上。这是由军官的社会成分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的。在革命的三年内，中间阶层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背离了人民统一组织的立场，中小企业家的奸邪凶狠虽不是一下子影响大多数军人，但逐步地感染了他们。”<sup>③</sup>

为阿连德革命政府暂时违心地服务的智利将军们是憎恨总统的。他们杀害总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资本家或大地主的儿子，也不是因为人民统一组织亲自从他们手里夺走什么，而是由于高级军官作为“上层权势集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

① 《幸福》月刊，第148页。

② 《纽约时报》，1974年11月29日。

③ 《拉丁美洲》，1974年，第一期，第77页。

生怕这个集团的生存受阿连德政府潜在的威胁。军队不过问政治、不干涉政治和保卫宪法的传统，只有在按资产阶级制度的“规则玩弄把戏”时才会得到遵守。但是军队还不至于推翻弗雷或亚历山大。但只要出现了取缔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的苗头，臭名远扬的所谓不问政治的传统就会被抛弃。认为军队会保卫公开声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幼稚的。在关键时刻，智利武装力量的领导集团一致起来保卫遭到威胁的资产阶级制度。阶级斗争的规律比军人“不干涉”政治的智利传统有力得多。

中下层军官不能算作属于上流社会，但是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即在闭塞的专职机构里，必然会发展帮会式的团结。军官们从进军校时起就受到团体精神的灌输（这一点上面已经讲过）。但是把军官推向反对革命的还有他们的社会关系：智利军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不关心政治寡头的利益，但是他们主要接触中间阶层的代表、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中滋长了憎恨阿连德政府的情绪。不能排除这样一个因素：即很多军官确实惧怕逐步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权，在这种政权下没有旧军队的地位，代替它的是民警或者虽然会保持它的地位，也要使整个军官队伍经过一番激浊扬清和彻底改组。

最后，只有通过系统的政治工作才能唤醒士兵的阶级意识，系统的政治工作并且可能“改造”部分年轻军官。但是阿连德被迫放弃了这种工作。总统从第一天起不论做什么，必须用“一只眼睛”盯住军队，猜测它的意向，尽量不触犯它，不使它疏远自己，不把王牌交给政变的支持者。阿连德很清楚，军

队的领导不会容忍在军队里进行任何“政治工作”，不会容忍政府在军队中搞“政治化”的任何企图，不会容许把军队从保卫旧制度和立宪政权的工具变为实现左倾社会政治的手段，使之变为政治上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军队。人民统一组织的政府自始至终的致命弱点是：当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在它的控制之下，要改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府取得政权的特点是和平的议会道路。唯一的希望只能指望军队“中立”。

阿连德能“武装人民”吗？在和平时期真正地武装人民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民警和工人队伍。但是军人反对，他们既出于表面的原因（这意味着政府不相信军队能保卫国家的秩序——是对军人的侮辱），又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如前所述，正规军不容许产生民警形式的竞争力量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专门”队伍。

而且即使这样的民警建立了，在与装备着坦克和喷气式飞机的现代化正规军的斗争中，又有什么成功的可能呢？经验证明，正规军如果团结一致、统一指挥，领导果断的话，通常能战胜任何非正规部队，但这只有在军队团结一致的时候。假如有部分智利军队倒向人民，假如有个别指挥官拒绝执行命令，军人中就会动摇，各部队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那就可能赢得时间，以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人民组织的领导预先知道了军阀的阴谋，并作了还击的准备，同时有充分的时间将装备比较差的，然而数量大得无法相比的工人队伍被派去反击叛变士兵。但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

当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军队时，如果只认为它的立场一



般都是反动的，那就很不全面了。多米尼加共产党总书记依萨·康杰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反帝革命的动力中包括武装力量的基本成员。”<sup>①</sup>这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军队能够起进步作用，甚至起革命动力的作用。

苏联学者舒尔哥夫斯基早在一九六七年就指出，在拉丁美洲存在一些军人团体，“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深刻的社会改造和反帝斗争的要求结合起来。根据他们的观点，武装力量负有领导‘民族革命’的使命，象他们的同行在埃及和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所做的那样。”<sup>②</sup>这指的是所谓“纳赛尔分子”。

崇拜纳赛尔的军官看到，纳赛尔主义具有这样的特点，反对帝国主义、决心争取独立和民族尊严，反对陈腐的社会经济结构。根据社会学者阿尔瓦的看法，在武装力量内，纳赛尔主义比社会民主思想的传播快得多。根据他的看法，纳赛尔主义在拉丁美洲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军事社会主义”，而这种概念的代表就是“实验室的军官”，也就是那些与民用部门的科技专家、进步企业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军事科技专家。<sup>③</sup>如果说到纳赛尔主义的军人，当然他们中间既没有企业家，又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军人的纳赛尔主义可以看作是他们企图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军队享有的特权

---

① 《真理报》，1971年4月6日。

② 舒尔哥夫斯基：《拉丁美洲的军队与政治》，《国际生活》，1967年，第五期，第46页。

③ 阿尔瓦：《技术专家治军的发展》，《前景报》，1963年，第六期，第5—39页。

利益是不相容的)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实质是殖民地道路)之间选择中间道路。那些还不准备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但同时又是真心希望消灭自己国家的附庸国地位和落后状态的军官,在寻求一条道路,能够保证拉丁美洲在“文明的军人革命者”集团的领导下向前发展。

一九七二年二月,瑞典《晚报》上发表了记者同一位玻利维亚游击运动领导人鲁宾·桑切斯的谈话纪要。鲁宾·桑切斯过去是军官,一九六六年同切·格瓦拉的部队作战,被俘,后转到游击队方面。记者问他:“一位职业军人怎么会变为革命者并跑到游击队方面来的呢?”他回答说:“我的童年是在极为贫困中渡过的,我很早就亲身体会到玻利维亚的社会存在着前所未闻的不平等……当一九六七年我当了游击队的俘虏时,我丝毫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进行斗争。军队内部的反共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每年都有上百名军人从玻利维亚到美国基地去受训,在那里他们受到思想改造。这样的思想改造在拉巴斯高等军事学校搞得丝毫不亚于美国基地。正是在那里人们变得更依附于军人组织,忘掉了人民的正义要求……”<sup>①</sup>

这段谈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理解当前秘鲁武装力量的作用。在秘鲁,由五角大楼教官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军队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地方剥削者的统治。这一点下一章再讲,这里只指出一点,秘鲁军官的榜样鼓舞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人。在巴拿马和厄瓜多尔掌权的军官,反对帝国主义和

<sup>①</sup> 《晚报》,1972年2月29日。

地主，他们进行着深刻的和重大的改革。霍尔赫·特克叶尔写道：“大陆上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是秘鲁和巴拿马出现民族主义的军政权。他们推翻了受外国垄断者支持的寡头，取得了政权……。从历史观点看，在拉丁美洲出现这样的民族主义军政权，是推进反帝斗争的道路之一，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还不能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条件下出现的。”<sup>①</sup>

这样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对资本主义失望和不信任它能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而产生的政治和思想潮流，不仅在人民中间，而且在军队中间都在传播。某些军人阶层、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们反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自然，这些军官要克服他们之中存在的同民主精神、为劳动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信仰等不相容的帮会情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军人民族主义者寄予过高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忽视与抹杀发展中国家军人中的进步潜力那是更大的错误。

不久前在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事件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九七三年七月，阿富汗的过时的古老封建君主制度被军队推翻了，其领导人是原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他过去是个军人，当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阿富汗军人积极支持穆罕默德·达乌德所开创的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

---

<sup>①</sup> 摩洛哥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莫赫迈德·马拉克希发表了以下的观点，“军事政变在下列那种国家最引人和最有成功的机会，即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成熟……。在许多国家里，民族运动之所以未能由政党来领导，主要因为这些国家中没有革命的先锋队或者先锋队的力量很弱。当居民中找不到出路时，军人集团就力图进行变革，所以这些军人集团能够成为革命力量。”（《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二期，第75页）

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政治作用也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正式把它列为最不发达和最穷的一类国家。埃塞俄比亚两千七百万人口中，有两千五百万生活在农村，困难重重，粮食朝不保夕。地球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人们认为现行皇朝的创始人是索洛蒙皇帝和萨弗斯基皇后的儿子）是当代世界上少数落后的封建堡垒之一，是陈腐和落后的体现。很早以前，吉本就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埃塞俄比亚人近一千年以来生活在梦中，他们已不知道周围世界，这个世界已被他们遗忘了”。

实际上，梦只是表面现象，埃塞俄比亚也在酝酿着变革。新的力量不知不觉地在发展、在成熟；不过其形成过程的时间特别长而已。这些力量中首先是军队，这是个太古朝代的“现代文明小岛”。军官们得到了现代军事教育，拥有装备良好的军队，他们意识到，国家状况极为悲惨，他们听取了要求变革的埃塞俄比亚进步社会舆论的呼声。

一九七四年初是埃塞俄比亚极为困难的时期。旱灾严重，粮食欠收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通货膨胀，很多商品价格猛涨。自然灾害使国家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开始愤怒了，首都出现了罢工。这时第五师有一个营逮捕了陆军司令，并拘禁达数日之久。然后第二师也出动了：阿斯马拉电台宣读了士兵的请愿书，他们控诉薪饷太低，给养不足，退休金太少。后来空军人员也参加了。皇帝宣布了增加士兵的薪饷，但浪潮没有平息。第二师控制了阿斯马拉城，海军也参加了。皇帝派往哗变部队劝说的将军中有一位被八名满腔怒恨的士兵代表押送回首都。第三师占领了迪雷瓦城。最后，二月二

十八日，第四师进入了亚的斯亚贝巴，占领了飞机场、电话局、银行、邮局。在军人压力下刚辞职的总理阿克利卢·阿普特·沃尔德换上破衣服，企图逃跑，但在机场被士兵截住。新总理马康南是最大的封建主之一，他答应进行改革，企图稳住军队。在这以前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和警察协调委员会决定考查马康南，给他时间，尽管最性急的军官想立刻推翻政府。部分飞行员企图轰炸亚的斯亚贝巴，攻下首都，但在最后时刻一位伞兵部队的上校破坏了密谋的计划，把自己的士兵派往德布拉—扎伊特空军基地，用军用卡车堵塞了飞行跑道。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夜，约三十名原部长、省长和将军被捕，押送首都师的司令部。马康南总理根据皇帝的指示答应施行新宪法，但军队越来越不信任他了。六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的夜间，驻扎在首都的部队在警察的支援下重新占领了一些关键地点，其中有广播电台。实行了宵禁，逮捕了一些贵族上层的著名代表人物，包括王权委员会主席。七月间大部分高官大臣、贵族老爷、大地主——帝位的传统的支柱——因犯贪污盗窃罪、营私舞弊罪、企图阻碍国家改革罪等等，或被捕，或逃跑。最后轮到了马康南总理，他被军人逮捕，按军人的要求被迫作出一次又一次让步的皇帝指定了新的政府首脑。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发生了真正的历史性事件：海尔·塞拉西皇帝被军人废黜。临时军人行政委员会把全部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委员会成员共一百二十人，其中四十五名是军官，军衔最高是少校，其余是军士和士兵。委员会的实际首领是第三师的梅基斯托·海尔·马里亚姆少校。他领导

了一九七四年二月开始的革命，他出身于瓦拉英族，这是帝国最受压迫和最受歧视的部族（自然会与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一样）。①他领导了军人的革命核心。在他的领导下，军人与临时军人行政委员会主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安东姆将军发生冲突。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安东姆被撤换，并被枪毙，同一天未经审判枪毙了五十九名前政权的著名活动家，其中包括十八名将军和两位总理——马康南和阿普特·沃尔德。

一九七五年二月，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后来又宣布了激进的土地改革，从而消灭了封建主义。

在革命过程中，军队的指挥成员基本上更新了。一九七四年以前的六十名将军仅留下五名，其余的分别被撤换、逮捕、或判刑。②

这样，过去一直是政权的顺从工具埃塞俄比亚军队突然觉醒了，并且唤醒了整个社会。国家动起来了。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变革过程。军队坚定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它的领导作用是无可争辩的。

无疑，象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这样的封建国家里，只有武装力量能够推动和成为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因为这里既没有政党，又没有社会组织，只有一些不大的、实际上是没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小组，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情绪，并因此受到了镇压。其他力量暂时还没有。假如在拉丁美洲或比较发达的阿拉伯国家，不经过军队或甚至同军队对抗，那是什

① 《联盟报》，1974年8月20日。

② 《世界报》，1974年8月27日。

么事也做不成的，所以落后的国家没有军队就不可能前进。

假如泰国给了我们一种模式——军队上层领导建立了军人官僚资产阶级的贪污腐化的政体，那末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给了我们另一种典型——即军官意识到变革的迫切性，起来反对专制封建制度，争取现代化和改革。

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军队还只是在这种条件的国家里活动，即这些国家的社会在政治上处于蒙昧时代，没有政党，缺乏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有组织的左派力量。但这一切迟早会产生的，那时军人面前就会出现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即在无比复杂、急剧分化和在政治上很快成熟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军人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制度呢。

## 第四章 军队和革命民主

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年青军官(新的阶层)通过政变，通常都会涌现出一批领导人，但他们在最初阶段对于社会经济方面都缺乏比较成熟的主张。他们的信念是民族主义，他们在民族主义浪潮中掌了权。民族主义是他们的思想基础，他们依靠国家和军事机构——这是他们暂时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不是直接依靠某一个社会阶级，而是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随机应变。他们的行动似乎异常地反复无常，这并不是因为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是出于政治动机，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对于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重要的是要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在国内外取得成就，从而赢得人民的拥护，使它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表现出它与旧政府有明显的不同，能够执行独立的政策和消除殖民主义后果。如果这一切要靠走资本主义道路取得，那末这个政府就应保护资产阶级。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军政权由于它的本性，不可能放弃对政权的垄断，它不会信任已经失败的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客，但它要在行政机构和经济部门给军官们安排领导职位以维护团结和取得军队的支持。军政权不会同意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

还应当指出一种情况：国家具有发展经济的职能，按照事物的逻辑，它要占据领导地位，限制外贸和资本家，并实行严



格的节约。但是这种严格节约的政策会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乃开始暗中破坏政府的政策，从而导致冲突。如果力量在政府方面，它就能取得胜利，例如埃及、叙利亚、缅甸就是这样。但是在斗争过程中，政府必须向左派方面扩大自己的基础，因为它的反对者是右派。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客观上就是拒绝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必须迅速解决各种迫切的民族问题、不能相信资产阶级会支持政府采取适当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信任资本主义大国，能够得出这样一些认识，是由于在亚洲和非洲的军事首领中广泛传播反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果。在亚非地区，国家政权多少是独立地具有机动性和选择的自由，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密切，并不担负旧制度利益的重担，而且它们是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条件下，这个体系是新的吸引中心，是物质和道义上的新源泉，革命民主主义军事领导人能够领导这些国家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要实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国家必须严格控制一切生活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军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独占地位，这使它更有力量。对于军人来说，要严守秩序和纪律，生活规律要严明，彻底消灭“无组织的习惯”，因此取缔私人资本的措施往往会过于冒进。根据这个原因，法国记者夏尔内发表了颇有意思的见解：“即使是从农民中招募的军人，也主张发展技术，工业化是他们的目标。但他们要建立重工业，而且要建设集中的经济，这种经济的生产力应直接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同于传统部门，与自己管理或独立经营的部门也不一样。”

夏尔内还指出：“军人社会的模式可以有两种办法组成，即一方面由相同的、可以互相替代的（在同一个军种内）的单位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按照不同的工种、象金字塔式那样由不同单位（不同兵种）组成。这样的模式适合于起统一指挥的经济，其中包括若干个经济单位、机关和国家公司。按照社会学，非无产阶级的专横政权都主张建立集体组织形式的经济，而且认为建立等级式的比建立公有制的形式容易。”<sup>①</sup>

除此之外，为了保住政权，按政治斗争的逻辑，必需破坏潜在反对派的基础，即使破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考虑经济后果。

因此对地主必需采取措施，以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 and 反政府的实力，同时要争取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即农民阶级支持政府。但是在技术、经验、干部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做法往往会使商品生产下降，使得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群众不满。

商业企业的国有化可以大大削弱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以缅甸和叙利亚为例，但由于对零售商也实行了国有化，就使失业者和有不满情绪的人增加，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居民的整个商品供应系统严重混乱，产品匮乏，出现投机等等。

革命民主政权的政治任务是要设法使农民和最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阶层，即知识分子成为自己的支柱。而经济任务是要保障农业生产增长，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和增加出口产品。

---

<sup>①</sup> 夏尔内：《阿拉伯军队处于革命和权力之中》，《国际社会学季刊》半年刊，1972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第232—233页。

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就需要有一批稳定的类似经理的管理人员。因为在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对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落后国家，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某种新经济政策。

不过，有意识地准许或利用私人主动精神的方针，也蕴藏着危险性。是的，有这样一种情况，即苏维埃俄罗斯实现的新经济政策。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和强有力的经受过考验的党，依靠有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即优先发展国营企业和加强工人阶级。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的国家里给私人自发势力提供广阔的活动天地，则又是另一码事，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多数甚至还未具备有觉悟的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也未具备用不可战胜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和以坚强的无产阶级为核心组成的久经锻炼的有经验和有战斗力的党；也没有能够迅速改造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然而只有进行这样的工业化，才能战胜私有企业和向集体经济过渡，即消灭最后一个堡垒——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在经济落后的非洲或亚洲国家，私人自发性的自由发展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私人势力控制社会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有一个有坚强思想的党——社会主义先锋队。

军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必须建立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政党。这是使国家能够成功地和逐步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资本主义道路也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和有利的国际条件下，才能够再向社会主义过

渡。

可是出现这种情况时，已经不是原来的军政权了，毫无疑问，它已经变了。就是象缅甸、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也已不是纯粹军政权了，虽然这几个国家建立先锋党的过程实际上还远未完成。

要建立先锋队必须有思想基础，因为这涉及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与它们斗争。但这还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虽然它已经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了，不过这种思想能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传播到各阶层人民中。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和思想的演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民族主义者便会站到革命民主方面来。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民族主义的军人站到它的旗帜下，所以这种理论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它的方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向科学社会主义演进。

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反映了中间社会力量的阶级特点，这部分社会力量按其成分是属于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能够继续前进，跨越过小资产阶级直接利益的界限。

革命民主派的社会主义概念试图结合民族主义口号，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号召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夺取政权。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明内部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不受欢迎，群众向往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另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经验宝库中汲取的。所以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民主理论

是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特征。

但革命民主派的实践倒超过它的理论。埃及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它的领导人的革命实践越过了他们自己规定的界线；阶级斗争的逻辑迫使他们打击原来不准备触动的那些社会阶层。他们最初认为中等工业资产阶级是“非剥削的私有制”，但结果不能成为政权的同盟者和助手。革命民主领导人想摒弃马克思主义立场，采取和平的办法把资产阶级和地主排除出领导岗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建筑在“暴力”和“无怪剥夺”的基础上的。但是反动派自己却诉诸暴力。

正如苏共中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宣传提纲中指出的，“某些已解放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在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正在采取重大的实际步骤。革命民主主义党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日益扩大，他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感到兴趣。”<sup>①</sup>

不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要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才能把群众从民族主义、宗教、宗法制度、封建和资产阶级观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思想的教育和传播只有靠政治组织来执行。这样，我们又要再回到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先锋党的问题上。这种政党的核心应是工人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真正关心建设社会主义，剥夺私有制，也只有它才是保证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稳固基础。

---

<sup>①</sup>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提纲》，《共产党人》，1967年，第十期，第38页。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几个进行革命民主改革的国家的具体例子。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政权。首先从埃及开始。

埃及的军政权是一个具有埃及特征政府。这个国家刚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贫穷得令人吃惊，人口不断增长。在纳赛尔执政前就存在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粮食问题，人口过多（沙漠淹没耕地），要加速工业化和改变农业上的连作制。任何一届埃及政府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军政权的根本缺点在于它想不彻底改变原来的社会结构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一年比一年明显，要解决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进行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而且要进行的改造应该比废除君主政体、取消总督称号和限制大地主等还要深刻。

从下表的数字可以看出，现代工业无产者的比重不大（占城市人口的10%，或不到全国总人口的3%），这也很能说明它不能成为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者。其次，城市中下层群众的比例很大，半失业者和失业者、半无产者、手工业者、仆人的数量占很大比例（占城市人口的56%）。其次是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占城市人口的22%）。在农村中无地和少地农民占绝对多数（79%）。

这些数字说明了收入水平差距极大，占人口1.4%的那部分人（资产阶级和地主）收入将近占30%（占九亿一千二百万英镑中的三亿一千九百万）。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得出结论，具有这种社会结构的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前夕，它面临的威胁或是经济崩溃，或是社会暴动。如果城市人口中有37%的人没有固定职业，这就意味着城市人口过多，而这些人都是为了逃避贫困而离开

农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偶有事做，所得无几，勉强度日。而且表中还没有反映出人口增长的因素。实际上埃及在革命后的十二年中增长了八百万人。

### 埃及的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一九五八年统计)①

| 种类                            | 数量<br>(千人) | 占城市人口<br>(%) | 收入<br>百万英镑 | 按人口平均收入<br>(英镑) |
|-------------------------------|------------|--------------|------------|-----------------|
| <b>城 市 人 口</b>                |            |              |            |                 |
| 无固定职业者                        | 2,982      | 37           |            |                 |
| 家庭个人                          | 934        | 12           | 20         | 21.4            |
| 半无产者                          | 186        | 2            | 6          | 26.8            |
| 传统经济部门的工人<br>(即非大工业的工人)       | 400        | 5            | 16         | 40.0            |
| 无产者                           | 790        | 10           | 48         | 60.8            |
| 低级职员                          | 1,117      | 14           | 118        | 105.6           |
| 传统经济部门的企业主                    | 736        | 9            | 94         | 127.7           |
| 自由职业的中级职员                     | 614        | 8            | 83         | 133.5           |
| 资产阶级和贵族(包括<br>住在城市里的农村贵<br>族) | 240        | 3            | 303        | 845.8           |
| 共计                            | 8,000      | 100          | 587        |                 |
| <b>农 村 人 口</b>                |            |              |            |                 |
| 贫农:                           |            |              |            |                 |
| 无地贫农                          | 14,000     | 73           | 50         | 3.5             |
| 少地贫农(1费斤)                     | 1,573      | 6            | 7          | 6.1             |
| 中农(1—5费斤)                     | 2,850      | 15           | 76         | 26.8            |
| 特权者:                          |            |              |            |                 |
| 富农(5费斤以上)                     | 873        | 5            | 76         | 87.4            |
| 农业资本家                         | 150        | 1            | 116        | 773.1           |
| 共计                            | 18,950     | 100          | 325        |                 |

① 利亚德,《纳赛尔的埃及》,巴黎出版,1964年,第41页;60页。

只有加速工业化才是出路。军事领导从一开始掌权就懂得这一点。他们做了巨大努力，给予私人资本一切可能的优待，要他们兴办工业；但是时间越久，他们越感到失望。

埃及工业联盟一九五三年的总结报告证实银行的投资及其为发展工业提供的信贷在缩减，工业产值的增长极为缓慢。一九五七年，其指数为123.3（一九五四年为100）。工业投资总额一九五六年为二千六百二十万埃镑，一九五七年下降到一千二百九十万埃镑。马利克认为，下降原因是“在苏伊士事件期间富有阶级感到巨大威胁”。<sup>①</sup>这意味着苏伊士危机导致把外国人的所有权收归国有。这在精神上加深了资产阶级对军政权的不信任。

上面已经讲过，在一九五二年以后曾经给外国资本家某些优待，但是正如J.拉库蒂尔和S.拉库蒂尔指出的，“还在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前外国资本家就很克制……，西方资本主义就尽量回避上校政府。”<sup>②</sup>在一九五四年给外国资本家以新的优待：允许把利润用投资国的货币汇寄出国等等<sup>③</sup>。但这一措施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吸收本国资本兴办工业，同样是这种情况。专为工业提供贷款而建立的工业银行，拥有九百万埃镑的资本，到一九五七年底提供的信贷总额为四百五十万埃镑。<sup>④</sup>银行很不愿意贷款给工业公司。

埃及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所写的文件中指出：“在埃及的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03页。

② J.拉库蒂尔和S.拉库蒂尔，《运动中的埃及》，第346页。

③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05页。

④ 同上，第103页。



经济发展过程中，私人企业的作用同样不大，而政府主动采用一切可能的关税保护，给予补助和直接拨款等方法，鼓励新的投资；但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年），冒险的因素——私人企业起作用的基本原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在这期间，私人企业实际上是不愿意将财富白白地向无能的人投资。<sup>①</sup>换句话说，政府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给他们创造了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他们并给予补助，但仍然无效。

出乎意料的是，本来为了促使资本向工业投资而进行的土地改革，也实在是收效甚微。一九五五年从农业方面抽出四千五百万英镑，但向工业投资的仅六百万英镑。<sup>②</sup>投机商人把资本投到城市建设方面（每年投资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英镑，通常是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大城市）。<sup>③</sup>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对城市建设投资达到了特别的规模，两年内的投资约为八千二百五十万英镑，而这时对工业的投资不超过一千六百六十万英镑。<sup>④</sup>在一九五六年城市建设的投资为全部私人投资的75.8%。<sup>⑤</sup>在以后的几年中，情况也没有变化，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投资超过全部私人投资的四分之三。

其主要原因是这一经营范围的利润比工业企业高得多。但还有其他原因：政府的不彻底政策既打击了右派，也打击了左派（左派较多）；军人官僚阶层的反共倾向，时而隐晦，时而

---

① 《埃及国家银行，1953—1963年间埃及经济发展的评价，埃及国家银行经济公报》，1964年，第一期，第47页。

②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91页。

③ 同上。

④ 沙菲，《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261页。

⑤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91页。

公开(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给予外国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以特权——所有这一切使一部分资本家深信，政府不会左倾，不会走上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因此资本家无所顾忌地耍弄故伎；他们无视政府的劝告，玩弄一切可能的外汇舞弊勾当，毫不关心民族利益和工业化的需要。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政府为了争取资本家对政权的信任，改善他们的活动条件，给予优待，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而资本家则更加厚颜无耻地以加倍的努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但是，如前所述，在苏伊士国有化之后，许多资本家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认为政府迟早会由剥夺外国人的产业所有权进而侵犯本国有产阶级的特权，他们感到自己将难以幸免；于是，还在未“被掐住脖子”以前，千方百计不失时机地拼命赚钱。这就使资本家向着那些在最短时间内能获得最大利润的领域投资。结果是财迷心窍，陷入了迷魂阵。

外汇流失具有特殊意义。埃及极为缺乏外汇。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曾揭露出多起商人滥用外汇的勾当。外汇流失给经济造成了真正的灾难。<sup>①</sup>

大资本家、银行家、大商人勾结在一起，悄悄地组成一个垄断集团。他们与国营公司做交易，在利润问题上达成协议。五年计划所批准的许多重要设计项目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原订要吸收加入这些项目的私人资本未能参加，这些人之所以退出是因为他们认为工程开始时肯定无利可图。在价格回

---

<sup>①</sup> 一九六一年在弗·塔格尔(埃及资本主义台柱之一)每年汇报伦敦值一千万英镑的外汇。

题上显然是没有什么可竞争的。因此政府完全有理由怀疑，一些私营公司为了互不妨碍以最有利可图的价格签订承包合同，秘密地划分“势力范围”。资本家还靠提取设备折旧等狡诈手段发财致富。<sup>①</sup>

哈立德·毛希丁写道：“计划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在用于经济发展规划的总金额中私人资本不超过10—15%。政府为实现五年计划作了一切努力，以影响私有经济，实行有利可图的物质刺激。但是这样做也无显著效果。最后，经过长期谈判，政府被迫在一九五九年颁布了一项关于确定最高利润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禁止分配利润超过一九五八年利润总额的10%。问题在于资本家认为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计划是个徒有其名和极不现实的意图；他们还认为，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末基本上也是靠损害他们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将抵制一九五九年的法律，公开怀疑计划的现实性，并拒绝参加这项计划。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对被他们称作‘为了后代牺牲当代’的计划进行宣战。”<sup>②</sup>

总之，资产阶级兴旺起来了——基本上依靠非生产性领域和狡猾手段。它的利润在增长。但是正如马利克指出的，资产阶级将受到的排挤是：“军队要想自己管理政治，保持对政权的垄断……，军队并不担心经选举的大会将捆住自己的手脚，尽管埃及资产阶级各派可能要利用这个大会强迫自己向他们屈服。他们可能公开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要想控制行政机构。但这些人能够当选部长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sup>①</sup> 《金字塔报》，1961年8月8日。

<sup>②</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2页。

但这些集团有必要准予参政，过去正是由他们来指定和罢免部长，由他们来同外国谈判、控制报界、政党和议会。”<sup>①</sup>一句话，就行使国家权力而言，现在的资产阶级则要靠死死抓住政权的军政府。纳赛尔的意图经常是神秘的。他不同“权威人士”商量，而采取闪电般的行动。这些“有权威的人士”也不信任他，不愿冒险向实际上是当局所建立的企业投资。

资产阶级暗中不满，企图减轻政府干涉的“压力”。它感到必须使国家“摆脱”这种“压力”。于是，反政府阴谋的潜在危险就产生了，从而为反对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政府知道这一点，无须多等。哈立德·毛希丁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没有政治监督，要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不现实的。这就再次证明，国内不能有强大的而且又是与政府关系不好的私有者阶级。纳赛尔未能“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在开罗出版的《社会主义对话》一书中谈到：“我们国家长久耐心地期待着富有阶级的觉悟，而大私有者却阻碍实现经济发展计划。”<sup>②</sup>这句话除了“觉悟”一词以外，几乎全对。埃及资产阶级考虑到它的“殖民地”出身，它的过去，它的传统，它的心理状态，它对现实的态度，最后，考虑到它财经上的软弱性，经济条件和国内政治状况，它不能不这样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发展的利益不相容，而政府仍然坚持民族发展利益，否则它的活动，它的“利民主义”（主张铁路公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06页、107页、115页。

② 《论社会主义》，开罗出版，1961年。最早是埃及杂志证实，“埃及实业界不愿对民族复兴进行投资”。（见《埃及经济和政治评论》，1959年5—6月，第27—28页。——译者）

有，限制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思想——译者注），它对政权的垄断，等等，就会没有意义。军政府或实现工业化，在十年内成倍提高国民收入，或证明自己无能为力。资产阶级起来挡路，军政权便打击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道德上的怀疑，当权者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与资产阶级没有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军队和国家机器。

奥勃拉恩写道：“一九六一年前，军官们已经对私有经济部门缺乏信心，怀疑它能否或是否愿意遵循民族计划委员会为它制定的路线。军官们不想在计划的成败这个问题上进行冒险，因为这个计划同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他们宁愿将中央能够控制的经济部门都收归国有。”<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宣布将埃及国民银行和“米斯尔”银行收归国有，这是政府对埃及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力打击。“米斯尔”银行及其二十九个分行在国有化之前都是强大的垄断组织。正如经济组织头头卡约苏尼博士所说的，“米斯尔”银行的资本已超过十亿英镑，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股份公司，<sup>②</sup>它很象美国反托拉斯法律所禁止的公司。<sup>③</sup>后来查清，“米斯尔”银行42%的股票掌握在五十个人手中，其中十个人占有全部股票的20%，仅“食糖大王”阿布德一人就占该银行股票的14%。<sup>④</sup>

① 奥勃拉恩：《埃及经济体系的革命》，第315页。

② 霍尔金塔公司是专门控制其他公司的股份，通常它没有自己的生产性企业。

③ 《金字塔报》，1966年3月6日。

④ 《鲁登·优素福》周刊，1960年2月20日。

《金字塔报》写道：“米斯尔”银行达到“垄断阶段”，它已经危及国家政权的统治。<sup>①</sup>这是问题的实质，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驱使它去控制国家政权。

“米斯尔”银行的国有化是采取更大步骤的前奏，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政府命令将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一系列的工业及其他公司（共四十四个）收归国有。国有化涉及到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根据第二个命令又将八十家公司改成合营股份公司，其中国家资本不得少于50%。这个法令打击了一千七百一十五个资本家。根据第三个命令，规定一百四十八家公司中私人资本的总额不得超过一万埃镑，超过部分转交给政府。有二千零七十个大股东受到了法令的制裁。<sup>②</sup>

政府把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把商船队收归国有。进口贸易应由国营公司或政府资本不少于25%的合营公司经营。

政府决定收购所有棉花出口公司35%的股票。棉花是属于政府监督下的一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也是获得外汇的主要来源。

新的土地改革把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减少一半，每人可达一百费丹。外国人所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约没收了二千六百一十四人的十四万二千费丹土地。

埃及部分的资产阶级感到惊慌失措，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但叙利亚部分的资产阶级情况就不一样，他们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驻扎在卡特纳（靠近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卫戍部队，开进首都

<sup>①</sup>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65页。

<sup>②</sup> 《埃及国家银行，经济公报，XIV（1961年）》，第三期，第326—332页。

---

(大马士革)。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实际全权代表阿密尔元帅拒绝军官们提出的最后通牒，因而被捕。军官集团夺取了政权，并宣布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马蒙·库兹巴里任政府首脑，众所周知，他与所谓的“五人公司”有密切关系，这个公司是叙利亚资产阶级的核心。<sup>①</sup>

象在苏伊士危机时候一样，纳赛尔再次表现出器量宽宏的国务活动家的品德，他选择了唯一正确的决定——不动用武力把叙利亚强行留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

更重要的是纳赛尔从叙利亚危机中得出了深刻的结论。他深信，对革命的威胁来自资产阶级，敌人来自右方。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了他政治活动中的转折点，促使他采取坚决的步骤，在埃及进行早就想做的根本的社会改造。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纳赛尔发表了一个演说。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中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动势力，他为反对帝国主义条约和基地进行了斗争，可是帝国主义还在“百万富翁的住宅中和保险柜中”。纳赛尔承认，他和他的助手给了反动分子进入民族联盟的机会，保持了原有的、无效率的国家机器，而没有把它变为人民群众手中的工具。纳赛尔也承认没有对人民进行革命的教育工作。<sup>②</sup>

马利克写道：“如果一九六一年七月颁布的法令想使大资产阶级保持中立，那么十月十六日的演说意味着大资产阶级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60页。

② 《金字塔报》，1961年10月17日。

将被消灭。<sup>①</sup>

过了两天，十月十八日组成了新内阁，二十八个阁员中有十三名军官，包括总统一人，副总统五人，再过了四天，宣布逮捕了四十人，他们基本是过去的华夫脱分子（四个月后被释放），宣布管制一百六十七个“反动资本家”的财产，他们是埃及传统上流社会所有“大家族”的代表。三年之后，纳赛尔承认在决定对财产实行管制以前，他动摇了很久。<sup>②</sup>实际上，这是向资产阶级公开宣战，是坚定的一步，而且取得了成功。<sup>③</sup>

象几年前从政治舞台上粉碎和驱逐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代表（旧时代的政客）一样，一九六一年又从政治舞台上粉碎和驱逐了大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总值十亿埃镑的财产，资产阶级最出名的代表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加以“隔离”，即剥夺政治权利。埃及资产阶级的总头头“食糖大王”阿布德因用金钱舞弊而受到国家安全法庭的审判。

“如果我们把经济领导权交给私有制部门，我们将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在纳赛尔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长期的冲突导致一九六一年采取革命措施。哈立德·毛希丁写道，“对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没有达到接近全面的控制，五年计划就不能实现。除了国有化和人民监督，除了组织劳动群众积极参

---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00页。

② 《阿拉伯政治公报》，1964年，贝鲁特美洲大学，第114页。

③ 有一种说法，阴谋的败露影响了这一步骤，参与这个阴谋的约有三十名军官，这些军官同资产阶级集团有联系，似乎同华夫脱分子也有接触，并倾向于要求阿迈尔结束独裁和恢复议会制。



加社会建设外，别无其他途径。纳赛尔总统从实践和理论上得出结论：不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如不遵守社会主义原理，就不可能实现发展计划。他向人民宣布：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解决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确定了理论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进行政治经济活动。”<sup>①</sup>

但是正如该作者正确地指出的，“必须有一个理论，来证明革命所选择的道路”。<sup>②</sup>确实，革命进入了寻找理论的阶段。埃及提供了革命发展的有意义的典型，在这场革命中，实践超过了理论，它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根据。

由于这些行动针对阻碍革命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自然，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早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前就已明确了，“寻找理论”就是研究制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根据军政权首领们的意见，这种思想体系应适合于埃及的条件，于是作出决定，必须使研究这个思想体系的过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为此建立了人民国民会议，为召开人民国民会议还要奠定一个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基础，人民国民会议要在这一组织的基础上召开。纳赛尔指出，国民联盟混进了反动分子，它已不适宜承担这个任务，因而予以解散。决定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该联盟中凡是选举产生的机构，其中工人和农民所占席位应不少于50%。纳赛尔指出，“工人和农民是一支最关心社会主义的力量”。

早在一九六一年，当权派确认“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3页。

② 同上。

已经身败名裂<sup>①</sup>。十月十六日后，开始筹建新的政治机关，下面我们看到，这种筹建工作延续了好几年。但是重要的是意识到了不能同“思想陈旧”的人合作，尤其是在思想方面，这正是这一时期首次发现的。

人民国民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幕，会议召开前进行了细致的准备，而且准备工作由纳赛尔亲自领导，他在会上宣读了民族行动宪章，大会一致通过了宪章。这是一个确定国家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针的文件。从这个重要文件可以判断埃及革命民主派的意识形态。

宪章的核心是确立社会主义作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导所选择的社会结构形式和否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原因在宪章中作了明确阐述：“当在发达国家中产生了依靠剥削殖民地财富的大垄断资本家时，资本在落后国家中自然发展，不会再促进经济上升。”<sup>②</sup>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能靠私人资本使国家走向进步，因为他们的动机是追求私利。为扩大民族财富的基础，不能允许私有剥削资本的自发性及其贪得无厌的欲望……结论是人民必须控制一切生产资料。”<sup>③</sup>

除宪章的这些原则外，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金字塔报》社论还作了如下补充：“对阿拉伯人来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事实证明，依靠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和克服由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统

<sup>①</sup> 《纽约时报》，1962年7月11日。

<sup>②</sup> 《金字塔报》，1962年7月11日。

<sup>③</sup> 《埃及新闻报》，1962年5月22日。

治所造成的极端落后。”<sup>①</sup>

社会主义已成为埃及历史的必然，这种思想在宪章中表现得极为有力：“用社会主义来克服埃及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用革命的手段争取进步，这不是某种抽象的选择，而是现实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愿望，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发展的形势所赋予的历史必然。”

由此得出结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顺利走向进步的最新形式，任何其它道路均不能保证所期望的进步。”因此宪章指出的正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某些埃及理论家多年来所鼓吹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纳赛尔自己也不用“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了。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导人是怎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呢？根据纳赛尔的定义，社会主义意味着“生活富裕和正义”。而“正义”则要努力“消灭阶级之间的矛盾，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才能达到。“剥削”这个概念不包括生产资料私有者所有的剥削，这里指的只是所谓的资本剥削（实际仅指大资产阶级和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问题在于，宪章宣布：“人民必须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并根据计划支配收入”，同时宪章强调，“人民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并不意味着必须把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必废除私有制，不伤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法的继承权”。人民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可以通过“强大的公有制部门”来实现，因为这个公有制部门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可以允许私有制部门存在，这些私有制部门可以在总计划的范围内在

---

<sup>①</sup> 《金字塔报》，1962年7月11日。

不剥削的情况下参加建设(即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作者注)。

国有化仅限于“剥削资本”，而“非剥削资本”不仅不予消灭，而且还受到鼓励，并宣布它为人民力量的一部分。两种资本的区别在于：第一种资本企图控制政府(又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即革命政权对私人资本企图插手政治领导过分敏感)，它依靠帝国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并获得最大利润；而第二种资本则要消灭对工人的剥削，给工人提供合理工资，给予工人参加企业利润分配和企业管理的权利。

至于土地问题，宪章明确表示反对土地归公。“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不在于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而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制，并扩大土地私有制，给予多数佃户以土地所有权，而且要巩固私有制，其办法是进行农业合作化，并扩大农业合作化的范围，包括农业生产过程自始至终的各个阶段。”

因此宪章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可以保护城乡小资产阶级。

宪章指出：“谁认为七月法律扼杀了私人所有制的主动性，谁将会犯很大的错误。”但只承认这样的私人所有制不是依靠投机和垄断，而是依靠“劳动，准备冒风险”。实际上这种提法和关于“不进行剥削而获得合法利润”的想法很难设想是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这里所指的雇用少量工人的小生产是经商、承包建设工程等等。但是总的来说，宪章也让私人经济部门在工业中占居应有的地位，其理由是：“私人经济部门对国有部门来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为在总的经济计划范围内开辟了自由竞争的活动余地。”

---

宪章承认重工业是经济的基础，并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保障利用一切民族资源的唯一办法。”

和革命前某些时期相比，宪章的作者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如果在一九五九年纳赛尔说，革命可能“不必用阶级斗争，靠友爱和亲善”来发展<sup>①</sup>，那么在宪章中则说“反动派和剥削资本的联盟应该摧垮，斗争的和平解决只能在反动派缴械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宪章指出，“革命前埃及是反动阶级的专政。工人和农民是奋起革命的人民力量的先锋队，不能忽视和否认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斗争。”但是宪章的作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流血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更没有必要打内战。他们主张缴下反动派的武器，消除其危害性，以便为“阶级斗争的和平解决开辟道路”。但是解除反动派的武装，这意味着使用暴力，实行专政（即使不是流血的）。因此与原来以“友爱和亲善”为基础在民族联盟内部进行阶级利益调和这种论调相比，宪章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劳动人民的联盟中包括“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经验证明，“民族资产阶级”（“非剥削阶级的”同义词）主要指的是小资产阶级。一九六三年八月又有二百七十六家私营的和合营的企业和公司收归国有。有很多食品、纺织、化学、制药等工业也国有化了。这中间大多数是中等资产阶级的企业。

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宪章中作了如下规定：“民

---

<sup>①</sup>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八期，第41页。

主是政治自由，社会主义是社会自由。彼此不能分开……，没有获得一块面包，自己的选举是没有价值的。”

社会革命的有组织力量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即“领导群众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成为联盟的成员，尽管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农村经常受到破坏。纳赛尔多次表示担心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钻进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他说：“如果封建主或者资本主义剥削者在人民组织中篡夺了领导岗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失败。”纳赛尔再三强调指出，革命的思想应该来自工人和农民。

纳赛尔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国民议会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言时说：“宪章不是教条，而是全面发展的方法，宪章应是团结劳动人民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束缚这个联盟的枷锁。”<sup>①</sup>

分析一下国民运动宪章，不用怀疑，这是一个革命民主纲领，它给一系列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综合这些措施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总结作为政治力量的埃及军队的活动，（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因为看来军队在埃及已经起到了独创的政治作用），应该确认军队在民族解放革命中建立了巨大的和无可争议的功勋。一九五二年，军队就在反帝和反封建的人民运动中起着先锋队的作用。在后来的年月里，军队又在捍卫着革命成果，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和对付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

一九五二年以后建立的制度，其主要弱点之一是这种制度产生于军事行动，它是军政权。军队看作（至少自认为如此）

---

<sup>①</sup> 《金字塔报》，1962年7月11日。

是国家的领导力量，由它来决定祖国和革命的命运。这是它逐渐变为特权集团和上流社会的根源，这个变化是在大部分军官中，特别是高级军官中滋长着特殊的“上流社会”心理。他们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他们便要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此高级军官必然要抵制联合竞争力量（应领导国家的政党）。但当建立的不是普通政党，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时，这种抵制尤其强烈，因为这种政党会加倍威胁军人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军人官僚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军队的上层集团以及同他们有关的行政上层（大部分来自军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的侵略促使冲突达到顶点。

在“六天战争”中，埃及士兵在各种环境下顽强作战。波兰作者捷基兹在《政治周刊》杂志中写道：“糟糕的不是武器和士兵，而是骄傲自满的军官阶层，其中很多代表人物处于国家和私有经济部门的交叉路口上，他们维护着自己的特权地位。”<sup>①</sup>

这里我们要认真讨论一个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以上有关官僚机构的所有论述，同样适用于军官阶层。已经指出，部分军官占据了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岗位后，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与首都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结合，沆瀣一气。<sup>②</sup> 他们的浪漫主义、革命热情和谦逊精神大大衰退了，很多军官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为了官运亨通，他们已

---

① 捷基兹：《希望》，《政治周刊》，1967年7月8日。

② 威洛克：《纳赛尔的新埃及》，伦敦出版，1960年，第47—48页。

不满足于穿戴军装，希望得到法律系、贸易系或经济和政治科学的毕业文凭。主动要求并获准在大学旁听。不少军官进入了一九六一年创办的新的军事技术系，该系七年的课程中既有中等军事技术教育，又有高等技术教育。<sup>①</sup>

迈克尔克是这样评论军官的情况的：“军官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占据了经济机构中的经理职位，管理苏伊士运河和领导治理沙漠。所有二十四个省长全由军官或警官担任。驻外大使中30%是军官团的成员。自然，他们在自己的文官职位上是不穿军服的，但是他们已成为当代的军阀……，他们比其他埃及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和特权。不允许军官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免他们穿着军服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互相推挤……，他们使用的是军用交通工具……。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俱乐部。他们的薪金高于同工种的任何其他埃及人，一个中尉每月可得二十五——三十英镑，而国家机关工作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不超过十八英镑。”<sup>②</sup>

根据法国学者勃·维尔年提供的材料来看，军人仍保留着物价上涨时的特别补贴费，但文职官员的这种补贴已经废除了。专门为军官开设合作“市场”，他们仅用价格的30%购买日用品。<sup>③</sup>

苏联新闻记者别利亚耶夫和普里姆科夫写道，许多军官“利用特权来提高自己的福利，服役期满离开军队后，很多将军和上校军官一般都能在工业部门和政府机关获得高位。政

① 马利克，《埃及是个军人社会》，第178—177页。

② 迈克尔克，《红色剑王》，汉译出版，1964年，第64页。

③ 《在第三世界军队的超军事任务》，第126页。



府往往请求军队帮助在某一政府机关整顿秩序。把军官调往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已逐渐成为常规。在新的岗位上他们有更多机会增加自己的福利。这些将军和年老军官在银行立有帐户和领取支票本。还有这样的情况：当在外国银行开立帐户时，就把存款折合成外币汇往外国银行。军官商人式的人物出现了，这种人物做起买卖来要比对士兵和军士实施军事训练起劲得多。

两年前开罗报纸的报道透露了有关“新官僚派”的情况。所指的首先是在政府机关内获得高职位和领取高薪金的军官。有一个人同我们交谈时苦恼地说，这些人是把自己利益放在国家之上的特权阶层。在阿联，军人资产阶级这个术语已广为流传。<sup>①</sup>

所有这些雄辩的事实说明，革命以后的年代里，埃及武装力量的军官集团朝着什么方向演变。青年革命爱国者常常变成资产阶级官僚，变成特权军阀集团的成员。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埃及的军事首领依靠军队夺取了政权，他们懂得军队的意义，他们保持了君主制度给军官提供的特权，而且有增无减，力求军队成为自己的主要支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特权会使心理变化。当在埃及存在纯粹的军政权时，军人官僚阶层大可不必担心，政府也不必怀疑它的忠诚。但是随着社会改造深化，这个阶层开始表现出不满。根据别利亚耶夫和普利马科夫证实，一九六一年在纳赛尔颁布“社会主义法令”时，就有军人驾驶员（一般出身于较为富裕的家庭或特权

---

<sup>①</sup> 《在国外》，1967年，第二十七期，第8页。

家庭)公开反对“青菜萝卜小商贩”走入国民会议<sup>①</sup>。有时纳赛尔也撤换部分骨干军官,但显然,这一行动太缓慢了,还赶不上军队干部的官僚主义化和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因此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继续存在,因为军人仍享有特权地位,政府还不敢废止它。相反,政府进行的社会改造越深刻,它越应该估计到高级军官反抗的可能性,越要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特权,以保持他们的忠诚。这种恶性循环终究使内心不接受革命和从纳赛尔的改革中感到威胁自己特权地位的高级军官,在关键时刻不表现出应有的爱国精神和战斗精神。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内心深处完全可能认为,假如以色列打垮纳赛尔,那就更好了,因以色列人迟早会象一九五六年那样离开埃及国土的,然而政权的左倾化将会结束,富裕阶层面临新打击的谣传就会烟消云散,共产党人的影响也随之消失。

自然,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前线作战的不是坐在政府行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军官官僚和军官商人,但军官阶层总的气氛却是以他们为转移的。军人官僚资产阶级的情绪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感染部分作战部队。

军队中没有真正的政治工作,没有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支部,军职人员不得成为该联盟的党员。很多军官离社会主义思想很远,没有保卫革命成果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思想政治工作只是在军训时一带而过。

哈立德·毛希丁在谈到六月失败的直接原因和纯军事性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比较基本的和深刻的原因造成的,

---

<sup>①</sup> 《在国外》,1967年,第二十七期,第7页。

“它反映了政治机构中存在严重缺点……民族行动宪章的口号至今未能真正实现。许多富裕农民和土地资本家以农民代表的身分在国民会议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占据了席位。工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多席位本来应该留给工人代表的，实际上被政府高级官员占去，其借口是：每个职员都是劳动者。”<sup>①</sup>

著名埃及新闻记者、《共和国报》编辑奥达在分析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政治和思想工作完全被忽视。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国家是为群众的，但又没有群众。”<sup>②</sup>《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针对这个问题写道：“政权中心和管理机器只为自己服务和保护自己……群众运动不是由这个机器和政权扶植发展的，而是针对它们而发展起来的。”<sup>③</sup>海卡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了“政权集团”，指出“行政机关全操在”政权集团手中。

“政权中心”、“政权集团”以及“压力集团”等术语直到六天战争以前还没有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使用过。只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当这些中心已被粉碎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它们。只是到那时才查明了这些“中心”和“集团”的真正权限。这些“中心”和“集团”极为强大，以致某些埃及作者认为可以称它们为一九六七年六月前存在于阿联的“双重政权”<sup>④</sup>。“第二政权”或政权的“平行中央”（用埃及报刊上的术语）的头头是阿密尔元帅。阿密尔的司令部、军事侦察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在

---

① 《新民主》，1968年，第二期，第117页，120页。

② 《真理报》，1967年12月6日。

③ 《阿拉伯共和国联盟：经济情报处季刊》，1967年，第四期，第5页。

④ 《新民主》，1968年，第二期，第96页。

一定程度上就是监督纳赛尔总统的两个“压力集团”，它对政治生活影响不小。

前作战部长巴德朗一九六八年春在阴谋分子出庭受审时声称，早在一九六二年，纳赛尔总统就想剥夺阿密尔在军队中个人决定全部干部问题的权力。但是正如苏联新闻记者普里马科夫报道的：“阿密尔以辞职来威胁，而纳赛尔在未准备好下手以前，实质上同意了‘双重政权’继续存在。”<sup>①</sup>另一位将军谢里德在法庭上证实，他亲自听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巴德朗打电话给纳赛尔说，他（巴德朗）十分强大，需要时，他“躺在沙发上”就可以发动政变。<sup>②</sup>

一九六八年三月，纳赛尔在赫勒万演说时谈到：“有一个军人政治活动家集团……对这些人来说革命就是要掌握政权……，当六月九日和十日人民起来之后，这个阶级感到对自己有威胁，于是就想夺取司令部。”使用“阶级”这个词不是偶然的，纳赛尔在另一次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存在着军人阶级，他们认为是政权的天然继承者，自认为应由他们来决定国家和革命的命运。”<sup>③</sup>

这指的就是军人官僚资产阶级。我们理解它当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是一九五二年革命后在埃及形成的新特权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是许多作者们所公认的，首先是埃及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这个阶层除高级军官外，还包括普里马科夫所说的“从军队中出来的，包括亲

---

① 《新时代》，1963年，第十七期，第5页。

② 《世界报》，1963年2月28日。

③ 《政治》，1963年2月24日。

西方的技术专家在内的政府官吏阶层”，这些人被称为“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政府官吏。<sup>①</sup>

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纳赛尔总统就宣布：“我们的职责是不惜任何代价制止企图继承旧特权的‘新阶级’产生。我们应该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因为一旦可能，这个阶级就要用武力打败人民力量联盟。”<sup>②</sup> 纳赛尔决定同这个和他对立的“平行政权”进行斗争，他先是依靠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然后再依靠他打算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建立的“秘密组织”。纳赛尔和他最亲近的同伴懂得，“军官集团已逐渐从他的支柱变成第二权力中心。”<sup>③</sup> 阿密尔集团试图使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活动陷入瘫痪。冲突在不知不觉中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到来了。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埃·鲁卢证实，“许多军人所期望的是，如果军事不失败，那无论如何也遭受严重失利，这场失利可能迫使拉伊斯辞职。”<sup>④</sup> 伊斯萨写道，在六天战争期间，“新阶级”起来反对纳赛尔，“新阶级的成员已经在开罗会议室集合，企图组织新政府，名单早就拟定；党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党的机关也瘫痪了。但是人民在坚守岗位，他们就是前面所说的沉默的不关心政治的人民，他们成千上万地走上街头，他们成了主人……六月九日和十日运动成了反对运动——反对新阶级及其体制。”<sup>⑤</sup>

---

① 《新时代》，1968年，第十七期，第6页。

② 《新民主》，1968年，第二期，第97页。

③ 《红色权利报》，1968年7月19日。

④ 《新民主》，1968年，第二期，第97页。

⑤ 同上。

群众胜利了。人民证实自己才正是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军人上层从自己的统治地位被推翻了。但是军人官僚资产阶级仅仅是受了一点伤，于是他们就疯狂反扑。他们策划阴谋，阴谋的头子就是阿密尔，关键人物有前作战部长沙姆赛丁·巴德朗、前任侦察长官萨拉赫·纳斯尔、少将奥斯曼·纳赛尔，阴谋被揭露后，阿密尔自杀，其余的阴谋分子被送上被告席。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写道：“阿密尔倒台后，没有一个人能维护阿密尔分子的特权，阿密尔在世时这些人是国内最有特权的阶级。”

纳赛尔总统说：“感谢上帝，武装力量现在摆到应有的地位上了。”哈立德·毛希丁写道：“对革命事业持保守观点并对普通群众持蔑视态度的最高军事指挥部被粉碎后，将大大促进埃及各方面的民主化。”<sup>①</sup>

《真理报》记者别利亚耶夫和普里马科夫写到军事阴谋家时指出：“他们站在公开敌视革命的道路上，变成了埃及反动派的中心。”<sup>②</sup>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全民投票一致拥护的《三月三十日纲领》实际上“拒绝军人作为充实政府机关各个环节的主要来源。”<sup>③</sup>

现在谈谈叙利亚。前面我们谈过一九六一年这个国家退出阿联，在短期内恢复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但很快就垮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生政变，复兴社会党又开始掌权，这时这个党在叙利亚军队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① 《新民主》，1968年，第二期，第122页。

② 《在国外》，1967年，第三十九期，第15页。

③ 《真理报》，1968年4月28日。

复兴社会党具有两项最重要的思想武器：阿拉伯统一的思想和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这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反帝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派别不同之处。如果再加上复兴社会党的组织集中和纪律严格，那么，它所以会取得胜利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三年，复兴社会党就这样重新上台。这也是一种特别政治真空促成的。形成这一政治真空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政党已威信扫地，共产党经受打击后还未恢复元气，而纳赛尔分子已被削弱并遭到排挤。

就表面看来，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认为复兴社会党要比共产党人和纳赛尔的支持者好一些。复兴社会党人的纲领并没有提出要打击企业家和地主等特权阶级。叙利亚有特大的地主，仿佛是大地产者，其中有的拥有土地达十万公顷。<sup>①</sup>这些基本上都是土耳其和库尔德的封建主，他们在独立后不起什么重大的政治作用。统治阶级是资本家，同时他们也是大地主。贸易是他们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叙利亚的贸易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投降政府造成的）。大约从十八世纪起，阿勒颇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中占优势，然后是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徒才同基督教徒一样在这一领域中占领了阵地。

二十世纪中叶，在叙利亚形成了三个主要企业集团：胡马西亚集团（大马士革），成为企业主的伊斯兰进口商人，经营纺织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等；萨赫纳翁集团（大马士革），都是

---

<sup>①</sup> 《世界报》，1966年10月17日。

些买办资本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经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阿勒颇集团，最大的纺织厂主和最富有的大地主穆达尔里斯，经营纺织和水泥工业企业的商人哈里里和沙巴列克。

部分大资本家，包括阿勒颇集团中的阿美尼亚商人在内，在杰齐尔购买了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种植小麦和棉花。

叙利亚共有二万六千家工业企业，其中一万六千家是只有不到十个工人的小厂。工人人数超过五十人的只有五十八家企业。从工人人数（一万八千人）看，纺织工业是主要工业部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大纺织厂具有第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这些工厂财运亨通的老板伙同杰齐尔农场主一起，组成叙利亚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所有这些人都不赞成采用社会主义术语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对地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来说，哈立德·阿兹姆，舒克里·库阿特利，阿塔西（前总统）是“自己人”。

复兴社会党人、特别是复兴社会党的军人上台，可以说预先就意料到的，他们瓜分权力，发动政变，互相颠覆；时而与共产党人联合，时而与纳赛尔分子接触。社会秩序、安定、平静和稳定发展等等都得不到保证。资产阶级借以决定政府方针的传统议会政党制已不再能发挥作用。叙利亚重复了埃及同样的过程。资产阶级同有较大独立性或自主权的政府之间发生了“信任危机”。最初，政府完全没有打算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地象埃及那样，政府让资产阶级享有特权。复兴社会党政府允许外币自由流通，撤销某些外币限制并开始通过国家银行广泛资助私营企业（仅一百零四家私营工业企业



就获得政府贷款八千二百七十万叙镑)。<sup>①</sup>

一九六四年五月主持政府的萨拉赫·比塔尔曾千方百计地安抚资产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政府方面来,答应不实行国有化。政府首脑哈菲兹将军后来(一九六五年一月)说:“在我们与私有经济部门之间似乎存在着妥协。我们给它以证实其善良意图的机会。”<sup>②</sup>

但他们恰好没有这样的善良意图。取消外汇限制,导致外币流失。流往国外的资本数量很大。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六四年间,外流到黎巴嫩、瑞士和其他国家银行的钱共八亿叙镑。(一九六三年整个国民收入为33.15亿叙镑)。<sup>③</sup>国家贷款被用作流动资本进行简单再生产,而所得利润流往国外,这样便造成工业停滞,贸易下降。资本家以经济困难和资本缺乏为理由关闭企业或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失业增加,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迁居国外,预算赤字、贸易亏损和支付逆差增加。

一九六四年,全年没有一个工商界的代表向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到年终棉织品、水泥、食糖、建材等行业全都减产。主要工业企业的股票牌价急剧下跌。<sup>④</sup>

这一切引起人民普遍不满。经济困难使复兴社会党在人民中的声誉严重下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很清楚,这意味着形成新政变的根源。由于这种困难,经过多年斗争夺取的

---

① 维克托罗夫,《叙利亚的进步改革》,《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5年,第五期,第130页。

② 同上,第13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政权又有丧失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被迫采取措施，以制止经济的下降与崩溃。初步采取了限制进口的措施，加强了对外国金融业务的监督。一九六四年初，将一些最大的纺织企业收归国有。

可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很多商品从市场上全部消失，走私开始增加。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将首先受到政府的打击，因此失去对政府的一切信任；至于外国资本，它实际上拒绝与叙利亚打交道，其理由是叙镑的可靠性急剧下降。

大马士革贸易署呈报经济部长的一个文件中讲到，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如下：外汇储备减少，外债增加，外国银行不愿给叙利亚贷款，叙镑在国外的信用下降，出口减少，国内市场价格上涨，销售困难，商业萧条，等等。

根据贸易署的意见，主要原因是政治上不稳定，因此，实业界人士不愿向发展经济投资。贸易署建议政府，应完全放弃对外国金融业务的实际监督，鼓励私人的主动性等等。换言之，资产阶级要求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使国家完全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这些要求的后面还有明眼人一看就完全清楚的一个要求：允许权威人士、实业界代表参加制定政治方针，即结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对国家领导权的垄断。但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沉痛经验教训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袖们，如果不是教训了他们的全体，至少也教训了一九六四年底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年轻左翼。

由于一九六三年春季大清洗的结果，从军队中开除了一些支持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军官，“第四代”军官（新生力量）

纷纷登场。这一代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这些军官一般出身于普通人民，是外省人。鲁洛在《世界报》上发表了访问叙利亚革命政权领导人之一阿卜杜勒·卡里姆·琼迪的谈话记录。琼迪说：“我不是自愿当军人的，我想当个工程师，因为家中没有钱，不能供我上大学；这要一大笔钱，只有大资产阶级的子弟才有可能。而在军事学院学习是免费的。而且我们还有助学金保障我们的生活。”鲁洛写道：“军队给了他适当的军职，使之享有威望，其次是给了他在其他部门不可能得到的权威，最后还有权力；这可使他从有产者手中夺过统治工具。”<sup>①</sup>鲁洛还提到其他两个军官——一个陆军大尉，普通农民的儿子和一个上校，印刷工人的儿子。

第二，清除了与首都特权阶层有联系的军官，使军队中伊斯兰教正统派分子遭到削弱。因为大马士革的上层都是伊斯兰教正统派分子。取代他们的是边区代表，阿拉维人、伊斯麦人、德鲁兹人，即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始终受到歧视，他们对旧制度怀有相当的敌对情绪。

第三，青年军官都是霍姆斯军事学校毕业的，那里有不少进步教师，他们给学员介绍了新的社会思想，从而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兴趣。

这些情况说明了“第四代”军官左倾的原因。他们不仅不与传统的统治阶层联系，而且对他们怀有敌对情绪。一九六四年，资产阶级所持的立场迫使军官集团采取断然行动。

其结果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掀起了国有化浪潮，随后在春

---

<sup>①</sup> 《世界报》，1966年10月17日。

季又发布了一些命令，把工业生产的75%转到政府手中。

一九六六年在大马士革颁发了题为“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式文件。文件中不仅阐明了一九六五年一些法令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法令作了论证。不妨从文件中摘录几段：

“党认为，在实现公有制以前，控制经济部门是不可能的。党还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工业和民族经济创造适当条件。党还认为，资产阶级是一支剥削的和无积极作用的力量。

“党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需实现自治政策。其目的是防止产生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弊病。因为在生产中民主自治政策是能够赋予劳动群众以管理经济的机会的唯一途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获得技术经验创造条件，不应该等到积累了经验再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将会很快地和有效地为积累经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外，我们确信，在世界上已积累了不少的技术经验，一些愿意帮助我们的诚挚的朋友，已掌握了这些经验……

“在我国还存在着私有制经济，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它控制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济部门，这种私有制经济部门的存在只能意味着生意人对斗争中的工人和消费者继续进行剥削……私有经济部门的发展依靠政府保证在税收率和关税上给予优待，提供信贷和运输工具等……这是私有经济部门首先所需要的，而且只能对它有利，换句话说，政府各方面都应照顾私有制部门的利益，有利于它的发展。这意味着政府最好仍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

“经验证明，虽然政府为私有制部门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保证，但它仍不能保证民族经济切实有效地发展。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步伐一开始，私有制部门就私自输出资本……私有制部门采用的手段是利用它所控制的贸易公司和工业公司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次私有制部门继续要求政府给予协助和信贷，它把能转往国外的资金都转往国外，同时尽力阻碍国内生产的发展。

“所以，在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总范围内把国民经济继续留在个人手中，就等于维护私有制和自由企业家活动体制的全部弊病。这还意味着，政府仍将是生意人的工具，使斗争中的群众遭受损失，而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这些群众的。

“……所有这一切证明，为结束资本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为消灭对斗争中的人民的剥削，采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步骤是必要的。

“这是通过革命手段才达到的。当时颁布了命令，将拥有资金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二千叙镑的二十一家公司实行国有化。

这些公司生产水泥、食糖、玻璃、植物油、纺织品等等。根据这些社会法令，还将二十四家公司以及90%的商行……和六十一家公司以及76%的商行收归国有。这些社会主义法令涉及到一百零六家公司。”<sup>①</sup>

非常巧合，国有化的根据与埃及民族运动宪章非常相似：即资产阶级的消极性、自私性、怠工行为，以及在资本主义道

---

<sup>①</sup>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转向社会主义的文件》，大马士革，1966年，第17—22页。

路上不可能达到经济高涨。相似的根据起源于相似的形势。

一九六三年，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因为要对付两条战线（反对共产党人和纳赛尔分子），便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很快就弄明白，对象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样的政党来说，单是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很不够的，何况这种支持是动摇的和被迫的。需要有群众的支持。但群众受到了一九六一年纳赛尔法令的影响，他们要求激进的变革。因此复兴社会党人决定实现“没有纳赛尔的纳赛尔主义”，尤其是当剥夺了资产阶级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之后，这些人正在暗中破坏经济发展计划，更加需要这样做。这样又造成复兴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更加疏远，这时，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便发生了变动，以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为首的“正统教派核心”让位给不受过去反共斗争偏见和外来观点限制的军事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由于摆脱了资产阶级而相对独立，它便急剧左倾。于是，产生了一月国有化的法令。此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成为资本家眼中的敌人。复兴社会党人懂得这一点，自然就同共产党人合作，指望利用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样，恢复左派力量统一战线的前提就出现了。

总之，认为复兴社会党是个一成不变组织，那是错误的。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由于再次变革的结果，左派军官集团掌握了叙利亚的政权，他们是一九六五年改革的发起者。开除了哈菲兹，因为哈菲兹与比塔尔联合，客观上已成为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夺取了军队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键岗位。一九六六年十月，在第九次复兴社会党全阿拉伯代表会议上又把右派复兴社会党人开除出党。

后来发生了“年轻军官”集团的内部斗争。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复兴社会党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党员干部、作战部长哈菲兹·阿萨德将军把萨拉赫·贾迪德、努尔丁·阿塔西、扎因等人清除出政府，在这些事件中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危机时刻党的领导主要是贾迪德和阿塔西的支持者，但是部队，其中包括装甲部队，都站在哈菲兹·阿萨德方面。这些部队开进了大马士革，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夺取了政权的集团中有一位代表宣布，从现在起叙利亚摆脱自己发展的“幼稚阶段”，结束“无稽之谈和蛊惑性宣传”。<sup>①</sup>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叙利亚摆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状态，同埃及和好，进入阿拉伯共和国联盟，改善了同伊拉克的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更灵活和更现实的立场。决定鼓励私人向工业投资；哈菲兹·阿萨德宣布，必需使“经济摆脱停滞不前状态，把它从束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sup>②</sup>政府的顾问纳赛尔对这些决定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我们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要更积极地利用私人资本，使它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在大资本家离开政治舞台，而经济的一切重要杠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情况下，这样的措施不会影响政权的性质，而且也是有益的。”<sup>③</sup>

新领导在叙利亚的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组织了进步民族阵线，参加这个阵线的除了复兴社会党外还有叙利亚共产党，以及北爱尔兰统一党人（民族主义纳赛尔分子或

---

① 《团结报》，1972年3月31日。

② 同上。

③ 《在国外》，1972年7月27日。

民族主义分子)。组成了人民会议，它包括一切左派政党；地方自治机构实行选举。叙利亚共产党人坚决支持政府反帝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各项措施，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进步的；“这些措施能够为在进步和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叙利亚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能够为将来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可能性。”<sup>①</sup>

为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已取得了重大成就。所有大型企业和大部分中型企业、自然资源的开发、银行、信贷系统、外贸均由国家掌管。幼发拉底河上有苏联参加修建的大型水力发电综合工程，该工程能灌溉十万公顷土地，供应工业企业和生活用电。

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中军人起着显著的作用，它以革命民主改革纲领为武器，领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

这样，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期间的复兴社会党实际上只有一个名称和纲领（这也是改头换面的），剩下了一些骨干分子。但是从整体来说，复兴社会党进行了彻底革新。军队成了革命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进步的军官把复兴社会党推向左转，并改变了它的性质和方向。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新条件下，军官集团不想抛弃具有各种外来观点和复杂历史的复兴社会党，而另成立新党？显然，当有一台安装好和调整好的机器时，就应当掌握它，抓住它的方向盘，比拆掉它，重造一台更为明智。复兴社会党享

---

<sup>①</sup> 《真理报》，1973年7月27日。



有声望，具有现成的分支机构，有战斗力，有能吸引广大群众的进步纲领，有能使它成为全阿拉伯人的党的传统。

最后一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有数以万计的拥护者。这些人对阿弗拉克和比塔尔的机会主义政策概不负责，他们追随党，他们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他们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

革命的军官利用党的这些优点来发展叙利亚的进步事业，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

叙利亚军队之所以能够起革命民主作用，其独特之点是，它不需要建立政治组织，已经有现成的组织了，只需要更换领导就可以了。叙利亚军队如同埃及军队和缅甸军队一样，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这种民族民主革命又发展成为反资本主义革命。但是叙利亚避免了纯军人政权的阶段：军人一上台，就领导具有社会方向的政府，这是叙利亚革命的一大优点。

由此在叙利亚，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叙利亚的军队是“有思想觉悟的军队”，军队不是仲裁者和超阶级力量，而是革命改革的因素之一。

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六三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人已经掌了权，但是他们的统治是短暂的和很不成功的，当时该党的右翼领导执行了反共主义的镇压政策，左派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为保守的民族主义军阀政权开辟了道路。该党从中吸取了教训，一九六八年七月再次取得政权，它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党内进行了重大改组。

早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复兴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成立的意识形态小组研究了关于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宣布“党从来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同自己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之一，复兴社会党应该利用它。”<sup>①</sup>一九六八年，复兴社会党人执政后从监狱中释放了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主义者，并主动表示与伊拉克共产党和好，意识到必须与共产党人会谈。在一九七〇年五月，颁布了新的非常激进的反封建土地法和保证工人及职员退休金的劳动法。制定了排除外国资本的方针。伊拉克共产党在其机关刊物《新思想》的社论中阐述这些改变的意义时说：“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十八日，复兴社会党进行的革命变动，以及通过这次变动产生的政权，导致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国家一系列问题的解决。”<sup>②</sup>

一九七二年五月，伊拉克共产党的两名代表参加政府，早在这之前，即一九七〇年三月就与库尔德人签订了一项协议，结束了多年的兄弟残杀战争。一九七一年末，颁布了民放运动宪章草案，开辟了伊拉克各种爱国力量走向团结的道路。一九七二年四月，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后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完成了历史性事件：复兴社会党总书记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与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签订了停止巴格达全国运动的协议，促成了伊拉克左派力量的统一战线形成，所有民主主义者都期望这一重大事件能够永远结束妨碍国家向进步方面发展的长期斗争。

复兴社会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土

<sup>①</sup>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9年，第一期，第46页。

<sup>②</sup> 《亚非民族》，1973年，第一期，第13页。

地改革后带来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就在这一年（一九七三年）伊拉克成立了一千四百个合作社，他们团结的农民从地主那里分得了80%的土地，绝大多数的合作社具有消费销售的性质，并准备在五年内把它们改造成集体经济。<sup>①</sup>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宣布“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这是有巨大意义的事件。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它过去在伊拉克是毫无拘束地主宰一切，是帝国主义进行掠夺的垄断集团。这一公司的名称象征着整个一代伊拉克人遭受的外国压迫和剥削，国有化使它受到了沉重和突然的打击。伊拉克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亚于一九五六年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但是时代变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已经不同于五十年代，谁也不再敢提武装干涉，于是企图采取经济封锁，但是帝国主义的企图落空了。一九七三年二月，“伊拉克石油公司”只得承认了国有化。伊拉克在使自己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全摆脱外国人的控制方面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这是在与苏联合作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并成功地开发了鲁迈拉油田，同时为培养民族干部打下了基础。

英国《金融时报》对复兴社会党虽无特殊感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与过去相比，整个变化很大。第一，伊拉克的君主制度推翻后，国家拥有必要的物质财富和造成了对发展自己落后经济较好的心理气氛。”该报还报道说：“在巴格达的观察家，谁都不认为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会放弃自己的社会思想。”<sup>②</sup>

<sup>①</sup> 《真理报》，1973年7月12日。

<sup>②</sup> 《金融时报》，1973年7月27日。

伊拉克军队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卡塞姆和阿里夫统治时期，对伊拉克的上流社会结构，特别是军事领导进行了重大变动。如果说，“地方”的上流社会一九五八年革命前有三分之二的部长是巴格达人和摩苏尔人，那末到了阿里夫时期两个大城市出身的人已经不到一半了。一九六八年之后就更少了。地方上来的人开始占多数，但还不是从农村来的，而是从小城市来的，特别是提克特人。在“军阀主义”化的上流社会中，官僚们的儿子、自由职业者和商人的子弟起领导作用，与过去相比，伊斯兰教正统派的百分比增加了。地主和企业家占据要职的数量急剧减少，而军官子弟相对也减少了。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八年期间，每年平均被解职的军官约二百至三百名，与巴格达的大官僚和大地主有亲戚关系和事务关系的这类军官已成为过去，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军官开始占优势。这类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民主。

这种类型的人只能保卫反帝反封建的成果，而不会去进行革命改造。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一九六八年，复兴社会党人夺取政权后不久，党的高级机关——革命指挥委员会中便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军人，一派是文官。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文官派是进步改革的倡导者，思想进步的军人加入了这一派，但不主张革命深化。只有当复兴社会党的领导扫除了军人的障碍之后才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对话，与库尔德族的和平，才出现了实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措施的良好条件。

一九七三年夏，情报处长卡扎尔的未遂政变失败之后，革

命指挥委员会的权力在其它政府机构的加强下受到削弱。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如同叙利亚一样，虽然军队是最强有力的支柱，但是逐渐失去“纯军人政权”的特征。作为国家进步发展的支持者军人们懂得，不提倡民主，不把所有左派和爱国的反资本主义力量都团结起来，要实现这种进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如前所述，缅甸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军人当政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政变后军人重新执政的一次预演。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军队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摆脱国家贫困状况的道路。由于他们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有了较成熟的理论基础，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其中有些人组织了共产党），所以当在缅甸的资本主义濒于破产的条件下，他们不用特别费劲就找到了这样的道路。在制定党的未来的理论方针时也吸收了已经脱离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当政权重新交给军人时，这已经不是临时性的军政权，而是由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已有明确的纲领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无论在这之前或之后，在“第三世界”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军队掌权时有了完整的理论纲领和准备成立动员群众的政治机构的计划。<sup>①</sup>在缅甸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由于缅甸军队具有特殊的“非职业的”政治和革命性质；第二，由于早期军队领导人在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就给予巨大的影响；第三，有了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

<sup>①</sup> 在奈温第一任统治期间，革命委员会成员仅仅半数军官担任着重要的行政职位。（西尔弗斯坦，《军队在缅甸的作用》，《现代史》，1967年1月，第41页。）

年的经验。

关于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理论观点，有很多专著作了阐述，<sup>①</sup>所以我们在这里仅限于列举其某些最重要的要点。

首先应当指出，这个党基本上是在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者立场上的，从《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原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党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资料属于各阶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社会主义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没有剥削，将消灭产生阶级对抗的条件。<sup>②</sup>

革命委员会宣布：“本国现有的条件表明而且经本国的历史证实，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外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符合缅甸的现实情况。社会主义制度对缅甸的农民、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是最为有利的。”<sup>③</sup>

在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宣言《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明确地指出革命的主要目标：“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以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并且要保护这个所有制。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主力军和捍卫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同样在这个国家的中间阶层和其他所有为社会造福而忠诚地工作的人

---

① 见阿尼克耶夫，乌里扬诺夫斯基，《民族复兴纲领》（《党的哲学：“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民族》，1964年，第四期。

②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208页、209页、211页、212页。

③ 同上，第165页。

都将获得应得的地位。”<sup>①</sup>

这个政治宣言是缅甸革命的主要纲领性文件，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缅甸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委员会第十一次年会上获得通过。<sup>②</sup>这样，军官团支持和批准了奈温的社会主义纲领。

缅甸的革命领导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所有亚非各国的革命民主政权的纲领中，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纲领是反对资本主义最彻底、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缅甸反对资本主义是公开的，在高等学校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缅甸，“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骂人的语言。<sup>③</sup>

十分自然，缅甸实业界认为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就是打击了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对新政权采取敌对态度是不可避免的。奈温指出：工业家和资本家只要一听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就懂得，这次我们讲了“一”，还会讲“二”，现在他们等待着，准备好了一切。<sup>④</sup>

但是，尽管缅甸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确实已经作了一切准备，但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在已经控制了军队情绪的情况下，即使杀掉奈温和他左右的人也改变不了局面。当然资产阶级手里也有武器，如经济上的怠工和收买等等。奈温对这些也是担心的，他也要有所防备。在军事革命管制的第一阶段，对资产阶级采取特别温和

---

①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145页。

② 同上，第244页。

③ 瓦西利耶夫，《在新十字路口上的缅甸》，第21页。

④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81页。

的态度，尽力不吓倒他们，把他们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没有一点要迫害的意思。奈温曾说：“采取恐怖措施是容易的，而要消除它的后果是困难的。”<sup>①</sup>但是，果然不出所料，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经济利益高于一切，而任何“民族精神”的教育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奈温上台执政一年后被迫承认：“原来我们想搞许多企业，但政府不能保证这些企业开工，政府不能再保护私人企业家。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呢？企业家力图获得更多的利润，开始对政府官员行贿。我们懂得如果允许建立私营工业企业，那么就会发生来自外部的破坏活动。”<sup>②</sup>

对奈温来说，资产阶级的这种行为未必是意外的，但他很可能决定用温厚的方法试图对付这一切。当弄清了这是为什么之后，军人对商人就不再客气了，无论是工业或是贸易企业国有化，都早就拟好了计划。它是整个革命领导纲领中的一部分，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当着工、商界代表的面宣布了这个计划。奈温坚决地命令：“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原则，迟早要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他对资本家直截了当地指出：“私营部分的存在违背我们的目的，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

“我们允许现有的工业企业活动，但是往后将对它们国有化。我已宣布了这个决心。”<sup>③</sup>

一周以后，所有私营银行全部国有化，一九六三年十月，许多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同年年底所有私营进口贸易全部由

---

①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 88 页。

② 同上，第 41 页，43 页。

③ 同上。



政府接管，一九六四年四月，又接管全部出口贸易。

一九六四年三月给资产阶级以最大打击，此次轮到了对内贸易。三月十九日中午，仰光电台广播了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中商业企业国有化的决定。同时约有四千名士兵去组织商店，仓库和商行的国有化，监督所有的簿记帐目，由士兵和军官组成的二十五个小组巡视商店并向那些店主宣布他们的商店实现国有化；之后又把约五百名商店老板集合在该市的几个地方，由军政权的代表向他们解释国有化的目的——制止物价上涨。商店老板在国营商店中大量购买商品，囤积起来，而后巧妙地高价出售。<sup>①</sup>

在六天之内，缅甸实现了三千家商业企业的国有化，这些企业主要都是属于华人和印度人的。

因为许多商人知道快要实行国有化，事先就将商品销售变成现款，将巨款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颁布币制改革的法令，停止使用最高票面价值为五十元和一百元的货币，规定这些钱兑换成新币的比例，这对于有巨款的商业老板来说是不利的，这样就等于剥夺了缅甸有产阶层二万余人的巨额资金，使他们损失五亿元以上。

缅甸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没有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样做过。对资本家来说，不仅夺去了他们的企业，而是还被迫破产。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是由于银行国有化之后，资本家撤销了投资，进行投机，有时还从国家方面抽回资金。

---

<sup>①</sup> 《卫报》，仰光，1964年3月20日。

大私有者还破坏征收所得税。根据所得税条例规定，年利润在十万元之内课所得税 95%，利润超过三十万元，课税 99%，扣除所得税之后，最大的收入几乎等于政府官员的最高薪金。

缅甸军队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如下，第一，资产阶级主要都是异民族（这就很容易对付他们，因为同异民族作斗争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群众都乐意让“外国”剥削者破产）；第二，资产阶级的势力比之埃及和叙利亚资产阶级的势力要弱得多，缅甸没有大工业家和大金融家，所以迅速地毫不费力地消除了资产阶级的阻力。

除此之外，缅甸的资产阶级与埃及和叙利亚的资产阶级不同，没有公开地要求参政（因为由于自己势力薄弱和异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它们取得政府高级职务的道路堵死了）。但对于当权的军人集团来说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力图收买政府官员，以破坏政府机关的忠诚。革命委员会执政以后，资产阶级想破坏经济，以造成居民的不满，使政府的声誉下降，为敌视奈温的力量夺取政权创造条件。正是这些居民中的富有阶层是潜在反对派的基础和支柱；在这些人中间可能产生阴谋者。政府懂得应把他们击败，必须镇压这个尚未形成组织的反对派。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或政治上都必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但是主要应考虑政治方面。无论在埃及、叙利亚或缅甸，国家政权都打击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不去考虑经济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是着眼于为了避免其他方面的各种严重后果，所以暂时不去考虑经济方面。

政治斗争的逻辑要求建立稳固的群众基础，依靠这个基础可以压倒特权阶层的阻力。缅甸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自然首先是农民阶级。<sup>①</sup> 一九六四年，革命委员会指出，在革命的现阶段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先于一切”。<sup>②</sup> 早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地主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不许他们夺取农民的土地、谷物和劳动工具来顶债。并禁止地主直接出租土地。一九六五年四月，租金一般都已取消；缅甸军人革命家的革命行动比亚非国家的任何其他民主革命领导人都更为坚定和彻底。

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非缅甸籍的人被禁止进行高利交易，随后撤销农民的债务一亿元。一九六三年三月，拨给农民和农业工人一笔巨额信贷。这些措施得到了巨大的效果。根据报刊资料仅就免去租金和高利率这一项，就使耕种十英亩土地的农民每年的收入由二百九十元增至五百七十元。

对于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规定了一个基本标准，即要使每个农民所获得的收获足够供本人和家庭生活，即平均每个农民十英亩。这也就是建立巩固的小农（或中农、下中农）私有经济。这是否可以称之为在缅甸农村推广资本主义、建立富农阶层的政策？

无论在缅甸或在其他国家，革命民主政权的土地政策都想达到两个目的：使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阶级成为政权的可靠支柱，成为它的群众基础；解决粮食问题（即保证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的供应），同时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

---

<sup>①</sup> 据奈温讲，农民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工人约占15%，其他占5%。  
（见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66页。）

<sup>②</sup> 《劳动人民日报》，1964年7月9日，增刊。

波兰经济学家凯莱尔写道：“奈温将军集团上台执政后在政治真空中活动。在‘第三世界’各国要夺取政权，并不是说援助不是必要的条件，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集团为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不去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援，这就必需在一定的集团或阶级中间寻找支柱。问题大体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到农民中间去寻求支柱呢？因为农民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最小，但是他们的作用很大，所以这就使政府感到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sup>①</sup>

必须补充的是，问题不仅农民的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全民族的利益一致。

预先取得农民的支持——就是说，要把他们从地主高利贷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给予贷款和提供机器援助，使他们实现有自己的一份土地的伟大愿望。

由于政治原因而采取的反地主措施，造成生产下降，这是因为获得土地的农民缺乏足够的农具、牲畜、资金、经验。在经济落后的贫穷国家中保证农民获得这一切东西是需要多年才能办得到的，不创造适当的条件，集体化就不能保障生产的增长。唯一的出路是在全面推广合作化的条件下，鼓励巩固个体经济来发展商品经济。

因此，军事革命政权的土地政策无论是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都要求建立稳定的私有经济阶层，那怕作为临时措施也好。问题不在于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定要在农村中培植

---

<sup>①</sup> 凯莱尔，《在军官制服上的社会主义》，《政治周刊》，1964年5月23日。

资本主义。而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要巩固政权必须鼓励建立小农所有制阶层。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让独立的小农和中农经济任意发展并得到巩固，能不能保证它们不变成这个政权的反对力量？城市中的政府与无产阶级相互关系的规律会不会扩展到农村？农村和城市的私营部分与当权集团反对资本主义的方针能否同时并存？私有者具有雄厚的经济地位，但没有政治权力，这一状况能维持多久？能否鼓励他们在经济领域内继续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同时不允许他们参与制定政治路线，以继续保持对政权的垄断？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在缅甸和其他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政府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将决定它们能否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增长同时保证农业的上升，或者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席卷城市，导致政权的垮台或者变质。

因此，政权向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具有决定性意义。问题的实质是在于，在军政权基础上成立的政府，它能否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群众基础、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干部机构等的广泛和稳定的政治体制？这里首先指的是要建设这样一个党，这个党有坚定的目标，为重建一个开始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社会而斗争，并能把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参加这一斗争。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纲领性文件《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组织工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谈到，“虽然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按其性质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军事委员会。但是革命委员会都没有去努力做到

一点，因为革命必须由革命的政党来领导。”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章程中也有类似的内容，章程中指出：“所以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能在缅甸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政党。”<sup>①</sup>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行动纲领中指出：这个政党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党”，而不是“仅仅号召改革旧秩序的改良主义政党，而是要消灭不公正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公正制度的革命党。”<sup>②</sup>

列夫科夫斯基指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特征是有它自己独创的道路，按照通常的情况都是先建党，然后是为了实现党的纲领而去夺取政权，而在缅甸则是先夺取政权，然后才开始建党。“在这种情况下，党就不是某个阶级或阶层夺取政权的工具，而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政府为了实现已拟定好的纲领所要使用的工具。”<sup>③</sup>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七月，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党代会召开前的一年内，党员由二万人增加到七万三千人，预备党员计二十六万一千人，此外，到召开党代会时共计有三十三万四千同情者，合计超过六十六万八千人；到一九七二年，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党员已经约达八万人，预备党员超过二十九万人。

奈温将军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三项主要任务：建设一个团结的政党，成立缅甸各民族联盟，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并在代

---

①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186页。

② 同上，第232页。

③ 列夫科夫斯基，《缅甸的概况》，《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七期，第70页。

代表大会上宣布，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应该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人民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党章中指出，“党将在缅甸联邦中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首先选出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名文官（共十五名成员），革命委员会承认党是自己的政治领导。

一九七二年四月颁布了宪法草案，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党推荐再由人民选举。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国务院，同时国务院组成部长会议；所有下级政权机关均由人民会议选举产生。

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的工人和职员参加了工人理事会，农民理事会中约有六百万人左右。

劳动人民委员会是在所有企业和机关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们是群众参加发展生产的机构和保护他们利益的机构。委员会章程中指出：全体劳动人民“都应当团结得象兄弟和同志一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友好的组织”。缅甸民主革命的特点是广泛发展全民族的农工学习班，在学习班中劳动人民讨论自己的问题，并有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这些学习班同时也是对劳动人民进行道德观念教育的场所（社会主义竞赛，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等等），这种学习班似乎是同军政合一的趋向对立的，但这正是缅甸革命政权不同于并非其他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的政权的一个特征。

领导和党的建设采取军政合一的方法。这首先意味着缅甸十万人的军队在国内居于关键地位。政权已经不是纯军人性质的，它有社会方向，但军队依然是这个政权的支柱。

“军队是革命的基础”，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总书记山友准将曾经这样说过。他还说：“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和武装力量应该象水一样不可分割，武装力量是党的主要支柱。”<sup>①</sup>

一九七一年，七万三千名党员中有四万二千人是军人，一百五十名中央委员中军人占一百二十名。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军人占71%。

显然人民已习惯于这种情况：真正的力量仅仅是军队。山友准将专门作了解释。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在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会上作了题为《武装力量的新方向教育》的报告，他说：“仅仅认为武装力量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辛勤劳动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武装力量应当同政府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合作。”<sup>②</sup>

军人执政后有一个规则，凡是政府领导机关中根据国有化的需要，各种经济管理职务都由军官担任，而且凡属这种情况的军官都依然要履行自己的军职。军官们半天在兵营里，半天在被他们领导的企业和机关的办公室。因此军事工作负担过重问题成了军事会议专门讨论的议题。

革命委员会认为必须建立对军队干部进行政治训练的制度。山友准将指出，“军队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完成委托给他们的历史任务，即如果他们成为人民的军队，并用正确的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人民的利益和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这同叙利亚革命领导所说的“有思想觉悟的军队”相类似。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学校开学，奈温在开学典

<sup>①</sup> 《前进报》，1972年5月1日。

<sup>②</sup> 《劳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7日。



社会上的讲话指出：“理论是指导生活的灯塔；生活是理论思想的准绳。”

奈温还说，“如果军队没有应有的思想，国家就要灭亡。”

因此打算让军队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决定建立军人生产合作社，使军队自给自足。

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成立了拥有三十九个公司的半独立的缅甸经济发展同业公会，这种公会“代表了不断壮大的军人资产阶级企业活动的利益，这个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发展利用军队和国家两条渠道”，<sup>①</sup>在武装力量系统中设有五个办事处。同业工会和所有这些机构于一九六三年收归国有，从而开始了制止军人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斗争。

军队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引用到过缅甸观光的一个英国实业家的一句话，“你到俭朴的农村去，买一把米，就可以看到做买卖的中士。在税务局接待你的是尉官。”<sup>②</sup>

军队保持优越的物质待遇。奈温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央政治学校的演说中说：“军人可以领取自己原来的工资，现在一下还很难同他们说，要他们减少一部分收入和让他们领取低给养。”服役满十年的仍给予每月工资三百元，陆军大尉可保证获得一倍以上的工资，并保证有一套住宅。

军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宰地位，可以加强国家对全部经济领域的控制。这可以从政治上来理解。政府宣布了社会主义方针，自然非常担心私有者阶级的反对，因为私有者的利

<sup>①</sup> 瓦西利耶夫，《在新十字路口上的缅甸》，第17页。

<sup>②</sup> 《新闻周刊》，1955年1月3日。

益受到了政府损害，这在心理上也会产生影响。但通过这种打击将大大克服“不稳固的”和“无组织的”状态，使整个经济都纳入统一的计划领导，把经济杠杆集中到国家手中。不过实际上这是导致左倾，因为政府还没有能力分配商品，还不能代替商业领域的私商，特别是零售商。无论在几内亚、叙利亚或是在缅甸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早在一九六四年底，有三千多个已经国有化的商店又撤销了国有化，因为经济领域中的唯意志论导致了整个供应系统的混乱，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奈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承认，虽然在首都商业企业国有化是按照计划作了较好的准备和调查的，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些企业在外省还有自己的分店，对它们的国有化缺乏准备。奈温说：“我们是抓住老虎尾巴的人，我们不能把它放了。”<sup>①</sup>

国家与私人企业相互关系的问题远没有解决。这无论对城市和农村都是这样。当实行大米统一价格时，许多农民就种植比大米价格高的其他作物，以致大米生产开始下降，人民供应恶化。人们开始囤积大米，出现黑市。供应系统的混乱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因此实行多种商品的配给制。一九六五年农产品下降4%，减少了每个人民的收入。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生活费用平均上涨一倍。

一九六六年九月，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国家垄断鱼、鱼制品及二十三种农产品的交易，因此人民的供应得到改善。

缅甸的经济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满意的。当然，可以说，如果这段时间的政权仍是旧政府的话，那么情况显然还会坏得多。但是在政治上“真是”没有任何意义。革命本来是为了

<sup>①</sup> 《纽约时报杂志》，1966年2月27日。

消灭旧制度的灾难和弊病，如果新领导没有能力消灭这些（或者如果产生新的灾难代替已被消除的灾难和弊病的活），革命政权在人民心目中就很难得到信赖。

据认为，缅甸领导人懂得这一点。人们由于经济困难采取各种巧妙的手段，用不完全合法的方法维持自己的生活，领导人宣布这不是“敌对力量的阴谋”，而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劳动人民日报》写道：“责备人们以其本能的企图补偿制度的缺点，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拒绝承认人性的特点和人类利用条件的本事。”<sup>①</sup>

这样处理问题是给缅甸的革命者保留面子。

不过领导人不打算对“人性”放任自流，不允许进行有害于国家的活动。因而特地进行反对人们囤积的运动。

缅甸的革命者十分正确地看到出现各种缺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的弊病所造成的。

早在《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宣言中指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障碍是现存的官僚机构，如果利用这样的机构，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能达到。将采取措施废除这种官僚机构，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机构的扎实基础。”<sup>②</sup>按照自己准确和鲜明目标建立最好的机构。对军人进行思想教育的学习班是建立新机构的途径之一，然而，第一，不可能很快地找到一批人来代替庞大机构所需的有经验的旧官吏；第二，因为旧官吏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且许多新干部也要经受会不会发生蜕化变质的考验。

---

<sup>①</sup> 《劳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0日。

<sup>②</sup>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146页。

在缅甸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号召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文章，列举许多例子来揭露那些对人们的贫困采取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的态度、官僚习气、无效力、无能力、并企图逃避责任、无纪律、失职，等等。<sup>①</sup>

号召与贪污作斗争，是够认真的，因为这是旧机构难以摆脱的恶习。在缅甸，贪污现象向来是最普遍的恶习。奈温在一九六三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不久以前，整个国家包括所有行政机关、军队、工商界和政界都沾染腐败习气。

“……如果我们对所有犯罪分子都进行审判处分的话，那么监狱里还容纳不到一半人，监狱装不下这么多人。我相信现在还有10%的人在外面。”<sup>②</sup>

军事革命政府从一开始就提倡新的社会道德，特别是强调要诚实和有责任心，要有认真的劳动态度。

许多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驻缅甸的日本记者一九六六年报道：“仰光——这在东南亚各国中可能是贪污现象克服得比较彻底的首都。”<sup>③</sup>实际上，缅甸正如在埃及革命之后一样，不正当的贪污现象已经下降，但是在公共事业和国家事务中的诡诈行为，社会上的许多不道德行为，还在继续广泛流行。为了适应无所不为的官僚制度，人们努力寻求有势力的政府官员的庇护。《劳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了缅甸的庇护情况（“庇护”这个词大概是缅甸的同义词）。<sup>④</sup>

---

① 《劳动人民日报》，1967年5月20日。

② 奈温：《在新道路上约缅甸》，第48页。

③ 《读卖新闻》，1966年9月21日。

④ 《劳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

特别强调对人的道德教育，其起源显然应当在佛教的宗教观中寻找——这是缅甸革命者的思想特点。在“党的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人的天性是利己的和自私的”，①缅甸的革命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新型的人。不这样做，无疑他们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对人的道德再教育的同时，显然，应当使生产力上升，经济要有效地发展。缅甸的一个军事首领正确地指出，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决定性的斗争”。②但是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只有在经济和思想两条战线上都取得成功，才能为缅甸开创社会主义的道路。

目前“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尚处在成败未卜的阶段。

在缅甸的土地上没有外国企业，基本生产资料都实现了国有化，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只有国营合作部门才能建立新企业。国家的总生产量中国营部分约占五分之二。近年来已有数十个轻重工业工厂投入生产，目前还有四十项基建工程正在施工中。所有私立教育机构都收归国有，并实施免费初等八年制教育；③有70%的大学生受到工程和农艺的教育，而在革命前整个缅甸只有两名农学专家；在全国开办夜校，由青年工人给孩子和老人上课，当扫盲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以前，他们不离开农村。他们的口号是“每个识字的人负责教育不识字的人！”宣布的口号是“青年是国家的希望！”④

① 奈温，《在新道路上的缅甸》，第213页。

② 《劳动人民日报》，1966年8月4日。

③ 《真理报》，1973年1月4日。

④ 《在国外》，1970年4月3日。

---

乌利亚诺夫斯基在评价缅甸发挥军队的作用时写道：“在缅甸，军队是唯一有组织的巨大力量，只有它才能领导国家。”他着重指出缅甸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特点：“……这个发展是在民族解放军革命民主军官的领导下开始的”。<sup>①</sup>直到现在，无论在党内或是在政府内，军队保持自己的领导作用。但是缅甸的军人革命者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逐渐改变军人领导的形式。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缅甸根据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草案中指出，“缅甸是劳动者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名为“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社会主义是国家的目标，社会主义建设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和民主为基础的”。新宪法草案已由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缅甸人民所通过，一九七四年三月，根据新宪法，国家的整个立法权交给人民会议，人民会议选出国务院，人民会议主席奈温任国家总统。统治缅甸整整十二年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军事管制机构宣告结束，但是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仍是唯一的领导政党。

这样正式完成了由缅甸军政权转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官一党制。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热带非洲两个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的军事改变，改变的发动者也是爱国主义的军官。

其中一个为刚果人民共和国，这个不大的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很多的优越条件：自然资源丰富，按人口平均的收入较高（一百三十美元），识字人的比例较大，工人和职员的比例重

---

<sup>①</sup> 乌利亚诺夫斯基，《新道路上的缅甸》，《国际生活》，1972年，第四期，第17页。

大(一百万人中有独立收入的人占20—25%)。

在独立期间刚果经受了不小的动荡的考验，起初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听命于殖民主义的阿巴特·尤卢资产阶级官僚政权，一九六三年八月，强大的人民运动冲垮了这个政府。人民革命运动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宣布奉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针。但是国家总统和党的领袖马桑巴·代巴逐步转变为执行资产阶级的保守政策，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内消失。而那时有民主情绪的军官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九月，以马里安·恩古瓦比为首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接替了马桑巴·代巴政权，刚果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举行新党——刚果劳动党的成立大会，并通过口号“刚果要实现社会主义！”大会批准了新的国名——刚果人民共和国，国歌——“国际”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恩古瓦比少校在大会上宣布：“建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历史的必然。”<sup>①</sup>

刚果的社会经济改造首先是要使国家摆脱对新殖民主义的依赖。如果考虑到刚果80%的经济掌握在法国垄断资本家手中，那么，这是很不简单的任务。在国有化方面仅仅走了第一步，国家掌握港口、电力公司、糖厂、蔗糖种植园、广播电台等。建设新的企业和公司，国有经济部门提供13%的工业产品，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近三万人，还有合营部分，在国内的一些外国公司股票的15—30%属于政府。

---

<sup>①</sup> 《在国外》，1970年4月3日。

恩古瓦比总统指出：“刚果人民共和国是自由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非洲国家，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所以它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目标。幸运的是在斗争中它一直得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sup>①</sup>

刚果革命者也未能避免内部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危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批人反对恩古瓦比，企图政变。但是这次严重的动荡未能使党改变政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举行了党的特别会议，在会上通过了新纲领。纲领中指出，刚果的革命现在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它的任务是奠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现阶段的总任务是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

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草案，规定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地区和省的人民大会，政权的最高机关将是全国人民大会，政府的活动受党的监督。

刚果现行的政府制度不能称为军政府，但是它的产生是由军人行动的结果，而且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屡屡搞阴谋的条件下，军队是现政府的支柱之一。在非洲外国资本称霸的条件下，宣布了一个不但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公开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政权，必然受敌人的包围。没有绝对忠诚的革命军队，这个政权要存在下去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刚果劳动党的领导非常注意对军人和警察的教育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实，一九七〇年三月，党的非常

---

<sup>①</sup> 《消息报》，1972年2月29日。



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宪兵，因为本来想“使这个军团转变为适应人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这样的革命企图不能实现。”<sup>①</sup>

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小册子《人民军队属于人民政权》指出，“每次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的中心问题则是军队问题。”<sup>②</sup>

国家与党的首脑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事变后不久举行的军人党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是革命的军队，应该有教养，刻苦耐劳，训练有素、灵活、听指挥、守纪律……。”<sup>③</sup>恩古瓦比宣布要在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他又说，政治委员应该知道：“根据军事条例，连指挥员是队长，而政委是队长的助手；当政委要完成党赋予他的职责时，连长应让出自己的位置。”<sup>④</sup>

恩古瓦比在这次演说中说：“我们的直接任务是要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力量，使党能有效地领导军队……，军队应该动员起来，成为能够解放人民的实际力量……。”他给军队提出的口号是：“热爱人民，尊敬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还提出：“新的军队要有新纪律。”<sup>⑤</sup>

早在一九七〇年在朱埃就建立了军事训练中心，在该中心开幕仪式上，伊奥姆比少校说，必须改造军队，使它变为党的，同时也是人民的有效工具。“军队应该是一个政治单位，同

---

① 《人民军队属于人民政权》，布拉柴维尔出版，1970年，第31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马里安·恩古瓦比，《军队的任务》，总统新闻报道处出版，第12页。

④ 同上，第12—13页。

⑤ 同上，第14页。

时又是一个军事和生产单位。”①“军队是执行党所交给的政治任务的机构，其中也包括纯军事工作。”②

一九七〇年一月在警官会议上通过决议，要求警察通过做思想工作，密切与人民的联系。③

因此，刚果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即军队“政治化”，使它变成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

索马里是非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牧民，十分之九的人是文盲。至今一切生活必需品，甚至连火柴和香烟都需要进口。八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仅耕种四十万公顷。三百万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获得独立后，资产阶级官僚上层执政。当时有八十八个收买选票的政党，这真是对民主的讽刺。贪污成风，资产阶级和封建上层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无论是哪个政党或是工会都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能使国家摆脱贫弱的唯一力量是军队。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点钟，在炮兵上将西亚德·巴雷的指挥下，按照原订计划，军队占领了摩加迪沙，并给所有各区的警卫司令下达命令——夺取政权，并建立地区和县区革命委员会。政变是流血的，西亚德·巴雷将军领导最高革命委员会。整整一年以后，最高革命委员会隆重宣布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方向。

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巴斯赫·艾哈迈德·阿卜迪是这样评价这一事件的：“随着西亚德同志领导下的爱国主义的十

① 《人民军队属于人民政权》，第 8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同上，第 9 页。

月政府掌权，结束了腐朽的反动制度，作为民族民主革命队伍之一的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这支部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同人民划等号，它引导我们的国家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继续说：“我国其他方面的革命队伍（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解决索马里革命提出的若干迫切的民族民主任务。我国革命面临的基本任务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民族民主阶段，这个阶段还未结束。”<sup>①</sup>

法国《亚非》双周刊杂志记者问西亚德·巴雷：“您是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先生？”西亚德回答说：“读书，大量地读书。将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进行对比，同时分析我国人民的状况。我相信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我看到，这是一条最适合于我国人民的道路……我不能容忍过去所存在的特权。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使这些权利受到尊重和对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要科学的社会主义，即以集体福利、社会公道、经济平等和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指出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sup>②</sup>

在另一次谈话中，西亚德·巴雷将军说：“我读了很多书，并且得出结论，造成我国人民不幸的，不仅是殖民主义，还有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流毒和陈旧风俗。社会主义制度是所有各种制度中唯一正确的制度。我开始在军队中活动时，不提“社会主义”这个词，我选择忠于事业的军官，帮助他们弄明白这

<sup>①</sup> 《非洲共产主义者》季刊，1973年，第四期。

<sup>②</sup> 《亚非》双周刊，1973年9月25日。

一学说，理解其真实涵义。教育他们与人民结合在一起。”<sup>①</sup>

政变（事实证明已是真正的革命）以后经过几个月，便把所有的外国银行、动力工业、制糖工业、燃料进口事业收归国有。而外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和保险公司则由政府监督。房租平均降低60%，政府根据先进的工资等级，大大减低了公职人员的薪金，而高级职员工资降低到40%。降低了军人和警察的薪金。采取了控制租金的措施，规定了粮食的稳定价格，国家垄断粮食收购。

实行免费医疗措施，禁止私人行医。企业和机关建立工人委员会。开展挖掘内部潜力的“自助”运动，组织特殊的劳动投资，即无论是农民，或市民，都要参加铁路、医院、学校建设和改进居民设施的义务劳动。在两年内用“自助”办法完成的项目价值总达二亿索马里先令，约占三年发展纲要中计划拨款的20%。<sup>②</sup>

在谈到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时，西亚德·巴雷指出，或是解雇六千职员，剥夺约两万人的生活来源；或是“勒紧腰带和忘掉奢侈的生活”，最后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sup>③</sup>

索马里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一九七一年的反对部落主义运动；一九七二年的劳动教育和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动，反对贪污受贿的运动；一九七三年的扫盲运动，参加者达二十四万人；组织了脱产三个月学习国家方针的训练班。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建立与社会各界联系的办事处。这是

<sup>①</sup> 《在国外》，1973年，第六七三号（总编号——译者），第17页。

<sup>②</sup> 《十月之星》，1973年9月14日。

<sup>③</sup> 巴雷，《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第100页。

宣传政府政策的群众性的机关，是军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可能这是未来政党的雏形。到一九七三年夏季，已经成立了十个省级和五十个区级办事处。在这些办事处之下又设立“方针宣传中心”。后来这些办事处隶属于政治局。关于政治局，西亚德·巴雷说：“政治局活动的任务更重了，它的前途也远大了，现在它已从动员群众达到能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不久以前政治局的一些成员被委任为地区的领导——他们成了区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地方政权机关的组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省级和区级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相应的地区行使职权。我们尽力使人民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具有尽可能大的影响。各地区的人民比中央机关的官员更了解自己的需要。”<sup>①</sup>在这些变化中军队的作用如何？军人政治领导又如何看待这种作用的？

西亚德·巴雷指出：“索马里军队同群众紧密相连的，暂时不存在向文官交权的问题。我们力求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军队是人民的儿子。军队的军事训练、普通教育和思想教育等等，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而且只有为人民服务。这样，军队组织便是人民群众的不可分开的部分。穿草绿色衬衫的人和穿白衬衫的人之间毫无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知识分子之间不存在分歧……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问自己，我们的世界观如何？我们能同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合作，哪种政治力量的代表来领导国家。早在革命前的长时期内已经就这些问题与知识分子进行了讨

---

<sup>①</sup> 《十月之星》，1973年12月6日。

论。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选定了，我们决定把国家的管理权委托给积极的年青知识分子。”<sup>①</sup>

根据索马里革命领导人的这些言论，可以得出结论，索马里的军人正在建设一支新社会的人民军队，而新社会的领导力量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先锋党。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也在积极参加新社会的建设。阿尔及利亚军队是属于革命的民族解放军类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在反对殖民者的七年流血战争烽火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九六五年六月，布迈丁上校为首的军队发动了政变，废黜了本·贝拉政府，而以后的事件证明，这不是反革命，它不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现在军队是主张深入革命的力量。例如，军官们响应布迈丁的号召，在土地革命中成了自愿献地运动的倡导者。军队首先把现金献出作为土地革命的资金。在土地革命中，后备兵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后备兵在服役期间和服役期满后，将成为在人民中贯彻政府政治方针的干部。因此在军事学院的学员中进行着大量的政治工作，使他们正确理解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各项任务和措施。所有服役期满的人员自愿去建设模范村和其他工程，例如运输甘蔗的道路。

军队中派出权力很大的政委进驻所有要没收土地的居民点。统计和分配私有土地的委员会中都有军官。如果没有军官参加，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县一级和省一级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民族联盟组织中有军区指挥部的代表参加。

不妨再提一下马达加斯加军队所起的进步作用，否则情

---

<sup>①</sup> 《亚非》双周刊，1973年4月25日。

况将会不全面。推翻新殖民主义者的傀儡齐腊纳纳反动政府是以年青军官为首的爱国军人的功绩。马达加斯加当前的方针还不明确,但谁都不能否认,军队是推动积极变革进程的首要力量。

最后再说说秘鲁。关于秘鲁军队的进步作用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怎样解释恰恰是军队发起了革命并且实际上领导革命?”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作了如下回答:“秘鲁事件清楚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影响下,以及世界舞台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觉悟在变化。”<sup>①</sup>

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年青军官在同游击队作战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是非正义的。他们的领导人后来直截了当地说,被军队镇压的秘鲁游击队的正义斗争,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促使武装力量决心采取革命行动。使他们的认识转变的基本因素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后来又加上社会因素。军人建立了从事高级军事研究的中心,开始研究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六八年十月,他们在农民的儿子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领导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贝朗德·特里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秘鲁历史上开始了新阶段。军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寡头政治的改革倡导者,这些改革同时还有反资本主义的特征。

一九七三年十月,秘鲁共产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秘鲁武装力量在真正和爱国的军官领导下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一期,第14页。

表示感谢。”<sup>①</sup>

直到一九七五年仍担任革命政府领导的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解释了秘鲁军官之所以站到对于拉丁美洲军官来说是极不平常的政治立场的原因。

“一方面是旧制度的深刻危机，其表现是国家机器腐朽，悬而未决的全国性的主要问题不断尖锐化；在政策方面表现出愈益反民族和投降主义；外国在秘鲁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社会遭到无情剥削，日益贫困，处于不公平的窒息气氛中。另一方面是，军人们认识到整个形势的严重性。深信民族的安危与国内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深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是软弱的国家，未必能在现代世界生存下去。

“基本就是这一切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对秘鲁的主要问题展开正面进攻。因此由军队来建立国家政权便是必然的了，因为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文官未能做到。要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就要在全国进行激进的改造。这是一项没有一个政治集团能够或者愿意实现的革命任务。于是，为了保卫秘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军队出来管理国家便责无旁贷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爱国主义的天职。”

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还说：“武装力量虽然与过去没有两样，仍旧保持着体制上的一致，但原则上已改变了自己保护旧秩序的历史作用，成为自己国家内部改造的动力，开始了为创建伟大历史成果的革命进程。”<sup>②</sup>

秘鲁总统同波兰记者的这次谈话对于我们所探讨的题目

<sup>①</sup> 《拉丁美洲》，1974年，第四期，第58页。

<sup>②</sup> 《政治周刊》，1974年7月20日。



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作为“第三世界”武装力量革命派中最有权威的代表之一，他阐明了军人站到进步立场的原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全部：外来的压迫，民族的屈辱，群众的贫困，各种“政治团体”。即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无力或组织涣散，等等。

从原则上讲，爱国军人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就能激励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现纯粹民族主义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改造，采取消灭贪污受贿的措施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秘鲁军人的功勋在于继续前进。他们懂得，必须对国家的整个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指出：“现在，武装力量的革命政府代表了被剥削的阶级利益（政府本身也这样说），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贫困阶层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近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反对资本主义的。”<sup>①</sup>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说，存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秘鲁方式”。它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公有制，或者象人们所说的国家集体所有制起主导作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指出秘鲁武装力量爱国军官所倡导的改造具有革命民主性质。

“秘鲁的典型”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继某些阿拉伯国家、缅甸、刚果、索马里之后，又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改造，这再次证明，抹杀“第三世界”的军人有可能朝向进步方面演变是非常错误的；

---

<sup>①</sup> 《真理报》，1974年7月27日。

---

认为某些国家，其军队甚至与五角大楼有直接联系，似乎只能起着“守旧的”、保守的、反民主的作用，这样的看法也是不对的。秘鲁军官明显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不是偶然的现象；秘鲁的特殊现象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正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再重复一遍（秘鲁的例子正好能证明这一点），仅仅是军人，即使有良好的愿望，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不成立进步的政治组织，也是不能发展革命的。

## 结 论

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是在国际舞台上两个体系进行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帝国主义虽失去了直接政治统治，仍绝不会放弃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剥削。帝国主义是解放了的国家独立发展的主要敌人。新殖民主义者集团不仅密切注意到年青的民族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并且积极干预它们的事务。当然，“第三世界”武装力量政治作用的加强不能不引起殖民主义者的注意，因为近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有了自己的地位。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早已看到了军官这一社会阶层的重要性，并且尽力争取他们到自己方面来。

在亚洲，帝国主义集团通常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军人为自己服务，因为亚洲国家的军队早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军队，已经摆脱前宗主国军阀或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在这些国家尽可能地做军官的工作，如不少印度尼西亚的军官到美国去接受军事训练，当然这样就会使他们接受适当的政治“理论”。

在非洲，帝国主义正在利用各种可能来影响军人。

如果说，在拉丁美洲，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观点方面的影响无论如何几乎总是由一个大国、即美国所独占；那么在非洲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不仅在经济

上，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发生冲突。美国在非洲的地位不如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美国在非洲的投资相对来说也不大，美国的私人资本家至今对非洲（除南非共和国外）的兴趣不大，在五角大楼的战略地位上非洲被排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之后。

美国工商界和政界不少最有远见的代表意识到非洲的发展有远大的前程，这个大陆在世界经济中将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他们提议现在就应该在非洲建立牢固的扩张基地。

但是大多数热带非洲国家在推翻了殖民主义压迫之后，同原宗主国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多数还保持着军事联系。对美帝国主义来说，要在那里占优势地位是非常困难的。

英国和法国当权集团明显地感到结束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统治已经为期不远了。他们面前的任务是：“撤退之前”确保自己的一定地位，以便在这些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之后能够继续控制或施加影响；他们除确保经济地位外，在干部问题上也有发言权，在民族主义国家中培植一个在思想和教育方面亲西方并居领导地位的上流社会，以充当原宗主国政策的代理人，这就是国家职员和武装力量的军官。

非洲国家建设武装力量时，外国的援助具有巨大意义。因为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建设民族武装力量没有别的道路；而且，在获得独立前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干部，来保证军训计划的执行。所以新兴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几乎全部由原宗主国武装力量的部分人员组成（除了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以外）。因此，大国担负起装备和训练民族军

队的使命。

这样，英国和法国达到了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被迫撤离殖民地之前和这些殖民地变为独立国之后，能在军事方面保持这些领地对自己的依赖关系。

但是，年青的自主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经过数年发展就会出现这样的特点：即在许多国家中武装力量起着政治作用，在某些国家成了主要的政治力量。从而这些国家与原宗主国的军事联系变成了政治关系。领导这些国家武装力量的通常都是从英国和法国军队中出身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政治方向，而且依赖西方强国获得军队装备，一旦这些人掌握政权后，在政治上就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了。

资产阶级官僚的上层人物是在殖民主义者撤离之前培养的。许多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有本身的弱点，在处理独立后产生的问题时表现无能，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所以他们常被军队撤换）；他们对付不了民主倾向的发展和工会运动的高涨。工会运动具有政治性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消除对帝国主义强国的依赖。从这些意义上看，军政权有明显的优越性。因为它能（最低限度暂时）制止不利于殖民主义强国的这些危险趋向的发展。而资产阶级官僚上层人物和军官这两个集团的政治观点和方向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通常在夺取政权前，英国和法国军事院校培养的将军和上校在内外政策方面都奉行亲西方方针，极力避免同社会主义国家接近。

这里出现了矛盾的情况：一方面，非洲新独立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的利益要求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拒绝采纳向西方

国家一边倒的方针，要求同愿意帮助它们克服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领域内，如军队建设、武器供应、干部训练等等仍然依赖西方。殖民主义者训练出来的军人执政后，更增加了这方面的依赖性并扩大到其它领域。

这是一系列非洲年青主权国家在发展中的一个最大的矛盾。

著名的《纽约时报杂志》编辑、美国人萨尔·赛尔在另一家《民族》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对于美国宣传家来说是罕见的观点，因此这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情，其中谈到非洲军人在夺权之后表现出一个“与东方隔绝”的倾向，赛尔强调指出：这是“愚蠢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军人切断了—自己一个非常现实的援助来源，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使这些国家成为西方的主顾，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但得不到西方更多的援助，反面会减少这种援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因为我们公开宣布的政策是要把钱投到那些受共产党威胁的国家，而对那些没有受到这种威胁的国家则是不予关心的。”<sup>①</sup>

应当承认，这是明智的见解。美国总是“自欺欺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谁会用接近“东方”的手段来向他们勒索，他们总是不乐意给那些“已经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人多花钱。非洲将军们利用华盛顿的“弱点”（反共主义）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他们在经济 and 军事关系方面仍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所以对美国来说，问题首先要巩固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即在这些国

---

<sup>①</sup> 《民族》周刊，1966年3月31日，第311页。

家虽然不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但还要同“旧主人”竞争。很显然，美国的政治家认为促使非洲军人在政治思想上从英国或法国转向美国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并不需要改变他们根深蒂固地亲西方的保守观点。但是问题并不在这一方面；要使“旧派”军官改换门庭，必须割断对旧主人的依恋，此外还要冒个人安全的危险。毫无疑问，原来宗主国的间谍时时注意到非洲国家情绪的变化，凡是发现有谁“不忠”，就毫不迟疑地马上把他干掉（在其他“可靠”军官的帮助下），因此当刚果（指现扎伊尔。——译者）掀起反对比利时的浪潮时，蒙博托能做什么？这位在独立之后成为军事首领的新人，不能轻易支持那些在英国和法国军队中服役过的人。

所以美国现在的当权派尽量等待，获得同老殖民主义者没有直接关系的新一代非洲军官的支持。

《纽约时报》谈到关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时指出：“华盛顿的政策很清楚，出售武器是美国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从而可以争取朋友，可以在拉丁美洲国家和军官中赢得影响。因为军人往往能左右某个政权或推翻它。”<sup>①</sup>美国对待热带非洲的做法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但英国和法国对此十分清楚，无疑也将倾注全力来巩固自己在非洲军官中的影响。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非洲的军人将成为所有帝国主义强国更加注意的对象，随着非洲军队越来越明显地干预政治，帝国主义集团将对这支力量下更大的功夫。

---

<sup>①</sup>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著名的美国政论家苏兹贝格写道：“在不发达的国家内，要达到政治目的，武器往往比选票更有保证。谁掌握了坦克和飞机，谁就能控制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武器和供应备用零件的外国便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sup>①</sup>

很自然，发展中国家的军官意识到，西方强国多么重视他们的立场；他们便有意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下列情况说明很多问题，华盛顿指望在拉丁美洲“保证内部安定”，即支持军政权镇压革命运动，因此曾经正式宣布，提供的军事装备尽可能限于反游击战所必须的轻便武器，不提供不适用于这种战争的现代化重武器。但是拉丁美洲的军阀并未放弃供给他们飞机、坦克和军舰的要求。无论华盛顿官方宣传家怎样高谈什么昂贵的现代化武器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例如引用了这样的数字：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价格可以在农村建立五百所学校），五角大楼仍继续答应拉丁美洲军国主义分子的要求，供应他们的既有喷气式飞机，又有坦克和军舰。众所周知，这种武器永远不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但这个问题明显地表现出军阀关心发展自己巩固的独立自主体系，要求自己有必要掌握最先进和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从而使拉丁美洲各国武装力量之间出现危害民族经济利益的竞赛，导致毫无意义的“军备升级”。美国统治集团客观上鼓励这种竞争，使拉丁美洲浪费大量资金，走上军国主义化道路，进一步损害本来就是薄弱的经济。

但是，今天在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明天完全可能在热带

---

<sup>①</sup> 苏兹贝格，《未完成的革命》，纽约出版，1965年，第220页。



非洲发生。在热带非洲的军阀中间，这种趋势和欲望也将发展起来。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推测，受到帝国主义集团鼓励的非洲军国主义将给非洲国家尚未巩固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于帝国主义强国。帝国主义就是想用这样的办法，依靠军人一举达到几个目的。

但首要的目的是借军人之手，避免人民民主力量掌握政权，从而避免这些国家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和消除帝国主义的剥削。帝国主义集团将这一目的叫做“反共主义”，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简单方便，不如说是为了蛊惑人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还谈不上什么反对共产党。西方的宣传机器，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机器极力混淆视听，似乎他们的政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夺取政权”。在苏兹贝格的书中引用了美国教授加亚·波克尔的如下论断：“各国军官集团面临着一种选择——或是夺取国家政权，或是让共产党填补真空……为了在与共产党竞赛中取胜，军官集团需要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最近十年内，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力量集中支持软弱的文官统治者。我们能否更慎重考虑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最后一个良机，给军人以建设性的支持？”<sup>①</sup>

如果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通常指的是真正的爱国民主力量，波克尔的这种论点对理解帝国主义集团的立场和打算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打主意了。

---

<sup>①</sup> 苏兹贝格：《未完成的革命》，第220—221页。

新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浸透着反共主义的思想，只要看一看任何一个阐述西方强国在“第三世界”政策的官方文件，就可以确信帝国主义者所采取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都有明显的反共色彩。喋喋不休地强调“共产主义威胁”的论调本身就值得怀疑。华盛顿真的如此害怕在发展中国家传播苏联影响吗？

这不过是一种有意识地偷梁换柱的企图，真正的目的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领土上建立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控制，而“防止共产主义”的论调不过是一个幌子。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不过是个大骗局，其目的是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统治集团的反共情绪和“第三世界”内一部分保守的社会舆论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军事援助以及军事同盟的目的是掩盖“第三世界”广大地区从属于帝国主义祖国，使垄断资本家能够剥削它们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时代在变化。从前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战略是巩固和保持政治统治，以保证对殖民地掠夺的最有利的条件。现在帝国主义对从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战略是把这些国家保持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指望这一体系本身的规律使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处于落后的、不平等的、被剥削的地位。

但是只有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把它们保持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拒绝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即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剥削（当逐步实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和依靠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时）。因为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前的结构是

不现实的，指望在“第三世界”中发展资本主义便是帝国主义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帝国主义在这里遇到的障碍，正是代表资本主义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稳定性，没有群众基础和普遍的财力不足。这种现象的原因本书已作了阐述。因而帝国主义集团面临着—个任务——在主观条件不利，没有比较“可靠的”当地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设法促进经济落后国家朝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出路是寻找（至少在初期）某种“代替者”，即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事实说明，根据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这样的力量应是军队。

军队应为资产阶级的发 展打“掩护”，帮助它取得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帝国主义指望军政权在“第三世界”人为地创造建立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波克尔所说的帝国主义的那个“最后良机”。

可以换一种说法，这里指的是建立军人专政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上层建筑。这样的国家，其行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用残酷手段实行资本主义积累，这不仅要损害劳动阶层的利益，而且要损害私有者阶层的利益，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利益；如果需要，还要损害经济方面的利益。

这里我们又要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作用问题。这种作用总是非常大的，正如苏联学者奥斯特罗佳诺夫和斯捷尔巴洛瓦指出的，“在若干时代内，东方的国家不仅是社会分化为阶级而产生的工具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它本身还是产生阶级的根源……。”<sup>①</sup>

<sup>①</sup> 《新世界》，1972年，第十二期，第201页。

国家政权的萌芽产生于阶级以前，恩格斯写道：发展为国家的是“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sup>①</sup>。只是后来才产生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sup>②</sup>

两种矛盾趋向（即为统治阶级服务和脱离社会及超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斗争存在于整个历史，包括欧洲历史。强大的、独立的私有者阶级一旦兴盛起来，变成了领导者，前一趋势就开始占优势，第二趋势就会受到削弱。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封建制度兴旺时代中央政权的软弱性就清楚了。资产阶级只要成了领导者，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就完全控制了国家。

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统治下的东方，这样的事没有发生。由于缺乏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和至今还未形成大私有者控制整个经济，社会仍是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这就为提高中央行政权的声望创造有利形势。社会没有明显的领导者阶级，阶级分化过程还未结束，还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特点，小生产者占优势，但是它们很少或完全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范畴。这种社会是强大的国家政权的良好培养基。这种社会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分裂性、不均匀性，宝塔摇摇欲坠，很不稳固，其下层还未越出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二十卷，第162页。——译者）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十一卷，第194页。——译者）

其上层已经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民族尚在形成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很弱——所有这一切加强了上层建筑各部分的独立性，加剧了专横霸道的趋势。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些因素。只有国家才能动员必要的资金，积累资本，给最初几年不生利的企业拨款，去建立必要的国际经济联系，以获得原料和设备。整个思想气氛也有利于促进国家威望的提高。群众把国家看作保护者和捍卫者，寄希望于集体的努力，他们意识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黑暗和贫困。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城市下层社会和官僚阶级，形成国家政权的基础。软弱的经济支持和负担着庞大的政权。

在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私人资本主义一般不太可能成为政权结构的因素和确立资本家阶级的领导。至于国家资本主义那是另一回事。

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前面已经讲过。国家所有制部分对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是培养基（如果不说是料糟的话），而资产阶级化的官僚上层社会也能从它的发展中获利。但从另一方面讲，毫无疑问，“官僚资产阶级”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决不放弃直接掌握企业并与私人所有制部分勾结起来，当然也不会放弃国家杠杆。如果这样做获得成功，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非传统形式”（借用《再生周刊》的引文），采用这种方式，从历史上看，国家所有制部分的作用在于为逐步自立的资产阶级创造有利条件（原始积累靠国家）。

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能力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重任，

在世界科技革命时代,尤其如此,它缺乏能够动员群众的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所有这些使它难以实现上述方案。官僚上层社会执行着尚未形成的阶级的职能,但能否成为一个资产阶级,还是个问题。毕竟他们还不是资产阶级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化的上层社会,是资本主义方向的体现者。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不是已形成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工具,它作为一个主要生产资料的独立所有者而出现。苏联学者切什科夫写道,资产阶级化的上流社会是“某种特殊的社会团体,它使国家机器这个所有者人格化……。国家所有制又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在其基础上形成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新出现的特殊形式的社会团体。”<sup>①</sup>在《发展中国家:规律,趋向,前景》这部集体著作中曾经谈到,“国家机器正在组合和凑成一支社会内部力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稳定而长期的社会结构。”<sup>②</sup>这部作品的作者一致认为“不太可能的是,国家机器能够在发展当地资产阶级的基础上走上(或保持)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国家里这样的领导人和‘方向标’多半都是外国和本国垄断资本家。”<sup>③</sup>

外国资本(首先是“跨国”公司)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工业化的队长”。垄断组织也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极为成功

---

① 切什科夫,《发展中国家的“上流社会”和阶级》,《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0年,第一期,第38页。

② 《发展中国家,规律,趋向,前景》,莫斯科出版,1974年,第192页。

③ 同上,第191页。

的和有利的协作，但归根到底，在亚洲和非洲培植资产阶级决不是他们的本意。巴西的例子说明，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并无情镇压危害帝国主义利益的革命民主势力的军人专政，最适合外国资本的胃口。这种独特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帝国主义者来说，是极为可取的，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不仅如此，当这些国家的军人掌权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步改革，同时，在保持国家所有制部分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妨碍私人企业的发展，这时帝国主义还很关心鼓励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最近时期的事实表明，外国资本对埃及很感兴趣，因为在那里私人经济的产品不断增多，其外贸比重正在增加，各阶层人民之间收入的差距很大，在这里由于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而获利的富裕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明白的。如果在物质状况上，在特权上存在差别，如果存在高薪官吏和高薪军官的上层社会，设想这个上流社会不会施用各种手段，贪污受贿，不会依靠与土地所有者的亲属关系和依靠同外国公司的联系“顺便”发财，那是幼稚的。如果私有者统治了农村，那就很难避免不出现生意人、投机商、经纪人和在国家所有制部门活动的“新型的信托资产阶级”。政府在努力根绝这些现象，它不希望产生（在强大的、经济独立的私有资本的基础上）政治活动的独立中心，以致威胁革命民族主义统治集团的垄断地位。但同时政府又力图在这个小生产者中间寻求支持力量，而这种支持力量又必然会导致产生这些现象。

在当权的革命民主派中逐步出现分化，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即激进的和保守的。根据前面的一些论点，可以认为，

保守派小私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个保守派未必能建立“传统”形式的，即西方和日本形式的私有资本主义。这个保守派多半会导致特殊形式的、改头换面的、“热月的”<sup>①</sup>、有权势的上流社会的统治。这种上流社会依靠着官僚阶层，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是要在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外衣的掩护下。

帝国主义者们的如意算盘是：让发展中国家有特权的军人上层集团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与激进派对立，而使得这个军人上层集团同由外国资本“豢养”的本国上流社会发生关系来抵制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根据西方政治家的意见，这两个因素应导致这样结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尖锐，军队将更加保守，倾向西方。

很明显，尚未与资本主义决裂的经济落后国家，它本能地会使职业军人变成持保守观点的官僚集团。

在论述伊拉克军队的一章中已经指出，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都是非常有限的，其社会思想贫乏，并带有反民主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反知识倾向。视界的局限性和狭隘，不信任一切陌生的和不习惯的事物，固守陋习的禀性，宗教偏见和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是产生对共产党人怀疑的根源。

崭新的、巨大的、复杂的和多边的世界，其大门突然向落后的社会敞开，使人胆战心惊，显得不可捉摸和十分陌生。表露出一一种本能的愿望：即向往纯朴憨厚和稳定，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能够按照传统的、习惯的、能够理解的方法去认识，希

<sup>①</sup> “热月的”——即是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希做热月政变。——译者



望保持习惯的、不复杂的、甚至原始的精神财富和多世纪来神圣化了的观念。军事训练特别注意秩序、纪律、服从命令、观点和行动的统一性和规范化，培养军人对推理、对辩证法、对知识分子思维的敏锐性，以及对事物的广阔观点的怀疑，尽力使军人怀疑民主，甚至敌视（何况这种民主会与唯一熟悉的民主形式——即殖民主义者、“西方人”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混同起来）。越来越确信必须控制政治思想，因而也就必须控制政党和政治活动家。越来越害怕群众在有害宣传的影响下可能陷入“迷途”，走上“岔道”；因此对人民采取神父式的态度，这是“领导人民所必须的”，同时逐步实行独裁，以防止诱惑和外来的影响。

这些感情和观念，以充满民族主义和宗教偏见的总气氛为背景，促使对共产党人产生心理上的怀疑，把他们看成象“白鸦”（一种怪人——译者）一样，犹如不相容的、非民族主义和反宗教的力量。

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军官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发达的国家才有土壤。因为那里的社会早已分成为敌对阶级，因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群众运动自然要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旗帜下展开。在亚洲和非洲，社会是统一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实际并不大，只有同外国压迫者和定居国内的外国人的矛盾，例如欧洲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在埃及），华人（在印尼）等等，因此没有按政党特征划分社会的根据，没有阶级斗争的基础。相反，需要的是一切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党派斗争，国会制度，这一切都是别国的事，是怪风吹来的，不适合人民的思想，会削弱和分裂民族；按照他

们的看法，特别有害的是共产党人。因为第一，他们不断号召加强阶级斗争，从而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尖锐化；第二，他们用无神论破坏人民的信仰和传统；第三，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夺取政权和消灭全部对手；最后，第四，他们为“外国利益”服务，因此不能不把他们看成是一种国内的力量。因为这个缘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方，和本国共产党人作为另一方严格加以区别，似乎本国的共产党人是“传播外国人思想的，是把不适合于解决亚洲和非洲问题的方法带到本国来的”（甚至当这些方法在别国已经证明有效）。

这当然是扼要地和概括地叙述民族主义军官的观点，但不应忘记，在一些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不高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群众最易掌握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政治思想不够发达，他们最善于掌握的是“黑——白”的表达方式。

当然不应忘记，军官阶层并不是统一的群众。在武装力量中到处有政治觉悟高的人，他们可能高出于中等水平之上，他们能克服传统、偏见、成见和陈规陋习，他们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和思想实质。这样的军官在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力量内，特别在空军内曾经是不不少的。但绝大部分军官是处于中间状态。

是的，在各种事态合乎逻辑的影响下，上述那些观点可能改变。我们已经看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革命的军官承认了阶级斗争，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象纳赛尔这样一个“第三世界”最著名的军事首领也大大左转，最初他的政治观点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对共产党人往往持不友好态

度。纳赛尔承认了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已是他的主要观点），并吸收了埃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自己的政府合作，他的观点的转变比起许多还没有超出反帝民族主义的军官，显得“还左”。

一般来说，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都是不对的，如即使在为反动政权服务的军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军官能朝着进步方面深刻转变（直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我们已从秘鲁武装力量的例子看到这一点，在秘鲁武装力量内就有人认为需要向左急转和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造；结果便发生了秘鲁军队从反革命的寡头政权的堡垒中转变为革命的力量。我们再简单谈谈葡萄牙军人的作用。虽然葡萄牙不属于“第三世界”，但根据其很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特点，它很近似“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很近似“第三世界”中较发达的国家。正是由于其这些特征，葡萄牙在西欧是属于最后一位，其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仅为五百多美元；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额定资本的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外国资本家或者在他们全国的控制之下。这个国家既是无成效的，空虚的和无生气的，同时又是残酷的。它是欧洲最后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它还在进行绝望的挣扎，幻想抓住它在非洲的地盘不放；它是劫掠殖民地奴隶的无赖；它是一个可笑不自量的、发疯似地企图维护原有白人威权残余的“帝国”——这就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的葡萄牙。数以千计的士兵（葡萄牙青年之精华）牺牲在毫无希望的殖民战争中，庞大的军事预算把国家拖进了经济崩溃中；黑暗的制度没有发展前途，不能产生促使进步的内部推动力，任何演变都不可能。只有爆炸才能使葡萄牙

摆脱绝境，摆脱萨拉查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退步。

军队就成了革命的突击力量，这支军队曾经被政府看作是同政治警察一样，作为自己的支柱。

更确切地说，不是军队，而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组织，即“大尉运动”。

在发动殖民战争的军队的军官中怎么能产生反抗情绪？英国作者布鲁诺是这样描写这一奇怪现象的：“这些下级军官比有些人更懂得，殖民地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他们在非洲服役过三期甚至四期，直接接触士兵，这使他们非常了解伤亡情况，取胜的可能微乎其微。

“……假如他们不满的原因是害怕军事失败，那可以设想，运动可能是由斯皮诺拉这样的人领导的……但是年轻的军官首先根据个人的经验意识到了社会的危机。他们的薪金不高，通货膨胀冲击着他们。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就能够理解到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由于无止境的动员，他们的不满带上了政治性，为了使武装力量达到十五万人的数目，要求总动员，号召全部青年参加军队。军事学校内招收的不仅有大学生，而且还有党派积极分子，因为在他们面前只有一种选择，进监狱或军队。而且党派积极分子告诉我（虽然这一点很难证实），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都鼓励自己的战士参加武装力量，特别是要打入到军官阶层中，以便促进军队的激进化。这样就使得年青军官‘政治化’，他们就会把战争的原因同国内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sup>①</sup>

<sup>①</sup> T.C.布鲁诺，《葡萄牙的改变》，《今日世界》月刊，1974年，7月号，第282页，283页。

只要弄清了问题的实质，认识到必须采用革命进攻的手段才能摆脱困境——这就有了基础。下一步就应表现出行动的意志和建立秘密组织。葡萄牙军官阶层的可敬之处是，他们中间有真正的爱国者，有勇敢和意志坚强的人，有思想进步，决心拯救葡萄牙的人。“大尉运动”结束了法西斯制度：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成了葡萄牙自由的春天。在已经形成、但未最后定形的政治制度内，武装力量运动是指导力量。当然从历史的眼光看，葡萄牙的法西斯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但如果没有革命军人的行动，那就很难说它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失败的巴勒斯坦战争推动了埃及年青军官的革命行动。类似的例子在别的国家还有。历史雄辩地证明，军事上的失败比任何别的因素更能促使腐朽的反动政权崩溃，因为这样的政权不能向进步演变，而且还要抵制成熟的社会变革。军队作为这种政权的产儿和堡垒，再不是忠诚的；士兵的士气低落，最高司令部的威信急剧下降，军官之间不再团结，中下级军官“感染”上反抗情绪，在他们的中间出现了革命分子，形成组织，领导军团向政府进攻。

迷恋于对外冒险的反动军政权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本书已经论述了巴基斯坦军政权的崩溃：它在东巴制造了流血的冒险，其结果是导致了印巴战争，军事上的失败使得这个军阀官僚独裁政权遭到可耻的垮台。还可以引用希腊的例子，由于在塞浦路斯进行狂妄的冒险破产，“黑色上校”军政府遭到了惨败。雅典军阀在塞浦路斯掀起的叛乱出现了倒戈，反对它自己。

这种现象是有一定规律的。军人独裁政权在它不能解决

内部问题时，就想用对外战线上的成就来补偿自己的失败。独裁政权的荒谬逻辑使它走上冒险的道路，而冒险失败时，也使它无路可走了。

这样，经验证明，左倾的进步观点可能在保卫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利益的、并受过相应教育、训练、锻炼和考验的武装力量军官阶层中产生，虽然表面看来，好象在这样的阶层中产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促使更多的军官具有这样的观点，并在军队里使反抗的政治运动酝酿成熟，就要使政府陷入困境或威信扫地。可以推测，智利法西斯集团也会由于人民中积累的愤怒与憎恨对武装力量的影响，而早晚要垮台；参加推翻独裁政权的队伍一定会包括军队，或军队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现在不管人民群众如何憎恨皮诺切特政权，但它在军官看来还不到彻底垮台的时候；大多数军人认为它还不是那么令人反感和不可挽救，以致从军队集团本身的利益出发也必须加以消除。

谈到军队的进步作用，必须注意到如下情况：第一是，当在亲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反人民、贪污腐化和威信扫地的政权统治下，或文官政府不能对极为落后腐败国家进行变革时，诚实爱国的军官就要进行自己的控制，以拯救祖国，使国家摆脱落后和屈辱的困境，推翻外国压迫和封建主义，开始革新过程。第二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具有进步思想的军人将是进行深刻（客观上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的倡导者。

本书关于第一种情况的例子已讲了很多。在埃及、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军队的进步作用

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了。我们还看到另一种典型：如缅甸、索马里和秘鲁。军队不仅有第一种倾向，而且有第二种倾向，即不仅有民族主义的进步作用，还有社会进步作用。这里的问题在于作为民族主义革命者的军人和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军人之间的区别。前者不一定会成为后者。要求结束外国统治，打倒大地主或推翻贪污腐化的上流社会的政权，并不意味着会自动认识到必须反对社会不平等，反对“自己的”有产阶级剥削。民族主义分子、反帝国主义分子、爱国者、贵族和大地主的反对者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进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拥护者。其中一部分停滞不前，另一部分继续前进，不断发生分化。上述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反共主义成见，各种社会关系（首先与新老有产者的关系），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以及集团利益等等，“阻碍着”很多军人前进。如果“第三世界”爱国军官的“民族革命性”是必然产生的，那末他们的“社会革命性”则是有条件的，不一定必然产生的。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第三世界”的军队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革命作用，但在深刻的社会革命阶段，一部分军官就可能出现保守的和反民主的倾向。这样的倾向乃是受他们“特殊的”（恩格斯语），即集团的利益所制约的。帝国主义指望的正是这一点。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内，如把军队看作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和社会的领导者，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保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沿着真正民主和进步道路发展的唯一条件，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政党。这样的党应该去领导军队，使军人摆脱“上流社会”和帮派习气的

精神枷锁，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的历史是最好的典型，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可靠工具。

资产阶级的职业军队不仅不可能成为革命改革的领导者，而且，如果这些改造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时，它就连中立也不保持。人们可以从加纳的例子，或更明显地从智利的例子看出，武装力量在保持原有的资产阶级职业团体性质的条件下，指望它能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幼稚的。

关于革命人民能否起来与反动军队斗争的问题，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如果军队士气沮丧，没有统一的意志，把自己看作是业已崩溃的陈腐制度的一部分，如果军队的职业信心和职业团结因失败的战争而遭到破坏，等等，那末这样的军队在行动起来的人民面前，便会土崩瓦解。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到一九六四年的苏丹。在这些情况下，军队可能是：第一、分裂出去的那部分可能转到革命方面，第二、军队不转变，只采取自卫措施，以防止憎恨政府的人民的袭击，因为这个政府的代表是军队。

智利的经验直接说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军队对于社会究竟能“独立”到怎样的程度，以及它有多大的独立自主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分析军队时都没有产生什么怀疑，他们认为军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sup>①</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作品都阐明了关于可能产

<sup>①</sup> 见诸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草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国的阶级战争》，《意大利的革命》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生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的问题，关于官僚阶层的作用和它的权力欲的问题，关于“人为的帮会”问题等等。要研究这种国家官僚阶层，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它与军队的关系。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军队（更确切地说，它的上层）是官僚阶层的一部分，是军事官僚阶层。它具有官僚阶层一般所具有的各种规律和特征，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官僚阶层脱离社会和统治社会的倾向，军队也完全具备。

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御用军人的统治》一书中极为重要的一段：

“不过，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统治阶级，都依靠军队作为它反对敌手的 *ultima ratio*（最后论据，极端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注），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统治，即维持他自己的王朝。”<sup>①</sup>

这一段述评是针对第二帝国的。使我们想起正是针对着第二帝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概论中写到关于“最终和最高表现的国家政权”和“甚至侵犯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因此马克思所指的正是军队的统治，这个军队乃是从自己的

---

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的崩溃问题》等等。

<sup>①</sup> 马克思，《御用军人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第十二卷，第429页。——译者）

利益出发，并且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反对统治阶级。

恩格斯也指出军队能起独立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他不仅在写到国家政权和官僚机构具有暂时独立性时间接地讲过，而且还直接讲过，例如他说（已经不是指法国，而是指德国），“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sup>①</sup>

这不是恩格斯论述军队是决定性力量唯一的一处。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书中他还写道：“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暴力。”<sup>②</sup>俄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证明，只有当第一种力量军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保卫国家这个压迫工具时，而第二种自发的力量才会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有组织的力量，这时才能取得胜利。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军队可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和相对自主的、追求它特殊的团体利益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一论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国家学说中的一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在不稳定的和内乱局势中，在社会进步时期，军队起着独立力量的作用。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上的一个例子。苏联历史学家乌特昌科指出：“在罗马的政治形势下，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在城市平民的民心涣散，农村人民冷漠消沉的情况下，只有军

---

<sup>①</sup>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八卷，第62页。——译者）

<sup>②</sup>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十一卷，第491页。——译者）

队才是唯一可靠的支柱，起着明显的、在那种条件下最团结的政治组织的作用。”<sup>①</sup>凯撒明白这一点。“凯撒对罗马的‘民主派’失望了，不把他们看作可靠的支柱，他完全有意识地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组织——罗马军队代替了这个腐朽的、已不起作用的政治力量。”<sup>②</sup>

我们再回到现代。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提要中指出，军队“在一定情况下倾向于支持凌驾于各阶级和各阶级利益之上的政权。”<sup>③</sup>

发展中国家的军队不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出身的人的总和。在服役过程中，这些“不同出身的人”获得新的品质，结合成一个新的组织。军队作为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具有集团的特征，有它自己的利益（当然利益总是不尽相同的）。

任何闭塞的、孤立的组织都可能滋生帮派习气，脱离社会，变为自我满足的组织。军队也不例外。职业团结性可能发展为小团体主义，而小团体主义可能发展为帮派习气。“优等”职业的骄傲感可能变为超越于“文官”之上的优越感。

本来是在西半球出现的口号：“政治属于政治家，祖国属于军人！”而在今天，尤其明天，这个口号就可能响彻亚洲和非洲。“军队是国家唯一的大党”，这句话捏的是巴西，<sup>④</sup>但同样

---

① С. П. 乌特昌科，《罗马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莫斯科出版，1965年，第197页。

② 同上。

③ 《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提要》，1971年，第12页。

④ 《世界报》，1966年10月6日。

也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

法国学者韦尼埃写道：“在从前的传统社会里，军人没有突出于一般群众。他不属于特殊团体，不属于个别‘小集团’。无疑，很多军人出类拔萃，夺取了王位宝座，但是他们个人的成功，丝毫不改变他们的军界体制结构。提升的正常途径不是军人职业，而是‘权势人’的职业、宗教职业。今天一切已改变了。”<sup>①</sup>黎巴嫩报纸《东方报》写道，军队已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sup>②</sup>

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就其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的集中性能与军队相比。最主要的是军队拥有武器这一实用工具，随着武装力量(军队和警察)技术装备的提高，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有威力和不可抗拒。自动武器大大加强了军人镇压人民起义的能力。

“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集团看到了这一点。原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写道，“现代化武器的技术改进给了军队以巨大的镇压能力。一个有装甲车、手榴弹和机关枪的突击排，今天就其威力而言不亚于从前的一个营。”<sup>③</sup>

军队对维护“内部安全”的作用近来大大提高了。因为“内部安全”——这不是军事范畴，而是一个政治范畴，所以可以说，军队正是作为政治因素，更确切地说，作为内部政治因素，其作用也就提高了。这种情况军官们和将军们非常清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优越性和有利

<sup>①</sup> 韦尼埃，《中东的军队和政治》，巴黎出版，1966年，第220页。

<sup>②</sup> 《东方报》，1963年6月5日。

<sup>③</sup> 《拉丁美洲和社会发展》，智利圣地亚哥出版，1966年。

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正是意识到自己是超越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社会机构，同样他们也就意识到自己是超越于所有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之上的，这就不能不诱使他们“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根据这一原因，《再生周刊》杂志写道：“在经济落后的社会里……从国家的社会机构中分离出来的享有特权的军队是唯一的有效力量，它有垂直的体制，在社会意识和文化方面都具有同等水平。军队是任何一个现存政治集团（包括统治集团）不能与之比拟的力量……它是不依赖国家机关和政府的一支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力量。这支力量比国内其他有影响的力量更加现代化和有效率，正因为它没有任何政治依赖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就会突出自己，提出将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服从于它的集团利益；它甚至置各经济集团的战略利益于不顾。”<sup>①</sup>

我们感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论点应当批判和修改。即军队的“相同水平”也就是相应的知识水平。亚洲和非洲的军队由于出身的阶级和阶层不同，其知识水平也不是相同的。主要的反对意见是针对作者关于军队完全没有“政治依赖性”的论点。

关于军队的相对自主和独立只是指社会经济和政治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的。在“第三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们又引用智利的悲剧教训），军队上层事实上并不把自己的利益和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的利益分开。阶级本能促使智利的将

---

<sup>①</sup> 《再生》周刊，1967年6月5日。

军们反对革命，虽然人民政权决不会触犯军人的直接利益。

甚至即使由于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使得军队能够有明显的行动自主，能“脱离”社会，去追逐自己特殊的集团利益（主要是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特权地位，保证不进行任何军队所不欢迎的政策），这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军队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军队客观上总在促进社会经济沿着某种道路发展，以适应某一个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例如，独立的、对外甚至侵犯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波拿巴政府，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客观上反映了某些阶级的利益，其中包括小农经济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官僚上层，尤其是皇帝本人主观上同这一农民阶层毫无共同之处，也最不关心他们，然而这一点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另外一点：波拿巴政府所执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总的来说符合小农经济利益，维护了防止小农经济瓦解的条件。

军队取得政权后，要处理实际的国家事务；因此它自由或不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某些经济发展方针，适应某些阶级的利益，同时要触犯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既可能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推动国家经济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这一点与其说决定于其领导者的主观意志，不如说决定于社会条件。

军队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和从事活动，它所处的环境是充满思想斗争的社会。军队不能成为社会上的孤岛或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社会的进步力量会舍弃资本主义，寻求别的路。

因而，归根到底，一切并不取决于军队，而取决于社会，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劳动群众成熟的程度和他们能否站在先锋队一边为进步和独立而斗争。



2 028 1029 9